

香港製造

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

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作者 韓墨松 (Peter E. Hamilton)
譯者 鄺健銘

目錄

推薦序（一）	跨商與香港——重新思考「香港模式」／	12
推薦序（二）	◎王迪安（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研究香港所需之視野／	16
推薦序（三）	◎冼玉儀（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教授） 左右逢源的跨商和載不動的香港／	20
推薦序（四）	◎郭慧英（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研究教授） 從香港跨商的社會網絡重思全球資本主義史／	28
推薦序（五）	◎鄭祖邦（台灣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流動香港：跨商網絡、資本與亞洲全球化城市之誕生／	34
推薦序（六）	◎莊嘉穎（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從基督教歷史研究角度看「香港模式」發展歷程／	40
	◎洪善丰（美國杜克大學宗教研究系（普世基督教）博士候選人）	

繁體中文版作者新序

全球史與香港角色 / 46

◎ 韓墨松 (Peter E. Hamilton)

導讀

香港歷史研究補遺——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前世今生 / 54

◎ 鄺健銘 (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導論

/ 69

第一章 中國精英之花果飄零——香港作為難民據點的前世今生 / 109

1.1. 香港跨太平洋網絡之成形 / 115

1.2. 長江流域的美國連結 / 122

1.3. 中國精英的去留抉擇 / 131

1.4. 香港——在華之英國？ / 143

第二章 基督教徒之花果飄零——美國資助教育之建立與香港發展 / 157

- 2.1 歐美傳教士在港活動簡史 / 163
- 2.2 傳教士與港英政府之協力 / 174
- 2.3 傳教士學校中的美國影響力 / 181
- 2.4 香港發展與美國網絡 / 191

第三章 香港教育之花果飄零——難民學校發展史與美國 / 195

- 3.1 崇基學院之成立與發展史 / 200
- 3.2 新亞書院之成立與發展史 / 215
- 3.3 浸會書院之成立與發展史 / 218
- 3.4 小結 / 227

第四章 李卓敏、香港中文大學與跨商策略 / 231

- 4.1. 李卓敏作為決斷的跨商 / 237
- 4.2. 李卓敏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 246
- 4.3. 香港中文大學作為跨太平洋大學 / 247
- 4.4. 中大開設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 254
- 4.5. 跨商精英與中大發展 / 261
- 4.6. 小結 / 267

第五章 投資與解殖——親美精英之社會資本與香港產業發展 / 271

- 5.1. 香港產業發展與精英社會資本 / 276
- 5.2. 案例：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 / 282
- 5.3. 外來直接投資與香港經濟發展 / 292
- 5.4. 案例：美國兩大企業之在港投資 / 300
- 5.5. 小結 / 310

第六章 跨商效應——香港教育網絡與經濟起飛 / 315

6.1.	香港學生旅美現象	/	320
6.2.	案例：胡應湘從美國回港的發跡故事	/	322
6.3.	非精英留學生的抉擇	/	324
6.4.	香港學生的留學取向	/	327
6.5.	香港網絡與國際技術人才分佈	/	333
6.6.	跨商與香港經濟轉型	/	334
6.7.	小結	/	343

第七章 香港跨商作為中國融入世界的引路人 (1971-1982) / 347

7.1.	香港、新自由主義興起史與中國改革	/	350
7.2.	中國透過香港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路 (1971-1978)	/	354
7.3.	香港對中國改革發展之預測與美國商會本土化之源起	/	361
7.4.	香港與中國經濟實驗之試行 (1979-1982)	/	369
7.5.	小結	/	378

第八章 香港跨商與全球新秩序 (1982-1992) / 381

8.1. 中國改革實驗與香港 / 388

8.2. 香港精英與中國大陸協議之履行 (1984-1989) / 395

8.3. 六四之後的跨太平洋網絡與香港 / 402

8.4. 小結 / 415

第九章 結論——香港作為東方熱內亞與「漫長世紀」 / 417

9.1. 香港跨商策略作為新自由主義發展之推力 / 420

9.2. 香港、世界與中國 / 427

9.3. 歷史中的熱內亞與香港 / 429

推薦序（二）

跨商與香港——重新思考「香港模式」

王迪安（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副教授）

外國領事館，聳立於當地政府總部建築群中，實屬罕見。這正是香港二戰後的布局：美國領事館比鄰港督府，週邊香港政府決策機構林立，對望英軍軍營，俯瞰滙豐及中國銀行總行。領事館得以盤踞如斯要塞，美國在戰後香港的重要性該一目了然。

香港歷史研究的盲點

然而香港歷史研究一貫側重中英關係。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著作《香港製造：跨太平洋

《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把我們的視野轉移到香港在中美交流中發揮的作用。二戰後，尤其是在冷戰的關鍵時期，香港處於有利的地緣政治位置。位於中國大陸南端的英國殖民地，香港成為跨太平洋網絡聯繫中美的樞紐，從而發展成一個日益繁榮的全球中心。《香港製造》不僅敘述了香港的故事，更解釋了二十世紀下半葉香港在全球網絡的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韓氏稱之為「跨商」的務實香港精英，在地緣政治急速變動的背景下，編織了一個鏈接起香港的社會生態系統，並熟練地遊走其中。在二戰後的英治香港，跨商憑著他們在美國的關係及其連帶的社會資本，於竹幕的邊緣大展拳腳。正如香港民政司黎敦義一九八三年在一次對美國商會的演講中所言：「憲法上，香港事務歸英國所管。在經濟範疇，美國則具更大影響力。」（見第五章）一群有進取心的跨商利用流動於冷戰前線香港的信息、資本和技術，擺脫了英帝國，加緊參與了跨太平洋循環，把重心轉移至美國帶動的國際體系。通過商業活動和教育事業，韓氏所描繪的跨商，促進中國通過香港聯繫上以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體系，並在此過程中，鞏固了他們在香港的社會地位及獲取經濟利益。

「香港模式」與港美關係

建基於藏於世界各地的重要史料，《香港製造》闡述了這群精英在香港跨代積累的社會資本。這些顯赫家族早在戰前扎根於內地，並在美國大學通過社交活動擴闊了他們的國際脈絡，巧妙地部署了橫跨中外的關係。跨商通過高等教育建立的美國聯繫，在香港的戰後發展無比重要。韓氏並不單純地接受香港「國際化」的進程，反將香港的轉變定義為「一個偶然、無以為繼、相當不公的過程。」（見導論）高等教育確實可以帶來跨文化社會資本，並將之轉化為經濟資本。精英家庭多代的努力經營，效果尤為明顯。在香港，美國參與建立香港中文大學和其他高等教育機構，為香港的普羅大眾帶來向上流動的機會，可是跨國社會資本的培養似乎仍然是上流社會的特權。

《香港製造》彰顯了美國在香港發展中的角色。可以理解的是，香港居民（無論是在過去還是現在）似乎都沒有注意到涉及美國的幕後政治和商業活動。儘管美國對香港繁榮堅定不移的支持，重要性不亞於英國的參與，在中英就香港前途進行談判的關鍵時刻，美國明顯缺席。英國提供了一個特殊的合作夥伴，二戰後的港英管治為跨商製造了條件跟美國體系合作。宏觀當代的國際大勢，美國在香港的隱蔽運作，在冷戰時期的佈局，可曾是比比皆是？猶如英國的日衰勢力，在這過程又是否都仍具不可或缺的影響力？

跨商巧妙的部署，把香港從不再是如日方升的大英帝國轉向美國領導的體系。在殖民地香港的暮年，各方避開了看似不可能的障礙，並在一九九七年憑藉跨商資源（一如香港特區首任長官董氏家族的網絡）精心策劃了一個相對無縫的過渡。香港能否繼續依靠該類中美網絡，實現持續的經濟增長？在現今不穩定的國際環境，中美對峙，世界經濟越見疲弱，《香港製造》描繪的歷史過程具有指導意義。二十一世紀中國崛起的同時，美國力求穩守主導地位。香港要再接再厲，在這新環境中開闢一條前進的道路，當要以韓氏論述的歷史為鑒。

推薦序（二）

研究香港所需之視野

冼玉儀（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名譽教授）

香港歷史研究近年來發展得很快，有關的書和論文接踵而來，學者探索了不少新課題，有時候不禁給人一種「還有什麼題目可以研究？」的感覺。韓墨松（Peter Hamilton）在這個「擁擠」的情況下，能寫出一本令人耳目一新的書來，實在難能可貴。除了嶄新的主題，他還利用豐富的史料，包括收藏在世界各地圖書館、檔案館的文獻資料，和訪談得來的寶貴口述資料，還有在地的體驗和敏銳的觀察，用活潑而精煉的寫作手法，完成矚目之作。

研究香港之視野

我一向支持濱下武志教授在《香港大視野》一書提出的觀點，要真正了解香港，不能只著眼於這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彈丸之地內所發生的事，而必須把視角放得更高更遠，透視到香港怎樣受外界大環境的影響，而又怎樣利用那些外在因素發揮本身的力量和精神。韓墨松的《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採用這途徑，研究香港和國內和國際之間扮演的角色，清楚地證明要先了解那些長期以來建下的千絲萬縷的關係，才能了解到香港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他尤其將香港在近現代中國和中美關係歷史中從新定位，是很大的突破。

對我個人來說，這本書特別有意思。我生在香港，長在香港，書裡面提及的人物，有我認識的，提到的事，有我親身經歷過的。其他的人和事都大概在媒體看過、聽過，似曾相識，並不陌生。看這本書以前，那些人物、事件，只是我生命裡很多的點滴，從來沒系統地梳理過或者分析過，只是些常識，甚至只是些零碎記憶而已。韓墨松對香港的研究，聚焦的正是人和事之間的關係，包括了政治的、經濟的、教育的、文化的、宗教的、家庭的關係，他梳理了無數明顯和不太明顯的脈絡，分辨出跨地域、跨世代、錯綜複雜的網絡，從而勾畫一幅既充滿動感又多維度的歷史大勢圖出來。多耐人尋味！

以新視角回望香港

這本書讓我從新回顧香港的那些人和事，教我用新的方法和角度思考我成長的地方，從新探索我自己過去的幾十年，領悟到原來我是在這樣的一個環境活了那麼多年。我本來就是「香港製造」("Made in Hong Kong")，只是現在對香港有了多一層的認識，就是對自己也有了多一層的認識。

這本書帶給我衝擊，也帶來了喜悅，令我感恩。

推薦序（三）

左右逢源的跨商和載不動的香港

郭慧英（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研究教授）

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的《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一書，以國際政治經濟結構為經，跨商策略為緯，編織出對二十世紀後半香港與世界發展的新圖像，開宗明義挑戰以文化取徑來理解所謂「亞洲四小龍」（台灣、香港、南韓和新加坡）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經濟發展。這派學說將香港放諸於東亞區域研究的範圍裡，主張由於儒家文化對家庭倫理和人際關係的重視，東亞資本主義的發展形成以家族企業為主、國家經濟政策為輔的特殊型態。此一觀點的代表著作，有高偉定（S.

Gordon Redding) 在一九九〇年出版的《華人資本主義精神》(*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和韓格理 (Gary G. Hamilton) 於一九九九年所編著的《寰球資本家：二十世紀末的香港與離散華人》(*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等。韓格理的分析首先點出香港的特殊性，在於其作為離散華人資本的首都，並開創出與日本不同格局的資本主義。香港中心的離散資本主義以家庭企業為主體、集中在輕工業和商業貿易；日本明治維新之後的資本主義由國家主導，發展重工業和大財閥。《香港製造》反對這種將亞洲社會視為與西方文明絕然不同的本質化論述，並強調香港資本主義不只與日本有別，更不同於新加坡、台灣和南韓。

關於二戰後香港與跨商

關於戰後香港特殊的政經背景，政治學者曾銳生 (Steve Tsang) 的《香港現代史》(*A Modern History of Hong Kong, Bloomsbury Academic 2003初版*) 即提出英帝國在失去香港三年零八個月後，為了重新續命，在施政上必需順應民情，於是在一九八二年中英前途談判前，已有廉政公署、公共房屋和「兩文三語」（以中文和英文書寫；普通話、英語和粵語的對話）、接受大陸移民等有

助當地社會發展並能提升港英統治合法性的政策。《香港製造》則將當地的政經背景拉到更為鉅觀的國際體系，即美國在太平洋戰爭之後在亞洲的擴張；在英國仍為香港宗主國的最後半個世紀，美國已透過教會辦學、企業管理知識和工商金融投資而對當地形成廣泛而深入的影響；而串連起美國、香港和中國大陸之間的中介者，即是本書所稱的「跨商」社群。

本書所認定的跨商，是那些移居到香港之前即有美國淵源，且在冷戰時期透過美國關係發展工商資本的企業家。以具體指涉的對象而言，這些跨商多半是那些在國共內戰之後，隨著國民黨撤離中國大陸而南下香港的上海工業資本家，其子嗣活躍於香港的政界與公共事務，像是第一屆香港特首董建華為東方海外航運公司創辦人董浩雲（1912-1982）長子、南海紗廠創辦人唐炳源（1898-1971）家族的唐英年（其父唐翔千為唐炳源的堂姪）則擔任多屆香港立法局議員和財政司要職。這些家族皆熱衷送子女進入入學條件嚴苛的美國大學接受教育，並與有相似社經地位與教育背景的家庭通婚。

但跨商並非單指戰後在香港的上海幫，畢竟該社群並非以固著的鄉籍、語言或宗族來界定，而是以採取相似的行動邏輯、文化偏好，和重疊的社會關係來推論。舉例而言，廣州出身的教育家李卓敏亦是發揚跨商策略的中堅份子。李氏於香港中文大學提倡以實業主義為宗旨的商業與財經管理等相關課程，而使得美式工商企業文化深入香港民間。換句話說，跨商是戰後從中國離散到香港的

華人移民精英，他們支持美國實用主義教育和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雖然這些跨商大多與國民黨交好，但他們選擇以香港為基地而非隨著國民黨逃離到台灣。主要的理由是，相較於在冷戰時期處於戒嚴令管控下的台灣，港英政府的經濟和文化政策更為自由放任，也容許基督教會開辦易與美國教會接軌的學校。

跨商的形成，因此不能化約成東亞區域文化裡的華人商業網絡，而必需放諸二十世紀後半香港的特殊國際連繫來探討。幾個重要的時間轉折點如下：從一九四九年中共建國到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尼克遜撤銷對華禁運前，香港是跨商聯結世界的據點；一九七〇年代之後，香港的美國關係成了跨商進入中國市場的重要資源。具體而言，戰後跨商從香港擴張到中國市場的契機是一九七二年尼克遜訪華，在此之後，在港的美國公民便開始接觸中共官員、籌謀與中國企業的合作。也就是說，在社會主義中國於一九七八年推動市場開放之前，香港的美式企業文明已開始影響中國，而成為社會主義中國經濟改革的源頭之一。

關於跨商策略

從冷戰時期的親美反共，到後冷戰時期發展出與美國及中國的雙向關係，跨商策略的根本之

道，即是務求彈性、確保利益不因為一時一地的政治取向而損及家族長遠利益的發展。在終章，作者引用學者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針對全球資本主義的起源與發展所提出的創見，將本書的香港與十四世紀末的地熱內亞（Genoa）進行比較。當威尼斯（Venice）商人掌握地中海東部的商貿路線，熱內亞商人轉而投資西班牙的海貿，從而掀起了十六、十七世紀的歐洲擴張；二次大戰之後從香港發跡的跨商則因中介中國與美國的經濟交流、促成一九七〇年代以降的全球化和中國的崛起。

雖然本書試圖繞開儒家文化與資本主義發展這個命題，但跨商策略裡家庭的角色——亦即跨商再生產的面向——仍然呈現出不可化約成經濟邏輯的特殊文化價值。具體而言，跨商對於「家」的執著，表現在對子女教育的重視、從下一代當中挑選並培養企業接班人、於不同跨商家族之間的通婚等等，都反映出為維護並力求家族利益和聲望能代代相傳的文化思維。

而一旦正視跨商的家族觀念，或當更能重新回到文化的角度來思考跨商在不同國際聯繫下的身份認同問題。本書在第一章回顧以「海外華人」認同為主題的文獻時，批判既有研究的盲點：「國際聯繫與除政治身份以外的動機都會易被忽略。」而本書對美國百人會的分析，則點出了香港的美國聯繫如何在影響跨商的政治身份之餘、同時形塑香港與美國兩地的關係。該會成立的背景如下：繼一九八九年六月中共鎮壓北京天安門的示威群眾和學生而面臨美國多項制裁後，由唐炳源之子唐

騮千和其他包括大提琴家馬友友在內的美國華裔領袖，為促進中美兩國民間多方了解與互惠交流的情況下而創建此組織。在美國，百人會為華裔及更廣泛的亞裔爭取平權；在亞洲，百人會同時與北京、香港和台灣政壇皆建立良好關係。而為了能同時應付這些不同的國家立場，百人會在國際上的發展模式，「是依賴精英間相互結交連繫，同時將政治、人權、去工業化等具爭議與無助牟利的議題置於邊緣」（第九章），這亦是跨商策略的體現。

《香港製造》與當下國際形勢

總之，本書以獨特的視角闡明二次大戰後的香港，如何成就那些為逃離共產黨而南下的工商資本的跨商策略，以及這些彈性與趨利的跨商策略如何有助於冷戰時美國利益在東亞的擴張，和後冷戰時期中國改革開放政策的確立和發展。作為穿梭中國境內與海外的跨商網絡，在世代傳承的過程中，有些選擇立足美國、有些留在香港，亦有些北上中國，並不拘泥於特定空間。如此看來，香港作為戰後從上海飄零南下的工商資本的集散地，當這些資本企業開枝散葉於太平洋各岸之後，其萌生的花果卻不必然會回流香港。回到阿銳基對資本主義歷史轉型的分析，在熱內亞商人帶動十六世紀歐洲擴張後，全球金融中心即轉到阿姆斯特丹（Amsterdam），後又為倫敦和紐約相繼取代。本

書所論的跨商對美國關係的重視，所反映的亦是二十世紀後半以紐約作為世界資本中心時的政治經濟現況。而面對當前中國與美國日趨緊張的國際競爭，跨商會如何調整其策略？特別是於二〇二〇年六月三十日之後，當中國將香港方面的美國聯繫放在國家安全的架構去防範和懲治，跨商的因應策略又會如何影響二十一世紀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本歷史著作因此對思考當下國際情勢有極大的啟發。

本書原是英文學術著作，當中包括諸多中、港、台人名和地名自然都是用英文拼音呈現，對於已知這些人物和地方但不熟悉其中、粵、英文名稱轉換的讀者而言，如今有此譯作出版，並由對香港、新加坡皆有研究的季風帶文化總編輯鄭健銘親自翻譯，於華文讀者實是一大裨益。

推薦序（四）

從香港跨商的社會網絡重思全球資本主義史

鄭祖邦（台灣佛光大學社會學系副教授）

在《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一書中，作者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嘗試為我們解答戰後香港經濟成長之謎，何以香港能夠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樞紐城市？他認為答案不純然在於英國治理下自由主義經濟市場的形塑，也不是亞洲四小龍中強調政治指導的發展型國家論述（台灣、韓國、新加坡），當然更不是去強調儒家倫理下紀律勞動此種韋伯式論題。他聚焦在一群人身上，這群人在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二年期間先後逃離共產主義中國而移民香港，在他們之中包括了銀行家、工業家、行政人員、學者、國民黨技術官僚，作者將其稱之為「跨商」（*straddling merchants*）。正是

這個精英階層所構築的跨太平洋社會網絡，形塑了香港戰後經濟起飛的軌跡與樣貌。更重要的是，如果忽略這群擅於流動、務實、適應力強的跨商角色，我們便會無法理解戰後由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如何在西太平洋一帶形成？中國的經濟如何走向出口主導的模式，在改革開放後重新融入全球體系？作者的企圖正是要揭露這個以香港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發展史，他要將一九四五年之後那些不太引人注目的跨商社會網絡置於每一位讀者的眼皮底下，這些人如何共同協力影響著香港經濟、全球資本主義，乃至於中國崛起的故事。

美國社會資本與英屬香港之非正式解殖

我想大多數的讀者可能會跟我有一樣的想法，就是理所當然地認為香港是一個深受英國殖民影響的城市，英式的法律與金融體系對香港的經濟成就至為關鍵。然而，本書的作者卻嘗試告訴我們一個全然不同的故事。亦即，香港的經濟成就與這些經過革命、戰亂而花果飄零到香港的跨世代精英們（跨商）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些人憑藉著家族的資源敏銳地意識到，國家權力的轉移以及戰後以美國主導的全球化向西太平洋的擴張。他們在一個英國殖民的土地上，卻孕育經營出龐大的跨太平洋網絡，在美、中經濟體之間扮演著樞紐角色。所以，不是強有力的政府，而是這些「非國家

角色」影響著美中關係的形塑、美國主導的全球化資本主義進程，並讓中國重新融入全球體系。他們選擇與英國帝國體系漸行漸遠，透過跨太平洋網絡活動，向美國帝國體系靠攏以迎合新的國際秩序，他們與美國有聯繫且願意為美國帝國擴張服務，藉以獲得自己的安全與物質利益。作者認為這些帝國的協力者並沒有被反殖民的浪潮所消滅，反而香港跨商的行動策略對原本英殖時期的經濟權力關係與特權賦予了新的形態，作者稱之為「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

乍看之下本書的主題似乎是一個屬於巨觀結構或政治經濟學分析的研究議題，但是，作者卻極具巧思地側重於從社會網絡中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經由同學、同鄉、婚姻等建立的社會關係）來理解香港對全球化經濟發展的影響。作者聚焦於跨商精英之間的互動，分析這些社會關係如何發揮功效，促進資本的流通（銀行的融資、美國的直接投資），最終建立家族與個人的經濟成就，同時又將香港推向全球經濟的樞紐位置。而這些社會資本的累積又與跨商採取的美式教育策略密切相關。作者提到一個有意思的歷史實例就是，一九七〇年代香港利用美國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的紡織品出口商，與此同時香港也是美國院校最大留學生的來源地（特別是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香港成為美國留學生最大來源地。這些原屬江南地區（江蘇、浙北、上海）的紡織工業家，其家族就一直重視美式教育，這些人中有六成曾在美國留學或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學校就讀，並且留美也是對其下一代的精英教育策略，最終可為家族跨國生意鋪路。發跡於無錫的唐氏家族

（唐炳源及其子唐驥千）正是書中顯例，唐驥千就時常想起父親的座右銘「個人成就、名聲與教育，才是人生重要之事。」所以，社會資本為經濟資本的累積扮演著關鍵的角色，有助於金錢與權力的集結。作者還告訴我們，美國的教育工作也是帝國擴張計畫的一部份，美國高等教育讓資本主義全球化增速，美國高等教育成為知識、精英社會網絡、文化行為、市場資訊的發源地。在戰後對香港的援助中，教育項目正是美國的重點。大批華人基督徒和美國傳教士在戰後前往香港，建立起龐大的學校、社區中心和就業訓練計畫網絡來安定這個移民湧入的社會。傳教士的宗教工作讓美國政府的政治行動得以隱密進行，他們背後都得到美國政府（美國國務院國際開發署）的支援。傳教士與華人精英透過教導、人脈引薦與獎學金讓大批學生有機會前往美國留學，鞏固並強化了跨太平洋網絡的連結，可以說香港的慈善組織的活動其實是為了促進市場經濟而工作。作者還講述了香港中文大學是第二間在英帝國體系內不以英語作為唯一授課語言的大學（第一間在法屬魁北克），中大的前身崇基（一九五一年）、新亞（一九五三年）、聯合（一九五六年），在一九五〇年代末期都是因美國支持才能存活並擴張為書院。首任校長李卓敏（跨商網絡的一員）的辦學願景，正是以美式教育和商業模式為基礎，他推動了當時東亞與東南亞第一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跨商策略與香港歷史

從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美國與聯合國對中國實施禁運（一九六九年解禁），以至一九九五年中國獲得最惠國待遇這四十五年時間，跨商利用跨太平洋的社會網絡來適應並因應這個以美國為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的形勢變化。在一九五〇年，第一代跨商利用韓戰的爆發所衍生的美國軍事貿易需求，解救了當時許多受困於禁運的紡織貿易商。第二代的跨商們抓住後福特主義彈性生產的機遇，利用跨太平洋網絡讓香港匯聚並招攬更多的美國資本，讓香港從低廉生產的樞紐變為國際商品供應鏈的重要協調中心，形成以知識與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例如：利豐集團）。此外，早在一九七八年中國改革開放之前，香港跨商的全球商業網絡早就開始滲入中國，成為中國改革開放融入世界的推手。作者認為，不是北京的政治領袖，而是香港的跨商重新讓中國融入於全球經濟體系。在六四天安門武力鎮壓發生之後，香港民間發起愛國民主運動之際，跨商們卻急於透過社會網絡的動員，發起確保中國永久最惠國待遇的運動，他們影響美國政策的制定，讓美國相信美中關係的維持才會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

作者認為上述是一段被香港人忽略、主流歐美學術論述所排除的歷史。如同書名的主標題是「Made In Hong Kong」，正是要去凸顯出香港在全球資本主義網絡連結中（特別是美中之間）扮

演著關鍵的「中介角色」。這是一段以香港為中心來書寫的歷史，作者修正過去歐美主流的學術論述，讓香港這個「第三世界」在戰後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角色可以被每一位讀者看見。最後，從書中的討論中，我們可以發現到這些跨商們因應局勢變化推動著香港的非正式解殖，讓香港戰後站上經濟發展的高峰，成為全球資本主義最耀眼的城市之一。但是，從李卓敏擔任中大校長就不公開議論中國內戰之紛爭，唐驥千與鄧小平會面談一國兩制時，更不認為全面民主化將在香港實現。民主化從不在跨商的跨太平洋網絡的議程之中，一種長期去政治化的態度，對香港的民主化產生了限制，這是香港的代價。回首來時路，不禁也讓筆者想去探問，在當前美中關係惡化、貿易與科技戰重啟、全球供應鏈重組的時刻，香港這個「中介角色」將會受到何種影響？這個跨太平洋的社會網絡是否能像過去的歷史一般進行更進一步的適應與演化？或者香港這個東方之珠，在全球資本主義史中所曾創造的輝煌是否將會就此褪去？

推薦序（五）

流動香港：跨商網絡、資本與亞洲全球化城市之誕生

莊嘉穎（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香港的社會、經濟生態向來相當多元。其中一環是跨越地理的人物、資本、技術和知識。

韓墨松（Peter E. Hamilton）的《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關注點就是其中精英、技術和資本的「跨商」環節。這個來自中國各地的精英層跨商及其後裔，在二戰和國共內戰結束前後，為了保住自己和家人的安危，決定舉家攜眷搬到英屬香港。雖然在一個當時對他們而言相當陌生的地方，不過因為自己的背景和各種社會、經濟優勢，這群人很快就不但能夠立足，而且連接當時正在崛起的美國經濟和政治勢力，將香港變成一個重要的國際商業據點。他們成功利用香港如水般的社會和經濟流

動性，協力奠定了香港在二十世紀下半和二十一世紀初，作為全球主要國際經濟樞紐之一的地位。

跨商雖然離開了他們在中國原居地或起初經濟發達的地理區域，有些還將他們能夠移動的財力帶入需要外來投資的香港，但更重要的是把他們的精英網絡引進香港。這種社會資本，雖然無影無形，也沒有辦法直接以金錢或物質來衡量，可是卻無比地關鍵。如親情和專業的聯繫，即便是間接而非直接，往往會讓人容易引起共鳴，對彼此有超過一般的信任。經常會因為這類關係所產生的想像和信用，使人偏向透過這些管道切入陌生的環境。類似的網絡經常會呈現在校友、同鄉、宗親、宗教、商會、專業協會等自發的組織，時不時也會觸碰到一些利益交換。二十世紀初至二十世紀中搬遷到香港的跨商，利用美國崛起、中國對外受限的環境，經營類似於信任和利益交易，把太平洋另一端的美國資本帶入香港，換取當地的廉價勞力，或者將來自中國貨品轉手，間接替中國賺得外匯，不但自己發達，還推動香港經濟快速發展。

香港的繁榮基礎

香港近幾十年的繁榮，在某程度上，代表跨商靈活應用手上的非物質資源，和成功地充分利用當下機會。這種現象，不單在香港可以觀察得到。新加坡、瑞士、盧森堡等地，也一樣在物質資源

匱乏的情況下，使用不同的人脈關係和資本網絡，將自己涉入全球價值鏈，建立長期經濟發展和穩定。二戰後的台灣和韓國，其實一樣，利用戰前已經建立的人際、技術、學術關係，引進美國援助和資本，和後來的日本資本，讓自己經濟能夠快速起飛，只不過台韓選擇以更果斷投入製造業的方式，參與國際生產鏈。《香港製造》書中所討論的跨商網絡和全球化過程，雖然把焦點放在香港和太平洋對岸的交流，但是形容的是在冷戰時期，美國大國影子下，非赤區的一種生態。中國進行改革開放、冷戰的結束，增加了全球的需求，讓有跨商背景的經濟和國家更能夠發揮這種國際樞紐或買辦的角色。

但是跨商能夠有所發揮，前提必須是要世界要有全球化的意願。在這種環境下，國際結構裡才會有建立和維持跨越空間的需求。一旦在遠端尋找商機、政治機會和連結少了必要性，跨商及其網絡的價值就會下降。二戰後和冷戰時期，美國在赤區外推動的自由國際秩序，基本上就是聯合了美國的資本、技術和市場，拉近不同地方的勞動和天然資源，後來還加入的戰後重建工業的西歐和日本。冷戰末期，中國也首先利用自己的勞動和市場資源，投入這個全球價值和產業鏈，讓它更加蓬勃。跨商在這種環境下，可以利用自己的資本和人際網絡，幫不同的產業找到連接和賣點，建立商機和成功尋求利潤，也同時讓如香港的樞紐區從中獲益。不過，在二十一世紀一零和二十年代，為全球經濟和政治龍頭的美國、歐洲和中國，卻因為內部發展不均，以及美中競爭，對持續全球化的

興趣下降。這個趨勢，也就削弱了跨商及其據點的重要性。

全球化之未來與香港

所以香港近十幾年的經歷，也部分反映了全球化的命運。香港二十一世紀的前十來年，經濟迅速成長，但貧富差距日趨嚴重，也因此造成社會反彈。在這方面，與許多全球化的中高收入經濟體，大致經驗相同。在國際層面上，全球化的張力，以及美中相對實力的變化，造成對全球化過程的信心大幅度流失，美中競爭加劇。一但世界對全球化的需求降低，跨商能發揮的空間也會跟著調整。香港的跨商，在這種環境中，一方面是設法繼續跨太平洋經商利益串連，另一方面卻在政治上與中國共產黨靠攏，希望能夠從中得到好處。可是中共在習近平領導下，轉向「內循環」，而美國及其盟友同時為了「減低風險」（de-risking），開始強調生產、科技和價值鏈「上友岸」（friend-shoring）和「上自岸」（on-shoring），然後又碰上新冠疫情，這些種種原因造成跨商的空間縮小。香港在新冠疫情減緩後，也因為大環境的改變，即便能夠使用國安法強制壓下抗議聲音，也無法找回經濟動力。

跨商雖然對於香港的興衰起伏相當關鍵，不過他們仍然只是全球化香港的一面。香港之前的成功，也在於社會能夠歡迎和容納來自不同背景的個人和群體，給他們足夠機會和空間。從中國到香港的歷代普通移民，在二戰後給經濟提供廉價和勤奮的勞動力。與東南亞不同地方的各種連接和人脈，給香港更多貿易機會和小型資本可以流動的去向。一般香港市民本身的努力和精力，也給城市帶來活力，讓它對世界更具有吸引力和魅力。這些不同面向，共同建立了二戰後至冷戰結束後，大家所熟悉的繁榮都市。這些全球化在香港呈現的面向，光靠跨商，甚至跨國知識份子，是無法完全達成。從這個角度理解，香港之前享受的成功，不是因為是英殖民地，或是回歸後以中國管制的區域，而是香港在適當的時間點和環境，能夠充分地以各種不同的方式，靈活與世界各地建立和維持不同的溝通、商業、文化、思想和技術管道。

推薦序（六）

從基督教歷史研究角度看「香港模式」發展歷程

洪善丰（美國杜克大學宗教研究系（普世基督教）博士候選人）

感謝師兄、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鄭健銘邀請我為本書作序。作為仍在為博士論文努力的後進，獲此邀約確是受寵若驚。師兄找我應有兩重理由吧。一方面，我的專業為普世基督教，專研政教關係及基督教在中港及亞太區的交流與流動，在研究領域和地域上與本書皆有重疊。另一方面，書中的一些故事與我關係甚深。本書第二章中的北角衛理堂與北角衛理小學，正是我的母堂與母校；家母一生都任教於衛理公會屬校。該章主角黃安素會督、安迪生博士夫婦、阮潤桓阮郭美德夫婦等，都是我耳熟能詳的教會前輩領袖。該章主要用到的、存於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的安迪生博士檔案，就是引導我進入中港教會歷史研究的一份檔案。而第三章的崇基和第四章的香港中文大

學，則是家父，我弟與我的母校。

基督教歷史研究與香港史

如何運用前人留下的寶貴史料說故事，特別是香港與教會的故事——不是歌功頌德，而是從大量的材料中梳理出影響社會發展的重要脈絡——是我長期思考的問題。本書於我來說，是個祝福，也是個難題。它是個祝福，因為作者為我們整理重構出這段重要的歷史。但它也是個難題，因為作者寫了我一直在思考的故事，甚至運用了我想運用的檔案，而且立論堅實，實在難以超越。

近年來對香港歷史的書寫，越來越多以香港為中心。當中的一些論述著作明顯受本土主義興起的影響——藉抗衡他人對自己的定義，建構自我身份認同——但過份的影響又會成為書寫者的盲點。韓繼松教授在本書中的「以香港為中心研究香港」，卻是冷靜而嚴謹。他一方面梳理出港人在歷史中的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檢視香港這彈丸之地如何孕育出跨太平洋的網絡，而跨商等非國家角色又如何形塑中美關係。另一方面，本書並非對這些角色毫無批判。在作者的筆下，他們為著個人名利及家族的傳承，務實而策略性地逐利；如作者點出他們「基於愛國情懷到中國投資」之說實帶神話成份，而他們的商業行為，乃至對香港高等教育的投入，也助長了資本主義全球化。

相對一些歌頌和吹捧香港人勤勞精明因此有成的「獅子山下」式的右翼論述，作者的筆觸冷酷：「香港的變化縱然令人吃驚，但也亦非必然、理性、公正。這其實是一個偶然、無以為繼、相當不公的過程。」相當不公？是的，香港在全球資本主義擴展中佔得角色，獲取成就，與本地和海外的血汗工廠脫不了關係，本港地產商的成功，也與今天香港的土地問題以及居住不正義脫不了關係。

從基督教歷史研究的角度看，本書的一大貢獻是把教會和信徒嵌進整個香港社會、全球冷戰體系，以至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進程中。教會本位的書寫固然重要，例如有關基督教會對香港社會發展的貢獻，特別在教育、醫療，和難民救濟等方面的工作，已有不少專文專著論及。但一個易犯的毛病，是太專注寫機構與個人，而未能揭示他們如何有意無意地參與著教會傳道服務以外的、有普有惡的各種進程。如在香港過去的發展中，教會與商界的關係為何？在冷戰背景下，美國傳教士和具美國背景的教會如何受華盛頓影響，協助了美帝國的擴大？教會，特別是其教育事業，如何參與了資本主義的全球化？作者獨具慧眼，選取了香港跨商作為中心，難得地運用了傳教士的記錄，整理出跨商在跨太平洋網絡中的政、商、教跨界關係，填補了上述的空白。與一些傳統的以教會和信徒為中心的基督教歷史研究相比，本書更深刻地對教會作出批判。

「非正式解殖」與香港模式

此外，韓教授提出的「非正式解殖」概念實在引人深思。作者指跨商透過引入美國社會資本，擴大美國在港的影響力，逐步瓦解英國殖民統治者在港的權力與特權；在過程中，華人則逐步從殖民者手中取得權力。必須注意的是，從作者的描述中，我們可以看見這種「非正式解殖」跟眾多解殖案例不同——它並不以民主化為目標，它的最大得益者是跨商和少數社會精英；透過策略性地利用美國社會資本，他們在英殖香港、冷戰全球美國霸權秩序，和中國崛起的處境下建立、維持，和擴大其事業。在跨商等本土協力者的周旋下，「非正式解殖」似乎無意、也並無改變殖民統治的根本權力結構；跨商與一些本土精英從英殖者手中取得權力，但廣大基層有在這權力重新分配的過程中，分享到多少權力？甚至作者提到，「英治延續，是足以方便跨商策略與美帝國系統連結繼而興旺的場景。」果真如此，我們接下來要問的是，「非正式解殖」與「解殖」的關係是甚麼？由跨商策略導致的「非正式解殖」，反而是鞏固了殖民架構嗎？它是促進了還是妨礙了「解殖」？這些都是由本文引發，而值得繼續探討的重要問題。

再次感謝韓教授此書的貢獻，特別是他以跨商為焦點，梳理出政、商、教的跨界關係網絡，並

解構香港在資本主義全球化中扮演的角色，為我們開啟批判香港經濟神話的一扇門；而這正是香港解殖研究的重要一環。十分推薦對香港研究及香港基督教史有興趣的朋友細讀此書。

繁體中文版作者新序

全球史與香港角色

韓墨松 (Peter E. Hamilton)

十分榮幸能為《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 中文版寫序。作為新晉作者，自然希望讀者會閱讀自己的作品，讀後會認為這是有意義之作。我甚至盼望，這本著作的中文版面世後，讀者群會進一步擴大，著作會被用作教材。更重要的是，我希望本書能引起讀者對香港歷史的興趣，甚至能夠啟發更多研究著作述說香港未為人知的故事。

關於香港過去，還有很多值得學習之處。香港是廣為人知之地，但其歷史往往被忽視，或被以某種方式書寫，從而服務各種外在議程。在十九世紀末，第一批歐洲歷史學家開始書寫香港歷史。

在他們筆下，英殖政權仁厚。於他們的想像之中，其官員是為「貧瘠小島」(barren rock)帶來商貿與公義的人。早期華人歷史學家則以國族主義論述書寫香港歷史。在他們眼中，香港猶如扁平符號，而非複雜社會。直到近期，大部份中國與英帝國歷史學家仍然忽略這個「細小之地」。於二〇一二年，我開始進行本書研究。很多教授都勸我改選其他研究題目，因為香港「並不重要」。幸好，我的博士導師徐元音 (Madeline Y. Hsu) 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她堅定地鼓勵我逆流而上。

香港歷史研究的承先啟後

在過去十年，學者被迫重新評估他們先前關於香港並不值得花力研究之斷語。香港歷史正受更多學者關注。本書能夠協助推動這一波學術反思，是令我感到自豪的事。不過，若無前人研究、奠下基石，本書便難以面世。這些先驅學者都認同，香港有其歷史角色。在一九六〇和七〇年代，施其樂牧師 (the Rev. Carl Smith) 開始研究香港早期歷史，艱苦地為之整理了達十四萬張索引卡。洗玉儀的《權力與慈善：東華三院與殖民地香港的華人商業精英》(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一九八九) 正確地改變了學術界的聚焦點，使之從英殖官員轉向香港本土華人社群。文基賢 (Christopher Munn) 的《英治華夏：華人與英國治下

的香港 (1841-1880)》(*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二〇〇一) 修正了有關英殖政權「仁慈及寬容」的落伍迷思。高馬可 (John Carroll) 的《帝國夾縫中的香港：華人精英與英國殖民者》(*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s in Hong Kong*) (二〇〇五) 則聚焦於巧妙地佇立在兩個帝國之間的香港精英。唐耐心 (Nancy Bernkopf Tucker) 和麥志坤率先揭示在亞洲冷戰之中香港所佔的關鍵縫隙位置。饒餘慶、黃紹倫及施錫亨 (Catherine Schenk) 等學者則為香港現代經濟史作奠基性研究與梳理。我閱讀他們的著作之後，深信香港歷史不但有趣，其在各種全球史的角色更是獨一無二，這裡所指的全球史，包括：中國歷史、英帝國歷史、跨太平洋歷史、海外華人移民史、中美關係史等等。

香港在全球史中未為人知的角色

的確，有關帝國如何相互競爭、全球化如何加速進而形塑現代世界的論述，自然會將香港與倫敦、紐約並列，視之為份量同等的樞紐。在整個十九世紀及二十世紀早期，香港是全球鴉片貿易和海外華人移民中心。學者已然分析指出（例如徐元音的《夢金山、夢家鄉》〔*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 110011〕、和洗玉儀的《穿梭太平洋》〔*Pacific Crossing* - 110111〕）。

香港的船務代理、船舶維修商、保險商、碼頭工人、其他商人與工人，令數百萬移民得以橫渡海洋，在北美、夏威夷、法屬印度支那、英屬馬來亞、海峽殖民地、荷屬東印度群島、澳大利亞、紐西蘭、薩摩亞等許多地方往返遊走。對這段時代的工業化和全球化而言，這些移民的勞動力至為重要。他們修築數千里的公路、鐵路及運河，經營礦山及種植園，為世界提供主要產品，例如大米、錫、銀、糖、水果、橡膠、海鳥糞及椰子乾。香港企業藉此成為海外移民聯繫中國、安穩處理匯款、傳遞信件乃至運送遺體安葬的重要橋樑。對移民至美國的華人而言，在二戰之前，他們百分之九十會途經香港。

有次我為了論文研究而返回香港。在埋首於香港檔案之時，我發現了此一非凡全球史被忽略的一個章節。在觀塘政府檔案處、紅磡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香港浸會大學以及香港大學館藏部裡，我發現了先前未被討論之事。於一九四九年左右，約七十萬名難民赴港。在這場難民危機中，我發現有不少材料顯示，香港華人與當時日益擴張的美帝國體系合作。他們多透過商業或教育方式聯繫美國。這些材料包括香港工業家招徠美國客戶的報刊文章，以及香港本地學生前往美國深造的政府紀錄。從這些材料角度看，香港人連結自身至美國資本、市場、思想與權力，藉此為自己的未來打拼。從我的觀點看，這些行為是「不按牌理出牌」(flipped the script)。歷史學家一直強調，國家行為是國際貿易與國際關係背後的重要推力。這些材料則表明，在一九五〇至六〇年代，於巨大變

局之中，香港商界精英發揮其能動性以應對局面。當時的變局，包括：英帝國衰落、美帝國在亞洲擴張、資本主義全球化。當時的英屬香港，基本上自治，且容許各種流動，故此香港精英有充足條件實現跨國個人策略。在冷戰時代，處處皆管制入境、政治忠誠、外匯，香港精英能如此行事，並非尋常事。

此外，我將此研究推進至一九七〇與八〇年代後。我發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期間，香港歷史同樣發揮關鍵作用。本書最後兩章已然指出，若然能夠全面瞭解香港冷戰時期的經濟和社會歷史，便會重塑我們對鄧小平時代香港之於中國的影響之理解（特別是香港對廣東以及中美貿易復興的影響）。不令人意外的是，在一九五〇及六〇年代，香港與美國共同建立了龐大的跨太平洋教育、貿易與投資網絡，這為中美貿易及投資的復甦創造了條件。香港精英結合其跨太平洋網絡以及對中國承諾，追求個人利益，同時推動中國國家發展。胡應湘及合和實業在廣深高速公路建設中的角色、楊敏德和溢達集團的工業投資等都是案例。若無這些香港精英，如今龐大的中美貿易活動便將無從談起。

「跨商策略」、「非正式解殖」與「美國社會資本」——研究香港的新學術用語

不過，現有學術研究並沒有能夠分析這類活動的相關術語。早期有關香港冷戰時期經濟發展的文獻，將香港經濟置於不太適用的「亞洲四小龍」框架之中，香港經濟模式根本有別於其鄰居。我因而意會到，我需要創造繫於香港情況的用語，以描繪上述活動。唐氏家族、崇基學院的歐偉國、香港中文大學的李卓敏，或利豐的馮氏家族都是本書所述人物。他們利用累積的資源、經驗以及長期的雄心壯志，施行策略。這些策略與海外華商舊有策略有所共鳴，但同時亦包含適應冷戰與新地區霸權美國的元素。故此，我稱之為「跨商策略」，這種策略既連結歷史，亦重跨國與跨太平洋。我需要以此用語描繪的，是跨商策略所累積的無形資源，例如佔先機之人脈、文化之熟識度、市場之知識、美國之國籍。有另一位導師最初指出，這些資源可被稱為「社會資本」，故此在開始之時，我將之稱為「美國社會資本」。我原來的研究範疇並不包括英殖主義，但逐漸地，我發現英殖主義同樣受這些跨太平洋活動所重塑。你會看到，利舜英極力爭取加入只接受白人的會所，李卓敏自信無比，唐驥千獲選成為首位香港總商會華人主席。這些案例皆顯示，跨商策略和美國社會資本改變了這些人與英殖的關係。在一九九七年之前，英殖權力褪色，但仍未正式消散。這些人的跨太平洋策略和資源容許他們逐漸推動非正式解殖，在此過程中，他們違抗英人規矩，建立個人權威，打開

向他們緊閉的門。

未來的學者與新的研究或會挑戰、完善、擴展這些概念，這是理所當然之事。無論如何，我希望，後來者可以鞏固更為重要的一點——香港的歷史，應當以香港方式書寫。香港從來不只是一個「細小的」英殖民地，或另一個「亞洲四小龍」成員。香港並非因其地理位置而注定成為全球主要樞紐，我的同事和友人王迪安已在其近著《香港振翅：民航業與全球樞紐的發展，1933-1998》（*Hong Kong Takes Flight: Commercial Aviation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Hub, 1933-1998*）進一步指出這一點。我們談論香港之時，談論的其實是一個獨特華人社會。在這個社會中，其居民的思想、勞力、力量對世界皆有莫大影響力。

二〇二三年六月

導讀

香港歷史研究補遺——美國與香港關係的前世今生

鄭健銘（台灣季風帶文化總編輯）

有關香港歷史的論述，多以中英兩國為中心。這是自然之事，畢竟香港曾為英國殖民地，歷時百多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從英國移交至中國。至於（特別是在二戰後）美國對香港發展有何影響，美國與香港有何關係，其所得的關注則相對較少。

美國與港英時代的非正式解殖

談論美國角色之時，論者多會聚焦於冷戰時期美國對香港的文化影響，被提及的案例包括《兒

《童樂園》與張愛玲。前者創於一九五三年，由友聯出版，其主編為畢業於廣州市立美術專科學校的插畫家羅冠樵，是友聯出版年期最長的刊物。後者在一九五〇年代居於香港，期間著有《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兩者的共通點，是其文化生產背後皆得到美國資助，多少可被歸類為冷戰時期抗共的「美元文化」。《兒童樂園》與友聯另一旗下刊物《中國學生周報》對香港世代不無影響。《秧歌》和《赤地之戀》兩部作品則曾被納入美國新聞處的譯書計畫之中。關於《赤地之戀》，更有作者按外來既定大綱書寫之說。張愛玲據說曾對友人言：「《赤地之戀》是在『授權』（commissioned）的情形下寫成的，所以非常不滿意，因為故事大綱已經固定了，還有什麼地方可供作者發揮的呢。」按照這種討論，美國對港影響，多只集中於文化範疇，與香港社會乃至政經發展之關連似乎相對淡薄。事實上，在一九六〇年代，受中國文化大革命影響，香港發生六七暴動之時，美國為何與如何與香港保持距離、持觀望態度，是學術研究課題之一。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Made In Hong Kong: Transpacific Networks and a 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以截然不同的角度梳理美國與香港關係。按照本書觀點，在二戰之後，港美關係較一般想像密切。本書不時提到英治與冷戰時期的香港「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本質上可以說是美國化。

「跨商」作為連結美國與香港的媒介

港美關係密切，原因是兩者能從彼此身上各取所需。在二戰之後，美國著力建立以其為中心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若然香港在以美國為腹地的前提下經濟躍升、以美國知識與模式營商，這會有助輻射美國資本主義體系在亞太地區間的國際影響力。從香港角度看，二戰後香港社會仍未富裕，若然得到美方資源，推動香港社會發展，香港「從第三世界躍升成為第一世界」便會變得可能。

結連此一港美關係的重要中介，是「跨商」，他們是本書的主角。作者如此定義「跨商」：「我會特別聚焦於流動、務實、適應力強的香港精英世代，並將之稱為『跨商』（straddling merchants）。第一代跨商，主要是華人銀行家、工業家、行政人員、學者、國民黨技術官僚，他們都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間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除他們之外，還有高達七十萬人到港。這些精英移民在逃難之時，失去了物質資產，但有別於一般說法，這不代表他們失去了一切。他們憑其家族網絡、學識、事業，擁有得天獨厚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進而能夠參與美國主導的新資本主義體系，並同時獲得第一手情報。為了能夠成功移居至香港，他們以新策略行事。他們利用雙元文化網絡與技能，建立新事業與業務，專注經營跨太平洋的網絡流動，從一九五〇年代起推動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出口導向發展。這些跨商之跨太平洋策略不但能夠累積財富，且也能催生新的經

濟權力關係與特權。這有別於世界其他後殖民地地方，在那些地方，權力關係往往與國族國家環環相扣。這些跨商送自己的兒女到美國留學，入讀美國之大學，使之能夠繼承其無形資產，且也資助其他香港居民留學於美國，使之能夠協力於美國冷戰項目，乃至以美國方式重塑香港教育模式。這些活動令香港的跨太平洋之教育與商業網絡流動急速增長，香港這個英屬殖民地因而能夠扮演重要角色，令中國得以在一九七一年中美貿易關係恢復之後，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跨商」、美國與香港社會發展

簡而言之，跨商是英治時期香港社會美國化背後的重要推手。他們利用美國人脈，引進美國資金與知識，協助興辦學校、建設大型屋苑乃至發電廠、支撐香港工業發展，甚至在冷戰時期以香港為中心，串連中美關係，為共產中國爭取美國最惠國待遇，方便其融入美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此過程中，美國角色透過跨商之仲介，與港英政府協力，推動香港社會發展，猶如第二管治梯隊。跨商之源起，可追溯至十九世紀的中國長江流域。當地的傳教士學校，以及其時中國的洋務運動，令美式教育逐漸成為中國新一代精英搖籃，與美國之間的連結，亦為這些精英造就事業發展機會。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不少中國精英南移至英治香港，展開新生活。他們善用美國人脈與資源

重整事業，其事蹟繼而成為本書所述的跨商故事基礎。

本書所提的其中四個案例，包括：一，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二，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立與發展；三，美孚新邨之源由；四，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這四個案例都頗能反映美國角色如何透過「跨商」，與港英政府協力，參與香港發展，甚至將香港經驗輸出國際。

港島沙灣甘迺迪中心與官塘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同樣得到美國國務院補助，金額達一百二十萬美元。甘迺迪中心之成立，是為紀念甘迺迪這位遇刺的美國總統，這所中心為特殊兒童提供教育。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則為三百四十位殘障成年人提供職業治療與訓練。這些社區建設成立的目標有二：一，孕育「香港公民」意識，令香港民眾自力更生；二，培訓香港潛在工業勞動力，為香港工業發展奠下基礎。同類社區項目，多由美國傳教士以及華人基督徒精英參與營辦。他們在中共建政之後，從中國大陸移居至香港。事實上，世界復康基金會本地主管萊斯（Halleck Rose）是美國退休外交官。對港英政府官員乃至華人而言，這些社區建設有助穩定香港社會，他們樂觀其成。

香港中文大學首任校長為經濟學家李卓敏。到港履新之前，他就讀於美國在華傳教士學校，後到美國留學，曾為民國官員，於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總部工作，管理美國對華援助資源。及後他到

美國西岸大學任教，其研究方向亦按美國冷戰需要而改變——李卓敏不再研究國際貿易，改為分析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在其任內，不少學校發展資金來自美國，中文大學（中大）亦漸以跨太平洋大學作為定位。其大學圖書館管理以美國而非英國模式為標準，中大的校外評審人選及教員主要來自美國而非英國，學術榮譽制度亦與美國接軌，學校「國際化」政策以美國為重心，中大亦設立東亞乃至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而這類課程概念源於美國。

在一九六〇年代項目發展之時，美孚新邨是世界最大型私人屋苑，其資金來自美國巨企美孚石油，對當時香港而言，這是史無前例的投資計畫。美孚新邨源於港英政府的葵涌高速公路計畫，計畫觸及美孚的貯存庫用地，為作補償，港英政府提出換地建議，美孚新邨之發展計畫由此而生。促成此事的，是時任美孚石油執行董事宋啟鄺。他在一九五三年從中國移居香港。在此之前，他居於中國東北，曾入讀美國傳教士學校，後到美國留學。美孚新邨大受香港中產歡迎，因著香港的成功經驗，美孚成立土地發展公司，於全球業務之中以地產發展開源，三藩市南部的紅木海岸（Redwood Shores）樓盤是其實驗作。

移居香港之前，沈熙瑞曾在美國留學，及後於中國大陸民國政府處理金融事務。一九五〇年代初，沈熙瑞南下至香港。沈熙瑞在匯豐銀行工作之時，他利用人脈，方便同樣是來港移民的中國紡織界精英得到貸款，使之得以發展紡織產業。這些紡織商後來亦運用其美國社會資本，以美國為主

要出口市場，取得盈利。一九七〇年代末，香港學者黃紹倫曾訪問沈熙瑞，其回答反映對二戰後香港發展而言，跨商的社會資本如何舉足輕重：「我……告訴紡織商有何替代方案。我私下認識他們，所以能夠代表他們，與滙豐銀行洽商。我們向滙豐銀行與港英政府官員進行遊說，說明紡織業對香港有何好處。他們的確也能夠見到紡織業的經濟利益。戰後紡織品需求甚殷，故此利潤龐大。基本上，工廠能在三年內回本。銀行只要能夠見到利潤，便會同意批出貸款。於是我充當滙豐銀行非正式顧問，每週設晚飯飯局，處理顧問工作。後來我愈加繁忙，滙豐銀行說，我們需要你。結果我在接下來三年乃至現在繼續顧問工作。這份工作甚至沒有合約。」本書作者特別提到，事實上，在滙豐銀行檔案之中，關於沈熙瑞的材料甚少，只餘數幀照片。這意味，滙豐銀行與沈熙瑞都不願意記錄其行動細節。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美國國際影響力的前世今生

冷戰時代是本書跨商故事的重要背景。除了跨商之外，故事的另一重要元素，是美國透過非國家組織渠道進行的對外援助。冷戰形勢固然是美國以此作為國際外交政策骨幹的重要成因，但這種國際關係戰略思維早在一九三〇年代成形。在此略為介紹美國歷史學家埃布拉德（David Ekbladh）

的著作 *The Great American Mission: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merican World Order* 提供更多脈絡，以便理解美國對港影響，乃至「香港模式」之構成。

早在一九三〇年代，美國本土便已開始思考如何以新型「現代化」發展論述，守衛「自由世界」的邊界，抗衡極權力量的國際擴張。當時的國際思潮，開始視崇尚操控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為最佳政治與社會組織模式。美國的自由論者繼而認為，在自由放任主義 (*laissez-faire*) 與反自由的法西斯與共產主義之間，需要開闢第三條路，以挽回輿論對自由世界管治能力的信心。著名猶太裔社會學家曼海姆 (Karl Mannheim) 事實上曾言，此後再無規劃發展與自由放任之別，只會有規劃好壞之分。在此脈絡下，位處美國南方的田納西河谷管理局 (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 模式被視為第三條路的示範案例。

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視為屬於自由世界、自上而下由政府推動、能同時維護民眾自由的發展模式。此一模式始於一九三三年經濟大蕭條 (The Great Depression) 爆發之時，屬美國總統羅斯福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第一次新政」 (first New Deal) 的一部份，其目標是希望透過政府機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督促與施行各種新政，以解決美國南方的社會貧窮問題。新政內容包括：興建水壩以治洪水與發電、推動農業發展、改善公共醫療、推廣教育等。這種模式有三點特別值得一提：第一，模式相當重視教育，原因是教育被視為形塑公民健康品格的媒介，且亦能夠提升

勞工的知識乃至生產力。當中兩項政策，分別是每年向近七千民河谷民眾派發逾二十萬本書籍，以及贊助所有運動、戲劇等社區活動；第二，為與德國、日本、蘇聯重視極權的國家規劃模式作區別，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強調公私營合作，以實現規劃願景。在發展過程中，地方政府、商界、公民社會組織皆參與其中；第三，在美國之內，這種自上而下的規劃發展模式，自然會激起地方與中央政府的分權爭議。於此，利連索爾（David E. Lilienthal）是關鍵人物。他得到美國總統任命，領導田納西河谷管理局。為化解爭議，利連索爾積極推動地方分權，確保大學、地方政府、草根都能影響規劃之決策，確保規劃內容著眼於本土需要。

美國經濟學家士丹利（Eugene Staley）後來為美國樹立了自由國際主義（liberal internationalism）的外交政策框架，為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鋪路。他認為，區分國際間「權力經濟體」（power economy）與「福利經濟體」（welfare economy）有其必要。按其觀點，前者著力擴張軍事力量，後者銳意提升民眾整體生活質素。要提升民眾生活質素，容許原料、資本、人口、知識之自由流動是先決條件。在一九五四年，士丹利出版著作 *The Future of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進一步描繪他眼中的非共產主義發展模式路線圖。這個路線圖可分三步：一，提高民眾收入；二，促成民主自治；三，在社區中確立民主價值觀。此三步的目的，是減低共產主義極權模式的影響力。

在此外交思維框架之下，早於一九三〇年代，美國組織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 已在中國積極推廣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二戰期間，在一九四五年，美國戰時新聞局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 OWI) 於多種語言在國際間刊發了逾十四萬本宣揚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著作，作為宣傳。著名漢學家費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是當時美國戰時新聞局官員之一。二戰之後，在冷戰之時，美國杜魯門政府提出第四點計畫 (Point Four Program)，作為抗衡共產主義的外交政策。這項計畫主張與世界分享美國技術成果，以支援發展中地區，促進其發展。總統杜魯門宣揚此一援助外交新政時，特別提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其國務卿艾奇遜 (Dean Acheson) 號召非政府組織參與其中，以實行第四點計畫，這和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其中一個特點。參與的組織，包括國際救援委員會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 (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中華基督教青年會 (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 等，部份組織也進而成為香港跨商故事的一部份。這些組織提供的援助，包括就業培訓與提供教育。

《香港製造》的研究特色

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源起與輸出世界之歷史，可為本書內容作三點延伸討論：

第一，本書不以美國為中心書寫，正正可以補遺美國輸出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執行細節。本書所述的香港發展經驗，不無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特點。例如，美國傳教士得到美國資源後，便積極推動社區建設。他們建立天台學校、兒童組織、圖書館、社區中心乃至私人徙置區（香港島的衛斯理村與新界荃灣的亞斯理村便是例子）。再者，在香港跨商故事之中，非政府組織扮演重要角色。在救濟香港難民過程中，上述受美國國務卿艾奇遜號召的組織（例如國際救援委員會、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也有參與其中。於香港中文大學成立過程中，來自美國非政府組織的資源，是極為重要的影響因素。這都印證了上述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特點。

不過，以美國為中心的角度，無法解說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被輸出外地之後，如何與本土連接，發揮影響力。這正是本書研究價值之所在，在此可舉兩點說明：

（一）香港跨商之中介，影響了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成效。以中大崇基學院成立過程為例，其建築、圖書館館藏資源，主要來自美國組織，而其校園用地所得，則需港英政府官員配合。於過程之中，本書人物之一、崇基領袖歐偉國是關鍵人物。一方面，美國組織原本無意成為崇基的主要支持者，原因是從這些組織角度看，香港很快便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侵。歐偉國憑其手腕協助逆轉局面。另一方面，歐偉國亦憑社會資本，得到港英政府官員支持，為崇基尋得校址。

(二) 美國之影響，並不僅限於意識形態層面。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之源起乃至輸出國際，與國際間的意識形態對壘有關。但在香港，其影響卻超越了這種意識形態對壘。本書的一大主題，是深受美國影響的香港跨商，利用香港資源，推動了中國面向世界的改革，促成了中美兩國破冰合作之局面，其中一例是胡應湘。他年輕時曾旅美留學，美國的教育乃至建設規模，令他留下良好與深刻的印象，他為長子取 Thomas Jefferson 之英文名字，足以印證這一點。胡應湘後來成為香港建築大亨，他在中國爭取高速公路發展項目，這亦成為八〇年代中國改革之中的一個重要項目。不過，項目屢遇阻力，胡應湘的對應之一，是送六位廣東官員到加州，讓他們感受美國高速公路之發展，分享胡應湘在三十年前於美國所感受的震撼。胡應湘特意買了一部車，親自駕駛，帶官員遊覽。當時廣州副市長在車內寫日記，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路上，難有這種體驗。這是共產中國面向世界、融入美國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過程中的其中一刻。

第二，本書強調以港口城市 (port city) 書寫全球史之必要。近年在全球史領域之中，港口城市之影響與戰略意義愈趨受重視。英國歷史學家達爾文 (John Darwin) 的近著《解鎖世界》(Unlocking The World: Port Cities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Steam [1830-1930]) 便是探討這一點。按達爾文的理解，全球化之義，是人、貨物、金錢、技術、觀念、信仰，乃至生物(動

植物與微生物）之長距離交流，而這種長距離交流正是透過港口城市進行，全球連結由此而生。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原書的副題，包含「全球化新史」（new history of globalization）用語。作者在序章這樣說：「不以香港為中心，香港獨特的歷史經驗，乃至從香港往外幅射、與國際互相交集的全球史便難被還原。梳理香港民眾在歷史中的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痕跡，不但有助我們理解持續殖民主義之下的經濟演化與經驗，且亦能幫助我們探究中美之間巨大商業與教育網絡的起源。」本書末章更比較歷史中的港口城市熱內亞（Genoa）與香港。兩者的共通點，在其改變地區形勢的能動性。作者如此總結：「香港精英的跨商策略與熱內亞經驗有可比之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及至美國與中蘇角力之時，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1948-1951）、佔領日本（1949-1952）、布雷頓森林協定擴張勢力，推動全球貿易與金融發展。對香港而言，這些發展為未來增添了不穩定因素。香港當時從屬於英帝國而非華盛頓，無法自動受惠於美國援助或得到美國保護。再者，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之時，美國與聯合國實施對華貿易禁運，英屬香港的傳統轉口港經濟受到影響，恰如在十四世紀時熱內亞貿易受挫一樣。香港亦如熱內亞一般，擁有其他資產與優勢。在其傳統貿易崩潰之前，英屬香港的優勢有二：第一，精英移民的知識、資本、網絡；第二，數以萬計一般移民所提供的低廉勞動力。這種優勢的結果，是香港工業急速發展，以及向美國市場靠攏。這是熱內亞投向西班牙的亞洲版本。」

第三，本書重新檢視「香港模式」。一般輿論認為，至少在英治時期，「香港模式」的特點，在其積極不干預政策之施行。這不一定是香港故事之全部。在本書的香港跨商故事之中，我們其實不難發現美國田納西河谷管理局模式的身影，而這種模式的源起，正是在放任自由發展模式與以極權為手段的規劃經濟模式之間，另闢第三條路。這種第三條路的實現方式之一，是善用非政府組織之協力。於香港脈絡之中，跨商的能動性，是此一第三條路能夠接連本土的重要助力。至於為何在香港歷史記憶之中，這段歷程被淡忘，則是有趣課題。對於這一點，作者在書中曾作分析：「跨商策略的物質主義與務實主義，能夠有助解釋為何上述歷史不受公眾與學者重視。書中觀點應會令大部份香港人感到意外。這段跨太平洋歷史少為人知，我認為原因有四：第一，受殖民管治影響，知識之生產被訴諸於先入為主之見，能夠被用以佐證觀點的檔案與記憶卻被埋藏。再者，香港學校少有教授本土歷史，且大部份中國研究學者基於『大中原心態』（傅葆石語），甚少注意香港。第二，這些策略來自一小撮精英，其規模透過教育擴張。亦因此，跨商策略漸成『常識』（common sense），香港人進而視留學於美國為理所當然之目標，這點在『新浪潮』電影顯而易見。第三，跨太平洋網絡與策略經常引致移民，本書所論人物之後代多已不在香港居住，這段歷史之記憶因而被四處分散。第四，經濟急速轉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七年香港交接都觸發香港文化與身份之大變，跨商策略變得更為複雜多變。簡單舉例說，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美國社會

資本之累積備受重視，但此後，尋得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護照也成為一時風潮。我會指出，這段歷史已植根於今天公眾記憶之中，今天香港居民視一己為國際公民，其來有自。針對跨商策略之分析，是為解構『常識』，還原早期已被遺忘的策略視野之原貌。」

《香港製造：跨太平洋網絡與全球化新史》其實也是以香港為中心、重新書寫太平洋史之著作，是反映本土與國際關係屬一體兩面之經典。往後在香港研究乃至國際關係研究之中，這是不可忽略的重要研究。畢竟，從跨域視野書寫地方故事，有其必要與價值。

教青松仙觀

導

論

Introduction

傑克金屬製品

昌興皮革

聯興皮革鞋料

響音車汽

Station

JVC

導論

「我不斷告訴自己，我必須遵從父親的左右銘，記得金錢與權力並非一切，個人成就、名聲與教育，才是人生重要之事。你可以在任何時候失去金錢與權力，但無人能奪去你的成就、名聲與教育。」

——唐驥千，香港社會發展回顧項目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從第一次世界大戰到冷戰期間，世上只有少數社會能從所謂第三世界發展成為第一世界。除了某些加勒比海避稅天堂，只有一個既欠石油亦非獨立的地方能夠如此，那就是香港。在一九五〇年

代，大量移民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湧入這個英屬殖民地，使之面對人道災難。不過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香港已成為高樓林立的石屎森林，其人均國內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甚至高於其昔日殖民宗主國。這是個耀眼與獨特的大都會，借用末代港督的話說，香港猶如「彰顯人文精神力量之大滿貫」（A Grand Slam for the Human Spirit）。¹

雖然香港擁有麻雀變鳳凰式的傳奇故事，但令人意外的是，香港的經濟轉變，一直得不到學者的重視。為了宣揚自己的意識形態，在過去多年，經濟學者佛利民（Milton Friedman）歌頌香港，認為香港是引證經濟不干預原則成效的對照實驗（controlled experiment）。²我們將會見到，關於香港作為自由競爭形態原形的論述，都忽略了故事的另一半，即香港社會層級結構既根深蒂固，但亦不會固守一方。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間，其他學者著力將香港歸為「亞洲四小龍」模式成員之一，視之為儒家精神以及極紀律與辛勞的結晶品。對比之下，本書研究香港的前設很簡單——我們需以香港為中心研究香港。直到一九九七年，香港一直是英屬殖民地，在此期間，冷戰爆發，全球邁向民族國家時代，香港在其中的角色十分關鍵。香港殖民地管治確實令其住民失去政治影響力，但也使之能免受中華人民共和國毛澤東時代（1949-1976）的摧殘。在美國主導的全球資本主義之激發下，香港的英國殖民地也令其住民得以利用不尋常的策略對外競爭。本書聚焦於一九四五年之後，當時香港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之重要樞紐，所以能夠如此，這得力於香港人的跨太平洋網

絡與策略。我們將會見到，雖然香港處於英殖統治之下，但也已與英帝國體系漸行漸遠，同時透過跨太平洋網絡活動，向美國國際體系靠攏。這些跨太平洋人脈網之活動，為香港人提供了有關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可靠、來自局內人的知識。與此同時，這也為香港輸入了龐大的人才、資訊、資本、科技資源。

以香港為中心書寫香港歷史之必要

不以香港為中心，香港獨特的歷史經驗，乃至從香港往外幅射、與國際互相交集的全球史便難被還原。梳理香港民眾在歷史中的能動性（historical agency）痕跡，不但有助我們理解持續殖民主義之下的經濟演化與經驗，且亦能幫助我們探究中美之間巨大商業與教育網絡的起源。在二〇〇四年，美國首次超越日本，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夥伴。到了二〇一五年，中國也超越了加拿大，成為美國最大貿易夥伴。³直到二〇一九年年中，美國總統特朗普（Donald Trump）發動貿易戰之時，中美相互依賴的關係一直維持。除了商業緊密關係之外，中美兩大國也因教育聯繫而互相緊纏。在過去十年，中國一直是美國國際學生最大來源國。直到二〇一九年年底，共有三十六萬九千五百四十八名中國學生在美留學，與此同時，整年在華留學的美國學生也達

一萬至一萬五千名。⁴雖然比例不對稱，但美國捐獻者與機構也投入大量資源，在華營運冠名教育機構，當中包括：一，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Schwarzman College）；二，北京大學燕京學堂（Yenching Academy）；三，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究中心（The Hopkins-Nanjing Center）；四，崑山杜克大學（Duke Kunshan University）；五，上海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Shanghai）；六，哈佛大學上海中心（the Harvard Center Shanghai）。

不過，學者與政策制訂者對中美緊密關係的源起都不無誤解。他們認為，本質上這只屬兩國外交事務。這種觀點以國家為中心，聚焦於總統行為與條約內容，但卻忽視非國家角色對形塑中美關係的影響力。從一九七八年起，中國步入改革開放時代。自此，商界以非國家角色作為中介，設定議程，促成跨國網絡間的各種流動。同樣從一九七八年起，香港成為中國最大投資來源地。在一九九〇年代中之前，香港處理中國近半外貿，當中三分之二為中國對美國之出口貿易。⁵中國在美留學生成群之前，早於一九七〇年代中，香港便已是美國高等學院的首要學生來源地。這些美國留學生繼而成為中美兩國的教育與商業橋樑。在本書之中，我會檢視這個前英國殖民地如何孕育龐大的跨太平洋網絡，並會指出，香港商界的網絡與能動性為今天的中美關係奠下了基石。簡而言之，我會形容，在中美關係的成形過程中，香港角色至為關鍵。

從「跨商」角度理解香港歷史

透過研究一九四五年至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之年）的香港社會與經濟歷史，就香港的經濟發展、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進程、中國重新融入全球體系的轉折，我會提供嶄新論述。我會指出，在二戰後的全球化之中，香港角色相當重要。若然將之忽略，我們便會無法理解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如何在太平洋一帶成形、中國如何步向出口主導模式。我會特別聚焦於流動、務實、適應力強的香港精英世代，我將之稱為「跨商」（straddling merchants）。第一代跨商，主要是華人銀行家、工業家、行政人員、學者、國民黨技術官僚，他們都在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二年間（我稱之為「共產主義轉型期」）從中國大陸逃到香港，除他們之外，還有高達七十萬人到港。這些精英移民在逃難之時，失去了物質資產，但有別於一般說法，這不代表他們失去了一切。他們憑其家族網絡、學識、事業，擁有得天獨厚的社會資本（social capital），進而能夠參與美國主導的新資本主義體系，並同時獲得第一手情報。為了能夠成功移居至香港，他們以新策略行事。他們利用雙元文化網絡與技能，建立新事業與業務，專注經營跨太平洋的網絡流動，從一九五〇年代起推動以美國市場為主的出口導向發展。這些跨商之跨太平洋策略不但能夠累積財富，且也能催生新的經濟權力關係與特權。這有別於世界其他後殖民地地方，在那些地方，權力關係往往與國族國家環境相

扣。這些跨商送自己的兒女到美國留學，入讀美國之大學，使之能夠繼承其無形資產，且也資助其他香港居民留學於美國，使之能夠協力於美國冷戰項目，乃至以美國方式重塑香港教育模式。這些活動令香港的跨太平洋之教育與商業網絡流動急速增長，香港這個英屬殖民地因而能夠扮演重要角色，令中國得以在一九七一年中美貿易關係恢復之後，重新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

從研究現代中國的歷史學家的角度看，跨商呈現的，是跨世代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這段歷史橫跨二十世紀，也擴展了「中國」的邊界。有關現代中國的論述，向來都視一九四九年與一九七八年為兩個重要轉捩點，認為這是共和時代、毛時代、改革時代之間的分水嶺。加比(Bill Kirby)等學者和我則認為，在此轉捩點前後的歷史並非斷裂。本書書寫應和了這種觀點。重新梳理香港與跨商的歷史，能夠呈現這兩段時期的連接線。⁷香港與跨商歷史反映的，並不止於資本主義在毛式革命地門前興盛的進程，更具體而言，我們能夠從中看到，特別待遇 (privilege) 在家族、公司、體系間傳承，橫跨兩段時期，與全球角色與發展互動，繼而令想像的「邊緣」得以重塑「中心」。跨商歷史反映的，其實也是民國時期 (1912-1949) 歷久不衰的影響力。學者已廣泛研究清末 (1644-1912) 乃至民國時期的教育模式、鄉情、同鄉關係之演化。不過，學者較少注意的，是教育模式如何衍生新穎且互為連結的網絡。我認為，在民國長期動盪以及其政府私相授受的情況之下，很多精英追求現代知識，並非只為研究學問，他們也視之為建立人際網絡與樹立名望的投資，

這種投資能與同鄉關係互補，為自身帶來新的保障。求學於外國院校，既合乎精英家族的商業利益，亦使之能夠在戰亂與革命之下不斷移居。透過整合香港、中國、美國、英國的資料，我會研究這些精英如何跨境、跨世代、跨時代累積、運用以及轉移這些社會資本。為了逃亡、在異地安頓、恢復事業與生意，這些精英長期倚重這類社會網絡。通過研究這類網絡，我會揭示在一九四九年之後，跨境權貴網絡如何突出地集中於香港。這種網絡漸成生態系統，以獨特模式推動了冷戰時期香港這個英屬殖民地的經濟發展，此一過程我稱之為「非正式解殖」(informal decolonization)。

對研究資本主義與全球化的學者而言，跨商網絡發展史能夠使之觀察全球化、社會資本、中國改革開放背後，何種群體在扮演何種角色。學術界與公眾輿論對中國乃至亞洲發展，以及「重返亞洲」、「亞洲世紀」很感興趣。不過，這些發展背後的非白人與非官方推手之身份與行動卻較少受注意。這本書書寫的，並非對跨商之頌辭，而是透過觀察其環環相扣的網絡，理解社會階級與世襲身份如何延續，新殖民權力買辦面對何種矛盾，跨商有時如何無情追求財富與地位。仔細研究這種網絡史，會令有關戰後全球化與中國出口導向發展的論述變得更豐沛。

跨商活動不只能為中國乃至全球史帶來新論述，我們亦能藉此以新角度思考二十一世紀的兩大挑戰——不平等與移民。跨商活動資料反映的，是根深蒂固但具流動性的層級架構如何存活於戰爭、革命、移民潮。他們選擇以香港為據點，是因為這個地方對移民開放。他們擁抱跨太平洋的種

種機會，亦使他們的財富進一步上漲。他們曾經遇到種族主義，亦曾犯下失誤，但大部份跨商最後仍然成功，是因為其社會資本伴隨其跨域活動，動盪使之保持謙遜，不知恥使之能夠得到斬獲。跨商明白，不同種類的社會資本可以如何形塑個人經濟成就，可以如何被移植，可以如何在國家乃至跨國層面衍生不同社會經濟可能性。大部份學者都會從各界別工種角色（銀行家、工業家、學者等）角度研究這些精英。我則會從跨專業角度研究，聚焦於精英間的互動，只有如此，我們才能理解社會資本如何發揮功效，如何被傳承至精英下一代。右翼學者也總是錯誤解讀香港史，他們總是希望藉此歌頌其想像的自由市場。我會在本書強調，這些精英並非白手興家。香港在美國主導的全球化之中所取得獨一無二的成就，其實與體系之中的不平等關係匪淺，這種不平等在二戰前已出現。李嘉誠等富商白手興家的故事仍在香港本土受讚頌，但其事蹟並非本書內容重點。大部份香港精英發展事業之時其實都能憑藉家族資源，但我們對此所知甚少。故此，發展、解殖、移民、冷戰、全球化如何串連個人與家族，如何決定今天的社會階級差異，會是本書所聚焦的新歷史敘事角度。

跨商策略與其脈絡

我們不能過份強調，在冷戰初期，香港漸變成獨一無二之地。不過，我所指的跨商策略，其成

敗的確相當取決於這個不平凡之地所能帶來的機會。三大外來因素交匯於香港，令此地變得獨特，這三大因素分別為：第一，自一九四五年八月起，英治與其經濟政策於香港復行；第二，於中國大陸共產黨建政之際，約七十萬人移居至香港；第三，美國在西太平洋一帶進行帝國擴張。在香港歷史書寫之中，第三個因素得到的關注最少，故此在本書中，我會特別聚焦於第二與第三個因素之互動。這不代表英國官員或政策不重要。對香港而言，英式法律與金融體系是其穩定之基石，對跨商策略之成效亦至為關鍵。但同樣值得一提的是，英殖政策也引致房屋泡沫、銀行危機，官員對一九七〇年代的貪腐、走私、有組織犯罪問題亦有欠積極。

從一八四一年英殖管治開始至一九四一年聖誕節英殖管治者向日人投降，香港一直是歐洲殖民地港口網絡裡的樞紐之一，這個網絡橫跨非洲與亞洲海岸線。在大蕭條期間，鄰近香港的港口馬尼拉、上海、曼谷、新加坡、檳城、仰光的開放貿易與移民政策都相當一致。⁸亦因此，在十九與二十世紀之中，大量資本、人口、貨物在這些相互聯繫的商業中心之間流動。很多時候，這種商業活動都由海外華商管理，香港則成為這些離散華商的指揮基地。以洗玉儀 (Elizabeth Sinn) 的話來說，香港是中國與東南亞乃至美洲海外華人社群之間的中介空間。⁹跨商在東南亞取得商業主導權，有賴他們與歐洲殖民政權之間的戰略合作。他們扮演中間人角色，令華商變為「不可或缺的局外人」(essential outsiders)。¹⁰因為在地歐洲人人數很少，殖民地政府只能倚靠華商充當稅農 (tax

farmer)、勞動力承包商 (labour contractor)、土著中介等角色。很多華商憑藉這類角色致富，海峽殖民地 (Straits Settlements) 中的土生華人便是例子。不過，在日常生活中，歐洲人、華商、土著間的關係仍然疏離，一則源於排拒政策，二則與華商自力更生相關。

這種模式受二戰打斷，但香港仍然保留其中介空間身份。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二年間，日本帝國擴張快速，歐洲人與華商之間的網絡被粉碎，東京漸成新的網絡中心。¹¹至一九四五年八月，戰局逆轉，日本投降，以日本為中心的秩序之崩塌指日可待。於亞洲歐人乃至日本帝國的殘存勢力下，美國與蘇聯互相競逐，以擴大其區內影響力。中國內戰是當中一個競爭點。按毛澤東所訂的策略，人民解放軍包圍華北，迫使蔣介石的國民軍撤離城市，並在一九四八年末南下。我們會在第一與第二章看到，中國內戰此一轉捩，觸發了曠日持久、達數百萬人的流散，他們的目的地，主要為香港和台灣。大部份移民都是平常人，他們恐共，當中也包括為數不少的民國精英。國民政府與有軍方背景的家族都傾向移往台灣，但資本精英卻喜歡香港，原因是相較而言，英治恢復的香港更為穩定，更為開放。¹²我們會看到，很多移民都來自買辦世家，這些家族與外國人合作，學習外國語言，甚至在條約港口時代 (treaty-port, 1842-1943) 成為基督徒。¹³之前不少歷史學家都曾研究一九四九年前這些家族於上海與天津等地有何活動，本書研究將之延伸，探視一九四九年後這些家族的在港活動。¹⁴這些精英移民在港成為華商，他們迎合新的國際秩序，維持了資本家身份。

與此同時，解殖與經濟干預主義令香港在全球舞台之上顯得不平凡。至一九六五年，香港是亞洲少數殖民地之一，當時與香港同為殖民地的，還有鄰近的葡屬澳門，以及英屬巴林（Bahrain）與亞丁（Aden）。轉口港乃至華商之間的體系版圖與發展受限，原因是新的國族國家將港口城市併合於國家發展規劃之中。社會主義國家與資本主義國家同樣推動土地改革、貨幣管制、入口替代關稅、基建與工業國有化。這些政策及其與國際發展機構的互動之成效不一，已有大量學術文獻對此著墨，但值得補充的是，這都為華商帶來侷限。¹⁵很多後殖民國家也透過排華以激發國內的民族主義情緒。印尼、馬來西亞與之後的越南排華言論、政策、暴力，都令其華人資本與人才外流，香港與新加坡是這些資本與人才的主要接收地。¹⁶

此時的香港發展反其道而行。香港進一步放寬土地、勞動力、資本管制。在一九四〇年代末，重新得到行政權力的香港英殖政府除了推行溫和政改之外，還去除對女性、童工、非英國投資、工業土地併購的限制，對逃離解殖後的東南亞與革命後的中國資本家而言，香港魅力大增。如學者施錫亨（Catherine Schenk）所言，英國將香港留於英磅區（Sterling Area, 1945-1967），但對之也賦予頗大寬限權。在戰爭時期，倫敦於整個英帝國版圖之內規管外匯，以保存英磅之幣值。於一九四五年之後，只有香港與科威特（Kuwait）市場能夠自由兌換美元，這與兩地的轉口港歷史地位以及石油貿易有關。¹⁷布雷頓森林體系（Bretton Woods system）令匯率變得固定，且干預主義在

全球漸趨普及，這令香港成為華商乃至外來者尋找機會之地。不過，香港並非唯一一個規管寬鬆之地。奧格勒 (Vanessa Ogle) 曾分析指，整個「離岸世界」(offshore world) 成形之時，正值歐洲帝國離昔分崩，與此同時，強調干預的主權國家模式之發展如日方中，其影響力漸變得無遠弗屆。¹⁸ 在一九四〇至一九七〇年代間，低稅天堂、離岸市場、經濟特區群島地帶發展蓬勃，自由資本主義因而能在世界邊陲發展興盛，而這個世界日漸受強調干預與日益龐大的國家所主導。在此背景下，香港猶如耀眼之星，是少數擁抱低稅率與放任政策之地，以香港本土語言來說，是實行「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ism) 主義之地。不過，在經濟範疇之中，香港英殖政府仍然透過壟斷主要行業、興建大型公共房屋、柔巧協調工商組織等方式表現積極。在「離岸世界」之中，香港一枝獨秀，原因是香港能夠聚攏大量人才與資本。大部份離岸城市都倚靠旅遊與影子銀行事業，香港的難民潮卻為這個地方提供了低廉勞動力，令其製造業得以興盛。此前學者已經探討香港難民潮的外交、法律、人道面向。我想特別指出的，是這些移民如何利用其專業、資本、網絡，既善用其他移民作為勞動力，亦為其教育費心，令香港得以在一九七〇年代利用美國市場，成為全球最大紡織品出口商，同時成為美國院校最大學生來源地。¹⁹

但只有部份移民華商得以稱得上是我所說的「跨商」。那些之前與美國有聯繫，且願意為美帝國擴張服務的，才屬「跨商」。在二戰前，美國在英屬香港利益有限，但對華盛頓而言，中華人民

共和國建政，令香港之價值有變。如唐耐心（Nancy Bernkopf Tucker）所分析，香港先成為美國在華主要諜報站。²⁰我也會在第一章強調，於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間，韓戰爆發，美國與聯合國對中國實施貿易制裁，令香港成為美國經濟策略主要實行地。我們因而會在第二至第四章看到，華盛頓也開始透過其國家——商界網絡向香港（特別是教育項目）投放資源。²¹這些活動，以及北京、台北、殖民政府的共同利益，令香港成為可以與柏林相提並論的冷戰之地。²²眾多謀算相互糾纏，也令香港得以成為聚合各種網絡的樞紐。²³

重要的是，於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秩序之中，美國在港進行的心戰，為在港華民帶來了不可想像的機會。除了透過國家——商界網絡擴展美國在港影響力之外，華盛頓也開始改革其建基於種族的入境制度。在排華時代（Exclusion era, 1882-1943），華人失去各種權利與機會，上述改革將之逆轉。徐元音（Madeline Hsu）等學者都已指出，一九四三年，即使美國排華法案被撤銷，不斷湧入的華人移民的發展空間只稍為隨之而增加。在戰後，相較歐洲難民，華人難民所得的移民配額相當少。美國國會的特別法案容許有限的華人學生與精英入境或逗留。美國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等組織招攬華人知識份子，將之安頓於台灣與美國。這個系統隨一九六五年的《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也被稱為《哈特——塞勒移民法》〔Hart-Celler Immigration Act〕）而轉型。這些改革不再強調白人優先，改而著重教育與家庭

團聚需要。為此，香港居民移民美國的機會增加，受教育程度較高或與美國有聯繫者更是如此。與此同時，英國也透過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八年的《英聯邦移民法》（Commonwealth Immigrants Acts）以及一九七一年的《移民法》（Immigrants Acts）褫奪殖民地子民的英國公民權。結果，在一九四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間，華商被迫改變之前於英帝國內的合作與營商策略，轉而迎合以美國為主秩序。解殖、後殖時代之民族意識、經濟干預主義、中國革命、美帝國擴張這些因素互相交織，致使很多身在香港的華商有了新的目標，開始發展跨商策略。

跨商策略與非正式解殖

至一九五〇年代初，在港工業家、銀行家、學者等專業人士既著眼於照顧美國市場需要的出口導向發展，亦投資於仿照美式教育的學校發展。來自江南地區（包括江蘇、浙北、上海）的紡織業工業家對此特別感興趣。在其一九八八年著作《移民企業家》（*Emigrant Entrepreneurs*）之中，社會學家黃紹倫曾嘗試解釋為何這批移民能夠主導香港紡織業。按其一九七〇年代末所進行的匿名訪問，黃紹倫剖析了這些工業家的經歷與營商手法。他發現，這些工業家都心繫美式教育。他曾訪問三十二位大學畢業的工業家，當中九成都能以流利英語對答。他們之間，有六成人曾在美國留學，

或受學於中國的美國傳教士學校，另外一成二曾留學於英國，百分之六則留學於加拿大。他們的子女也同樣接受美式教育，有十位留學於美國，只有一位曾留學於英國與台灣。黃紹倫解釋，這是為跨國生意鋪路。他指，紡織業工業家的教育背景，為其提供了頗具價值的社會網絡，使之得到有用的人脈與市場資訊。曾在英美留學的工業家，亦因而容易在當地經營網絡。故此，紡織業工業家之後也往往都在英美留學，這些地方都是香港紡織品的主要出口市場。²⁴

雖然在黃紹倫的言辭中，英美看似同等重要，但其研究卻清楚反映，美國的影響力顯然更大。我將這種商業與教育策略視為跨商策略之重心，跨商策略衍生了美國社會資本（American social capital）這股無形資產（我會將之詳細闡述）。不過，黃紹倫以匿名方式進行訪問，令這些網絡與策略的實際操作難被窺探。透過歷史研究，我能夠補遺，且能放眼於紡織業工業家之外的網絡，探視銀行家、律師、行政人員、學者、前國民政府官員這些香港移民精英如何開展相近似的策略，如何在港扮演相類之角色，以令香港向美式商業與教育模式靠攏。我也會書寫心繫英國的廣東、潮州、猶太等精英如何變為心繫美國。故此，過往以上海為中心、以冷戰下香港殖民地為背景的華商史觀不免會增添其他族群互動元素。此時李卓敏等人物逐漸為香港本土教育帶來重要改變（見第四章），我因此會指出，在一九六〇年代，上流方程式（到美國留學，累積知識與社會資本，進而得利）逐漸成形，精英之跨商策略逐漸生根。

從我的角度看，跨商策略反映一種務實思維。從當時香港精英角度看，國際政治權力更替，利用英帝國衰落與香港作為冷戰中介點的機會自是必要；要把握這種機會，便需要建立與美國的商業與教育聯繫，進而將中國引入這個生態系統之中。這種融合以不同方式進行，且在過程中目標不一，以留學於美國作為商業策略，為本土企業引進美國資金與專業知識以規避或形塑香港殖民地政策，定期到訪美國或聯合香港之美國商會推動自由經濟，仿效美國模式以增加競爭力等都是融合的例子。促進跨太平洋之人流、錢流、貨流之思想，是這些行動背後的主要動力來源。以馬克思主義語言來說，這是為消除香港與美國乃至後來中、美、港之間的地理分隔。跨商一詞同樣能夠反映，在美國主導的新國際秩序之下，昔日海外華商與條約港口商人的合作如何以新形態出現。這種新形態重新定義了一九四五年後跨國間的權力、策略、特別待遇。有些人或會想將這些策略稱為「親美策略」，但這會過份簡化事實——對開展跨商策略的華商而言，他們只是行事務實，對美國的政治情感並非他們首要考量之事。在跨商策略之下，原來居下的殖民地子民地位躍升，於今天時人與學者眼中的政治、地理、種族限制，並沒有真正抵制這些子民之發揮。透過經營與累積美國社會資本，這些遊走的「第三世界」角色擠身於美帝國跨域勢力圈之中，並將香港置於全球經濟的中心位置。²⁵

其背後邏輯相當顯而易見。在一九五〇年代，美國是全球金融中心、全球最大的消費市場，且

在香港製造業蓬勃之時，愈趨成為香港的主要出口目的地。美國也是援助難民的重要資源來源地，甚至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建政之際，是重要的出走地。從民國時期的經驗看，出走的移民都明白，接受美國教育是出走捷徑。享獲美國高等教育，既是榮光之事，也是得到現代知識、熟習英語、理解跨文化、知曉市場動態、建立有用網絡、為移民鋪路的有效路徑。香港與美國攜手並進之時，跨商策略逐漸成形，本土工業家繼而能夠接通全球金融市場，跟上美國消費者的步伐（見第五章），得以推動香港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產業升級（見第六章）。學者薩尼揚（Annalee Saxenian）與翁愛華（Aihwa Ong）曾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提出意思相近的「阿爾戈英雄」（Argonauts）與「太空人」（astronauts）概念。我的跨商研究則以此為基礎，將研究視野擴至半殖民中國與東南亞作為殖民地的港口城市。²⁶從清末起，海外華商與條約港口資本家越洋協力，與外國帝國勢力合作，建立跨域教育與商業網絡。在政治事件的因緣際會之下，這些帝國體系被重組，很多家族聚於香港，接連西太平洋的社會資本因而在此植根。

不能否認，跨商一詞有別於這些華商的自我形象，且也非為樹立某種身份。此一用語只為揭示不同個體面對國際強權之時的不同應對，這種應對，始於他們在中國及東南亞與歐洲帝國力量合作之時。我在本書所做的是，將一九四五年後這種頗不顯眼、存於眾多專業人士精英間的協作網絡置於陽光之下。這些跨商策略相當靈活，並不固定，民國之不穩、一九四九年後香港前途未明、被

掩飾的美帝國擴張，都是其背後的重要推力。透過分析這些角色的教育與國籍選擇、跨國活動、世代間的社會網絡，我們能夠洞見跨商策略的其中一二。故此，我對社會資本的分析，屬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且也著重個人策略。網絡圖表與量化研究可以反映各種模式，但我們需要關注的，是更為獨特的脈絡，以及獨特個體如何得到、運用、維持各種人際關係資產。

追尋跨商策略的移民精英不但整合了跨太平洋的關係，而且也為始自英殖時期的權力與特權賦予新形態，我將這種形態稱為非正式解殖。羅賓遜（Ronald Robinson）在一九七二年曾發表奠基性文章，自此之後，研究帝國的學者都強調帝國初起、發展、終結之時本土協力者的關鍵角色。²⁷當反殖浪潮成功消滅殖民政權的中介協力者力量之時，解殖時代便正式開展。²⁸但在香港，這種轉變從未出現。研究帝國的學者或會假設，這是因為本土精英繼續與英國殖民者合作。我的跨商研究，令此一假設變得不再不證自明。本書所研究的精英，很少投資於英殖相關項目，且也沒有積極從英人手中爭取機會。他們沒有直接與英帝國力量交鋒，他們做的，是保存中華人民共和國理應會壓制的國際機會。從這個角度看，英治延續，是足以方便跨商策略與美國帝國系統連結繼而興旺的場景。香港居民熱衷追求公務員、法律、建築、醫學事業，他們繼續效忠於殖民管治，因為這些事業都受英殖力量控制。商界與學術界則不然。從一九四九年開始，當跨商策略開始累積以新形態示人的社會與經濟權力之時，這些界別之人曾經挑戰殖民地政府，亦曾利用其美國社會資本，越俎代庖，以

及從殖民管治者手中取得權力。利舜英（Ansie Lee Sperry）（第一章）、歐偉國（第三章）、李卓敏（第四章）、沈熙瑞（第五章）、唐炳源以及鄭明訓（第八章）的故事，都能說明跨商如何在殖民地制度居高位，同時不與英國合作。這些人物都利用美國社會資本以在英國衰落過程中取利，進而與殖殖目標唱反調。英國官員與行政人員也意識到其權力在萎縮，且也屈服於這種非正式解殖。從一九五〇年代開始，在非正式解殖過程中，治理香港的權力轉移以兩種方式進行：一，從英人至華人；二，從公營體系至私營體系精英。

跨商策略之概念也反映了眾多「海外華人」的經歷、價值觀，以及其所承襲的特權如何相近。

王廣武是海外華人研究的先行者，這類研究多專注於身份問題，以及這些社群與中國大陸保持何種關係。特別令他們感興趣的問題，是何謂「離散」（diaspora），何謂「彈性公民權」（flexible citizenship），何謂「協力式國族主義」（collaborative nationalism）。²不過，這種研究方法有其盲點。按照這種研究方式，國際聯繫與除政治身份以外的動機都會易被忽略。透過研究跨商策略，我希望揭示的，是當中精英之野心、移動能力、權力地位如何有別於美國排華時代的華商，乃至一般同代人。我稱之為跨商的人，他們通常視公民權為商品，很少視自己為美國人，或擁抱中國民族主義情懷。海外華人在不同帝國之間左右奉迎固然不是新事，但在美國以這種風格行事且合法，卻算是新風。這種有別於排華時代的氛圍，令香港跨商得以入籍於美國，並以此作為工具，迴避殖殖

影響，並在跨太平洋融合之中扮演重要角色。這有助我挑戰有關一九七八年後「海外華人」投資於中國的論述。我的研究能夠說明，誰最能夠從中國改革得到好處，「海外華人」基於愛國情懷到中國投資之說不無神話成份。

高等教育之用途或者不能不證自明，但跨商策略仍然能夠顯示，美國的高等教育令資本主義全球化增速。美國教育的亞洲面向，以及其政治、宗教、文學、種族影響，愈來愈令學者感興趣。³⁰於民國時代，中國精英與政府經常引導大部份留美學生攻讀「現代」與「有用」科目（包括科學、管理與工程）。³¹香港精英也有相同取向。他們如此教育在美兒女，亦按此取向導引美國資金與技術至香港體制。換言之，美國高等學院成為知識、精英社會網絡、文化行為、市場資訊的發源地。故此，我會揭示美國高等院校如何積極推廣美國商業模式、專業思想、階級體系至全球，香港學生在美留學乃至在港設立美式高等學院等跨太平洋活動是其推廣方式。³²第六章也會指出，在跨太平洋網絡之中，舊生的捐獻回饋活動，也助長了今天旨在積極開源的大學分校全球擴張。在本書分析之中，美國教育不一定更優越，也不一定是推動民主的力量，但的確，這是各個美國與國際角色推動資本主義議程的重要媒介。

跨商策略的物質主義與務實主義，能夠有助解釋為何上述歷史不受公眾與學者重視。書中觀點應會令大部份香港人感到意外。這段跨太平洋歷史少為人知，我認為原因有四：第一，受殖民

管治影響，知識之生產被訴諸於先入為主之見，能夠被用以佐證觀點的檔案與記憶卻被埋藏。再者，香港學校少有教授本土歷史，且大部份中國研究學者基於「大中原心態」（傅葆石語），甚少注意香港。³³第二，這些策略來自一小撮精英，其規模透過教育擴張。亦因此，跨商策略漸成「常識」（common sense），香港人進而視留學於美國為理所當然之目標，這點在「新浪潮」電影顯而易見。³⁴第三，跨太平洋網絡與策略經常引致移民，本書所論人物之後代多已不在香港居住，這段歷史之記憶因而被四處分散。第四，經濟急速轉變、一九八九年天安門事件、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都觸發香港文化與身份之大變，跨商策略變得更為複雜多變。³⁵簡單舉例說，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美國社會資本之累積備受重視，但此後，尋得加拿大、紐西蘭、澳洲等護照也成為一時風潮。我會指出，這段歷史已植根於今天公眾記憶之中，今天香港居民視己為國際公民，其來有自。針對跨商策略之分析，是為解構「常識」，還早期已被遺忘的策略視野之原貌。

要解構英殖管治，追蹤華人精英的足跡，我不能不以放眼全球與跨世代的方法研究。對冷戰時代香港歷史之研究，往往倚重於英國國家檔案館以及美國國家檔案館之館藏。我卻選以側重於香港中央圖書館、香港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之特藏。除此之外，我也參考來自美國、英國、中國圖書館與檔案館的中英文資料，以追蹤在不同脈絡與人物性格之下，跨域社會資本如何被累積、運用、轉移。我頗為注重研究對象人物之英文流暢度，但對我而言，這些人物的中英文史料

同樣重要。我也認為，將簡體字與拼音加諸於已離開中華人民共和國之人物，並非尊重歷史之做法。不過，經常出現於本書之跨商一詞，其英文名稱出自於普通話拼音 Kuashang。從廣東話角度看，其拼音應為 Kwaa-soung。從上海話角度看，其拼音則無定論。這其實是棘手的學術問題。書中所研究的人物，很多都不擅於普通話或廣東話，他們較喜歡使用上海話或英文。只有少數（例如李卓敏）能夠駕馭多種語言。正視這些背景，同時以普通話拼音標示跨商，也許是較恰當之做法。對我而言，所謂商，意指商人，即銀行家、工業家、乃至學者。我們之後會看見這些角色如何具商人色彩。

社會資本與全球化

在今天的公眾與學術討論之中，社會資本已成為流行用語。在全球化與經濟轉變的影響下，令學者關心的問題，多是如何透過量化分析，研究低社會資本對受磨損的社群之影響。³⁶高社會資本脈絡（特別是亞洲精英社會），則甚少受注視。我認為，若不關注這些脈絡，我們便無法理解全球化。我更認為，若不研究香港，不將之視為有所作為的角色，我們便無法理解社會資本在全球化中之位置。學者或會假設，紐約與倫敦等歐美精英的網絡與策略才是國際經濟體系背後的重要推力。這種觀點會使我們對全球化的理解變得貧乏，也會邊緣化位列全球金融中心頭三位之內的香港。歐

洲中心主義與帝國視角下的知識生產令以北大西洋為中心的知識框架得以成形與流傳，從這種框架看，發展中與後殖民世界屬次等地方。觀察香港精英如何孕育與運用美國社會資本，能夠幫助我們呈現更多權力地理學少為人知的一面。透過跨商的故事，我們會見到流動的華人精英如何預測一九四五年之後的世界變化，如何及時疏遠英人體制，迎向美國體制，並擁抱其世界觀，以得到安全乃至物質利益。在過程中，他們遇到眾多挑戰，例如美國漠視亞洲，華人受種族主義乃至保護主義困擾。不過，跨商的網絡與策略仍然促成香港製造業之興起，令全球化與其衍生的不平等更快成形，他們自身因而更具優勢，造就了中國的崛起。在第八章，我們將會見到他們如何促成美中勢力平衡。

每當提起社會資本，很多學者總會聯想起法國社會學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他並非首位提出社會資本之說的學者，但他的著作廣受重視（例如一九七九年的《區判》[*Distinction*]），文化資本（Cultural capital）是其著作探討的重點。³⁷布迪厄令我感興趣的，是他對教育的看法。在其一九八九著作《國家貴族》（*The State Nobility*）之中，他分析法國教育體系如何扮演分配與複製文化資本的關鍵角色，當中的方式，主要是藉由教育資歷、演說、衣著等制度與生活元素散播影響力。³⁸布迪厄一直認為，教育既呈現亦生產文化資本，並指教育成果取決於家族的文化資本之多寡。對他而言，學歷只代表文化競爭力的憑證。布迪厄也有說，衍生自教育的經濟成果，取決

於社會資本之傳承與累積。³⁹

我同樣重視教育因素的影響力。不同的是，我更為著重思考社會資本如何衍生自教育。接受儒家教育的目標之一，在於複製文化資本。但在我的研究之中，接受美國教育的務實目標則是另外一回事。第一章已然提到，晚清與民國商界精英更為重視傳教士與外國學校之教育，他們視之為一種工具。在海外留學，自然有助提高社會地位，但有助階級晉升的美國文化資本並沒有被視為最要的目標。在外國帝國主義、本土動盪、商業競爭、日本佔據、中國內戰、香港不穩的情況之下，這些不斷移動的精英仍然專注於尋求外國教育，希望能藉此得到新科技、營商方法與夥伴乃至外國籍。我認為，這些精英的教育策略，其實是累積跨世代、跨文化的社會資本之法，這種社會資本會被轉化為經濟資本。

在本書的人物分析案例之中，我對某類根深蒂固的知識觀念也有相同看法。大部份學者都喜歡應用令人不無疑慮的「人力資本」(human capital) 概念，布迪厄對此概念也不以為然。⁴⁰ 這個概念背後的假設確實不無商榷空間。按此觀念，教育至為重要的成果，在於知識，這種知識可以是專業技能，也可以是博雅教育(liberal studies) 所言的批判思考能力。這個假設一直受經濟學家爭論。在一九七〇年代，雅洛(Kenneth Arrow)、彭斯(Michael Spence)、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 等對「人力資本」概念感興趣的經濟學家都在辯論市場之中教育體制的演示實況的功能與

影響。⁴¹這場辯論的重心，在於學校最重要的經濟貢獻，是否在於其提供新技能，或在資訊不平衡的世界之中，展示個體既有特長之能力。在民國時期乃至一九四九年後的香港，商界精英專注於吸取實務能力，以及獲得資產。他們亦誘導其小孩學習各種工具知識，得到專業經驗，獲取海外網絡。他們的兒女基本上都會遵從父母的教導，但在過程中，他們不免會轉讀不同主修科，或被退學，或作反抗。我所研究的人物，他們都側重商業與專業知識，也沒有背離家族所持的網絡、旅美留學背景乃至行為。故此，我不需為美國高等教育眾多選擇分門別類。在研究之中，我對教育類型的分類標準，主要建基於伴隨流動與功利的美國社會資本而來的網絡、履歷、演說、衣著、自信。

開章的引言可以印證這一點。那段引言是唐炳源的人生格言，其兒子唐驥千 (Jack Tang) 則視教育、名望 (reputation)、信用 (credit) 為三大必要資產。他認為，沒有人能從你身上取走這三大資產。很多重商與離散文化群體也有相近看法，但唐驥千觀點的意涵更為複雜。對唐驥千而言，信用並非僅為信譽，這也意指銀行所提供的貸款。你的聲譽與貸款或能被他人言語或金融機構奪取，但輔之以唐驥千所言的第二大資產（即教育）之後，我們會更能明白他的真正意思。按其理解，教育加上信用與聲譽，基本上是將社會資本轉化為經濟資本（即金錢與權力）的方程式。他含蓄地解釋其家族之不同世代如何都視旅美留學為可靠且為社會所接受的獲取社會資本之法，這種方法揉合跨文化網絡、履歷、行動、知識。唐驥千在麻省理工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MIT) 與哈佛大學商學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HBS) 留學，這些學歷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能夠從中結識美國精英、同樣旅美留學的華人等國際朋友，能夠藉此取得金融信貸。這些持久與流動的社會資本經得起戰爭與革命的考驗，也有助金錢與權力的集結。

之前很多學者都研究社會資本與經濟結果之間的關係，不過，他們多只在社會資本稀薄與本土非跨域的脈絡之下作考察。例如，在一九八〇年代，社會學家格洛特 (Mark Granovetter) 與高民 (James Coleman) 新古典主義的基要教條，便是市場決策理性與人際網絡無關。他們指，各種根植於社會的關係，乃至跨世代價值觀，都在影響經濟決策。⁴² 在一九九〇與二〇〇〇年代，學者則認為，個人的社會資本的確能夠形塑社群的經濟成果。普特南 (Robert Putnam) 的暢銷著作《獨自打保齡球》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特別提出大量證據，演示在美國公民與社會參與日漸消亡的情況下，個人社會網絡如何衍生溢外效應。⁴³ 在這些見解的基礎上，我會專注於光譜的另一端，即社會資本厚重與跨域的脈絡。我會指出，美國社會資本不只有利於跨商家族，香港社會亦能從中受惠，原因是跨商策略為香港樹立了具生產力的教育目標，為之帶來跨太平洋機會，也重塑了不同的、理應理性的市場。在第五至八章，不論是在銀行與投資領域，或後福特主義 (post-Fordism) 轉變過程，或中國早期改革歷程之中，我們都會看到這一點。為免被誤解，我想強調，香港社會所享有的跨商策略溢外效應，並非自然而然之事。若非不同國家

相互合作，若然其合作沒有帶來差異頗大的各種回報，歷史便會有異。

對於社會網絡，中國學者卻一直另有所想。他們關心的，是限定於某種文化圈的同鄉關係。「關係」是一種頗為複雜、由社會建構之概念，這個概念隨時空轉變而演化。著名中國社會學家費孝通在其一九四七年著作《鄉土中國》指，中國社會鄉郊地區的社會圈子，其關係網都圍繞成員濃厚的自我中心意識。這有別於歐美社會的情況，即歸屬感建基於描象的共同體意識。⁴⁴換言之，上述關係意味兩點：第一，關係源於親屬與土生土長情結；第二，關係建基於成員對彼此的責任感，這種關係網具彈性，從內往外幅射。在民國時期，鄉郊移民離開家鄉，遷往城市甚至海外，但這種關係仍然保持活力。傳統上，離開原住地的旅居者透過會館自上而下的組織繼續連繫關係。管文（Bryna Goodman）曾分析，於民國時期，更為民主的同鄉組織「同鄉會」出現。⁴⁵同鄉關係也形塑了工會、商會、慈善組織、政治組織、企業董事會、犯罪組織的會籍規條。⁴⁶不過，同鄉裙帶關係並非連結華人精英的唯一路徑。精英間乃至與外國人的同窗關係，也構築了同具價值的關係網，在一九四九年之後，這種關係網匯聚於香港，且其規模不應被忽視。但亦如學者楊美惠（Mayfair Mei-hui Yang）所分析，在中國大陸之內，關係仍以獨特方式繼續演化。⁴⁷

從繫於教育與經商的跨文化與跨太平洋關係之角度看，我所指的跨商策略與美國社會資本，可被視為關係之樹的分支，在一九四九年後，這些分支聚攏於香港。在這個殖民地之中，大部份從中

國大陸而來的移民仍然透過原鄉關係尋找工作與住宿機會，不過，對於取得跨國企業投資、美國市場機會、移民機會，這些原鄉關係卻難有作為。要實現這些目標，精英只能依賴自己的跨國社會網絡，以接觸國際權力體系。跨商雖然仍會以原鄉關係為榮，且亦會加入蘇浙同鄉會等組織，但他們對原鄉關係的依賴，也已逐漸減退。他們不單參與美式舊生會，加入國際獅子會與國際扶輪社等組織（在一九四九年前，他們已然參與），且也私下與美國政府的不同代理合作，取得美國公民權，在國會大廈作證，甚至在其後成為中美關係之中介。原鄉關係與美國社會資本的一個交匯點值得強調。從第一章起，我們將會看到，中華民國時期的某些地方勢力確實心繫美國教育，故此兩者確有交匯之處。在某種時空下，同鄉關係，美國社會資本，或簡單如一世朋友，可以是同一件事。

全球經濟轉型史——社會資本、跨國網絡、教育體系、政府之互動

在過去，不同學者已然挑戰新古典主義經濟學派 (neoclassical economics) 只重推演邏輯，不重歷史的學術觀點。馬克思 (Karl Marx)、恩格斯 (Friedrich Engel) 的歷史唯物主義 (historical materialism)，乃至韋伯 (Max Weber)、熊彼得 (Joseph Schumpeter)、普蘭尼 (Karl Polanyi) 的歷史學派，以及華人哲學學者王亞南，都曾提出質疑。⁴⁸如之前所言，研究關係網絡的社會學家

也曾挑戰新古典主義之說，他們提供實證，指出市場只存活於國家行動之中，在人際關係的影響下，經濟交易不理性，也不平等。事實上，也有經濟學家同意這種觀點。漢保拿 (Robert Heilbroner) 指「經濟學」作為一門學科，強調理性自利與自由競爭，因而刻意忽視和掩蓋市場背後人所建立的制度和關係，故此已然成為一種意識形態面紗。⁴⁹

歷史學家向來主張以整全觀考察政治經濟學，但我們對二十世紀的理解，總離不開歐美中心觀。研究早期近世史的歷史學家在梳理全球資本主義擴張史之時，理應不以歐洲為心，轉而以跨大西洋奴隸網絡，或加勒比海與拉丁美洲的糖與銀之生產為觀察重心。王國斌、馬素馬達 (Sucheta Mazumdar)、普馬蘭 (Ken Pomeranz)、索林 (Madeleine Zelin) 等研究中國的歷史學家都已指出，在整個十九世紀，中國曾是世界最大經濟體，世界之銀礦場，且也是工業革新之重鎮。⁵⁰ 研究女性與性別的歷史學家則嘗試推翻以男性為中心的資本主義發展史論述。他們指，女性的勞動、投資、管理貢獻乃至其財產被忽視，她們乃至家庭被邊緣化的勞動角色被重新重視，也重新定義了經濟市場，破除了以往想像。⁵¹ 不過，對二十世紀發展的研究仍然進展緩慢，其研究只聚焦於圍繞發展的政治論述與思想，這些論述背後，都不無北半球政府乃至國際組織的主導角色。⁵² 直到最近，若然南半球細心留意，便會發現其政府被視為全球經濟的被動得益者，其經濟影響被認定幾近於無。⁵³

直到一九九七年，雖然香港人一直居於細小的英國殖民地，但他們也是中國乃至全球資本主義

發展與演變背後的重要推手。我曾在其他地方指出，在一八四〇年代，香港已成為首個華人資本主義社會，其後香港更促進跨太平洋整合，這個整合是英帝國與美帝國經濟擴張的產物。⁵⁴ 在本書研究之中，我不但會強調香港在世界舞台的地位，而且也會以更整全的視野閱讀政治經濟學。社會資本、跨國網絡、教育體系、政府的幕後工作乃至傳統商業史課題，都會是本書焦點。換言之，「第三世界」的經濟角色會是本書研究的主角，其用意是為修正當下主流論述，重新重視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過程中，殖民地乃至後殖民時代精英的角色。二〇二〇年的疫潮使「超全球化」(hyper-globalization) 受干擾，香港進入新的政治時代，中美關係惡化，晚期資本主義時代的物價上漲，在這些脈絡下，研究這些中介角色的影響，至關重要。

由於東亞的資本主義轉型發生於冷戰時代，大部份有關香港發展的文獻都不離「區域研究」(area studies) 框架的問題。目睹新加坡、香港、台灣、韓國在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間的爆炸式發展增長，社會學家假設，在這背後，一定有共通原因。他們因此應用地區框架，將這四地歸為「四小龍」。學者們假設，共有的儒家精神價值觀（包括家長式管治、紀律、對教育之重視），是這四地的成功因素。⁵⁵ 這種研究方法的問題之一，是一旦同樣擁抱相近文化價值觀的地方之成就不及此四地，便易受貶抑。更嚴重的問題，是文獻沒有正視以下事實——香港的經濟發展模式，其實有別於奉行國家強勢領導的新加坡、台灣、韓國模式。雷孝 (Edwin Reischauer) 曾在一九九〇年

講學，當時他已指出，四小龍模式不盡相同，且討論不少新加坡、台灣、韓國的政策與人物案例。不過，他並無言及香港的政策或人物。⁵⁶香港案例值得被獨立處理，原因之一，是香港曾為四小龍之首。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在一九九〇年，香港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一萬三千四百八十五美元，高於新加坡、台灣、韓國的一萬二千七百六十六、一萬零四十八、六千六百四十二美元。

從那時起，華商的跨國活動研究受更多學者重視，但其研究框架仍然一成不變。漢彌敦（Gary Hamilton）等社會學家曾研究「海外華人」企業之精益商業模式（lean business models），以及其對社會網絡之依賴、適應外在環境之法，並以「網絡資本主義」（network capitalism）或「遊擊隊資本主義」（guerrilla capitalism）等概念將之分析。⁵⁷米亞（David Meyer）也曾指出，香港之成功，離不開其長時間在亞洲之中作為華人與外國資本社會網絡交匯支點的地位。⁵⁸不過，這些學者只依重匿名訪談以及英文文獻作為研究材料。在這類研究之中，很多時候，有名有姓的華人以及華人企業都缺席其中。學者往往以「華人企業」、「華商」、「華人社會網絡」將之統稱，以區別於日本乃至西方商人與企業。⁵⁹對漢彌敦而言，這種研究方法，其實符合韋伯理想。這位社會學大師的理想有二：第一，發展符合亞洲社會情況的知識概念；第二，以這些概念為亞洲發展模式作總結。⁶⁰我相信，這類目標不免會將「亞洲社會」本質化的問題。學者仍以個體視角研究歐美企業與民眾之時，此一問題會更形明顯。透過研究雙語檔案，我會檢視華人個體、家族、企業如何在歷史長河之

中發揮獨特影響力。

此一研究確實令我更為留意市場需求與網絡，這個課題亦甚少受學者重視。在馬克思主義影響下，學者思考關於生產的問題，卻同時忽略了關於銷售與其困難的問題。漢彌敦注意到此一疏忽，並對戰後香港發展有以下看法：「香港企業家利用他們的商業知識與勤奮，聯繫大買家，或大型零售店的採購代理，乃至西爾斯百貨（Sears）、蒙哥馬利·沃德公司（Montgomery Ward）、傑西潘尼（J. C. Penney）、馬沙（Marks & Spencer）與樂蓬馬歇百貨公司（Le Bon Marche）等西方百貨公司。⁶¹這種觀點卻似乎認為，這個過程輕鬆且公平。如果單靠勤奮便能成事，那麼全球企業家理應也能聯結歐美零售商，出口其貨品至第一世界。本書研究會揭示，這種商業知識與連結較我們想像複雜，需要企業家對網絡、法規與消費者品味有精準的理解。在此情況下，累積美國社會資本，便能取得決定性優勢。

我並不認為香港的發展模式可被複製，或被擴大規模。研究香港精英如何盤旋於英美中三國權力體系之間，能夠反映全球（global）之形塑過程如何不間斷，這個權力場域如何同被國家與非國家角色形塑。關於這一點，我其實是受人類學家羅文豪普特·秦（Anna Lowenhaupt Tsing）的啟發。她透過觀察松茸，研究全球經濟的不穩定，並指出，我們被「發展」蒙蔽，誤解了經濟轉變所需的時間。⁶²為避免這些分析框架的流弊，我會指出，香港增長其實是在相對穩定的英殖脈絡下，大量

華人移民加上精英跨太平洋網絡與美國冷戰議程幾方面互動之產物。這些因素相交匯，令香港發展蓬勃，使之猶如從濕潤泥土發芽的蘑菇一樣。簡單而言，我們不能分拆經濟轉變與歷史脈絡。香港的變化縱然令人吃驚，但也亦非必然、理性、公正。這其實是一個偶然、無以為繼、相當不公的過程。

本書之結構

本書的開章與終章都圍繞中美貿易紛爭。這段紛爭從一九五〇——一九五一年的美國與聯合國禁運開始，至一九九〇年代初有關中國最惠國待遇的爭論。這些里程碑展示了香港作為跨太平洋關係急劇變化重心地的四十五年時間。於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間，華盛頓、北京與台北仍然處於對峙狀態。在此時刻，香港的商業與教育發展成為舞台焦點，並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九七年間令中美關係復甦。

第一章會回顧香港英殖歷史，重新檢視大陸精英於中共建政之時離開大陸的往事，以及他們的籍貫。來自江南的精英相當認同美式教育，在民國時期，留美學生歸來之後，逐漸主導主要專業領域。民國政權瓦解之時，很多心繫美國的精英移居香港，並依靠他們累積的社會資本謀生，以及延

續其生意。在一九五〇年，美國貿易禁運干擾了香港傳統轉口港經濟。韓戰衍生的貿易需求，令很多移民生意得以延續，香港作為英國殖民地，也開始親美國市場。冷戰初期不同危機交匯，成為跨商策略的背景。

第一與第二章審視西太平洋協助美帝國擴張的不同移民勢力。華人基督徒與美國傳教士也成群結隊來到香港，且希望能夠令其支離破碎的社群重新興旺。在香港難民危機之中，華盛頓透過美國傳教士組織提供資金，既希望幫助移民定居，也希望展現第一世界之優越。這種頗為隱蔽的美國援助，令華人領導的教會組織得以在全香港建立龐大的學校、社區中心、就業訓練計畫之網絡。很多這類組織都由跨商領導，其基督教信仰，與他們更大的策略很一致。這些組織提供教育機會，令基層非精英也能得到有限機會成為跨太平洋網絡流動其中一員。亦因此，跨商策略再非少數上流社會人士之專利。

第三與第四章會分析在一九五〇年代間，相類的過程如何形塑香港高等教育。在第三章，我會記錄離散的華人知識份子如何與跨商以及美國傳教士乃至基金會合作，建立四所華文學校，這分別為崇基（一九五一）、新亞（一九五三）、聯合（一九五六）以及香港浸信會（一九五六）。英殖官員認為，這些學校親美國，會帶來威脅，因此使之改革，使之被併入英聯邦體制。這些改革努力，以及書院自身對學校認受性的訴求，最後都迫使政府同意成立第二所大學。從一九五九年至

一九六三年，英殖政府為崇基、新亞、聯合提供源源不絕的補助，希望能夠導引這些書院成為英聯邦式的學校，後來這所學校被名為香港中文大學。

第四章會研究中文大學首任校長李卓敏，剖析這些計畫之障礙。我會指出，李卓敏是關鍵的跨商，他的辦學願景，是營運跨太平洋式之大學，這些大學基本上以美國教育與商業模式為知識基礎。他在美國擁有深厚人脈，在其任內，他促進了跨太平洋連結，跨商策略因而乘時機成熟，非正式解殖也因而加速。在一九七八年，李卓敏出任中大校長十五年，當時這所大學提供的，既非英殖亦非儒家教育，而是在美國國際領導之下的美式資本主義教育。

在第五與六章，我會概括之前各章，總結香港教育歷史，並分析精英跨商策略，以提供新的論述，提供英屬香港在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步入高消費市場轉型時期的新歷史論述。安居於香港之後，第一章所提及的工業家急於重新得到銀行信貸支持，其社會資本在此時大派用場。香港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 (Hsi-Jui Shen) 是例證。隨英美保護主義高漲，很多紡織業工業家都招攬外來直接投資，以令生產多元化，以便在不受配額限制的紡織業與成衣業大展拳腳。這一章會指，在一九六〇年代中，跨商引進埃索 (Esso) 與美孚 (Mobil) 的資金，這兩家是在全球後福特主義轉型期的龍頭巨企。

在第六章，我重新解讀香港在一九七〇年代發展出色之歷史。我會指，受惠於跨太平洋網絡，

香港得以適應全球經濟的動盪。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間，以及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間，香港是美國留學生的最大來源地。這類不成比例的流動，為香港企業提供了知識、網絡、資本，第二代跨商領袖亦能適應布雷頓森林體系之終結，採用更具彈性的生產模式。第二代跨商領袖利用美資外流的機會，指揮家族企業，使之能夠進入地產界、貨櫃船務業、金融業、供應鏈管理等高消費行業。簡單而言，透過英屬香港的教育與商業網絡，跨商企業成熟地根植於美國經濟，這是當時香港高人均國內生產總值所不能反映之事。

在最後兩章，我會演示為何我們需要重新仔細理解香港的經濟與教育演化，這有助我們明白中國如何重新連結全球資本主義體系。在第七章，我重新梳理中國的改革開放歷程，並聚焦於其經濟而非政治面向。我們會見到，在一九七一年中美貿易關係回暖之時，中國透過香港與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體系作有限的接觸。透過補償貿易（compensation trade）等渠道，英屬香港的商界精英開始在中國大陸開拓網絡。隨著商務關係變得緊密，美國商會（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AmCham）的國際行政人員開始對改革感到樂觀，並設立更多委員會、印製刊物、舉辦研討會，以促進知識與網絡之交匯。直到鄧小平截停改革之時，這些管理人員已能運用中國低成本勞動力行事。

在最後一章，我會以新角度解釋在一九八〇年代北京與香港的精英如何角力。我會先分析，部

份跨商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改革者聯手為中國稍後的出口導向發展奠下基礎。其方法之一，是胡應湘在珠江三角洲一帶興建高速公路。在此基礎之上，我會再分析香港精英的跨商策略如何在一九八四年的《中英聯合聲明》之後演化。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間，鄧小平與其盟友的威望正隆，香港精英轉而側重在廣東的直接投資。溢達集團 (Esquel Group) 的案例會顯示，此時港資扮演連結中國勞動力與美國市場的角色。在最後一節，我檢視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事件之後，跨商角色如何保護他們所建立的跨太平洋生態系統，以及如何運用其美國社會資本，確保中國的最惠國待遇能被續期。在一九九五年，中國獲得永久最惠國待遇地位。

這些章節都在說明，在一九四五年之後，香港其實是全球史與資本主義全球化成形之中心。研究香港，足以令我們以新角度解構乃至批判各種霸權關係背後的主流地理知識。⁶³這也是指，我們會將亞洲（全球三分二人口居於此）與殖民地精英置於中心，拋開以歐洲為中心的世界觀。我們會由此更明白，帝國主義與本土不穩定，如何形塑民國精英對國際教育的興趣，以及不斷的危機，如何令這些精英出走尋找機會，以對沖國族國家政治。透過觀察美國社會資本，我們會見到移民如何利用英帝國之衰落與美帝國崛起之形勢。他們務實地與美國政府相關機構合作。從此一角度看，解殖論述事實上應更曲折。國族國家之建構，頗為得力於間隙中的精英，以及作為國家代理的第三方力量。我們也能以新角度理解美國中學與大學，這其實都是衍生資本主義全球化乃至不平等不可或

缺的平台。我們也會見到，歷史進程如何繁雜，如何奠定今天我們所見的中美關係之根基。

書寫本書之時，不無警覺之心。首先，美國讀者會期望本書會歸功於美國的外交政策。華盛頓的冷戰議程的確為數以萬計的香港人提供教育機會，但同樣值得強調的是，美國對外的教育工作並非慈善項目，而是帝國擴張計畫的一部份。這個計畫的目的，是招攬全球最優秀的人才，為增加美國影響效力。第二，有些人已要求本書需對跨商作道德批判。部份人或會認為，跨商很精明。但其他人也會說，這些富商掠奪成性。我儘量避開這種二分思維。不論財富、專業、政治、品格，這些富商皆非鐵板一塊。跨商縱然深具影響力，但他們在香港、海外華人學生、美國華裔之中，並非主流，他們是特別的一群。最後，本書分析也隱然關乎父權。我認為，利舜英或許是第一位跨商策略者，她的確出眾。我的研究對象以男性居多，因為其父親多重男輕女，兒子得到的國際教育機會或領導家族生意的機會比女兒多。需要指出的是，本書研究對象以男性居多，並非本書意旨。事實上，女性一直都是運用美國社會資本的關鍵角色，書中內容會印證這一點。我由此希望，未來新的研究會以她們為焦點對象。

教青松仙

【第一章】

Chapter 1

中國精英之花果飄零

香港作為難民據點的前世今生

昌興皮革

有限公司

昌興皮革

聯興皮革鞋料

金寶順

金克傑

響音車汽

2001

Pioneer

第一章 中國精英之花果飄零

——香港作為難民據點的前世今生

「變革經歷來自橫逆。」——Anna Lowenhaupt Tsing,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在一九三七年春季，唐氏家族逃離無錫。無錫於江蘇南部，在太湖之旁，是唐家八代之家。在中國傳統之中，有此家族歷史，意義深遠，因為這意味，家族有深厚的關係網絡、共同的語言乃至傳自祖輩的責任。¹亦因為此，如非必要，家族不會離開這個原居地。被迫逃難或遇到機緣，則屬後話。²對唐氏精英而言，他們離開無錫，既為逃難，也為把握機會。他們密切留意時局，並判斷

日本將會全面侵華。他們沒有跟隨民國政府與數以千萬計的難民西行，移往內陸地區。具父親威嚴的唐炳源匆匆到英國處理生意事務，其妻溫金美則帶著六個兒女，到九十里之外的上海法租界，這是相當繁盛的外國在華飛地。在上海，溫金美租住被白俄羅斯人丟空的公寓，並主理家事。³

向被進佔之地逃難有違直覺，但也是精明之舉。一九三二年，日軍已然進襲上海，並已佔據大片領土。在此時此刻，上海很可能會面對一場屠殺。但如很多中國精英一樣，唐氏家族認為，日本不會甘願與法國、英國、美國開戰。故此於將臨的風暴之中，這些強權在上海的據點，會繼續是孤島。溫金美的丈夫在英國曼徹斯特(Manchester)購置紡織器械之時，她回到無錫，從磨坊取走所有現金，並坐在的士後座，將之帶到上海。⁴在上海法租界，溫金美成功為興建新磨坊籌集資金，這將會是唐家的救生艇。八月，日本進襲，唐家在無錫的磨坊被摧毀與掠奪，上海與無錫大部份工廠同樣被毀。⁵於戰時物資短缺之時，在此孤島之上，工廠生意卻仍然興旺。超過一百萬難民湧進上海租界，物價飛升，唐家的新磨坊因而有可觀收入。唐家生活舒適，其孩子甚至仍能繼續學習騎術。⁶(圖二)一九四一年十二月，日本向盟軍宣戰，並且佔領上海租界，唐炳源務實地選擇與新政府合作，向之繳達六百二十萬元，並加入新政府的棉花委員會，以保留其物業。⁷

華人工業家應對二戰的方法多種多樣。如高保(Parks Coble)所指，唐家的應對方式，是與日本協力。⁸唐家事後也證明，要處理這種不無風險的局面，整個家族遊刃有餘，能從中取利，原因



圖 1.1：唐炳源和四個小孩，上海，一九三七。由唐家提供。

是唐家相當務實、靈活、適應力強。唐炳源兒子在回憶之時，或許曾誇大其父親對時局的預測能力，但他的論述也多少反映了其父的世界觀。二戰之後，中國內戰與冷戰接踵而至，唐家仍能不斷遊走，離開原居地甚至國家，視累積財富與社會資本為首要之事。

唐氏家族是民國時代工業家與銀行家的象徵。在中共建政之時，他們離開中國，逃到香港。在清末民初之時，他們崛起，這些中國精英為在華外國利益服務，追求海外教育，以及回到中國創立最為前沿的企業，並從中得利。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以及中國內戰（1946-1949）所觸發的騷動，迫使這些資本家不斷遷移，以保存其性命與財產。在中國共產主義盛行之時，包括唐家在內的部份精英移居香港。這群自行脫離中國大陸的精英，將在領導冷戰時期香港經濟轉型的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至一九七〇年，唐家的紡織廠，已成為最大生產商，而紡織業正是當時英屬香港的最大產業。⁹這些花果飄零的精英對香港發展至為重要，正是因為他們一直重視海外教育，以及與外國勢力合作。¹⁰在冷戰時期，他們與之合作的，再也不是英帝國或日本帝國，而是美國跨太平洋帝國。透過跨商策略，這些精英經營與利用多面向的美國網絡重置其生意乃至香港，使之能夠得到美國重構全球資本主義的好處，進而成功。這種投向美國的轉向，象徵著世界歷史的一個轉捩點。這個轉捩點反映的，是以美國為首的世界秩序之成形過程源起，今天，此一秩序被稱為新自由主義（neoliberalism）。

要理解跨商乃至其對香港的影響，我們必需考察二戰前的香港英殖歷史。從一八四一年至一九四一年，從香港成為英國直轄殖民地（Crown colony）至香港向日軍投降為止，香港從漁村變成南中國的主要港口。除了鴉片貿易之外，香港匯聚了東南亞與北美的巨大貨流與人流，這多少是舊金山淘金熱的影響。¹¹濃厚的商業文化繼而衍生於香港。商人可藉與殖民政府的合作，擴大其影響力，進而主導社會。這與清帝國的社會秩序截然不同，但近似於東南亞殖民港口城市的情況。¹²香港的廣東人、潮州人、歐亞裔、東南亞裔精英都變得心繫英國，他們的求學與商業策略，都能夠反映這種取向。

江南地區的商業精英也有相近取向，不過他們的親英態度，並沒有那麼明顯。唐氏等家族曾嘗試展現中國國族意識，但與此同時，他們也利用不同帝國在華所帶來的機會。他們在英國、法國、日本、美國等帝國體系間經營各種社會資本。在過程之中，教育被視為主要手段。江南的商界精英逐漸重視傳教士與外國教育，以得到「現代」知識，以及跨文化技能與網絡。民國初期的不穩定，乃至後期民國政府的用人唯親，都迫令商界精英倚重以上策略。這些精英利用其國際社會資本，在第二次中日戰爭與中國內戰之時與日本、國民黨人、美國協力。戰火令他們更為依賴美國社會資本，但在中共建政之時，當中只有部份人移居香港。

本章最後一節會檢視二戰以及冷戰初期如何瓦解英國在港力量，如何令香港逐漸投向美國領導

的全球體系。二戰後，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衍生了新的社會可能。與此同時，很多老上海生意業務都遷至英屬香港。美國銀行家斯巴利（Henry Sperry）與香港女繼承人利舜英聯婚，可以印證這一點。及後出現的轉變更多。韓戰爆發，令貿易蓬勃，很多工業家移民大為受惠。但隨之而來的，是美國與聯合國對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貿易禁運，這多少截斷了香港的轉口港生意，為此香港減少了對中國的依賴。亦因為此，香港長期視美國為其新製品的主要銷售市場。我在第五章將會進一步分析指，擁有美國人脈的銀行家與工業家移民在跨太平洋互動之中如何享有優勢。換言之，美帝國力量橫跨太平洋，向西擴展，令中國精英移民得以在香港站穩陣腳。

1.1. 香港跨太平洋網絡之成形

在成為英國殖民地之後的第一個世紀，香港是南華重要港口，匯聚了大量轉口港貿易。一八四一年一月，英國軍隊在香港升起了國旗。官員當時稱，香港的功能，是促進貨、人、錢的自由流動。事實上，當時能夠定義香港的，只有一種商品，那就是鴉片。在十八世紀中，歐美商人從南亞大量走私鴉片至中國，以換取資金，進而大量採購中國的茶葉與絲綢。清政府官員一直在辯論應對之法。不過，至一八三九年三月，贊成打擊鴉片走私的政治力量開始佔上風。這種官方打壓令

廣東英商震怒，更令他們失望的，是清政府的重商政策（即一口通商）不再。從十八世紀初開始，廣州體系引進歐美貿易，這項政策的用意有二：第一，控制外國貿易對華影響，乃至關稅；第二，為北京提供穩定的銀根。¹³英國商人與其倫敦盟友依照自由貿易理論觀點，痛斥此一體系為亞洲專制模式的一種示範。他們歌頌自由貿易之優越，但事實上，他們透過殺戮華人才證明這一點。在一八四二年八月之前，英國部隊已截斷大運河航道，清政府繼而議和，《南京條約》隨之而來，此一條約將自由貿易與帝國擴張綑綁。在此條約之下，清政府廢棄廣州體系，開放五個港口供英商進行貿易，並向英國割讓香港島。條約更為在華英人賦予治外法權，以及令英國得到中國大量賠款。此時，清政府面對新的帝國主義時代，香港開始成為鴉片貿易重鎮，以及自由港之象徵。

事實上，早期香港非常動盪，當時此地的生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移民以及於本土崛起的華商精英。文基賢（Christopher Munn）已曾指出，在一八四〇年代，很多時候，香港僅能聚攏鴉片商。諷刺的是，當時香港政府奉行反自由貿易政策，其中之一，是拍賣眾多專營權。對華人罪犯、海盜、乃至客家與海上蜑家等邊緣族群而言，香港充滿魅力。亞熱帶疾病與暴力罪行肆虐，政府繼而推行嚴苛隔離措施、囚禁大眾、施行軍事法庭。當時很多觀察家對香港之未來不表樂觀，甚至有人建議倫敦放棄香港。¹⁴

洗玉儀也曾指出，拯救香港的，是美國加州的淘金熱，以及太平洋網絡日漸變得全球化。在這

此趨勢之下，香港的資本主義社會發展一日千里。一八四九年，美國加州淘金熱的消息令香港上下振奮。「金山」亦在南粵引發狂熱，不過，前往美國淘金的夢想，在香港才能實現。原因是至一八六〇年，清政府禁止民衆移民海外，中國沒有任何一個港口可以容納如此數量的移民，使之投奔太平洋。華人與歐洲商人合力推動香港基建之改變，香港不再只是鴉片之都，其定位開始變成移民樞紐。金山莊是新跨太平洋貿易的前驅，且也開始涉獵保險與銀行業。可以說，淘金熱改變了太平洋，將之變成一條高速公路，這條高速公路連接美國與亞洲，香港與三藩市是高速公路的兩端。與此同時，新加坡與香港之間，也衍生了一條走廊，大量中國大陸勞工利用這條走廊，在受殖民管治的東南亞之礦業與種植園謀求機會。¹⁵至一九三九年，逾六百三十萬華人從香港出發，前往外地。也有逾七百七十萬人回到香港，這個移民流動量，可與一八九二年與一九二四年間紐約埃利斯島 (Ellis Island) 的情況相比。¹⁶

太平天國起義時期 (1851-1864) 的難民湧入，乃至貿易與人口流動，都令香港穩定發展，華商與英殖政府的合作與日俱增。新加坡英殖政府立刻邀請華人加入政府，但在香港，同一發展卻差不多需時三十年。盧亞貴與譚亞才是最早在香港扶搖直上的華人，他們都受惠於第一次鴉片戰爭，在此期間，他們支援英人。盧亞貴是鹽家幫派老大，譚亞才則是承包商。不過香港的爆發戶要透過建立慈善組織才能鞏固其社會地位。高馬可 (John Carroll) 曾指，英殖政府的無知、冷漠、無能，

為華商提供了特別的機會——他們所提供的服務，能夠滿足社會需求。¹⁷在一八四七年，盧亞貴與譚亞才共同設立華人社群的首個社區中心文武廟。在一八五六年，於譚亞才的贊助下，英屬香港的首支消防隊伍成立。¹⁸在一八六六年，香港華商精英成立團防局（District Watch Committee）。這個組織屬華人社會間的私營警隊，香港島與九龍（在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被割讓）的秩序因此能夠維持。成立於一八六九年的東華醫院，大為鞏固了香港資產階級的地位。¹⁹洗玉儀曾指，東華從來不只是醫院，這其實是首間受英殖政府認許的華人機構。東華提供免費醫療服務，以及惠及離散華人的各種服務。亦因此，東華董事會成員逐漸匯聚政治影響力，香港最為富裕的華商由此得到半官方身份，他們成為英殖政府與普通華人民眾的溝通橋樑。一八七八年，保良局成立，既為華人提供慈善服務，也推動改革，改善女性性工作者、妹仔、被遺棄或虐待婦女與孩童等人的待遇。²⁰

這種協力成為華人精英持續參與英式教育與商業體系的誘因。在廣東體系之中，歐美貿易商倚重通曉中英雙語的買辦。這種職位歷久不衰，在十九世紀的香港，買辦通常是最富有之人。不過，只有部份家族成員擁有成為買辦的條件。在一八六二年，香港英殖政府成立中央書院（後稱為皇仁書院），以擴展買辦階級。當時史釗域是中央書院首任校長，這所學校的目標，是培養華人翻譯員、教師與文員。中央書院是雙語學校，其學生都得到進入英資企業或接受英式高等教育的珍貴入場券。一八六七年，何亞錫、韋亞光、黃勝這三位買辦與本土商人，率先保送兒子到英國留學。

在一八七四年至一八七七年間，香港首位華人大律師伍才於英國林肯律師學院 (Lincoln's Inn) 留學。²¹ 伍才以伍廷芳之名為後世所認識，他之後成為中國外交官員，為中國起草首份商業法，也為清朝終結準備法律文件。²² 這些精英積極參與以英國為中心的協力體系，相互聯婚，心繫英國的階級因而成形。在一九一一年之前，這個階級在港投資，複製英式教育，香港大學由此而生。時任港督盧吉 (Sir Frederick Lugard) (後來他在奈及利亞以間接管治策略著稱) 期盼，香港大學能藉醫學與工程訓練，在中國幅射英國文明的影響力。帕西 (Parsee) 商人摩地 (Sir Hornusjee Mody) 承諾出資二十萬，以助興建香港大學本部大樓，華人社群與外國企業也成功籌募逾一百二十萬。Alfred Lin 曾分析，這種對香港大學的熱情支持，其實背後有務實考量。他說，接受教育是獲取財富與權力的主要方法。英語教育則被視為一種特別恩賜。²³

這種協力以教育與商業維繫，香港英殖政府與廣東精英逐漸由此結盟，以維持現狀，但這種聯盟之內不乏張力。包括美國記者漢克 (Emily Hahn) 在內的眾多觀察者認為，香港當時氣氛呆板，與上海的自由奔放形成強烈反差，殖民地官員與廣東精英因而被詬病為頑固守舊、堅拒改變的力量。²⁴ 香港精英為本地人提供慈善服務，甚至支援中國大陸的革命人士，但他們抗拒本土政改，且也固執地與本地人保持距離。例如在一八九三年，孫中山的良師何啟與韋玉反對政府方案，不支持擴建域多利監獄 (Victoria Gaol)，當時這所監獄已過於擠擁。他們的理據，是監獄的免費膳食與

個人監倉會增加華人犯罪的誘因。在一九〇一年，兩人要求設立實行階級隔離的學校。²⁵他們也有利用其影響力，壓制罷工行動，剷除共產主義者，抗衡反帝國主義杯葛運動，對中國民族主義不感共鳴。²⁶

不過，在殖民地的種族等級制度下，英漢協力關係並不盡然友好。於二十世紀初，除了僕人與受邀請之外，一般華人被禁止進入山頂一帶。華人乘搭天星小輪之時，不能購買頭等艙船票。於英殖政策之下，華人在政府之內也不能晉升至高級職位。²⁷雖然跨種族之間的性行為普遍，歐亞社群早已在香港成形，但跨種族婚姻仍然被禁。按 Emma Teng 的分析，歐亞社群展現了戰前香港種族等級與大都會協力的具體形態。²⁸一方面，跨種族家庭被視作危害白人優越與中國父權的一種威脅。另一方面，歐亞裔一直運用其雙語與跨文化能力，出任買辦。何東與其兄弟是例子之一，他們成為出色買辦，累積了可觀財富。²⁹何東家族等處於英帝國與清政府間隙的精英所得到物質利益，等同與英國帝國主義協力的華人、歐亞裔、南亞裔商人的所得總和。為此，他們小心翼翼經營與各方的關係。

在戰前香港，美國與其在港利益穩定發展，但不顯眼。生於紐約的商人格林斯比（Charles Gillespie）在香港開埠之後數週抵埗。旗昌洋行（Russell & Co.）與瓊記洋行（Augustine Heard & Co.）等設於波士頓的企業則在鴉片與淘金貿易之中扮演重要角色。³⁰羅斯福總統（Franklin

Roosevelt) 的外祖父達蘭勞 (Warren Delano, Jr.) 在美國內戰期間亦曾是旗昌洋行僱員，他來港謀生。與歐洲人一樣，美國商人也在香港養育兒女。泰臣是旗昌洋行的合伙人之一，他同時亦是鴉片商陳啟明之父。陳啟明後來出任東華主席，且也是東亞銀行創行成員之一。³¹ 一戰之前，只有少數美國企業在港設置辦公室，美國總統輪船公司、花旗銀行 (Citibank，前稱為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大通銀行 (Chase Bank)、標準石油 (Standard-Vacuum Oil)、美國運通 (American Express) 等都是例子。一九二五年，成立美國會 (American Club)，是美國在港社群最為公開的舉措。美國人成立這個組織，以便聚會狂歡，調劑在香港困悶之情。³² 與英國會不一樣，美國會對華人開放。

跨太平洋移民，令華人精英得以在美國擴展網絡。大部份到加州的香港移民都來自四邑，故此香港商人即使橫渡太平洋，也會有同鄉或親友照應。換言之，同鄉關係成就了這條跨太平洋高速公路之成形。香港金山莊的經理們經常需要與美國人乃至美國入境政策打交道。例如，在一八五五年的《中國乘客法案》 (Chinese Passengers Act) 以及一八七五年的《佩奇法案》 (Page Act) 之下，東華董事曾被指派監督工作。³³ 在當時香港，英式高等教育仍然是主流，但按吳醒濂所著的《香港華人名人史略》 (一九三七)，本地精英也會入讀美國學校。³⁴ 從中央書院畢業之後，未來大班周壽臣在一八七三年到美國安多佛 (Andover) 菲利普斯學院 (Phillips Academy) 留學，當時他是容

閱幼童留美計畫參與者之一（在下一章會詳述）。³⁵ 東亞銀行李氏家族早期成員若然出外留學，也是選擇入讀美國學校。³⁶ 在兩戰期間，粵劇乃至電影界先驅亦為跨太平洋交流奠下基礎。³⁷ 總括而言，對十九世紀的香港發展來說，跨太平洋移民至為重要，這亦為英屬香港的港美關係留下伏筆。

1.2. 長江流域的美國連結

正當香港精英向英國靠攏之時，長江流域的新商界精英也採用相近策略，不同的是，他們的策略更為多元化。在江南，英國影響力巨大，但這個地區仍未完全是英國殖民地，而且不同帝國也在此相互競逐影響力。於本書之中，江南資產階級很值得研究，原因是在中共建政之時，他們至少有十萬人到香港避難。³⁸ 他們後來被稱為上海移民，但事實上，這批移民也來自上海週邊眾多的縣，也有部份人是廣東人。他們不只是金融家與工業家，且也是經理、律師、會計師、學者等專業人士，在之後香港的製造業黃金時代，他們都有莫大貢獻。這些移民為香港帶來了龐大投資，不同領域知識，以及社會資本。最重要的是，他們有深厚的美國人脈與在地閱歷。

在過去逾百年，江南土地肥沃，令城市興起，不過到十九世紀末，外國帝國主義、國內動亂、國家改革，都改變了清朝版圖內的地區經濟。³⁹ 在此脈絡之下，江南優勢既變得明顯，但其發展重

心也有變化。按《南京條約》，上海與寧波被開放成為條約港口，但真正改變這個地區的政治經濟的因素，是太平天國動亂。太平軍摧毀了杭州、蘇州、揚州（更準確而言是蘇北）等傳統港口，頗具成就的杭州商人頗受影響。⁴⁰與此同時，大運河衰落，商業機會逐漸移向受外國保護的沿海港口城市，上海特別受惠。徐潤與唐景星等廣東商人北上，取代杭州商人位置，在一八六〇年代成為上海頭號買辦商人。⁴¹廣東人利用其雙語能力以及人脈，開始接觸全球市場。港口城市匯聚各種機會，享用難得的蒸氣輪船服務，便是一例。⁴²

條約港口的買辦，事實上是離棄儒家科舉文化、投向「現代」教育的先驅。最初他們對傳教士學校感興趣。在一八六〇年《天津條約》之後，基於外國帝國主義密不可分的關係，各派歐美傳教士在中國都設立具規模的學校。在一八九〇年之前，於中國之內，傳教士學校達兩千多間，學生人數達四千多名，當中女學生達千人。⁴³美國與英國傳教士學校特別多。這些學校不只提供具質素的英語教育，而且也令學生得以接觸外國人或旅居外國的華人，學生因而得到升讀高等學院的機會（之後各章將會提到）。⁴⁴對買辦家族來說，這種個人發展路徑頗具魅力，有些買辦甚至建立自己的現代學校，例如在一八八九年，標準石油買辦、生於寧波的葉澄衷便在上海開辦澄衷蒙學堂。

買辦倚重傳教士學校之時，清政府也都開始資助學生到海外留學。清政府自強運動的一環，是在一八六〇年代設立外文與軍事技術學校。在一八七二年之前，畢業於耶魯大學的容闈說服清政

府，使之成立中國教育使團（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CEM）。使團內共有一百二十名學生，當中大部份都是廣東人，他們到美國新英格蘭（New England）的學校學習英語、美國科技、軍事科學。這些學生也有修習中國經典，並被禁止以美國方式生活，不過容閔乃至留學生都沒有認真看待這種要求，結果至一八八一年，使團被取消。⁴⁵在一八七〇年代，少數學生亦被送至德國、英國、法國學習軍事科技與策略。⁴⁶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中國慘敗，清政府更重視富國強兵，更為廣泛的教育改革隨之而來。⁴⁷一九〇一年，清政府開始改革科舉制度，並擬劃新的教育體制。但當時有很多人仍視取得科舉考試功名為重要人生目標，一九〇五年，科舉考試被廢除，很多人感到失落，拚命尋找新的目標，這繼而蘊釀了新的政治後果。⁴⁸

廢除科舉考試，令江南貴族與資產階級更為擁抱外國教育模式，他們在接受高等教育之時，就更是如此。香港科技大學李康研究團隊（Lee-Campbell Group）新近的數據分析顯示，在民國時期，大學生的來源地變化顯著。在晚清時期，於中舉的科舉考試應試生之間，江蘇與浙江省份學生佔百分之十七點八。到了民國時期，這些省份的學生佔大學生總數百分之三十九。若包括廣東數字在內，比率會增至百分之五十八。⁴⁹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的階級背景也有變化。按李康研究團隊的分析，在清末之時，七成中舉學生都來自官員或大學畢業生家庭。到了民國時期，六成大學生都來自商人或專業人士家庭。這些變化都在說明，接受中國新式中學與大學教育的學生多來自何地，以及有何

社會背景。除江蘇與浙江之外，廣東也是中國之內最為富庶的省份，在中國新式且最佳的中學與大學學生當中，廣東學生佔比不合比例地高。

民國時代初期，中國的高等學院多與美國有聯繫。在一八六〇至一九二〇年代間，美國傳教士特別活躍，在中國建立了至少十三間基督教中學或大學。⁵⁰這些學校多以英語教學，當中六間設於江南，上海著名的聖約翰大學是其中一例。北京的清華大學以及上海的交通大學也與美國建立了聯繫。清華成立於一九一一年，當時被用以為庚子賠款獎學金得主提供預備課程。在一九二九年，清華升格成為大學，在此之後，清華與美國繼續關係密切。⁵¹交通大學的前身為南洋公學，此後交大得到美國大量援助，其教員多受美國教育。⁵²清亡之後，這些學校課程艱深，政府獎學金同時在減少，江南與廣東的新商界精英因而得天獨厚，能夠善用這些新式教育機會。⁵³

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代，江南與廣東學生藉著這些機會，與美國接觸與日俱增。在一九四九年之前，在中國之外留學的學生達十五萬人。按香港科技大學李康研究團隊的研究，大學畢業生數目達四萬人，當中一點五萬人畢業於日本各大學，一點三萬人畢業於美國大學，其餘一點三萬人則畢業於歐洲各大學。⁵⁴在一九〇五年之前，日本是中國學生的主要留學地，中國旅日學生數目達一萬人。當時旅美留學的，只有兩百人。⁵⁵從日本學成歸來之人，都成為那個時代的主要知識份子、革命份子、教育改革者。但 Y.C. Wang 也有指出，日本在中國之旁，且學費不高，故此很

多中國旅日學生並非全職學生，當中大部份人都沒完成課程。⁵⁶與此同時，雖然美國距離較遠，學費也較昂貴，但在一九一〇年代，美國作為留學地愈來愈受歡迎，原因是與美國有聯繫的在華中學與大學數量在增加。美國學校被視為開放與現代之地、英語教育愈來愈重要、日本侵華、美國政府的積極招攬，亦是美國學校愈來愈受歡迎的原因。美國的排華政策，為中國學生旅美留學的計畫增添困難。一九〇八年的庚子賠款獎學金，以及成立於一九二六年的華美協進社（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都旨在增加中國學生接受美式教育的機會。江蘇、浙江、廣東的財富，以及城內眾多美國教育機構，令其大部份學生都入讀美式學校。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四五年間，於任何一年的旅美中國留學生間，百分之五十七至百分之八十二都來自這三個省份。如果我們也將中學生數字計算在內，那麼在旅美中國留學生之中，逾半都曾在江蘇讀書，或來自江蘇。⁵⁷李康研究團隊的另一令意外發現，在民國時期，四成旅美中國留學生都曾在中國人讀十四間學校。⁵⁸清華與交通是旅美中國留學生的第一與第四大來源點，美國傳教士學校則是其餘八個來源點。

在此背景下，長江流域的美式教育精英人數不斷增加，他們在至少三個專業領域發揮重大影響力。在一九一〇年代末，於英文報章之中，「美國回流學生」（American-returned students）語句之出現次數愈來愈頻密。中文報章的用語，則是「留美學生」。在主要大城市裡，留美學生組織相繼成立。度一九一〇年的一項調查，在外國回流學生之中，一千七百位畢業於美國，四百位畢業於

英國。⁵⁹曾有讀者建議，這些回流學生當利用其美國人脈，保衛中國。⁶⁰也有調查顯示，大部份留美學生回流之後，選擇成為教師、工程師、公務員，有些最後甚至主導中國學術界，或成為民國政府高級官員。⁶¹李康研究團隊也有發現，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要在學術界取得高級職位，畢業於外國學校是先決條件。八成教授呈報其最高學歷來自海外，四成取得美國學校憑證。⁶²民國政府高級職位也有近似要求。在一九二七年，民國遷都至江南城市南京，此後在全球經濟大蕭條，民國新政府更為依靠美國援助。在此脈絡下，留美學生更易取得民國政府的高級職位。有一項研究指出，在一九三九年之前，百分之七十一的民國官員曾在海外留學，當中百分之三十六旅美。⁶³有位曾歷任多時的華美協進社會長曾指出，民國政府積極招攬受美國訓練的人員，將之放在重要位置，但回流旅美學生的數量不足以應付需求。⁶⁴

現代銀行與紡織工業也聚攏於上海與天津一帶。在一九三七年之前，逾半中國工廠都設於上海一帶，天津與武漢緊隨其後。⁶⁵一九三二年，日本佔領滿州，上海與天津聚集工商業的能力更為明顯。事實上，這兩個城市有眾多優勢——擁有大量勞工、設有鐵路與蒸氣船網絡、取得外國法律保障、清亡之後得到眾多現代中資銀行。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〇年代，紡織公司與現代銀行業相互共生。白吉爾 (Marie-Claire Bergère) 形容，這是中國資本主義首個黃金時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中，歐洲競爭者逐漸淡出，日本與英國帝國主義受中國愛國者杯葛。⁶⁶城山智子 (Tomoko

Shiroyama) 亦強調，棉紡織是極具競爭力的全球工業，這為棉紡織工業家擴大生產規模增加誘因。亦因此，江南紡織廠急於向銀行申請沒有擔保的貸款，購買棉花，並以固定資產作抵押，取得低息貸款，以擴大生產規模。江南紡織廠也依賴穩健的外匯制度。⁶⁷銀行家與工業家之間的原鄉關係更進一步強化這種生態圈。學者很早便留意到，這些現代銀行都由江蘇與浙江人主導，他們利用原鄉關係，鞏固投資，並為董事局組班。⁶⁸紡織工業家亦然。錫行 (Brett Sheehan) 曾經提醒，強調原生關係的影響，有其侷限。不同圈子、跨區域的銀行家事實上有定期互相合作。他們清楚知道，自己是專業人士，是大都會成員。⁶⁹教育網絡亦促成了這種合作。在華語語系文化之中，同學情誼極為濃厚。在那個時代的頂尖銀行家之間，曾在美國傳教士學校或美國大學求學，是他們的共通點。

陳光甫親身示範了美國回流學生如何促進江南銀行業與紡織業兩者相互共生。在往後時間，陳光甫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Shanghai Commercial and Savings Bank, SCSB) 的創辦人。他生於江蘇商人世家。後來他的父親在報關行尋得工作，於是他全家移至漢口生活。陳光甫在該公司實習，並在晚上學習英語。之後他為漢口英資郵政公司工作，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管理模式，便是仿照英人重視紀律與效率的行事方式。⁷⁰但他在美國才真正學習銀行運作方式。其老朋友、同鄉夥伴、銀行同事張嘉璈曾為陳光甫書寫傳記奇，按張的說法，陳在中國地方商業學校學習簿記 (bookkeeping)，並曾在漢口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效力，不過陳最後辭職，原因是他不滿英人某些處事風格。及後陳

在漢陽鐵廠工作，並受買辦景維行賞識。景維行撮合其女兒與陳光甫的婚事，並遊說時任湖廣總督端方，使之容許陳光甫成為湖北代表團一員，出席於一九〇四年舉行的聖路易斯世界博覽會。⁷¹對陳光甫而言，這是令人耳目一新之旅。在聖路易斯，陳光甫主動結識革命領袖孫中山，並與未來財政部長孔祥熙成為好友。陳光甫決定在聖路易斯留學，並先後學習簿記、打字、書寫信函。他曾投書至華盛頓中國公使館，申請援助，並得到公使梁誠每月一百美元的資助。梁誠是留美幼童團舊生，當時他正為清政府爭取部份庚子賠款之退款。陳光甫曾在辛普森學院（Simpson College）與維思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短暫就讀，但他最後選擇在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The Wharton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完成學業。他在那裡花了三年時光，學習了經濟學、商學、美國銀行體系。⁷²在一九〇九年，畢業之後，陳光甫於一間美國銀行工作一年，之後他回到中國，在傳統銀行工作，最後於江蘇省銀行革新其運作流程。他也於新的中國銀行擔任顧問，在那裡，他與張嘉璈成為朋友，張是日本慶應義塾大學畢業生。⁷³

這些經歷與人脈，令陳得以創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並使之成功。一九一五年，他取得張嘉璈與李銘的支持，他們的支持，成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重要基石。李銘效力於浙江工業銀行，他畢業於杭州的一間美國傳教士學校，以及山口商學院（Yamaguchi Commercial College）。此後，陳光甫應用英式管理與美式銀行營運方式，並僱用德國銀行家巴路德（Gustav Baerwald），使之協助

管理外匯活動。較年長的唐元湛也受陳光甫所聘，成為其管理左右手。唐元湛是廣東人，他亦曾參與留美幼童團，在電政總局工作三十年，且也是扶輪社（Rotary Club）職員以及復旦大學校董。⁷⁴一九一七年，陳光甫選用旅美回流學生朱成章作其副手。⁷⁵可以說，為創立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陳利用了他所積累的眾多人脈與資源。他甚至花費兩百萬美元，資助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員工到美國進修，以顯示他在美留學與工作經歷之價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積極擴展國際業務，至一九二〇年代中，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已是中國外匯服務之龍頭，以及上海工業家的慣常貸款來源點。⁷⁶

在本書之中，我們會不斷見到陳光甫如何成為早期曾留學美國的工業家、銀行家、學者不斷擴張的網絡之重要核心，這個網絡以上海為基地。大部份紡織業工業家都是美國傳教士學校或高等學院的畢業生，唐炳源、穆湘玥、薛壽萱、宋棊卿等都是例子。當中不少人是在美國初相識，受中華基督教青年會（Young Men's Christian Association, YMCA）支持的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是其交友媒介。旅美教育的背景，令回流留學生得以利用各種人脈、英語能力、對有限責任公司（limited liability company）等商業概念的理解，建立各種有用的商業關係。⁷⁷在一九一九年之前，上海媒體已注意到這種網絡，並以不同報導，指棉紡織工業發展令人注目，原因與旅美學生回流以及他們取得資本的能力有關。報導說，棉紡織工業的發展受美國回流學生主導，他們極力遊說富人，使之願意投資紡織業。⁷⁸永安的郭氏等工業家也藉著聘用旅美

留學的回流學生（而非本地人）出任經理，以進入這些網絡。⁷⁹ 穆湘玥與陳光甫等美國回流學生也活躍於社交場域，他們都有出力營運美國回流學生會社。一九二四年，上海的美國回流學生會社社址遷至華商紗布交易所，穆湘玥是這兩個組織的領袖。⁸⁰ 跨太平洋教育網絡如同同鄉關係，組織與人員由此連合，不過同鄉網絡之規模仍然相對較大。⁸¹

簡而言之，在「黃金十年」（1927-1937）之前，美國回流學生的精英網絡已匯聚於江南，並活躍於專業領域。在本書之中，這些回流學生受用人唯親的國民政府所排擠，但與此同時，隨經濟大蕭條與二戰而來的美國援助，令他們受惠，他們因而利用其跨太平洋網絡，以從此一外交關係得到更多好處。至中國內戰之時，這些跨太平洋網絡與活動令他們更具誘因逃離中國。

1.3. 中國精英的去留抉擇

縱然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中國最終戰勝日本，其民眾仍然不離苦楚，因為在接下來的一九四六年六月，中國爆發內戰，國民政府逐漸崩潰。在這些戰爭之中，逾三千萬人喪生，無數人流離失所，至一九四八年，難民數字達五千萬。⁸² 在中共建政之時，約七十萬人逃至香港，於當時中國移民之中，這只屬少數。不過，這批移民最終對香港乃至其資本主義影響深遠。一般民眾是否移民，

其決策模式並不清晰，資本主義精英則不然。學者已指，他們是去是留，取決於不同因素，這包括其年齡、家族責任、國族意識、生意屬性。⁸³如天津李燭塵這樣的重工業巨頭會傾向留在原地，銀行家與輕工業家卻並非如此。⁸⁴也有人指出，在戰爭之中，他們已在籌備逃亡。在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〇年間，共七百間工廠從上海遷至香港。⁸⁵工業家的宗教與教育，是較少人探討的因素。較容易理解的是，基督徒與接受英美教育的人會更傾向逃亡，旅日回流學生卻有別於此，原因是他們較多人身居軍中或政府之位。⁸⁶對於資本家而言，更理想的移居地是香港而非台灣，原因是香港屬自由港，其貿易或金融限制較少。在一九四六年中之前，香港報章已在喋喋不休，報導上海難民商人如何轉移公司、資本、兒女。⁸⁷在一九四八年四月，陳光甫在日記中抱怨，紡織業工業家最有可能移遷。這些工業家沒有支持政府，他們改而將資本投放於香港工廠與購置器械，並想與政府劃清界線，建立其帝國。⁸⁸

在開章所提的唐氏家族是心繫美國、逃至香港的紡織業工業家例子之一。學者早已分析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無錫的工業發展，當時唐氏是業界翹楚。⁸⁹唐炳源生於一八九八年，在無錫成長，是成衣商唐保謙之子。唐保謙受教育不多，他在傳統華人銀行學習，並在工業界別作策略投資，其投資項目與生活息息相關，包括糧食、成衣、住屋、交通。⁹⁰紡織廠、穀粉廠、紡紗廠、植物油廠、碾米廠、磚廠，都得到了唐保謙的投資。⁹¹唐炳源先在聖約翰大學修讀，然後改到北

京美式清華大學繼續學業。(圖1.2)在一九二〇年，他得到庚子賠款獎學金，到羅維爾紡織學校(Lowell Textile School)進修，其後他轉讀至麻省理工學院。一九二三年，唐炳源畢業，取得管理大學學位，並在其兄長過世後回到無錫。儘管江蘇與浙江不時有戰事，但此時正值紡織廠、穀粉廠的發展黃金時期，唐炳源參與其中，他在美國所學的知識大派用場。唐炳源組織工廠，以美式管理方法管理，培訓專業紡織工程師，以技能評估而非關係聘用人才。唐炳源也有投資於新工業，當中包括上海的水泥廠，以及佳士拿汽車(Chrysler)的中國代理。⁹²他亦積極推動無錫發展，曾為扶輪社主席，也曾任上海媒體發表文章，形容上海為「中國的匹茲堡」。⁹³

與陳光甫相似，唐炳源的婚姻，以及他為兒女所作的教育安排，皆可顯示美國教育的價值。他回流之後，其首任妻子亡於生育之時。唐炳源另娶來自廣東基督教家庭的女士，這個家庭同樣重視國際教育。金美正是唐炳源的第二任妻子，她留學於英國，其後回到中國，在上海著名的中西女中(McTyeire School)任教，這所學校由監理會差會(American Southern Methodist)營辦。(圖1.3)金美的父親溫秉忠曾是中國留美幼童，在一九二四年，他出任蘇州海關主管。金美的母親則來自作為虔誠衛理宗信徒(Methodist)的倪氏家族。宋氏三姊妹是金美的著名親戚，她們同樣就讀於中西女中，然後在美國留學。在成為國際焦點之前，宋氏三姊妹於美國喬治亞州威爾斯利學院(Wellesley College)學習。她們的兄長宋子文則在聖約翰大學與哈佛大學就讀。唐炳源與溫金美為其子女選



圖 1.2：年輕時的唐炳源，可能是在清華求學時期。由唐家提供。



圖 1.3：年輕時的溫金美。由唐家提供。

讀無錫的美國傳教士學校，這所學校附於聖約翰大學。⁹⁴透過婚姻，唐炳源擠身成為心繫美國的國民黨精英，其家族成員一直接受美國傳教士學校以及美式與英式高等教育，並以相近聯姻方法，確保家族後代能得到雙語與雙文化教育。家族各代成員主要在美國大學留學，他們繼而利用其所得知識與網絡。⁹⁵唐驥千曾回憶說，其父曾因尊嚴問題，與宋氏家族保持距離，不利用此一人脈，但這種說法不無懸念。一九三五年，唐炳源是唯一一個被邀請加入中央研究院新的顧問委員會的工業家。⁹⁶

在法租界避戰禍之後，唐家利用其資本乃至人脈，籌謀於中共建政之時遷移。在此時很多工業家逃至香港，但其生意無法延續。及早離開中國、不再回流、定居美國的，似乎更易取得成功。例如，已有學者研究另一無錫大族榮氏家族，在民國時代，他們執紡織工業之牛耳。⁹⁷榮氏家族很龐大，但這也增加了家族遷移的難度。家族之中，有一分支選擇留在中國，其他成員則在一九四〇年代四散於世界各地。一九四七年，兩位榮氏家族成員來到香港，並創立南洋紗廠，但其成績今非昔比。在第七章，我們會見到，於改革開放時期，榮氏家族扮演重要角色。⁹⁸另一例子是宋斐卿。在一九四七年之前，畢業於美國西北大學的宋斐卿開始將資金與器械移至香港，並將兒女送往美國。但他本人留在天津，並在中共政權之下經營紡織廠。當他見到居留中國大陸計畫不夠穩妥之後，便與家人在一九五〇年移至香港。宋斐卿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短暫逗留，成為他的政治污點，他因而被

迫退休，並難以移民至美國。宋斐卿一家最後移居至阿根廷。他在一九五五年過世之時，已身無分文。⁹⁹

相較之下，唐家有條不紊地撤離，反映其對國家權力轉移的精準判斷，唐家累積的跨太平洋網絡，也使之得到莫大好處。一九四五年八月，和平降臨，唐炳源認為中國不穩，故此開始籌備撤離計畫。一九四六年，他在台灣購置房產，並在翌年開始將器械與人員轉移至香港。¹⁰⁰與此同時，他的親人（包括其姪唐翔千）也移居至香港。唐翔千是英國曼徹斯特大學（Manchester University）與美國伊利諾伊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畢業生。¹⁰¹唐炳源與其妻金美也不忘安置其兒女在香港。一九四四年，唐驥千入讀交通大學，並在此結識他曾就讀聖約翰的未來妻子。唐驥千在交通大學讀書的時間不長。其父親亦要求唐驥千入讀美國大學。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九歲的唐驥千到美國，先在布朗大學就讀，其後轉校至其父之母校麻省理工學院。在一九四七與一九四八年間，無畏的金美帶著其餘小孩到美國。一九四九年，唐驥千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並到哈佛商學院進修。在其父開始香港業務之時，唐驥千結婚，並在波士頓育有三名兒女。¹⁰²（圖1.4）在患上肺結核之後，於一九五三年，唐驥千在哈佛商學院畢業。他於紐約美孚石油工作兩年，美孚石油是他們在香港的能源供應商。同年，唐驥千夫婦得到美國永久居民身份，並在一九五五年入籍。¹⁰³唐驥千的兄弟都在美國完成學業，並在此定居，但唐驥千選擇在一九五五年五月回港，在其父親的南海紡織有限公司



圖 1.4：唐驥千夫婦與他們的孩子 Martin 和 Nadine，阿靈頓，麻薩諸塞州，一九五一年。由唐家提供。

擔任初級合夥人。¹⁰⁴我在第五章會指出，唐驥千在美國的人脈與經歷，是一九七〇年之前南海紡織有限公司成為香港最大紡織生產商背後的重要因素。¹⁰⁵

工業家劉鴻生一家是另一可作對照的江蘇精英案例。劉鴻生選擇留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但也選用近似的跨域策略。高家龍 (Sherman Cochran) 與謝正光 (Andrew Hsieh) 的研究指出，在一九二九至一九三七年間，劉鴻生送子女到英國、日本、美國留學，以積累不同地方的社會資本。劉鴻生生於寧波，並在上海求學，於聖約翰中學與大學讀書。美國傳教士學校之教育，使之敬畏美國模式之威力。¹⁰⁶劉鴻生所受的雙語教育，令其得到上海租界英國警察傳譯員一職。一九〇七年，他與葉澄衷的女兒結婚。一九〇九年，他以上海寧波同鄉聯會主席的身份，令他得到英資企業開灤礦務局 (Kailuan Mining Administration) 的職位，這顯示了原鄉關係的影響力。¹⁰⁷他與唐炳源一樣，同樣受惠於一戰的影響，期間，他成為開灤礦務局的主要買辦，並開始投資於各種工業項目，當中包括火柴與煤廠、水泥廠、羊毛廠。¹⁰⁸劉鴻生倚重原鄉關係，為其工廠聘用人手，以及推廣其製品。與此同時，劉鴻生也與唐炳源一樣送子女到外國人營辦的學校接受教育。他的十一個子女都到聖約翰學校讀書，之後也有到國外留學。其子女從中得到有用知識、人脈乃至未來市場。¹⁰⁹劉鴻生最初保送他最為出色的三個兒子到英國劍橋大學留學，但在一九三〇年代，其商業帝國崛起之時，他開始鍾情於日本與美國這兩大工業強國的教育，其第一、第五、第八個兒子都在美國著名學校讀書，

這包括哈佛商學院、賓夕凡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以及麻省理工學院。這些兒子都在美國煤業乃至西屋電氣公司（Westinghouse）實習。其第六與第七個兒子則在日本留學，前者在日本三井物產實習，這是日本當時最具規模的國際企業。劉鴻生的三個女兒先後在日本、英國、美國留學。在海外留學生活不易，他的子女曾為此反抗，但劉氏夫婦仍然堅持讓子女在海外留學，並讓他們保證，學成之後會回到上海，會為家族生意效力，而且不會與外國人聯婚。這些教條最終決定了劉家的命運。

日本侵華之後，劉家最初著力經營日本與美國社會資本，但在一九四五年之後，他們開始心繫美國。一九三七年，劉鴻生到香港，然後應蔣介石之邀到重慶。在重慶，他與小兒子和國民黨人合作，營辦不少工廠，但他的大兒子仍留在上海，與汪精衛政府合作。美國援助對中國戰事至為重要，劉鴻生於是要求他的第四子與美國戰略情報局（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的年輕情報官多聯誼，並加入重慶的共濟會會所。盟軍戰勝之後，日本社會資本的價值下降，親日之人也為此蒙受損失。此時劉家嘗試親近國民政府以及美國，希望藉此洗脫戰時叛國的指控，並確保劉家可以在美國對華援助之中受惠。當時美國對華援助，主要是透過新設立的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UNRRA），以及中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China National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 CNRRA）進行。劉家著力取得美國監督者的信任，並利用他們重建其家族生意。¹¹⁰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與中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在華所花的錢，高於其他

地方開支。劉家旗下的碼頭與倉庫，處理了這兩個組織大量物資之物流，並從中得到可觀利潤以及新的器械。¹¹¹一九四八年六月，陳光甫寫道，從美國援助得利，逐漸成為政治議題。在立法院，有代表以中國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為例，抨擊旅美回流學生，指他們令此機構作風奢華。¹¹²劉鴻生亦再重新經營美國人脈，將其第六與第八個兒子送回美國。¹¹³

在國內戰的轉捩點間，劉鴻生曾考慮不同方案。與宋斐卿以及唐炳源一樣，在一九四七年，劉鴻生於台灣投資，並派兩位兒子到台灣管理資產。在惡性通貨膨脹（hyperinflation）、政府政策變得更為掠奪成性之際，劉鴻生與唐炳源相近，對國民黨人的信心漸失。¹¹⁴劉鴻生最後放棄台灣，並嘗試要求兒子回到中國大陸，但不成功。一九四九年五月，中共軍隊進佔上海。劉鴻生與幾位助手再次逃到香港。他在香港探索商機達半年，並研讀傳自上海的報告。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作風，令其兒子印象深刻，他們提議父親回到上海。航運大亨盧作孚與劉鴻生同樣得到周恩來的個人保證與邀請。¹¹⁵在港投資遭受挫敗後，六十一歲的劉鴻生決定回到中國大陸。在往後幾年，劉鴻生似乎受到社會主義的感召，其價值取向有變。但在一九五二年，於五反運動之中，他與兒子都被批鬥。當時他們都想重回香港，但已太遲。一九五六年，劉家餘下資產被國有化，在十月一日，劉鴻生去世。劉鴻生兩位兒子在台灣，其餘五位子女在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間移居至香港與美國，有二位劉家子女仍然留在中國，於文革時期，他們飽受煎熬。所有劉家子女最終都無法復興家業。

江蘇資本精英的決策，受各種充滿張力的利益左右，唐家與劉家正是此一現象之寫照。不過，至一九四八年末，逃難的精英達數十萬人。十月，國民黨人在東北最後一個據點失守，英美當局開始呼籲其國民撤離。¹¹⁶北京與上海的機場變得擁擠，受美國支持的民航空運公司（Civil Air Transport）幫助數千人從瀋陽與吉林撤離。¹¹⁷兩份香港報章批評，美國公民之離去，令與外國有聯繫的華人沮喪不已。¹¹⁸火車與飛機都已客滿，上萬的人轉而選用海路離開。在一九四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間，按香港《南華早報》報導，不同群組透過美國海軍與商船從天津與上海出發，以海路離去。在一九四九年一月，按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報導，上海的國際社群，萎縮至只餘二千名美國人，以及可能較美國人稍多的英國人。¹¹⁹有香港報章頭條力指，為避戰火，上海居民聯群結隊往外逃難，但也有頭條正確地說，大部份人沒有選擇，只能留在中國大陸，等待各種未知的未來。¹²⁰

在惡性通貨膨脹之下，很多人一生儲蓄化為烏有，城市社會秩序瓦解，充滿期望的旅者失望而回，他們可以得到價值恆久資產的機會愈來愈低。遠行交通費用水漲船高，大部份人只能輕裝離開。況且，攜帶金等資產離境被禁，很多人嘗試走私，但最終被捕。不過，媒體仍然極力猜測，資金外流持續不斷。經濟學家西帕尼克（Edward Szczepanik）後來估計，在一九四七至一九五五年間，達七十一億港元湧進香港，以今天標準計算，其價值達至少一百二十六億美元。¹²¹不過，這股資金流

往往多與美國有聯繫。在美國接受教育、曾任上海市市長的吳國楨突然前往美國保外就醫。宋家也被發現以多架專機運送美金現鈔。¹²²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香港《文匯報》漫畫簡要地演繹了在財富轉移之中，這種資本與美國的聯繫。漫畫題為〈上海大騷動〉，在其當中，形勢混亂，大廈失去了窗且搖動。在右下角，槍戰進行中。圖左有人跳樓。飢餓的暴民含淚拿著飯碗，在街遊行。銀行附著煙斗，寫有「禮義廉恥」的橫幅在其面前落下。一九三〇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之中，「禮義廉恥」是官方口號之一。在畫中，此一口號淒美地墜落。有人在窗邊伸出口袋，希望與美國戰機接觸。駕駛戰機的，形似大力水手（Popeye）。戰機拖拉著美國官員以及華人精英，乃至其閃閃發光的財富。

在清末民初之時，江南資本階級於世界先進帝國建立了各種教育與生意聯繫，這其實是對外國帝國主義與本土不穩定的一種策略回應。與此同時，他們也在上海等條約港口推動工業發展。美國網絡變得愈來愈具價值。日本帝國的消亡、英帝國的衰落、中國內戰之爆發，令美國社會資本的價值更高，唐家等人亦因而對此落注。劉家則分散投資，時而猶疑。家族成員分散於各地，並非容易之決定。

一九四九年一月，陳光甫考慮逃難。他曾言，中共勝利之時，若然按其原訂計畫，離開中國大陸，此後或會被視為蔣介石的人，或會永遠不能回來，故此決定之前需要再三考慮。¹²³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五日，陳光甫通知其美國華爾街的律師，他與妻子已到香港。¹²⁴



圖 1.5：〈上海大騷動〉或 'Shanghai's Great Turmoil'，文匯報，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二日，1。

1.4. 香港——在華之英國？

英帝國亞洲版圖的種族與經濟體系飽受二戰摧殘。在日佔時期，香港不少人死亡或被迫遷移，人口從一百四十萬人降至四十萬人。一九四五年八月，英軍在美國支援與支持的情況下解放香港。¹²⁵在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六年間，香港擠滿英軍與美軍。署名「番鬼」的作者曾投書《南華早報》，問道：「香港這個殖民地是屬於英國人、華人還是美國人？」¹²⁶雖然美國海軍不時到訪香港，但在一九四六年，對香港而言，美國兵的出現仍是新鮮事，媒體仍會爭相報導。儘管仍有英人盼望復興「在華之英國」，美軍的出現，意味戰

爭已令國家權力轉移變得明顯。¹²⁷一九四六年一月，上海交通從英式左線變為美式右線。一九四八年七月，香港美國會重開，當時開幕典禮嘉賓，是新任香港總督葛量洪（Alexander Grantham）與其美國妻子莫琳（Maureen）。¹²⁸

香港貿易網絡快速恢復，原因之一，是香港以新聯繫融入於崛起中、由美國主導的世界秩序。一九四六年春，在政府協助之下，美國總統輪船公司（American President Lines）以低價購入兩艘退役海軍船隻，重開加州航線服務。¹²⁹八月，泛美航空（Pan-American Airways）得到授權，開拓上海、香港、加爾各答之間的航線，成為首家環遊世界的航空公司。¹³⁰在一九四七年年底，環球無線（Globe Wireless）透過馬尼拉，開設美國與香港之間全球首項射頻電纜（radio cable）服務。一九四八年九月，美國政府開設美國與香港之間的空運服務。¹³¹與此同時，美國退役軍人也香港探求商機。德州人法來（Roy Farrell）是例子之一，一九四六年，他創辦國泰航空（Cathay Pacific）。¹³²在一八六〇年代，蒸氣技術與電報網絡改變了歐洲與北美的互動生態乃至未來，於冷戰時期，香港此一建設也有同一功效，香港為此得到不少機會。

在一九四八至一九四九年間，英屬香港開始降低外來投資的門檻。在工業家移民要求之下，香港政府首次移除限制，容許女性與孩童在晚間工作，使之進一步受剝削。陳光甫頗為讚許此一政策轉變，同時批評上海之瓦解。他說，在香港新政策之下，有別於過去，工廠可藉三間制在二十四小

時之內不停運作。香港也可以學徒制之美名利用童工。¹³³此前的帝國政策亦阻擋非英國資金，以保護英磅區以及帝國特惠制（Imperial Preference）。從一九四七年起，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rade and Tariffs, GATT）確立，帝國特惠制的內容亦被包括在內。其中一項繁瑣要求，是所有外國公司需要向香港總督會同行政局（Governor-in-Council）作事先申請，以得到許可，購置不動產。簡單如租鋪開設汽車店，同樣受此限制。¹³⁴一九四九年初，香港政府修改這些限制，容許外國公司在不經政府同意的情況下自由購置不動產。自此，香港法律與英國一致。¹³⁵不久之後，出入口署被易名為工商署，官員開始以低於市價的租金，提供工業用地。對全球資本而言，這些香港新政都具魅力，對來自江南的工業家而言便更是如此。¹³⁶

美國崛起，英國衰落，令與美國有聯繫的人得益，他們從中得到新的社會機會。利舜英與美國銀行家斯巴利跨種族聯婚，是其中一例。這也為江南心繫美國的工業家的跨域策略提供了新的研究視角。利舜英是鴉片商與地產商利希慎的女兒。一九二八年，利希慎遇刺，轟動一時。¹³⁷利希慎在一八八一年生於夏威夷，其後他回到香港，依循這個殖民地的傳統路徑成為上流社會一員。他在英國學校讀書，然後從事鴉片、船務、地產貿易。他擔任東華董事局成員等職務，取得傳統社會權力。他也有投資於上海商業銀行，陳光甫與利氏家族因而友好。¹³⁸利希慎重視英式教育，視之為他的兒女學習的主要路徑。利舜英生於一九一四年，她在英國入讀寄宿學校，隨後在北京學習普通話。在

北京，她與美國將軍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女兒成為好友。但在香港，受英式教育的華人精英仍未能完全融入於殖民地權力架構。在一九二五年，利舜英的哥哥馬會會籍申請失敗，當時馬會頗重種族區隔。¹³⁹殖民主義由白人優先意識定義，金錢與教育都無法跨越這種歧視。直到戰後，形勢始有變，利舜英利用與美國人的婚姻打破局面。

利舜英與斯巴利相遇之時，他們皆是日本戰俘，身處馬尼拉旁的洛斯巴洛斯（Los Baños）集中營。當時正值太平洋戰爭爆發，利舜英與蔣介石的澳洲助理當勞（W. H. Donald）同行到菲律賓。¹⁴⁰從一九三〇年起，斯巴利已效力於花旗銀行亞洲支部，神戶、大阪、上海、漢口、馬尼拉皆是花旗銀行的亞洲據點。¹⁴¹斯巴利是美國公民，利舜英則是英國子民，日人同時將他們囚禁。在挨飢抵餓的情況下，他們相愛。至一九四五年二月，美國解放此一集中營。當時香港仍為日據，故此利舜英被送至美國，這是利舜英從未踏足的國家。其家人透過三藩市中國大使為利舜英提供生活費用，利舜英在柏克萊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與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留學六年。在此期間，利舜英也有在紐約探望史迪威女兒與宋靄齡等朋友。¹⁴²與此同時，利舜英與斯巴利籌備結婚。

與先輩情況不一樣，跨種族婚姻沒有限制二人的前途。他們聯婚，反映的是國際權力重心正從英國轉往美國，美國跨太平洋的種族互動開始普及。前文曾略為提過，在二戰之前，跨族聯婚於

香港被禁。至一九三〇年代，任何反禁的人，都會自絕於社會。¹⁴³美國兵與華人女性之間的性關係曾令中美關係緊張，但在一九四〇年代末，白人美國丈夫已漸為人接受。¹⁴⁴利舜英與斯巴利聯婚得到美國與國民政府的注意。在三藩市，夫婦二人與花旗銀行的首席法律顧問聯誼。按利舜英的回憶，這些聯誼活動，令她得到首席法律顧問的信任。在花旗銀行考慮是否聘用利舜英之時，首席法律顧問為其說話。這樣精英間相互了解背景的行為頗為雙向。斯巴利曾向花旗銀行主席朗策士拉（Gordon Rentschler）提起婚事，朗策士拉回應說他知道，因為曾有來自華盛頓的人問他誰是斯巴利。利舜英的弟兄曾為駐倫敦中國大使郭泰祺工作，郭泰祺在一九一一年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畢業。一九四六年，郭泰祺到美國，參與聯合國成立典禮。當時他指出中國大使館向花旗銀行查問斯巴利的背景。¹⁴⁵中美兩方都認為婚事合適。中美的戰爭聯盟關係，一九四三年排華政策被廢除、美帝國擴張至亞洲、夫婦二人的社會資本，皆是促成婚姻的因素。

可以說，利舜英與斯巴利聯婚，既象徵中美聯盟關係，亦意味在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太平洋，階級與種族權力關係被重構。一九四六年一月，斯巴利回到上海，重建花旗銀行據點。當時在亞洲，美國軍方是花旗銀行服務的主要用戶，上海分支則著力降低申請門檻，招攬中產客源。只要得到現有用戶推薦，能夠以英文簽署，便能申請花旗銀行服務。¹⁴⁶同年六月，利舜英也回到上海。七月，他們在聖三一堂（Anglican Church）舉行婚禮。（圖 1.6）陳光甫任利舜英之父的角色，花旗銀行



圖 1.6：斯巴利和利舜英結婚，上海，一九四六年七月。由 Victoria Sperry Merchant 提供。

經理雷德 (Red Reed) 則主持婚禮。夫婦二人透過一九四八年晚宴 (由英美煙草公司管理層舉辦) 等聚會，聚集了中美頂級金融家與外交家。其他賓客還包括利舜英的兄弟姊妹、宋慶齡，以及中國海關總稅務司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 Service) 美國主管萊特 (L. K. Little)。¹⁴⁷ 事實上，非精英也能進行這種跨族聯婚。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美國《戰時新娘法》(War Brides Act) 容許戰時新娘入境，在法院廢除反通婚法例之前，率先准許跨族婚事。¹⁴⁸ 在香港，華人女性與歐亞裔及華人海員結婚的數字飛升，曾有專機特地運送他們到海外。¹⁴⁹ 一九四八年，約三千六百名華人被准許進入美國境內。¹⁵⁰



圖 1.7：斯巴利、利舜英和 Jacqueline Kathe 在花旗銀行台北分行開幕式。
由 Victoria Sperry Merchant 提供。

澀沢尚子 (Naoko Shibusawa) 曾指，冷戰期間的緊張關係，令美國主流對亞洲人改觀，他們開始認為，亞洲人猶如女性與小孩，是美國盟友，能夠反映美國的領導地位。¹⁵¹ 這種帝國邏輯，乃至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實力，都成為歐美男性與亞洲女性聯婚背後的推力。

一九四九年，在逃離上海之前，利舜英利用上述大氣候之轉變，申請入籍成為美國公民。得到美國護照，令利舜英成為運用跨商策略的先驅。在香港，她運用其美國社會資本，打破殖民地權力體系的無形界限。斯巴利夫婦二人在香港山頂安家，這是前所未有之事。¹⁵² 曾拒絕其兄長會籍申請的會所，現也接納利舜英的申

請，原因是她是美國人。利舜英是皇家香港遊艇會、香港會、石澳高爾夫球會的首位華人會員。她曾言，她寧願是高爾夫球短切球桿，但英人較欣賞其丈夫的保守風格。¹⁵³利舜英的英國口音不成問題，她新取的美國人脈，則成為她事業的真正助力。直到一九七〇年代，怡和（Jardine）與太古（Swire）等英資企業仍然禁止其僱員跨種族通婚，斯巴利夫婦則成為花旗銀行香港乃至亞太地區裡的標記。（圖 1.7）¹⁵⁴

一九四九年，斯巴利夫婦按花旗銀行指示，留在香港，原因是斯巴利的上海大客、紡織業工業家也已遷居至香港。有別於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匯豐銀行，花旗銀行與客戶的關係並不長久深厚，其與上海工業家的關係，始於美國對華援助，花旗銀行是美國對華提供支援的平台。戰後，上海紡織家急需器材與棉原料，這些物資都來自美國與聯合國，其所需資金則來自花旗銀行。¹⁵⁵曾有前銀行職員指，當時中國與美國人簽署協議，以輸入棉花至中國。中國當時對棉花需求甚殷，原因是在戰後，中國人急需衣服，故此生意很好……在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七年間，銀行曾與很多紡織廠家見面。¹⁵⁶在惡性通漲之下，美國對華援助更形重要。於一九四八年三月，中華民國中央銀行仍與花旗銀行協商，希望能以其在紐約的黃金儲備作抵押，以取得一千萬美元購買美國棉花。¹⁵⁷一九四九年四月，陳光甫在日記之中曾直白地說，若然沒有美國援助，上海很多企業（包括其銀行）早就破產了。¹⁵⁸亦因此，戰後美國的對華援助，令中國工業家與美國跨國銀行建立了關係。透過陳光甫與斯

巴利夫婦的案例，我們可以見到，精英的人脈關係，如何支撐從上海到香港的遷移行動。事實上，利家與數家銀行都建立了關係。斯巴利在花旗銀行擔任管理職務，利家兄弟則受陳光甫之聘，成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香港支部的經理。他們的表哥利國偉也在恆生銀行冒起，成功進入這間銀行的管理層。¹⁵⁹從陳光甫的角度看，利氏家族的網絡極具價值。即使利氏兄弟違反銀行政策、以權謀私、為自己取得大額貸款，處事相當認真的陳光甫最後也大事化小，原因是利氏兄弟的社會地位有其利用價值。

移居之後，工業家移民開始恢復其商業營運，他們利用香港傳統的東南亞與英帝國貿易網絡營商。一九四九年三月，陳光甫審視香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業務表現，他發現，為香港原棉進口的融資額，達四百五十九萬港元（一百一十萬美元）。這是上商規模最大的海外採購。¹⁶⁰上商也有為很多工業家移民提供短期貸款，他們通常僅以棉作為抵押品。唐炳源與南海紗廠是上商的長期客戶，其透支額達三十三萬五千港元。¹⁶¹按陳光甫的紀錄，大部份經上商融資的紗布出口，都以區域或英聯邦市場為外銷對象，當中包括曼谷、新加坡、吉大港（Chittagong）、三蘭港（Dar es Salaam）、蒙巴薩（Mombasa）等地。¹⁶²從陳光甫的角度看，當時世界最大市場美國仍未被港商開拓。

但在隨後的短短十年內，美國成為香港紡織品的主要出口地，這種轉變在韓戰爆發期間發

生。¹⁶³一九五〇年一月，英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藉此維持在華商業網絡，但台灣國民政府封鎖海路，令香港難以向中國大陸出口貨物。與此同時，傳統東南亞與英聯邦市場也浮現動盪。唐翔千曾指，在一九五〇年之前，很多紡織品堆積……如果韓戰沒有爆發，大部份紡織商都會破產。一九五〇年六月，韓戰爆發，這是一個重要轉捩點。當時有些人（包括唐的叔父）為此感到憂慮，到巴西聖保羅避難，但區域的貨物囤積需要，以及美國軍方的訂單，刺激了短暫的貿易興盛，令很多廠商得救。¹⁶⁴從一九五〇年末至一九五一年初，香港貿易急增，很多紡織工業家因而能夠償還貸款（詳見第五章）。一九五〇年十月，中華人民共和國參戰，在十二月，華盛頓實施禁運政策，所有中國大陸的美元戶口被查封，北京以充公美國在華資產作為回應。¹⁶⁵一九五一年五月，在英國支持下，聯合國也對中國施行貿易禁運政策，英屬香港亦需跟從此一政策。貿易禁運的操作細節固然不能一蹴而就，但對部份人而言，其長遠法律影響頗為清晰。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陳光甫指示手下斷絕與中國大陸關係，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改而成為香港銀行，並易名為上海商業銀行。¹⁶⁶他明白，銀行乃至英屬香港的未來，都繫於美國主導的跨太平洋新秩序。

與加州的淘金熱一樣，聯合國與美國對華實施貿易禁運，是香港經濟史的重要一頁。在一八五〇年至經濟大蕭條間，金山莊憑藉跨太平洋貿易、移民、匯款而興盛，現在的貿易禁運，亦影響深遠。¹⁶⁷在一九五一年後、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三年間，《星島日報》、《華僑日報》、《大公報》

等香港報章特別關注金山莊的經營困難以及其華安商會之對應。商會代表組織會議，結集本地生產商，遊說英殖政府行動，勸告美國在港領事，與訪港美國財政官員合作。¹⁶⁸這類報導特別強調，美國政策逐漸摧毀存在已久的貿易與匯款渠道，當然，也有貿易者利用澳門走私以殘存。¹⁶⁹一九五三年二月，親國民黨報章《工商日報》甚至投訴，指美國的行動重挫香港處理中國大陸匯款、貿易、銀行業務的優勢。¹⁷⁰香港本土企業不再處理任何涉及中美的匯款與出口生意，以避免被美國制裁。美國的帝國擴張因而在重新佈置西太平洋的貿易體系，令香港逐漸疏遠中國。

學者一直指，貿易禁運促成了香港製造業之崛起，但他們沒有細說，這如何令香港逐漸依賴美國市場。貿易禁運令工業家與金融家都感受到美國的力量。至一九五四年，按官方數字，相較一九四八年數據，香港總貿易額下跌六成，金山莊與江南移民都大受損失。失去中國市場之後，仍然生存的紡織工業家極為需要新的出口市場。當時歐洲仍然處於戰後復甦狀態。大部份區域夥伴都開始施行貿易保護政策，以栽培其本土產業。令情況更為惡劣的是，棉紡織的全球競爭愈趨劇烈。至一九五〇年代中，巨大的美國市場成為香港工業家唯一的務實選項。不過，美國市場監管相當嚴格。一九五三年，美國領事館與香港政府推出產地來源證明 (Certificate of Origin) 體系，官員可從中篩選本土工廠製品，以確保其質素符合美國市場標準。結果從一九五三至一九七一年，香港製品（從雞蛋至棉紗）生產商都需要與英殖官員乃至美國領事緊密合作。¹⁷¹製品若能被證明與中國大

陸沒有任何關係，便可進入美國市場。香港的紡織工業家確能成功投向美國市場。一九五五年，香港對美國出口額僅為一千五百萬港元，低於香港對英屬東非出口額。¹⁷²至一九五九年，美國已成為香港舉足輕重的市場，在一九六〇年上半年，香港對美國出口額已增至三億四千三百五十萬港元。¹⁷³簡而言之，問題的重點，不只在於香港有何出品，也在於銷售對象為何。

投向美國市場，需要的是香港大量低廉勞動力，以及心繫美國的香港移民之社會資本。按禁墮要求，任何中國公民擁有的企業，都不得與美國進行貿易。美國懷疑所有香港商人其實都是中國公民，這種想法對王統元與其父王啟宇等移民顯然有害無益。他們的祖籍為寧波，在上海之時，王家是紡織業先驅。在一九四九年初，王家透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融資，以五十萬美元購置美國棉。¹⁷⁴王家用了兩年時間與美國財政官員協商，希望美國政府能夠重新界定香港華商身份，能夠包容其殘餘中國大陸商務。¹⁷⁵在美國貿易制裁之下，對移民而言，外國護照更具價值，美國護照更是如此。¹⁷⁶從唐家與其南海紗廠生意的案例看，我們可以理解，美國社會資本如何增加營商競爭力。唐驥千的美國公民身份使之能夠得到美國市場，他在哈佛商學院的時光，也令他取得營商銷售人脈。他的同學之一，是美國軍官，這位軍官後來處理軍備採購。唐的兄弟之一，甚至是美軍士兵，他在韓戰為美國效力。¹⁷⁷南海紗廠因而能夠取得美國五角大樓的訂單，其員工後來回憶說，直到越戰時期，美軍一直是南海的重要長期客戶。¹⁷⁸唐也有利用其哈佛商學院人脈，協助紗廠營銷。在

一九五七年年底，唐投書至哈佛商學院舊生雜誌，徵召有興趣為其售賣衣服、為百貨公司採購的同學協助銷售成衣。當時其生產線能每天製衣二百件。¹⁷⁹中共建政，心繫美國的江南移民為此與冷戰時期美帝國擴張交匯與互動，這為跨商策略奠下基石。移民精英帶同美國社本資本到香港，使之在美國領導的新秩序之中，面對各種機會與限制之時，得以復興。

中共建政之時，大量移民湧入香港。這些人多從廣東而來，但也有至少十萬人來自長江下游一帶，當中不少人是龍頭工業家、銀行家等專業人士。從一九一〇年起，江南資產階級便在教育與商務領域與美國建立聯繫。很多人在美國傳教士學校或美國學院就讀，與美國在華商人共事，或受惠於美國對華援助。他們多視香港為難以防守之地，且認為英帝國在衰落，故此來港之後，多自力更生。美國的市場規模和禁運政策，令他們更具誘因，投資於美國社會資本，以此營商，進而換取龐大的美國市場。唐驥千與利舜英都成為了美國公民。在一九五〇年，也有十一萬七千人透過美國在香港領事館申請美國准證，大部份申請都失敗。¹⁸⁰但在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間，擁有美國社會資本的香港華人得到更多機會，原因是華盛頓改革其入境政策，逐漸淡化其種族歧視色彩。在此背景下，跨商策略逐漸成形。其時，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等英資企業仍居龍頭地位，但銀行家與工業家移民已放眼於美國，並迎合其領導的新太平洋秩序。

在禁運政策之外，於一九五〇年代中，華盛頓的冷戰策略，還包括對港進行心戰（winning

hearts and minds)，以取得一般港人對美國的支持。美國的目標，是以新帝國技術改變亞洲的未來，以建基於民主的道德優越領導亞洲。昔日歐洲帝國強調的，是建基於官僚與軍事佔領的層級關係。美國更為重視的，是廣為攏絡亞洲民心。除了保留區內常規軍力之外，華盛頓的計畫與政策亦鼓勵亞洲民眾在「自由世界」的號召下，擁抱美國機會。共產政權的民宣，乃至美國的民權運動，都能夠反映這種理想之虛偽。但的確，在一九五〇年代，於國際領域內，美國確能抑止種族主義，令群眾向美國靠攏。¹⁸¹我們會在接下來三章見到，美國基督教與教育力量之擴張，對實現美國目標至為重要，在過程之中，香港是重要場域。此後二十年，數十萬香港居民為此得以接受教育，並協助擴充跨商策略。



第二章 基督徒之花果飄零

——美國資助教育之建立與香港發展

「孟母三遷。」——《三字經》

美軍 Marine Lynx 號經過加州金門大橋 (Golden Gate)、進入太平洋之時，仍是白晝。那天是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九日。數以百計的紙飄帶以及歌聲，伴隨船鳴，歡送船隻離開三藩市。後來，傳教士惠施霖 (Sterling Whiener) 回憶說，乘坐軍艦而非大郵輪，在加州金門大橋之下，迎向日落乃至太平洋，此一經歷很是特別。此軍艦剛退役，正被用於運送兩批重要人士到中國。同時，這批乘客包括二百個華人學生，以及四百位美國傳教士。在當時，這是離開美國最大的乘船隊伍。

對美國政府而言，以有限資源運送這兩批乘客是至為重要的事。傳教士的任務，是復興在華基督教信仰。而回國的學生，則身負延續中國現代化以及推動中美關係的重任。²對大部份學生與傳教士來說，上海是其目的地。有些傳教士則需到南中國工作，他們在香港上岸。

至一九四六年，美國派遣傳教士到中國，以及中國送出學生到美國留學，已持續達百年。他們各自在海外享有不同待遇，其流動各自反映美國在華的帝國擴張，以及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在第一章，我們看到，於二戰之前，美國傳教士學校是中國學生到海外留學的跳板。乘坐 *Marine Lynx* 號的大部份旅美學生都曾在傳教士學校就讀。歷經戰時中美聯盟、在美排華政策被撤銷、美國政府對旅美學生成為未來中國領袖漸感興趣之後，中美關係已有不同。在戰爭期間，美國國務院曾支援很多年輕且聰明的中國學生，中國爆發內戰，亦令華盛頓加快推動傳教士與旅美學生到中國，期望這能有助中國的重建工作。事實上，這個傳教士隊伍之規模更無前例，但他們只是先鋒隊。在一九四〇年代末，跨越太平洋到亞洲的傳教士達八千人。⁴

一九四九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情況有變。中共建政，令數以千計的美國傳教士以及中國基督徒以難民身份逃離中國大陸（至今在香港，難民的法律定義仍具爭議性）。⁵華盛頓亦停止運送旅美中國學生回國，以回應新形勢。美國傳教士則到其其他亞洲美國盟友地區。不過，「失去」中國，並不意味在華美國傳教士的工作告一段落。他們的基層閱歷、人脈與語言能力，使之成為美國抗共

的重要資產。例如，惠施霖出生於湖南岳陽。他通曉中國不同地方語言，也經常使用其中文名字「惠冕霖」。一九四六年，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重新派他與妻子乃至家人回到岳陽。⁷區戴義牧師師母（Merrill and Lucille Ady）、貝光道牧師師母（John and Harriet Bechtel）、厚士端醫生夫婦（Richard and Johanna Hofstra），等其他同船傳教士也曾在南中國工作數十年。⁸如果他們願意，在傳道之外，其抗共與協助建立美國影響力的能力也屬難能可貴。美國政府與傳教士組織利用此一機會，相互協力，重新從中國大陸調派人員，使之到海外華人社群傳教。在一九五〇年代初，移民仍舊湧入香港。雖然在一九五〇年五月香港實施入境限制，另在一九五一年二月，中國也限制公民出境，但英屬香港仍然是傳教士人員重新調派的重要據點。⁹一九五二年，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重新調派惠施霖一家到香港。隨後區戴義牧師師母，貝光道牧師師母亦然。¹⁰

對香港傳教士而言，冷戰時期美國政府的支援，成為他們進行傳教活動的強心針。從十九世紀初開始，傳教士已在整個中國建立學校與診所，以便傳教。¹¹傳教士開設組織的經歷，使之成為華盛頓推動公眾外交（public diplomacy）的自然盟友。下一節會探討美國政府如何利用「國家—私人網絡」，動用資金，協助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與香港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Church World Service）等在港傳教士組織之工作。¹²華盛頓此舉的目標，是展現「自由世界」的道德優越性，以



圖 2.1：本章所討論的美國資助計畫和機構大約位置的地圖。陰影部份代表自一九六〇年代末起的填海工程地區。地圖源自 Andrew James Hamilton，資訊源自 oldhkphoto.com/coast/Map/html。

及協助難民在港安居，以防止他們回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往外移民。美國傳教士與曾在美國留學的華人基督徒移民合作，利用冷戰資源，於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間在全港成立新教會、新學校。（圖2.1）傳教士沒有讓華人成為這些新組織的領袖，美國資源乃至議程因而顯得隱蔽。有傳教士曾強調，建立本土教會需份外小心，以令美國議程變得低調。¹³ 以往學者都能指出，華盛頓利用香港，監視北京舉動，審視入境申請，以及實施貿易制裁。我則會指出，美國政府與美國傳教士乃至華人基督徒協力，以在

基層推動文化外交活動。

第二節會分析這些受美國支持的新學校如何有助英殖政府在難民潮期間實現管治目標。英帝國早有囚禁具潛在威脅的移民之慣例，但在香港，英殖政府僅會針對國民黨士兵等其他政治效忠者。¹⁴英殖政府原先預計，這些移民只會在港短暫逗留，局勢穩定之後，他們會回到中國大陸。故此從一開始，港府只提供最基本的人道支援服務。當港府發現事與願違之時，他們便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推動大型公共房屋計畫，並在一九五六年開始籌劃普及教育。¹⁵此時，美國支援的學校能成為助力，故此在一九五〇年代中，英殖政府開始補助這些學校。香港英殖官員曾限制美方利用這些學校進行反共宣傳，但他們仍有以稅收為學校提供支援乃至指引。在港府指引與支援下，由華人領導與受美國支持的基督教組織開始在全港營辦不同補助學校（grant schools）。對香港而言，這種教育建設至為重要，亦因為此，在一九七一與一九七八年，香港終能推行全民免費小學與中學教育。不過，當時港英政府官員擔心，受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校不只為學生提供文理、英語、宗教教育，且也為非正式解殖推波助瀾，原因是這類學校多以基層低收入家庭學生為服務對象，這會方便美國增加其影響力，以及為美國學校與企業招攬新血。

最後一節會聚焦於美國傳教士在一九六〇年代初積極參與職業訓練與大學招生的經過。於初期，傳教士與華人基督徒利用其教會與學校提供職業教育課程。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的世界難

民年 (World Refugee Year) 之後，英國與美國政府都源源不絕地為這些組織提供資源，使之能夠設立流動站，為居民提供工業技能教育。這些訓練中心以慈善之名運作，但在其背後，香港英殖官員與美國領事都視之為引導低收入港人投身於工業事業的政經維穩工程。與此同時，在一九六〇年代初，與一九四九年之前一樣，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校再次為美國大學招攬學生，且招生人數節節上升。在冷戰之中，這種美國教育外展工作是為營建新的機會體系，以促進資本主義發展與跨太平洋融合，進而鞏固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對本書分析至為重要的一點，是如第一章所提，精英移民從晚清起便累積美國社會資本，到了此刻，一般非精英民眾也在美帝國擴張與英帝國衰落之時得到了有限機會。這種基層之上流機會，也為冷戰時期英屬香港的跨商策略發展奠下了基礎。

2.1. 歐美傳教士在港活動簡史

在二戰之前，歐美傳教士為中國人提供教育，已有百年經驗。在十六世紀，耶穌會進入中國，但直到一八五八年，傳道仍然是非法行為。在一八五八年，於英法壓力下，清政府被迫簽署《天津條約》，以終結第二次鴉片戰爭 (Second Opium War)。在清末民初之時，數以千計的歐美傳教士抵達中國。中國人不太願意歸信於基督教，令傳教士改而設立學校與診所。¹⁶ 在韓國與夏威夷，傳

教士也使用相類策略。¹⁷於中國，傳教士對其信仰之於帝國的衝擊，開始心生疑惑，在由基督教扮演重要角色的太平天國之亂乃至義和團之亂後，更是如此。故此在二十世紀初，大部份美國傳教士都轉而擁抱重自由精神之神學教義，並重設立機構而非單純傳道，以顯基督徒的服務精神。

於傳教士的宏圖之中，香港佔其中一角。英殖政府重建了香港的聖公會機構，聖公會營運不同名校，為歐洲、華裔、歐亞裔學生提供教育，這些學校包括拔萃書院與聖保羅書院。梵蒂岡則遷移區域基地，捨棄澳門，不過意大利的嘉諾撒（Canossians）與美國瑪利諾外方傳教會（Maryknoll Fathers and Sisters）等天主教組織仍然留在區內服務。¹⁸早在冷戰之前，於一九二五年，瑪利諾修院學校（Maryknoll Convent School）便已是香港首間服務孩童的美國傳教士學校。¹⁹

在一九三七年日本進侵之後，很多傳教士與華人基督徒遷居至香港，但直到中共建政之時，遷徙才真正開始。一九四九年四月，香港的美國領事館開始與港英政府商議美國傳教士的簽證問題。²⁰但是，大部份傳教士仍然在中國大陸逗留至最後一刻。²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策最終令傳教士不得不離開，因為信仰受管制，基督徒聚會受監視。在一九五五年之前，約七十萬華人抵港，香港因而開始受傳教士組織重視。²²於難民潮之中，傳教士爭相提供糧食、庇護、衣物，並開始視香港為替代傳教中心點。在一九六〇年代初，香港的美國傳教士組織數目明顯上升，這些組織包括基督教中華宣道會、耶穌基督後期聖徒教會（Church of Jesus Christ of Latter Day Saints）、美國路德

會 (Lutheran Church-Missouri Synod)、中華耶穌寶血女修會 (Sisters of the Precious Blood)、美南浸信會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衛理公會。於香港，在各國傳教士雲集的組織（如中華基督教會和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之中，美國人皆佔多數。

在一九五〇年代間，美國傳教士站在最前線，熱心為來自中國大陸的難民提供物質支援，他們甚至因而被形容為香港社會的「第三勢力」。²³傳教士的成功，建基於他們對中國地方語言乃至政治之熟識。例如，英美傳教士各自服務不同華人。英國傳教士以中華循道公會香港教區 (The Chinese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 District) 或循道公會之名，為操廣東話者服務。美國傳教士則以衛理公會之名，專注於為說上海話或普通話的華人服務。直到一九七五年，這些組織仍然分頭行事。另一例子，是在一九五二年，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委派上文提過的惠施霖到香港。當時曾有本土牧者要求美國傳教士到港，原因是年青人希望能夠學習英文，而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則希望這位牧者能到調景嶺（其時為國民黨支持者的居住地）等地服務廣東話族群乃至湖南移民。惠施霖原先學習廣東話，然後因為在湖南成長，所以也學習湘語。²⁴傳教士利用中國地方語言，為移居至香港的移民提供無微不至的服務。一九五七年，香港總督葛量洪曾記錄傳教士的貢獻，指在慈善救濟領域裡，傳教士組織的貢獻，大於政府或其他本土或國際慈善組織。²⁵在戰後美國的經濟援助下，傳教士主導了早期香港的難民救濟。

這種慈善援助，甚至轉而協助難民形成新社群。一九五一年，被調派到香港之時，安迪生夫婦（Sid & Olive Anderson）已逾六十歲。丈夫安迪生（Sid Anderson）是德州人，畢業於美國范德堡神學院（Vanderbilt Divinity School）之後，他在一九一四年首次來華。妻子列絲高寶（Olive Lipscomb）則在一九二〇年成婚之後來華與他共聚。他們在上海沐恩堂成為領袖，至今天，沐恩堂仍是人民廣場的地標。²⁶一九五〇年年底，安迪生夫婦因中國進行三自（自治、自養、自傳）革新運動而被迫離開，繼而被差會調派至香港服事不懂廣東話的難民。²⁷他們事後回憶說，他們到任何地方遇到老朋友之時，都會被問到，「我們的教會在哪？」²⁸事實上，華人基督徒與傳教士的情誼可以很深厚。寶絲利昆（Patsy Lee Queen）父母在一九五〇年代初到香港，她在港成長，隨後在一九六〇年代中移民至達拉斯（Dallas），並在該地升學。一九七八年，安迪生夫婦過世，她曾寫信給夫婦的兒子，說他們如何在上海為其父母證婚。其父母移居香港，展開新生活之後，安迪生仍為其牧師。安迪生夫婦都能說流利上海話與普通話，她們都被寶絲利昆視為祖父母。²⁹

安迪生夫婦在香港多與上海社群往來，他們認識這些上海人已逾數十年。在夫婦影響力下，新的基督教社群逐漸成形。香港之北角經常被稱為「小上海」，原因是江南移民多聚於此區。安迪生夫婦故意在此定居。他們與同事黃安素會督（Bishop Ralph Ward）共同聚合基督徒移民，並開始籌劃成立新社群。他們當時在思考這個社群的屬性——應當為其成立一個永久的教會，還是使之成為

人流中的歇腳點？³⁰在茶會與晚飯聚間，他們逐漸打聽到在港與在中國大陸的基督徒情況。安迪生夫婦其後以雙語撰寫新教會特許會員（charter members）名單，並作註解。³¹在一九五三年初之前，他們已準備到美國，邀請其上海與南京舊同事出任這間新教會的首位牧師。這位舊同事是周郁晞牧師，他在波士頓大學取得神學博士學位。當時他在佛羅里達州教區出任牧師，服務會眾。³²他未曾踏足香港，但在數月後，即一九五三年中，在其佛羅里達州會眾的部份贊助之下，到來香港。³³安迪生夫婦經常辯論但未有答案的問題，在於是否需要向新教會會眾交代周郁晞如何受薪，如何從美國而來。³⁴於一九五三年夏，這群於北角聚會的衛理宗信徒在安迪生夫婦家下租用十個相連的車房，以作臨時教會場所，場所可容納五十人。

北角衛理堂「車房教會」快速成長，其領袖開始組織不同活動，設立不同機構。在五年內，北角衛理堂的信眾數字已增至五百，安迪生夫婦與周郁晞共同提供服務。按安迪生夫婦估計，約一半信眾為「成熟的基督徒」，他們皆具自衛理宗、聖公會、浸信會、長老會背景，另一半為剛信奉基督教的信眾。³⁵教會的青年計畫逐漸發展，變成學校，在一九五八年更得到港英政府捐地補助。³⁶一九六〇年，在美國信徒贊助建築費的情況下，北角衛理堂開始籌劃建立永久的教堂與學校。（圖2.2）

阮潤桓與其妻郭美德，是在新教堂與學校建設背後的重要人物。阮潤桓是初代跨商與美國



圖 2.2：香港衛理公會特刊，PSRA, Box 2, Folder 23, YUDSL。
由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館藏部提供。

華裔律師。³⁷他在一九〇八年生於美國領土夏威夷檀香山 (Honolulu)，從出生開始，他便是美國公民。他入讀密西根大學 (University of Michigan)，攻讀法律。在安娜堡 (Ann Arbor)，他與郭美德相遇，當時她在美國留學，攻讀研究院。³⁸畢業於法律系之後，直到一九三三年，阮潤桓在美國夏威夷地區法院執業，其後他與妻子到上海。在上海，他先為理察臣 (George Richardson) 擔任法律文員之職，後於美國在華法院執業，當時他專攻商

法。³⁹ 郭美德是上海大學畢業生，這所大學由美國浸信會所創立。回到上海之後，郭美德先後出任為復旦大學與培成女校（Besant School for Girls）的院長，後者英文名字中的 Besant，是以證道學學者（theosophist）與反殖活躍份子安妮·貝贊特（Annie Besant）來命名。⁴⁰ 一九三七年，郭美德參與成立振粹小學。這所小學為女校，復旦大學校長、耶魯大學畢業生李登輝為校董會成員，著名教育家與美國伍斯特學院（College of Wooster）畢業生郭秉文為信託人。⁴¹ 日本佔據之時，阮氏夫婦仍然留在上海。一九三九年，在理察臣的安排下，阮潤桓替代理察臣，成為美亞保險（American Asiatic Underwriters）創辦人斯丹（C.V. Starr）的律師。⁴² 在太平洋戰爭期間，阮氏夫婦被送回檀香山。於一九四七年，他們回到上海，但在一九五二年移居至香港。⁴³ 香港的法律體系不同，意味阮潤桓無法繼續執業。斯丹因而邀請阮潤桓成為香港美亞保險董事，這反映了人脈的影響力。在此職中，他與貝祖貽成為好友。貝祖貽是來自上海的基督徒移民，曾是中國銀行管理人員，為著名建築師貝聿銘的父親。至退休之時，阮潤桓已是亞洲 AIA 的法律顧問。

阮氏夫婦是虔誠的衛理宗基督徒，他們成了北角衛理堂的象徵。從一九五六至一九六一年，阮潤桓為教會董事會主席，郭美德則在其附屬學校先後任校董會首任女主席與校長。⁴⁴ 這也是說，他們見證與管理這個社群恆常化的關鍵歷程。與此同時，阮氏夫婦非常熱衷於社交，他們加入了很多精英社團。在其兒子先後入讀寄宿學校與其母校之時，在一九五六年與一九五八年，阮潤

桓先後當選成為聯青社與獅子會主席。⁴⁵從法律與文化角度看，阮氏夫婦是美國人，但他們為眾多美國舶來品增添了華人色彩。⁴⁶現存的證據顯示，阮氏夫婦的目標，是傳揚普世教會合一運動（Ecumenism）、基督弟兄情誼、女子教育，其參與的不同活動以及其美國聯繫，則串連了不同教會、學校、企業。換言之，阮氏夫婦案例，能夠生動說明心繫美國的精英網絡乃至機會如何滲透至英屬香港的基層。

在阮氏夫婦的領導下，北角衛理堂開始擴展其影響力。一九六七年，衛理公會以美國衛理公會資金，在九龍建成安素堂（Ward Memorial Church）。安素堂是為紀念黃安素會督，他在一九五八年逝世。⁴⁷他們也開始在英屬香港的新建徙置區建立不同天台學校（下一節會將之詳述）。衛理公會亦嘗試設立兩個小型的私人徙置區，天后的衛斯理村（Wesley Village, 1955）與荃灣的亞斯理村（Asbury Village, 1959）是當中兩個實驗。每條村皆有八十至一百間小屋、教堂、社區中心、小學，以及用以增加家庭收入的生產小組。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曾為村落提供糧食。⁴⁸這些村落有各自的牧師，徐廉（Leo Hsu）和李廷英（Moses T.Y. Lee）是其中兩位，一位曾在美國留學，另一位則在美國傳教士贊助下於香港接受教育。⁴⁹安迪生夫婦也有在崇基學院任教（下一章會詳述）。⁵⁰這些活動意味，安迪生夫婦與阮氏夫婦已成功將其上海網絡乃至美國資金移植至香港，上述項目因而能夠萌芽。

過去學者已研究美國在港情報與移民申請審核之工作，但他們忽略了美國政府在傳教士工作背後的積極角色。⁵¹也即是說，傳教士工作令美國政府的行動變得隱密，使之得以進行。一九五〇年，英國為保存香港利益，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在當時，華盛頓繼續支持台灣的國民黨人，且也積極利用香港，以干擾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接觸香港難民，不免會觸怒北京，危害香港的安全，故此每當美國人提起「難民」之時，便會令港英政府官員感到憂慮。港督葛量洪曾指，「難民」是一個相當隨意的標籤，港府寧願向有真正需要的人而非單憑這類標籤分派物資。⁵²港府當時以「克制外交」方式，對待美國在港行動。如學者麥志坤所指，這有助抑止美國的文宣乃至挑釁。⁵³不過，這並沒有妨礙教育與醫療工作之進行。美國政府透過私人組織（主要是傳教士組織），捐輸可觀資源，以支援這類工作。一九五四年，美國領事館成立難民與移民組（Refugee and Migration Unit, RMU），以管理這些外展工作。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中華基督教會全國總會、世界信義宗聯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LWF）、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National Catholic Welfare Conference）、普世教會協會（World Council of Churches）等宗教組織以及美經援會（Cooperative for American Relief Everywhere）等世俗組織都受惠於美國政府資源。港英政府官員對傳教士資金充裕的原因了然於心。港督葛量洪在向倫敦的匯報曾寫道：「事後證明，這些表面看似與政府無關的組織，其實都得到美國政府若干財政支援。事實上有時候，其表面偽裝功夫也不多。」⁵⁴按葛量

洪的估計，單從一九五四年七月一日到一九五五年六月三十日，上述組織便已花費六十萬美元，用於糧食與衣物供應，受惠人數達四萬五千人。葛量洪也留意到，在匯報前兩年，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也耗資十萬五千元，興建五百二十七間小屋。他直指，為其提供資金的，是美國國務院的國際開發署（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葛量洪提到普世教會協會之時，亦指名義上屬於國際組織之機構，其實也與華盛頓有聯繫。普世教會協會總部位於日內瓦，但其大部份資金都來自美國。一九六一年初，難民與移民組向港英政府官員匯報時指，在一九五四至一九五九年間，其為本土組織籌集的資金，達七百萬美元。⁵⁵約一半資金用於協助難民在海外安居，另一半則用於本土救濟。⁵⁶當時香港約四分之一人口曾受惠於美援。⁵⁷

在受美國資助的傳教士組織之中，華人基督徒與美國傳教士的領導地位並不簡單直接。當時的趨勢，是權力下放，故此華人神職人員與阮氏夫婦等社會人士通常都能掌管營運事務。⁵⁸不過，美國傳教士也掌控大部份資金。在中華基督教會之中，這種權力關係引致華人牧師汪彼得與惠施霖之衝突。在一九四九年之前，該汪姓牧師是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協會的行政秘書，直到一九五五年，他才被准許離開中華人民共和國。⁵⁹後來惠施霖讚許汪牧師，認為他是強有力、聰明、有魅力的領袖，但也承認，他無畏無懼。兩人共事了十一年，一直到他們對中華基督教會長遠發展目標的歧見變得無可逾越之時才告終。汪牧師相信聚焦於教育之必要，且希望惠施霖能夠成為這些學校的美國代言

人。惠施霖則希望聚焦於社會工作。結果，二人理想無可溝和，在一九六六年，惠施霖辭職。⁶⁰

的確，維持教育事業，是美國支持之教會在香港運用資源、建立社群、招攬信徒的主要方式。所有美國衛理宗學校在正規課程之外，都提供聖經教育，以提醒學童家長，其小孩所受教育的宗教背景。教會與學校活動也有照顧社群的物質需要。在一九五七年，於五旬節與聖誕節之間，安迪生夫婦創下紀錄，招攬了一百六十名新教會成員，當中包括衛斯理村的家庭，以及剛離開中國大陸的基督徒。除了訴諸於信仰，教會學校亦會以免費教育作為賣點，吸引這些普遍貧窮的家庭，家長與傳教士之間的不對稱權力關係由此而生。例如按安迪生夫婦紀錄，在一九五八年，有個眼神機靈、笑容可掬、極為可愛的六歲小孩極力乞求，他的家人住在附近的貧民窟，其家有炊煙。他們邀請那小孩入讀其免費學校，並希望這位小孩終有一天會受洗。其父母原可拒絕，但對他們而言，小孩的免費教育不可多得。在另一個衛斯理村的學校活動之中，於安迪生夫婦的安排下，已受洗的小孩貼布藍色標籤，未受洗的小孩則貼有粉紅標籤。⁶¹非基督徒孩童被標為異類，其父母也不時被提醒，他們小孩的教育機會來自傳教士，而且這個基督教社群可為孩童提供其他機會。我們會看到，所謂其他機會，是指跨太平洋移民機會，以及升讀美國大學機會，這並非祕密。

2.2. 傳教士與港英政府之協力

對港英政府而言，支援受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校，是合乎利益之事。移民湧入，會威脅香港的社會穩定繼而影響政權之生存機會。他們也令社會服務變得短缺。港英政府官員希望能以低成本處理這些新增需要。在一九五四年，他們推出為期七年的小學學位擴展計畫，希望在一九六一年前，為社會提供二十一萬五千個小學學位。在眾多投身於教育事業的組織的積極配合下，新增的學位數目達三十六萬三千五百，另外有十五萬四千個學位處於籌備階段。⁶²很大程度上，此一成就源於官方政策。按當時政策，所有有志於興建學校、符合資格的宗教組織，都會得到政府補助與支援。港英政府官員固然留意美國在港情報與滲透工作，但他們仍然樂見美國組織參與構建香港小學與中學教育，並為這些組織提供了很多便利。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之學校興建工程曾落後於進度，曾有港英政府官員想予以懲罰，結果這位工務局官員被當時輔政司（Colonial Secretary）告誡。輔政司指，港府需要這些組織代為營運學校。若無不合理的延誤，政府便應容許其工程延期，不得以任何懲罰。⁶³華盛頓的外展工作不一定出於仁慈之心，港英政府官員亦利用受美國支持的基督教組織，以掩飾其資源匱乏，維持殖民權力的體面。從長遠角度看，將公共責任外判予以美國色彩濃厚的私人組織，象徵著香港非正式解殖時代之序幕。

美國傳教士與港英政府的合作，始於新徙置區的天台學校。在一九五三至一九五四年間，港英政府矢志為香港有需要人士提供大型公共房屋，這些新公屋以H型大廈示人。⁶⁴每幢可容納約二千五百人，每一家庭入住約一百二十尺的單位，並與其他鄰居共用廚房與浴室。至一九五九年末，政府已在九個屋邨興建一百零三座同類H型徙置大廈，其居民人數達二十三萬人。（圖23）⁶⁵這個相當擠迫的住宅區頗缺社會服務。是以在一九五六年，美國衛理宗傳教士申請在李鄭屋徙置區設立兒童會。阮潤桓與周郁晞牧師是發起人。他們希望，這個兒童組織能為區內最窮困的家庭服務，進而能夠招攬更多基督徒。選擇此區，原因之一，是區內有不少上海人或講普通話之居民。⁶⁶向港英政府官員介紹計畫之時，他們強調此一組織並非正規學校，以避開嚴格監管。港英政府為此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准許他們試驗計畫半年，此時正值國共支持者間的騷動愈演愈烈，維持社會穩定的需要有增無減。⁶⁷一九五七年初，四個社會會社獲准永久註冊，上述兒童組織是其中之一。⁶⁸衛理宗因而利用徙置區天台，鋪設椅桌與黑板，教授學童文學與數理，早午各兩班，每班共六十人。導師是崇基學院早期畢業生（另見第三章）。港英政府官員注意到，美國人為組織提供法律與財政支援。⁶⁹他們也有為屋邨家長與母親們開班，教授文學與縫紉，且也講授聖經，提供基督教服務。重要的是，港英政府並無就天台之使用向衛理宗傳教士收取任何租金，僅僅就儲物室之租借象徵式收取租金。楊震牧師事後親自向官員致謝，感謝政府提供老師培訓，且也有邀請官員出席他們的社



圖 2.3：香港政府手冊，
1968, PSRA, Box 2, Folder
22, YUDSL。由耶魯大學神
學院圖書館館藏部提供。



Methodist in Hong-
kong welcomed Rev-
Chester Yang at the
wharf, February,
1955

一九五五年二月
，香港衛理公會同工
迎接楊震牧師來港主
理九龍教會。

圖 2.4：楊震抵達香港，一九五五年二月。Ward Memorial Methodist
Church 1967, PSRA, Box 2, Folder 24, YUDSL。由耶魯大學神
學院圖書館館藏部提供。

會活動。⁷⁰ 楊震是衛理宗在九龍第二個會堂的牧師，他來自天津，在一九四八至一九五二年間，他得到獎學金，於美國東新墨西哥大學留學。其後，他在達拉斯柏金斯神學院 (Perkins Theological Seminary) 就讀，並在一九五四年學成畢業。在黃安素會督的贊助下，楊震來港。相隔八年，楊牧師終與妻兒在港重聚。(圖2.4)⁷¹

屋邨居民、其他傳教士組織與華人組織很快也都接受天台學校教育模式。在一九五八年九月之前，英屬香港的行政局開始批閱其他四個美國以及國際傳教士組織對設立兒童組織的申請。⁷² 於屋邨居民需求甚般的情況下，一九六〇年，美國衛理宗獲准在黃大仙邨擴展其兒童組織。其後在一九六一年、一九六二年、一九六四年，美國衛理宗陸續在大窩口、黃大仙、橫頭磡屋邨擴展或新增兒童組織。⁷³ 單在黃大仙，他們便透過組織與活動計畫，分別招攬了二百多位學生與近四百位小朋友。⁷⁴ 唐樂仁牧師 (Rev. Robert Turnipseed) 曾指，基層居民令學校滿足其需要，他們甚至在小童家長壓力下，推出預備班下午課程。⁷⁵ 官員亦協助這些兒童組織在地化，他們要求組織僱員需是屋邨居民。這項政策旨在增加就業率，但也令學校得以在社區之內擴展影響力。街坊組織、佛教宗廟等華人組織相繼設立其天台學校。在一九六〇年代末之前，香港學校總數已逾二百間。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中，政府終於推出足夠學位，開始清拆屋邨之時，天台學校仍具生命力。⁷⁶

學校漸能自立，並沒有消磨港英政府官員與美國基督教組織之間的教育合作。甚至可以說，香

港教育之成就，其實源自這種合作。一九五八年，港英政府通過《慈善（土地徵用）法案》（Charities

[Land Acquisition] Bill）。此一法案訂下準則，以助私人慈善組織興建小學與中學。按照準則，如果私人慈善組織承擔興建學校百分之二十之成本費用，那麼政府便會免費為其提供土地，另加一半興建補助費用，同時為餘下百分之三十興建費用提供長達十一年的免息貸款。可以說，港英政府補助私人慈善組織，以分擔其公共教育責任，進而換取學校經營權以及其創設資金。美國與國際傳教士組織是這項政策的主要受惠者，原因是其資金穩健，港英政府官員直覺認為，這些組織之項目，皆由成立已久且經營有道的教會贊助。⁷⁷對港英政府與傳教士組織而言，這是雙贏政策。在一九六七年之前，單是中華基督教會，便已在全香港興建了三間小學以及八間中學，為兩萬名學童提供學位。中華基督教會利用其基金，投資了五百萬港元，另外得到政府一千五百萬補助，與四百萬貸款。⁷⁸在一九六八年初，美國路德會亦靠自身的一百萬美元資金，營運或興建旗下八間學校。⁷⁹例如，在一九六六年，美國路德會申請於荃灣興建路德會聖十架學校，便隨即得到當時港英政府教育官員應和與支持。官員指，美國路德會有營運中小學的經驗，可靠與有效率。當時荃灣欠缺學校，加上辦學往績良好，美國路德會得到政府津貼港元四十四萬，免息貸款港元二十六萬四千，以及每年會得到教師薪金與書簿津貼，金額達六十二萬三千港元。此外，美國路德會也得到土地補助，以興建非牟利小學，該小學共有二十四間班房，可服務二千一百六十名學生。美國傳教

士需要擔負的成本額，僅為十七萬六千港元。⁸⁰即使後來路德會過度擴張，項目成本上升，政府對其支持仍然有增無減。⁸¹

除了以納稅人金錢支持美國傳教士組織之活動，港英政府官員也有為這些教育項目提供指引。在一九六三年，美國衛理宗傳教士仍然積極擴展社會事業。他們申請在九龍興建教堂、圖書館、社區設施。⁸²其中一位官員楊露斯（Rose Young）決定全面檢討美國衛理宗傳教士的社會事業發展。這位官員相信，美國衛理宗傳教士不缺金錢，但她想知道，他們是否真的履行承諾。她擔心，港英政府若不提供足夠指引，這些新建設施都只會是宗教場所。⁸³衛理宗傳教士在柴灣新建的愛華村令她印象深刻。這條村共住有三百五十個家庭，他們居於面積僅為一百七十尺的小屋，衛理宗傳教士僅收他們十元港幣的月租。在這條村，社區中心樓高三層，內有診所、供二百五十名學童讀書的幼稚園、遊樂場、公共浴室、教堂、晚課課室。楊露斯曾與黃姓牧師傾談。該牧師告訴她，愛華村村民的生活，優於眾多城市貧民，因為他們需付的租金、學費、診金便宜。當時柴灣仍將會新建兩幢社區中心。楊露斯認同，在社服機構的服務之下，柴灣居民的生活狀況，勝於徙置區。⁸⁴不過，港英政府官員沒有對每一個項目予以美言。衛理宗曾在李鄭屋邨擴展其組織，其中一位官員說，雖然計畫之活動不太理想，但這始終能夠為學前孩童提供服務，聊勝於無。⁸⁵

在一九六〇年代，港英政府與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校之間的互相依賴關係變得更為複雜。例

如，港英政府官員會為了鞏固關係，而自覺有責任繼續資助有問題之項目。一九六六年夏，中華基督教會向政府申請，希望將一所中學轉型為高等學院。官員以不同理由反對，但其中一位承認，他們審批申請之時，不能過於嚴格，因為在教育範疇，政府需要依賴中華基督教會的服務，故此有需要為其撥地。官員的決定，是先拒絕申請，如果中華基督教會再申請，便以教育「政治」原因讓步。⁸⁶與此同時，港英政府官員聯同富有的美國傳教士，希望以其之力，修正其錯失，例如他們曾利用寶血女修會，以應付華富邨徙置區的意外需求。⁸⁷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令受美國支持的組織處於特殊地位。例如，在一九六〇年代末，美南浸信會在未得事先准許之前，購買數個物業，以設立免稅的教會與慈善組織。這其實是違規行為，技術上，這會令物業購置失效。如何處理這個越界行為，令港英政府官員感到頭痛。有人寫道，政府應當懲罰美南浸信會，使之屈膝，但方法並非充公其物業。也有人建議，港英政府不應對其包容，應當充公其物業。官員之一曾回應指，美南浸信會在港營運，不計薪金成本，每年經費達港元一百萬，美國對其予以直接財政支援。傳教士都是美國公民。他們提供教會、學校、醫院服務，故此充公其物業，是重大決定，官員不肯定這是否應為之舉。⁸⁸後來港督處理此一問題，他被告知，如果物業被充公，這猶如向美國慈善組織掀大巴掌。⁸⁹他最後決定，只要美南浸信會注意其行為不當，便對之予以原諒。

在一九五八年至一九七〇年代中，華人基督徒、美國傳教士、港英政府官員之間的協力有增無

減。在一九五七年一月，港督葛量洪曾評論香港的教育狀況。除了對高等學院的補助之外，相較來自本土、私人與官方的資助，美國對香港教育援助的比率並不算特別高。⁹⁰不過，一九五八年的《慈善（土地徵用）法案》為美國對港教育援助開了一扇門。一九五九年七月，港英政府教育高官通知惠施霖，告訴他香港當時有七百八十九間私立小學，當中有二百一十八與九十一間由新教組織營運。在七十一間中學之中，當中五十六間是基督教學校。⁹¹在這三百六十五間學校之中，大部份都成立於二戰前，且有四成小學與近八成中學是基督教學校，這在非基督教社會之中，是特別現象。在一九六〇年代，於社會、美國資源、華人精英基督徒的需求下，此一現象有增無減。在一九六一年，安迪生夫婦勞累地寫道，指其教育工作有增無減。他們說，難民不斷湧入，希望得到教育機會。他們作為衛理宗人，需要處理的學校工作，已不勝負荷。⁹²

2.3. 傳教士學校中的美國影響力

在基礎與中學教育之外，受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校也提供了一線機會，令學生能夠接受美國高等教育。這些學校成為精英以外推動跨商發展的主要推力。例如在一九六〇年九月，安迪生夫婦為將到美國留學的二十名北角衛理宗學生慶祝。他們甚至寫信給居於學生所就讀的美國學校附近的朋

友，為其學生作引薦。⁹³翌年，安迪生夫婦開始記錄，指該年北角會眾之中，有八十四人離開，前往美國展開新生活或留學。⁹⁴於一九六一年初，浸信會傳教士摩根夫婦（Carter & Agnes Morgan）形容他們到啟德機場之旅，形同在現場察看香港學生如何成群乘搭專機離港到美國留學。他們曾懷疑，在這些學生之中，最終會有多少人能夠於旅美生活之中歸信於主耶穌，但他們仍然確信，這些學生會感受到物質主義的魅力，旅美生活會改變他們的生命。⁹⁵受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校以及美國政策不為這些留學生設置任何配額，故此在一九六〇年代，香港有不少學生前往美國留學。⁹⁶傳教士與華人精英利用其知識與人脈，透過其教導、引薦、獎學金，為基層難民提供旅美留學之機會。這些持續發展的教育網絡，反映英屬香港逐漸向美國靠攏，與美國在太平洋不斷向外擴展的商業網絡漸變得密不可分。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間，按紐約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的研究，於美國留學的香港學生，只有七十二位。⁹⁷在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間，數字卻已增至一千零六十位。其後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間，再增至一千五百九十七位。⁹⁸我們會在第三、四與六章見到，於一九六〇年代，本土與國際發展交融，旅美香港大學生人數增加。例如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間，香港成為美國留學生最大來源地。這股浪潮發源於受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校，北角衛理堂便是例子。安迪生與摩根夫婦已身體力行表明，這些親美學校其實也是在宣揚美國生活文化、機會、國際領導地位。在慈善組織的包裝之下，這些策略目標更因食物送贈而變

得明顯。在一九六二年，其後為美國總統候選人、主理Food for Peace的麥戈文曾到訪香港，他曾指，在香港活動的慈善組織，其實是為促進市場經濟而工作。他說，一旦小朋友愛上麵包、牛奶、燕麥等美國食物，他們便會成為支持美國貨的消費者。他主理的Food for Peace也有此一功能。”

不過，在美國教育工作之中，這些策略目標之成果要經年才能展現。在一九六〇年代中之前，只有少數香港年青人能夠得到接受美國高等教育的機會。除了傳統學校，美國政府與傳教士都專注於透過基督教訓練中心為香港青年乃至成年人提供職業教育，他們希望可以藉此訓練難民，將之變成有用的勞動力以及好公民。第一章已指，資本家移民促成了香港製造業之蓬勃發展，他們的工廠需要擁有新技能的勞動力新血。傳教士、美國政府代表、殖民地政府官員共同合作，希望能夠培訓這批勞動力新血，他們甚至徵詢工業家意見，按之剪裁培訓內容。受美國支持的職業學校不但透過培訓勞動力支援香港工業發展，且也令外界誤以為香港資本主義的成功源於其自由市場。香港的職業訓練，看似純然是基督教會與美國援助的慈善產物，但實際上，這為香港居民提供了以美國標準為綱的勞動力訓練，間接為這個殖民地提供了發展補助。

從一開始，美國傳教士便為學生之家長提供職業訓練。每逢晚上與週末，北角衛理堂與天台學校都會進行職業訓練課程。這種課程，為低收入居民提供了誘因，使之願意接受學校教育乃至基督教信仰。不過在數年之內，傳教士開始改在特定場所提供職業訓練。例如，美國衛理宗就在油麻地的

安素堂和其學校附設社會福利中心，開辦電子、紡織、木工、文員、渠務等課程。¹⁰⁰政府社會福利官員與楊牧師以及唐樂仁牧師牧師定期見面，相互交流，共同籌辦這間社會福利中心，規劃其課室等空間。¹⁰¹一九六一年十一月，香港官員 Dorothy Lee 批核這個項目。她曾與楊牧師以及唐樂仁牧師詳細商議，兩位牧師對計畫細節之熟識，令她感到滿意。從這位官員角度看，計畫所議之活動務實，能滿足油麻地此一擠迫貧窮地區的需要。¹⁰²這種官民洽商提供了很多很有價值的發展意見，且在中心發展之際，從無間斷。¹⁰³

非美國傳教士同樣取得美國政府資金，以提供職業訓練。例如，在一九六一年十月，於沈丹孚牧師 (Rev. Ludwig Stumpf) 的領導之下，世界信義宗聯會申請土地經費，計劃在官塘設置職業訓練中心。按世界信義宗聯會之計畫，該中心每年會為上千青年與難民提供英語、打字、會計、陶瓷、繪畫、紡織、冷氣維修等課程。港英政府批出土地，且也留意到，美國政府隨即為計畫分撥十萬美元，經費估計畫成本逾半。¹⁰⁴在一九六四年初，中心落成，並在翌年正式運作。¹⁰⁵其首四百個課程學額，共錄得逾三千申請。¹⁰⁶

事實上，在職業訓練之規劃過程中，美國領事館難民與移民組扮演頗重要之角色。從一九六〇年七月開始，難民與移民組官員便定期與港英政府官員見面，審議各項計畫。港英政府也成立中央協調委員會 (Central Coordinating Committee)，以管理美國援助資源。¹⁰⁷例如，在一九六〇年代

中，難民與移民組官員阿洛活 (Robert Aylward) 與華盛頓 (Herman Washington) 宣佈，他們已預撥一百萬美元，作為香港來年難民援助，當中三十五萬被用作支援難民落地生根，另外六十五萬被用於香港之項目發展。他們的主要目標，是支援香港「新移民」，這其實觸動了港英政府官員之神經，因為他們認為，美國領事館難民與移民組接觸香港難民，另有居心。¹⁰⁸ 對於如何使用經費，阿洛活與華盛頓有不同想法，但他們都熱衷於職業訓練之籌劃。他們支持官塘職業訓練中心之發展，且也為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與全國天主教福利委員會的訓練中心提供經費，另外也為國際救援委員會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 IRC) 本土分支之難民職業訓練與就業援助提供近五萬美元經費。¹⁰⁹ 在港英政府官員的建議下，阿洛活與華盛頓亦支援中學的職業訓練。¹¹⁰ 與此同時，當這些項目開始出現延誤，美國人便寄出措辭強硬的書信，這令港英政府官員不滿。官員們認為，關心項目發展的人並不明白所需工作之繁複，他們並不理解，要在一至三年內完成項目，是如何不務實。¹¹¹ 也有官員認為，項目之延誤，令政府難堪。同樣有官員認為，美國人需要的，並非詳細解釋，而是消除延誤，而這也已被執行。¹¹² 有官員甚至抱怨，指他們需要新的行事程序，以理順溝通。他強烈建議，關心社會福利開支的港英政府與美國領事館官員，都需以文書表達意見。¹¹³ 這位官員暗示，在一九六〇年之前，美國領事館乃至受其資助的傳教士，都已經成為香港社會福利開支的重要持份者。

雖以慈善事業之名行事，但職業訓練所得到的資金，仍然受美國資本主義思想乃至自力更生之理想主導。保良局等本土慈善組織乃至國民政府一直努力嘗試得到城市貧民的支持，並希望將之形塑成為「有用」之公民，但美國援助所著眼的，並非道德改革或國民自強運動。¹¹⁴美國官員希望能夠重新培訓香港低收入居民，使之能夠滿足工業發展需要。亦因此，數十萬移民被招攬到香港勞動市場，使之優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規劃經濟之假象由此而生。事實上，美國政府利用帝國力量，巧妙地資助發展，構建個人事業發展之選項。利他思想固然有助這種趨勢之發展，但真正影響香港的國際地位與價值的，是冷戰政治。在一九六一年，美國領事館難民與移民組至少為香港難民花費了六十七萬美元，分發的美國剩餘農產品，總值亦達近五千萬英磅。¹¹⁵於一九六二年，難民與移民組再為培訓花費六十萬美元，當中的一萬五千美元被用於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的培訓計畫，該課程訓練身有殘障的年輕女性針織。另外五萬美元被用於世界信義宗聯會對抗肺結核的項目，這項計畫的目標，是幫助病人重新投入勞動市場。¹¹⁶一九六三年，難民與移民組的開支已達近一百八十八萬美元，其後在翌年降至七十五萬美元，並在一九六五年重新增至一百萬美元。¹¹⁷國際救援委員會與美經援會同意聯合贊助香港首個酒店管理課程之後，在一九六四年十月，華盛頓頒發證書。¹¹⁸在一九六〇年代初，美國政府便花費上百萬美元，以國家力量，令香港工人自力更生。

在援助難民行動背後，除了經濟目標之外，還有政治理想，傳教士將之稱為品格與公民教

育。¹¹⁹ 美國政府捐贈物資，在世界難民年興建黃大仙社區中心，便是一例。當時在徙置區，社會服務欠缺。於一九五九年，港英政府官員宣佈，將成立六所主要社區中心。官員私下明白，居民居於黃大仙，純粹是因為他們原本的寮屋被清拆，後被徙置於此。亦因此，居民並無社群意識。¹²⁰ 官員擔心社會不穩定會由此而起，故此希望社區中心能助家庭建立社群意識，使之免受政治或不法影響。¹²¹ 首個實驗點在北黃大仙。¹²² 美國政府立刻提供所需的二十萬美元，並得到香港英語媒體讚頌。《德臣西報》(China Mail) 的社論指，從美國角度看，這是抗衡共產主義影響力的務實對應。但從本土角度看，社區中心的功能，是減低居民被離棄之感，多於鞏固他們在工業社會角色的自信。¹²³ 這篇社論不但反映社區中心建立歸屬感的使命，而且亦直白指出，於社區中心背後，不無新自由主義的雛型。

與受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校與訓練中心一樣，黃大仙社區中心亦以提供福利之名，令居民得到職業訓練。¹²⁴ 港英政府與美國官員都認為，項目的目標，是要建立社群，但《德臣西報》卻認為，項目的真正目標，是要將「寄生蟲」轉化為守法的勞工。是以，黃大仙社區中心既是個案工作中心、青年中心、育兒中心、基督教青年會課室、圖書館、母親會所，亦提供職業訓練，課程包羅萬有，摩托及電子維修、噴漆、英語等課程都在其中。日間課程可容納二百四十名年齡介乎十五至二十一歲的學生，晚課亦能服務達一百名八歲或以上的學生。¹²⁵ 這些課程都免費，在冷氣課室進

行，並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Hong Kong Christian Welfare and Relief Council）營辦。¹²⁶香港基督教服務處本身已得到基督教世界救濟會八十萬元港幣補助，以營辦課程。在雙語報章刊登廣告之後，至一九六二年，社會福利處估計，區內六萬名居民之中，有二萬人享用社區中心服務。¹²⁷

黃大仙社區中心案例亦能說明，何以美國在港規模龐大的外展工作會被遺忘。美國政府的捐贈者角色並非祕密。社區中心內有美國政府送贈的牌匾，美國大使亦在一九六〇年七月任社區中心落成典禮嘉賓，其雙語演辭透過美國新聞處（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被分發到各大報章。¹²⁸不過，隨後有關關愛與自力更生的論述逐漸得到更多注意。《德臣西報》錯誤地指，這所社區中心並非來自美國財政部的無私奉獻，而是來自人民自發的募款。¹²⁹《南華早報》更亢奮地指，新的社區中心會孕育自力更生的公民。¹³⁰其社區中心落成的報導，特別聚焦於歐太的演辭，歐太是黃大仙母親組織之成員。她當時以廣東話演說，並指，她不會忘記她們所得的相互學習、相互扶持、共同找尋生活目標之機會。善用閒暇，令她的生活出現了巨變。她由此明白，閉門造車，並不會帶來進步。¹³¹她的演辭被印成雙語，其自力更生論述，應和了美國有關生產力的理想，但同時亦多少掩蓋了美國領事之說，即社區中心之成立，與英美政府有關。¹³²各持份者都在著力說明，社區中心是基層恩物，但同時將美國公共外交的痕跡埋葬。實際上，社區中心猶如導引居民成為美國乃至港英政府心中理想公民模樣的棚架。這種公民一方面能成為工業勞動力，另一方面對政治冷感。就國

民黨的《星島日報》甚至不曾提到美國的角色。¹³³ 黃大仙社區中心被種植在肥沃的土壤之上，聖誕聯歡會與童軍等事物，自然而生。歐太等居民深感社區之心之好，同時將美國政府角色忘懷。

在一九六〇年代，香港持續得到美國資金，更多的訓練中心陸續成立，這些中心由傳教士組織乃至世俗組織營辦。一九六七年三月，鄧律敦治（Dhun Rutonjee）為官塘的世界復康基金會（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日間中心主持奠基儀式，並為此致辭。鄧律敦治生於富裕的帕西家庭，且是立法局議員。當時出席典禮人數達二百人，當中包括世界復康基金會主席來斯克（Dr. Howard Rusk）。鄧律敦治在演說中肯定美國於慈善項目的角色。他說：

「我們曾出席甘迺迪中心（John F. Kennedy Centre）落成典禮，這所中心為痲孺兒童提供教育，其後中心轉交予以香港紅十字會。轉眼間，已過了一週。現在我們聚守一堂，出席為官塘的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的奠基儀式，我們一眾不幸、受各種殘障所困的公民將會得到職業訓練與指導，他們從此能過有意義的生活，謀求福祉，香港社會亦會為此受惠。與甘迺迪中心一樣，此一日間中心亦由世界復康基金會資助興建，此一慷慨補助，來自美國社會。」¹³⁴

於港島沙灣的甘迺迪中心，以及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同樣得到美國國務院補助，金額達一百二十萬美元。甘迺迪中心之成立，是為紀念甘迺迪這位遇刺的美國總統，這所中心為特殊兒童提供教育。¹³⁵世界復康基金會日間中心則為三百四十位殘障成年人提供職業治療與訓練。不過，雖然鄧律敦治提到香港公民一詞，但在當時，從法律角度看，「香港公民」仍未存在於世，日間中心亦未峻工。在接下來數月，香港將受中國大陸的文化大革命衝擊，暴動與炸彈襲擊隨之而來。在此脈絡下，美國與港英政府官員希望，日間中心能為香港主要工業提供所需勞動力，更為此與工業聯會以及紡織大亨密切聯繫。¹³⁶結果日間中心的課程，以紡織為主。¹³⁷鄧律敦治也有提到為不幸的香港公民提供指導，港英政府的社會福利官員私下則更為直白，曾言殘障人士能為香港經濟發展提供額外潛在勞動力。訓練中心能使之在現代工業社會之中尋得位置。¹³⁸令身患殘障的小孩與成年人成為低薪生產線勞動力，聽來猶如英國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小說情節，但美國國務部更聯絡親美媒體，為此籌募捐款。這些報導都曾經得到官員的導引、剪裁、分析，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以及香港的「成功故事」（香港總督語），都由此得到正面評價。¹³⁹在中心成立三週年之際，有關美國政府角色的論述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有關積極不干預主義的論述。事實上，世界復康基金會本地主管萊斯（Halleck Rose）是退休美國外交官，甚至可能是美國中情局人員。¹⁴⁰

在中共建政之時，華人基督徒精英以及國際傳教士組織都遷移至香港。為應對英屬香港的人道

危機，美國傳教士與華人基督徒精英合作，建立新社群。其合作項目逐漸與美國冷戰議程合流，與此同時，上百萬資金透過美國政府的私人網絡流向這些合作項目。得到美國支持的基督徒發展項目，由華人領導，與此同時，香港年青人與成年人被導向信奉基督，同時擁抱資本主義的未來。透過這些合作項目，香港普通民眾能夠接觸基督信仰、英語、美國價值觀與國際秩序觀，並得到訓練，迎向勞工與「公民」新生活。港英政府與華人精英都支持這些項目，原因是他們認為，這有助穩定香港社會，合乎其利益。結果，在華達百年的基督福音傳教，於冷戰時期香港得到新的土壤。

2.4. 香港發展與美國網絡

在這一章，我們見到，美國、英國、華人三者合作，發展教育事業，於全香港建立基督教學校與訓練中心。這個過程令上萬家庭得以落地生根，融入於新社群，本土教會得到新會眾，英殖管治得到鞏固。對華盛頓而言，對港補助確立了冷戰議程，其中之一，是令民眾接受企業家式自力更生觀，藉此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美國對港援助以自由市場發展之態示人，這模糊了後世觀察者對香港與美帝國擴張關係的理解。例如在一九六三年，華盛頓向香港捐贈了七十六萬零三百二十港元，以助興建九龍仔公園遊樂場與青年中心。在一九六七年工程之中，曾有官員建議，公園之命名，應當

提醒後世，公園與美國民眾之密切關係。¹⁴¹但於當年夏季，數以千計青年騷動，反對英美帝國主義，此一建議便被擱置。官員淡化港美關係，美國領事館也僅僅為此送贈一塊小牌匾。

受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校與訓練中心，既有助香港發展，亦為美國在香港基層間累積了社會資本。第一，不論質素如何，這些機構都為基層提供了基本的社會服務。香港縱然有別於很多後殖社會，沒有遭遇能夠撕裂社會的種族與宗教因素，但當時香港的人口密度與貧窮狀況，確實是社會的計時炸彈。其時港英政府官員深明這些機構對穩定香港社會之價值，我們的分析亦需如此。第二，這些學校與訓練中心引導一般民眾接受美國生活方式、教育模式、移民機會（形同精英的跨商策略），為香港的非正式解殖埋下種子。透過這些機構，一般民眾得到足以改變他們一生的機會——他們或得到職業訓練，或得到升讀美國高等學院的機會。簡而言之，這些機構為香港民眾提供了一扇窗，使之能夠接觸受美國資助的跨太平洋各種機會與網絡。受美國支持的學校與訓練中心改變了香港社會向上流動的策略結構，美國資歷變得具價值與魅力。

親美基督教發展項目的首要目標，其實是透過美式高等學院，培養未來領袖。一九六六年二月，基督教世界救濟會的黃牧師與惠施霖投書於香港教育官員。當時香港中文大學雖已成立（下兩章將會對之分析），但二人留意到，每二十位中學畢業生，只有一位能夠入讀於香港中文大學或香港大學。當時逾一萬名學生申請到海外留學，美國是首選地。¹⁴²他們於是建議政府設立書院，幫助學

生到美國或加拿大與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 (Hong Kong Council of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有聯繫的學校留學。他們希望，這種教育網絡能夠消弭文化衝擊，並鼓勵學生完成北美的文學士課程。¹⁴³這項建議最終沒有被採納，但這也反映了建立跨太平洋教育網絡的野心。傳教士在香港重構失落了中國大陸的教育體系，本章開初所提，Marine Lynx 號盛載傳教士與接受美式教育華人學生，正是這種失落的寫照。我們將會見到，在一九六〇年代中，香港學生已融入於受美國資助的教育體系網絡。這個教育體系將會擴展香港的跨太平洋網絡，令香港加速成為以美國為首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經濟重鎮。

教育青松

【第三章】

Chapter 3

香港教育之花果飄零

——難民學校發展史與美國

金寶順

金豐榮
裕豐
裕豐
裕豐

金克傑

昌興皮革
有限公司

昌興皮革

聯興皮革鞋料

響音車汽
JVC

第三章 香港教育之花果飄零

——難民學校發展史與美國

一九五一年七月，美國大學會（American Universities Club）向港英政府呈交提案，建議政府為華人學生提供高等教育。¹當時這個組織只成立了一年，且其提案細節並不明確。²不過，此一主張引起了港英政府高級官員的注意，因為他們懷疑，這其實是美國與國民政府的主意。美國新聞處的費萊曼（Paul Frillman）曾提出相類建議，而上述組織的成員，皆是美國回流學生，他們與台北以及華盛頓關係密切。³摩爾（Ernest Moy）與國民政府關係匪淺，組織主席王正廷則在一九〇八年畢業於美國耶魯大學。他曾為外交官員，駐守於華盛頓。⁴王正廷是寧波聖公會牧師之子，且也是北美基督教中國學生會的創辦人。回到中國之後，王仍然活躍於社交場合。一九五〇年，

王正廷移居至香港，在此他與同鄉重新聯繫，李祖法是其中一人。李氏家族祖家在寧波附近，其家族憑上海房地產與船務致富。李祖法先就讀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其後在美國耶魯大學畢業。此後他成為出色的保險公司行政人員，並與影星唐瑛聯婚。⁵在美國政府支持下，摩爾、王正廷、李祖法共同成立美國大學會，其宗旨是為美國院校招攬學生。不過，港英政府官員懷疑，這其實是美國文化外交之操作。這種懷疑後來被證明是正確的。

有另一原因令港英政府官員憂煩。事實上，在當時，於香港以中文（即本土母語）進行高等學院課程，是前所未見之事。一九二六年，官立漢文中學（後易名為金文泰中學）成立，但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香港大學仍為是否以中文授課而辯論不止。偏見與資金問題，令辯論持續。⁶戰後，香港大學以英語學府定位重新營運，原因是大學成立的原意，是成為宏揚英國人優越感與影響力的場域。遲至一九四八年，香港大學只聘用了三位華裔教授。⁷亦因此，美國大學會主張成立以中文授課的高等學院，以引入競爭。八月二日，港督葛量洪與輔政司、教育司司長，以及聖公會會督商議此一提案。當時教育司司長按葛量洪指示，向美國新聞處費萊曼表示，在任何情況下，港府都難以給他非官守身份，讓他代表美國大學會發言。葛量洪亦指示，美國大學會需被告知，港英政府正在考慮其他計畫選項。事實並非如此，不過，葛量洪確實決意另訂其他方案。會議的結論，是主教何明華被委託撰寫實在且詳盡的計畫，以籌備以中文授課的高等學院課程。⁸

在美國留學的華人精英，與港英政府官員之交匯，乃至冷戰議程，形塑了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香港高等教育之發展路徑。在前一章，我們見到，於基督教學校與職業訓練中心急速發展之背後，有相近似的推力。不過，高等教育之性質頗為不一樣，原因是港英政府官員願意接受美國援助，但頗為抗拒美國影響力之擴張。港英政府官員認為，以英語主導高等教育，是大英帝國令人自豪的遺產。在解殖浪潮之中，這也是團結英聯邦的凝聚力重要來源。但亦因為此，能受惠於高等教育的，只限於英語能力高的華人精英。當時香港正面對難民潮，心繫美國的精英與資金充裕的美國組織到來香港，令形勢有變。結果在新的華文書院、其美國支持者，以及港英政府三方之間，爭論持續不斷。

對於戰後香港高等教育的發展軌跡，華人與英美互動對此有何影響，學者仍未有共識。此前曾有學者認為，過程不涉及政治，屬自然發展。⁹事實上，在冷戰時期，全球心戰正盛，香港教育發展同樣受此影響。李祖法等移居香港的華人精英得到美國組織的財政支持。他們與這些組織關係密切，以紐約為基地的嶺南大學信託人、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哈佛燕京學社、雅禮協會（Yale-China Association）等，都是這類組織的例子。¹⁰這類組織在新中國的項目被腰斬，便轉而尋求新的且意識形態相近的合作夥伴。¹¹美國資金因此變得重要，沒有任何一間香港「難民學院」能夠不倚靠美國資金而獨自生存。在一九五〇年代末，崇基學院、聯合書院、新亞書院乃至香港浸

會書院都是因受美國支持而能存活、擴張繼而得到公眾支持的書院。一九五七年，首三間書院共同成立「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Chinese Colleges Joint Council)，並向當局請願，希望能提供正式學位課程 (degree) 而非文憑課程 (diploma)。¹² 一九五九年，港英政府官員開始對應這類訴求壓力，重奪主導權，提議三間書院連結成為香港新的第二所大學，即香港中文大學。當時教育司司長毫不含糊地向港督說，他並不樂見香港第二間大學成立，但也認為，如有第二間高等學院提供學位課程，此屬務實之法。¹³ 香港浸會書院被排除在外，只有這三家書院得到資助，原因是港英政府官員希望將這三間親美書院變成英聯邦大學。我們會在第四章看到，在跨商、首任校長李卓敏的領導之下，香港中文大學有了自己的發展意志。

香港在一九七〇年代的經濟起飛，其實是得力於雙語高等教育的急速發展。第六章會論述這一點。在一九五〇年代，英屬香港的中產階級仍未具規模，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比率仍然不高。至一九六七年，只有百分之十三青年人口能夠完成中學教育。¹⁴ 但在一九七〇年代初，香港經濟發展急速，香港成為美國留學生最大來源地。這兩個不太貫連的社會發展形勢，反映香港高等教育的兩個特點——一方面，香港高等教育的擴展屬副產品，另一方面，香港高等教育也成為了精英興立跨太平洋知識與社會資本網絡的工具。這一章會檢視故事的上半部份，即難民學院如何與美國建立合作關係。崇基、新亞、聯合、浸會與美國開展合作的年份，分別為一九五一、一九五三與一九五六

年。這一章會聚焦於崇基學院與浸會書院，並分析華人基督徒精英如何向美國靠攏，與美國冷戰項目合作。這兩所學校都由資本家領導，他們奉行跨商策略，以得到美國資源，滿足個人與學院需要。歐偉國是崇基學院董事會首任主席，林子豐則為浸會書院首任校長。在一九四九年之前，二人皆是著名銀行家與工業家。不過與親美的江南華人精英有別，歐偉國是廣東人，林子豐則為潮州人，他們都不曾在美國留學。在一九五〇年代，形勢不斷轉變，二人開始爭取美國支持，以發展兩間書院，且也同時開拓跨太平洋網絡，為自己與家人謀求利益。亦因此，新的香港本土角色開始與江南南來精英一樣，利用精英之社會資本，迎合戰後美國主導的國際新秩序，為出路作準備。在此脈絡下，歐林二人對英殖權力結構限制跨商策略表達意見。他們成功推動書院之發展，亦令家族財富有所增長，但與此同時，他們自己乃至其機構亦需付出代價。

3.1. 崇基學院之成立與發展史

受委託之後三週，何明華主教向港督葛量洪呈交報告。一九五一年八月，他向行政局申請，希望設立崇基夜校，校名故名思義，意指「崇拜基督」。¹⁵此前外國與華人基督徒為此校作規劃，何明華主教利用這個項目，以滿足港督葛量洪的指示。行政局批准了何明華主教的申請，為期一年，

以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加諸於宗教自由之壓制。¹⁶ 行政局也留意到，東南亞與香港都欠缺以華文授課的高等教育。當時香港大學僅僅提供英語課程，故此當局開始擔心，區內青年只會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學院留學，這會方便廣東教育者向他們灌輸意識形態。¹⁷ 成立崇基，事實上是便捷的對應方法。申請獲批之後，何明華主教租借聖公會的教堂與學校等額外物業，並為學院捐贈首批書籍。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崇基開幕，當時共有六十三名學生入讀。至一九五二年年底，學生人數已增至二百三十二名。¹⁸

何明華主教畢業於英國牛津大學，他是崇基的贊助者，但學院的領導層成員多數親美，學校也依賴美國資金。（圖3.1）崇基董事會成員包括英國與華人聖公會成員，來自中國大陸的新教教徒，以及英美傳教士。¹⁹ 大部份教職員都來自廣州嶺南大學，這是得到美國支持的基督教學府。崇基自視為中國十三間基督教高等學府の後遺。²⁰ 崇基的首任校長是廣州嶺南大學最後一位校長李應林。他曾以基督教青年會獎學金在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就讀，其後為中國的基督教青年會工作。在一九三七年成為廣州嶺南大學校長之前，他已晉升成為祕書長。戰後，李應林曾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廣州辦公室的副主任。第一章曾提過，這是具影響力的職位。²¹ 一九四九年，他先到澳門，然後於基督教青年會工作，並開辦書店。至一九五一年，他移居至香港，加入崇基。他是自由亞洲委員會（Committee for a Free Asia）的早期成員，這個組織受美國中情局支持。其當時的工作，

Founders of the College



Bishop R. O. Hall, the late Dr. Y. L. Lee,
Mr. David W. K. Au.

圖 3.1：「學院創辦者們」，*Chung Chi College, Special Bulletin* (March 1955), 1, in PSRA, Box 2, Folder 21, YUDSL。由耶魯大學神學院圖書館館藏部提供。

是編寫教科書。他也是孟子基金會（Mencius Foundation）的首任主席，這個組織成立於一九五二年。²² 李應林在美國擁有深厚人脈，他運用此一人脈，從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為崇基籌集了二十萬美元。²³ 相較之下，英國組織中國基督教大學協會（China Christian Universities Association）只捐贈了七百五十英鎊。²⁴ 崇基最為出眾的領袖，是董事會首任主席歐偉國。他是李祖法與何明華主教的朋友，為著名銀行家，曾出任聖約翰大學董事會主席，他因而與美國傳教士與江南移民精英有交情。

不過，歐偉國與港英政府官員皆曾抱怨，崇基的領導層並不團結。²⁵ 紛爭源於宗派分歧、國籍隔閡、性格不合，乃至對學院使命的不同理解。港英政府官員視香港為細小與依賴外力的地域，此地正面對人道危機。他們與主教都希望，崇基能在既有教育體系之中，成為能夠頒發文憑的學校。他們也希望，其課程與考試方式能與英國而非美國體系接軌，其畢業生為投身成為教師。²⁶ 崇基團隊裡的美國與華人成員則對學院乃至香港發展有不一樣的理解。他們認為，香港並非只是一個細小殖民地，這個地方也是保留中國傳統、企業家與基督教精神的最後堡壘。他們希望，學院並非只是職業訓練所，只培訓文員與教師，他們也希望孕育基督教領袖，令中國有不一樣的未來。為此，他們希望建立自立於香港大學、能提供學位課程的新高等學院。從一開始，李應林便投書於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與嶺南大學信託人，述說規避既有殖民地措施，解決學位頒發問題之需要。²⁷

這種對未來發展的不同願景，引發了港英政府官員與「難民學院」之間持續不斷的矛盾。官員與香港大學領袖的種族意識，令他們難以明白，崇基提供以中文授課的學位課程之野心，反映的其實是基層的願望。學院成立後，港督葛量洪成立委員會，研究高等教育以中文授課的問題。²⁸委員會由凱瑟克（Sir John Keswick）出任主席，他也是怡和集團主席。委員會花了一年時間撰寫報告。不過，凱瑟克發現，答案顯而易見。一九五二年四月，他向港督葛量洪寫信，指委員會強烈建議高等教育以中文授課有其必要，應當在同年九月推行。當時距離委員會發表報告只差數月。²⁹葛量洪對此重視，並支持香港大學成立以中文授課的學位課程。³⁰不過，當時香港大學的教職員與行政人員反應不積極，資金問題是其重要原因。³¹一九五三年一月，香港大學校長賴廉士（Lindsey Ride）建議，只收三十名使用本土語言的學生，然後透過一間特別學校，操練他們的英語。³²二月，教育司司長高詩雅（Douglas Crozier）被激怒，他寫道，香港大學執行的計畫，已偏離凱瑟克委員會的建議原意。³³凱瑟克也特別措辭強硬地提醒官員，很多香港華人都熱烈盼望，希望以華文學習，忽視這種合理訴求，強調以英文教育華人是錯誤行為。³⁴不過在一九五三年三月，香港大學建議，只收三十至六十名以華文學習的學生。賴廉士認為，崇基加上港大課程已足夠應付學生以華文學習的需要。³⁵難民學院不以為然，認為這種學習機會非常不足，原因是學生申請不斷。亦因此，學院要求政府賦予其提供學位課程的權力。至一九五七年，香港大學教育系教授白時令（Kenneth

Priestley) 仍指，推行以華文授課的學位課程仍不可行，原因是教科書配套不足。³⁶

結果，崇基的發展建基於其領袖利用個人美國人脈籌募經費的能力。需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美國組織無意成為崇基的主要支持者，原因是從這些組織角度看，香港很快便會被中華人民共和國進侵。³⁷ 李應林利用人脈，成功令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開出第一張支援崇基的支票。但李應林與歐偉國並沒有因而鬆懈，他們持續爭取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的支持，他們甚至會利用罪疚感來進行遊說。³⁸ 美國人亦經常希望英國人能夠分擔壓力。一九五四年，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的行政秘書費恩 (William Fenn) 寫道，指他們並不願意令崇基變成純美國機構——「我們希望英國人能分擔四分之一成本，並且肩負學院當下開支，這也許是期望過高。」³⁹ 至一九五九年，崇基四成營運基金，仍然來自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與嶺南信託人。⁴⁰ 崇基的建築費用開支，也源自美國。一九五九年，崇基從海外得到三百一十四萬港元，當中二百七十二點五萬（百分之八十六點八）源自美國資金，四十一萬八千（百分之十三）來自加拿大與英國支持者。⁴¹

在戰後，得到美國支持並非理所當然的事，所以成事，其實有賴崇基領袖利用其美國社會資本。麥卡錫時代的美國政治氛圍，令往「紅色中國」門戶的捐獻變得敏感。一九五三年五月，嶺南信託人之一黃念美 (Olin Wannamaker) 寫信給費恩，為崇基董事會疑似被共產黨人滲透感到憂慮。費恩的回應，頗能反映美國社會資本如何有助香港建立跨太平洋網絡。費恩回答說，他並不認識當中

每一個人，但也不認為，崇基董事會存有這種暗湧，原因是這些華人領袖都是聖公會教區委員，以及基督教學校校長，他並不懷疑他們的忠誠度，甚至認為，他們是香港社會之中值得尊敬與信賴的一群。換言之，即使費恩不認識他們每一個人，但仍願意以個人信譽，為他們的名聲說項。他總結說，即便在台灣，董事會裡約六至七位華人成員都會被接納，主席歐偉國更非例外。⁴²

歐偉國是值得研究的案例。這個案例反映，跨商策略之應用，再也不只限於江南移民圈，且也與舊有跨商網絡建立乃至與外力協力的策略揉合。歐偉國在一八八九年生於澳洲悉尼，其父是當地先施百貨經理歐彬。歐偉國後來到香港，在聖公會學校接受早期教育，然後到上海，在一九一八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⁴³其後他在上海先施百貨工作，並在一九二一年與雷玉蓉結婚，雷玉蓉是聖瑪利亞女中 (St. Mary's Hall) 畢業生。⁴⁴先施派遣歐偉國與雷玉蓉到倫敦工作四年，以管理英國業務。一九二五年，他們回到上海。四年之後，歐偉國加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成為陳光甫的助理經理。(另見第一章) 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歐偉國獲選成為聖約翰大學董事會主席，以填補劉鴻生的空缺。在十二年內，歐偉國從畢業生躍升成為高層。從一九三四年起，他曾短暫管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一九三六年十一月，時任中國財政部長曾挖角，邀請歐偉國處理重開廣東銀行之事務。⁴⁵陳光甫後來曾言，有兩件事令他失望，歐偉國不預留時間交接，便因追求高薪而離職，是其中之一。⁴⁶一九三九年，上海與廣州都被日本佔據，歐偉國回到香港，成為太古洋行 (Butterfield & Swire) 的

遠東副經理。他是聖約翰座堂的活躍份子，亦是何明華主教的朋友。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時，歐偉國在三大洲居住，亦因此，他建立了橫跨本土與海外華人資本家、高級國民政府官員、在華美國基督教組織、聖公會、香港龍頭英資企業的網絡。這顯示了適應力高、移動力強的貿易者應對危機之法。戰後，歐偉國成為中國共濟總會主席，為香港廣東精英提供了入會機會。⁴⁷ 利銘澤 (Richard Lee Ming-chak) 是利舜英之兄 (另見第一章)，他是熱心的共濟會成員，對教育發展亦感興趣，本身是凱瑟克委員會成員。⁴⁸

解殖與新中國成立，令形勢有變。此時歐偉國選擇親美，參與一連串美國支持的香港發展項目，這對其事業發展大有幫助。從上海到香港之後，歐偉國重新獲選成為於香港註冊的聖約翰大學舊生會主席。一九五三年，歐偉國亦成為十三間前基督教學府聯合舊生會主席。⁴⁹ 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聽到這個聯合舊生會成立的消息之後，立刻主動提供協助。歐偉國當時回應指，共有三百八十五人出席首次聚餐，組織正處理棘手政治問題，亦在協助舊生於香港尋找工作。⁵⁰ 歐偉國進行的，其實是典型的移民生活策略——他利用教育網絡（而非原生地關係），幫助背景相似的人於香港落腳。對美國政府而言，這種網絡令歐偉國變得具有身價。一九五二年，歐偉國被選為「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主席。徐元音與彼德臣 (Glen Peterson) 等學者已然分析指，這個私人組織的目標，是招攬具價值的難民學者，並安置他們於台灣或美國。⁵¹ 與美國大學會一樣，這個組織也

是由摩爾創立，積極反共的國會議員祖德（Walter Judd）是贊助人。「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的資金來自美國國務院與中情局，故此組織會按美國政府議程行事。值得注意的是，歐偉國同時成為這個組織、崇基、上述舊生會領袖。在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他直接受僱於美國政府。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也一九五一年向歐偉國提供二千美元貸款，助其應付女兒在美國留學的開支，原因是當時歐偉國的資產被凍結於上海。⁵²歐偉國案例顯示，在後一九四九年的香港，移民精英可利用既有網絡建立新的美國資本，從中取利。事實上，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也依賴歐偉國的網絡。

與此同時，歐偉國是聖公會人與太古行政人員，在親美之時，他也有親英的形象。這對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而言頗有用處。費恩與黃念美溝通之時，便曾以歐偉國反共為例。他說，歐偉國已在太古洋行工作多年，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已深入其心。⁵³但在私下，歐偉國承認他的信念並非如表面般堅固，他認為自己是聖公會人，但聖公會傳統之於他，並不完全深厚，他對其他世界觀仍感好奇。⁵⁴歐偉國在英美之間穿梭，這有助崇基的發展。卜其吉牧師（Rev. James Pott）被任命，是好例子。一九五三年十月，歐偉國向費恩報告，指美國聖公會已決定在卜其吉完成東京軍役之後，調派他到香港。歐偉國希望卜其吉能成副校長，以減輕病重的李應林之公務。⁵⁵費恩對此提議興趣不大，歐偉國便解釋他的真正用意，指卜其吉的取勝之處，並不在於其專業履歷，考慮任命他為教師或行政人員，並非按此思量。卜其吉的賣點，是他的身份為聖公會人，時任教育司司長高詩雅是

聖約翰座堂祭室長。聖公會在香港影響力巨大，但英國神職人員不足，美國聖公會人易受重用。歐偉國特別強調，他有此說，並非因為他自己是聖公會人，或肯定這種狀況，不過，事實歸事實。⁵⁶

歐偉國看重卜其吉的社會資本，以及他容易取信於英人的背景與網絡。卜其吉最終被選為副校長，歐偉國也安插其他傳教士在不同位置，晏務理（Maurice Anderson）與惠施霖等人便是例子（另見第二章）⁵⁷。在歐偉國眼中，有些人純為免費員工，有些則因擁有雙語能力而有特別技能。在一九五〇年代，芮陶菴（Andrew Roy）一直執行副校長之職，並不時成為署理校長。其兒子芮效儉（J. Stapleton Roy）後來成為美國駐新加坡、中國、印尼大使。

歐偉國也有利用其英美人脈，為崇基尋得永久校址，以及取得資源興建校園。費恩與歐偉國經常討論學院的需要與預算，以及各種任命的可取性與潛在政治影響。⁵⁸這些討論都建基於二人的共同基督信仰與辦學使命。一九五三年十一月，歐偉國在信中提到卜其吉，他亦建議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作為擔保人，為崇基向港英政府申請一百萬元港幣貸款，以建立新的永久校園。⁵⁹費恩反對此提議，並認為聯合董事會幾乎可以肯定會否決提議，因為此擔負一長期重責，有違聯合董事會政策。⁶⁰這種考量，源於聯合董事會在港仍未有正式法律地位，且香港可否長遠穩定，亦令聯合董事會懷疑。歐偉國能夠預料這種回應，但仍然堅持主張。至十二月十一日，他回覆指，他仍然期待他的主張能夠成事，並表示，崇基已在申請貸款、新界土地補助、火車站之興建。⁶¹

港英政府官員、聯合總中會、歐偉國都明白，崇基並無足夠錢財購置圖書館館藏。歐偉國對官員說，崇基的支持者（主要是美國人）會清還貸款。⁶²不過，費恩對此拒絕。歐偉國仍然認為，聯合總中會與彌南信託人曾支持崇基，他們會一直如此，直到香港被捲入戰事之中。⁶³歐偉國希望取得美國人信任，乃至取得他們的資源。與此同時，歐偉國也有與港英政府官員打交道。他向教育局高詩雅去信，指學校曾以英國方式重寫課程綱要，並培養學生成為教師與社會工作者，這很符合港英政府官員之慮。在審批貸款之時，高詩雅特別重提歐偉國的這些承諾。⁶⁴在回信中，高詩雅也提到他對崇基之善意，並表示他一直支持與同情崇基。⁶⁵作為高官，這是非常友善之態。這種對歐偉國的信任，令港英政府批核貸款變成雙贏之事。如果批出貸款，這會有助英人收編力量，未來的港英政府官員更易將之融入於英聯邦體系。如果美國支援在期間中斷，崇基甚至可被直接收編，額外成本不高，支出可被接受。有官員指，相較崇基的發展潛力，對政府援助的要求並不算多。⁶⁶在上述兩種情況之中，批出貸款都有助重塑這所親美的年輕學府。

收到申請之後，港督葛量洪成立專責委員會（Ad Hoc Committee），由香港大學教授白時令領導。他曾指，以中文授課的學位課程難以想像。歐偉國加入此一委員會，並寫信向政府保證，他們會配合政府。⁶⁷翌日，他也向費恩寫信，直白分析委員會內的狀況。他認為，高詩雅已盡其職位能力，支持申請，何明華主教與他都同意，其他成員也願意合作，且同情崇基。不過，貸款申請仍有

一大障礙，那就是貸款獲批的代價，會是崇基的自主與自由。得到公帑資助之後，政府會加強監管崇基運作，崇基的傳教自由便會受限。歐偉國提及此事時，語調輕鬆，但他知道，聯合董事會並不樂見此事，這有違崇基的成立願景。歐偉國向費恩保證，只要他仍然是委員會成員，便能定時匯報委員會觀點，如果察覺有不合適代價、有違崇基宗旨，便會以行動捍衛。⁶⁸歐偉國利用了連橫策略。面對港英政府官員，他展現順從一面。面對美國人，他坦誠交代，並訴諸於共同理想。他不斷移居適應的經歷，令他能夠在各權力體系之間遊走。他理解各派需要，並引導他們以結果為本思考。⁶⁹孫子或會稱這種以結果為本的思考方式為「勢」。

貸款申請令費恩擔憂，但他並不清楚歐偉國的真正企圖。費恩立刻回覆指，申請令他感到困擾，原因是要清還貸款，似乎需要聯合董事會的額外資金。事實也是如此。在未得到紐約同意的情況下，歐偉國向各方作出承諾。不過，費恩仍然選擇信任歐偉國。他在信中說，聯合董事會仍會被涉及其中——雖然聯合董事會的參與方式會有違以往慣常方式，與歐偉國的預期或有落差。歐偉國與李應林的美國人脈，令聯合董事會成崇基主要但只具虛名的主要支持者，聯合董事會對崇基的控制不多。費恩在信中明言，他不會質疑歐偉國的行動，但事實上，他有此暗示。⁷⁰兩個月之後，他思考兩個組織之關係，並給歐偉明寫信。他認為，兩個組織之關係已變得難以言喻。一方面，聯合董事會儘量避免對崇基作出長期承諾，另一方面，令崇基繼續生存下去，似乎已成聯合董事會的道

德責任。但在信中，費恩只是沉思，而沒有定論。⁷¹這是美帝國擴張與歐偉國應用跨商策略同時發生的結果。

一九五四年三月，專責委員會發表首份報告，報告要求，學院需採用英國學術模式運作，以得到貸款。報告認為，學院的成立目標過於矯飾，並惋惜其揉合美國與中國特色的課程綱要，以及學院與英國大學招生水平之間的落差。報告訓示，學院的課程設定需具更高質素，以符合英屬香港高等學院的水準要求，並指，香港高等教育之需求，與美國乃至中國大陸的情況有別。⁷²從報告角度看，美國體系並不合乎邏輯，且也有違常態。但報告內容正正合乎歐偉國之需要。他曾向港英政府官員提過，聯合董事會擁有所有崇基所需資金。要確保聯合董事會願意將資源投放於崇基，他需要英人之報告，以製造危機感。他向費恩寄出報告，這份報告不經意間令身處倫敦的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Association, ACCA）主席大感氣惱。⁷³費恩讀後反應極大。歐偉國回覆說，他們只是在聯合董事會看似無法支援之時，向政府申請貸款，並指，申請能夠試探政府對崇基的看法。他希望紐約方會抗衡港英政府觀點。歐偉國認為，報告有提供具價值的意見。他也有以點列方式批評報告的一些內容。他抱怨，貸款申請獲批，不代表崇基會得到土地補助。⁷⁴

貸款申請是一場回報可觀的賭博。費恩隨即以震撼消息回應，這個消息，是聯合董事會會全數資助崇基建立新校園。這裡所指的資助，並非意指貸款。如果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也分擔三分之一

開支，聯合董事會便會分三年提供二十萬美元資助。信託人一致同意，崇基之發展，不應建基於港英政府之貸款，因為崇基會漸受政府控制，其自主權會受削弱。專責委員會的報告反映，紐約不能接受港英政府增強對崇基之控制。費恩承認，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能力有限，聯合董事會提供資助，是建基於這一點。⁷⁵事實上，亞洲基督教大學協會曾向港英政府官員表示，在崇基組織與課程符合港英政府要求之前，他們無意向崇基提供大額財政資助。⁷⁶最終，聯合董事會願意全數資助崇基。

歐偉國運用跨商策略，策動英美影響力之戰，以左右崇基所倚重的方向。他的英美社會資本，令他得以搖動香港的殖民管治，令崇基得以換取免費校園、港英政府提供的校園鐵路站、美國夥伴提供的校園建築。在三年之內，崇基從臨時搭建的校園，變成永久學府，這在任何脈絡之中，都是了不起的成就。歐偉國能夠成功，並非因為他大膽或說謊，而是歸因於精英網絡、知識、策略。不論是港英政府官員還是聯合董事會，他們都不樂見此一結果。歐偉國需要理解兩邊的優次，調校其說詞，分而治之，以維持兩方對他的信任，以及隱藏其議程。港英政府官員可以拒絕貸款申請，或將資金投放於其他書院。如果歐偉國的預測錯誤，聯合董事會最終不挺身而出，那麼崇基便會受制於政府貸款，會被世俗化與聖公會化。在一眾持份者之中，歐偉國的網絡與知識最為廣闊。

事件刺激了港英政府官員，歐偉國在崇基之內所得的支持也隨即消散。事後，歐偉國撤回貸款申請，但官員仍然堅持，要按專責委員會報告建議，委派兩名代表至崇基董事會。⁷⁷何明華主教反

對，但官員們認為崇基需按英國教育標準發展。⁷⁸不過官員也曾辯論崇基不接受政府貸款之時，政府可以如何加強監管。其中一位官員分析指，當崇基畢業生尋求教職或政府職務時，政府便能加以控制崇基。⁷⁹其他大部份官員認為，這種控制過於間接。他們堅持成為新校園的信託人，因為可以肯定，崇基董事會會從美國得到所有資金。土地是政府唯一可以控制崇基的工具。⁸⁰在此背景下，一九五四年八月，垂死的李應林辭任校長之職，歐偉國在繼任人風波之中出任為署理校長。⁸¹歐偉國告訴費恩，在過去兩三年，他出任董事會主席之職，極為艱難，因為要平衡董事會內勢力非常不易。⁸²不過，其他人有不同回憶。根據惠施霖之說，歐偉國成為署任校長之後，其世俗風格與婚外情令其他基督徒成員很不舒服。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祕書據說曾遊說惠施霖，希望他能介入，阻止歐偉國成為第二任校長。⁸³在一九五五年一月，惠施霖推薦凌道揚博士成為第二任院長。凌道揚是客家基督徒，亦是林護專家，他從耶魯大學取得博士學位，曾與李應林共同效力於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⁸⁴一九五五年二月，凌道揚正式當選成為崇基第二任院長。歐偉國隨即辭任，並在一九五九年三月去世。聯合董事會後來察覺，歐偉國並未清還貸款，他的三個兒女，其中兩個已移居至美國。⁸⁵

此後，美國社會資本一直影響崇基的發展。凌道揚任命芮陶菴為副手，並定期到美國，因為他的兒子在美國攻讀電子工程。⁸⁶我們曾在第二章提過，崇基的教員多在美國接受教育，他們也開始

積極保送學生到美國深造。一九六一年的調查顯示，百分之三十一點八崇基畢業生成為本土教師，另外百分之二十九到海外留學，美國是首選地。⁸⁷一九六〇年，何明華主教令凌道揚無法續約，凌道揚繼而接任為聯合書院第二任院長，之後到加州退休。⁸⁸容啟東是崇基第三任校長，他也是跨太平洋網絡的產物。其父是一八七〇年代容閎晚清幼童留美計畫（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 CEM）的畢業生（見第一章）。容啟東在一九三七年於芝加哥大學取得植物學博士學位，並於戰時在美國大學任教。⁸⁹我們會在下一章見到，隨後容啟東如何創辦東亞乃至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MBA）。

3.2. 新亞書院之成立與發展史

港英官員希望將崇基融入於英聯邦體系，就在此時，第二間同樣受美國支持的學院正在成形。周愛靈（Grace Ai-ling Chou）對新亞書院的研究非常出色，故此在此僅需簡述其歷史。一九四九年十月，新中國剛成立，新亞書院以高中定位開始營運。新亞的創辦人並非基督徒，他們都是新儒家學者，矢志保存中國傳統文化，他們相信，中國傳統文化將會消失於中國大陸，被中國人民摧毀。對他們而言，中共之勝利，意味敵視中國傳統文化的力量接管國家，共產主義與中國文化的核心價

值相對立。他們想保存的，是中國文學以及儒家哲學。歷史學家錢穆與哲學家唐君毅都是新儒家人文學者，他們認為，宋後的儒家思想仍然合時，與此同時，他們也有引介「西方思想」。新亞以其人文學與通識教育著稱。不過，新亞的領袖對香港評價不高，他們視香港為知識與文化廢土。他們不鼓勵學生學習廣東話，除英文課之外，所有新亞課程皆以中國國語進行。⁹⁰

新亞有其文化自傲感，思想敏銳，最終亦能生存。直到一九五〇年九月，新亞才得到政府註冊地位，並在一九五三年七月取得非牟利機構地位。⁹¹相較之下，在一九五一年年底，崇基的註冊引起熱議。但在崇基的內部討論之中，無人提及新亞案例。崇基同時取得聖公會與美國支持，故此能夠快速發展。美國支持，以及改善中的香港殖民地狀況，也為新亞提供了成長土壤。雅禮協會代表蕭約 (Barclay Preston Schoyer) 曾言，在一九五三年，新亞只是一所簡陋的細小書院，仍在內有六位老師，與一百名學生。⁹²不過，新亞書院的知識氛圍、反共意識、非牟利地位，都成為雅禮協會支持新亞書院的原因。⁹³

新亞創辦人並無運用跨商策略，亦無實質的英美人脈，故此，雅禮協會為新亞書院提供了所需資金與網絡。一九五一年五月，雅禮協會代表被逐出中國大陸，耶魯大學歷史教授盧鼎 (Harry Rudin) 在同年六月被雅禮協會派到香港，以查探香港潛在合作夥伴。⁹⁴李祖法是他的耶魯舊同學，當時他在港居住，亦曾成立美國大學會。⁹⁵盧鼎亦聯絡蕭約，當時他在港擔任記者，他引介盧鼎

認識新亞。⁹⁶ 錢穆令盧鼎留下深刻印象，他回憶說，錢穆相當在意雅禮協會的宗教背景，以及其潛在基督教規條。盧鼎曾探視崇基，但他認為，崇基已得到足夠資金，且也有太多世俗內訌。⁹⁷ 盧鼎也有接觸港英政府官員，以確保新亞書院的發展合乎港英政府期望。⁹⁸ 他與教育司司長高詩雅會面，促膝長談，並成功取得政府對新亞書院的認可。⁹⁹ 在旅程完結之時，盧鼎建議雅禮協會每年撥款二萬五千元，為期五年，同時亦向福特基金會（Ford Foundation）爭取二十萬美元資金。雅禮協會隨即鼓勵其捐獻者爭取亞洲基金會（Asia 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哈佛燕京學社的支持。周愛靈特別提到，若無這些資金，新亞不可能繼續營運下去。¹⁰⁰ 雅禮協會亦開始與港英官員打交道，其代表扮演難民學者與高深莫測官員之間的溝通橋樑。¹⁰¹ 是以在一九五六年，雅禮協會獲港英政府批贈土地，作為新亞的永久校園。雅禮協會繼而承擔新亞校園的所有建築費用。¹⁰²

對新亞發展而言，美國社會資本極為關鍵，情況與崇基同出一轍。與聯合董事會以及嶺南信託人之於崇基一樣，雅禮協會為新亞提供資金，供其建築、器材、獎學金、薪資之開支，且也替新亞建立網絡。¹⁰³ 在美國支援之下，兩間學校都沿用美國教育模式，亦為學生打開進入跨太平洋網絡方便之門。至一九五九年，二十五名新亞畢業生選擇深造，當中十二人選擇在新亞的研究所升學，另外十人往美國留學，同時無人到英國。¹⁰⁴

新亞情況有別於崇基的一點，是在新亞取得美國支援之時，當中並無跨商參與其中。一九五九年，新亞的董事會共有九名成員，當中包括五位華人學者、兩位雅禮協會代表、一位英國學者以及一位華商。該華商為承包商，他曾就讀於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¹⁰⁵一年之後，新亞得到港英政府資助，條件是董事會人數需增至十七人。此時不少商人也有加入，當中包括劉漢棟，他畢業於麻省理工學院，是東南紡織公司經理。¹⁰⁶不過，新儒家學者仍能保有書院控制權。這所書院之營運，仍具哲學風格。一九五九年，雖受政府禁止，但書院仍然掛起中華民國國旗，結果引起風波。¹⁰⁷崇基在歐偉國務實的領導之下，這種事情難以想像。得到美國支援之後，進入跨太平洋網絡或取得個人利益皆非新亞領袖的目標所在。這有助我們理解跨商李卓敏的影響，在下一章，我們會探討這一點。

3.3. 浸會書院之成立與發展史

至一九五六年，香港共有九所「難民學校」，當中有另外兩間同樣得到美國支援，這分別為聯合書院，以及香港浸會書院。在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之前，聯合書院的發展度最低，於此可略為解說。曾有學者分析，聯合書院能夠成立，主要得力於亞洲基金會的支持。亞洲基金會的前身，是由亞洲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在一九五二年成立了孟子基金會，其目標是進行文化外交活動，李應

林是其主席。¹⁰⁸透過孟子基金會，亞洲基金會開始資助八間學院，當中包括崇基與新亞。不過，至一九五六年，哥倫比亞大學校長與亞洲基金會主管柯克（Grayson L. Kirk）建議，這些書院之發展，應當配合基金會的政治目標。¹⁰⁹廣僑書院、光夏學院、華僑工商學院、文化專科學校、平正會計專科學校、廣大書院等學校同意組成聯合書院，由蔣法賢領導，他是畢業於香港大學的醫生。針對拒絕組成聯合書院的學校，亞洲基金會強迫孟子基金會中斷其資助。不過，蔣法賢被視為港英政府的盟友，與崇基、新亞以及其書院董事會產生磨擦。一九五九年，他被辭任，學生與教員紛紛離開，在凌道揚治下，聯合書院面臨危機。凌道揚在一九六〇年離開崇基，接任成為聯合書院院長。在一九六二年年底，當聯合加入成為香港中文大學一部份時，學生人數只剩一百零七人，其時崇基與新亞學生人數分別為五百三十三與四百三十二人。¹¹⁰

香港浸會書院卻情況不同。這間學院發展快速，其意識形態清晰，其創辦人與首任校長林子豐可敬。與聯合書院一樣，浸會書院的發展，主要建基於美國維吉尼亞州（Virginia）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Southern Baptist Board Foreign Missions, SBBFM）的支援。林子豐擁有深厚美國人脈，與全球浸信會組織也關係良好，從一九五五至一九六五年間，他曾是世界浸信會聯盟（Baptist World Alliance）的副主席。英國人對浸會書院的發展影響甚微，但這也有礙其發展。林子豐過於倚重其跨商策略，浸會強調傳教之必要，亦使之被排拒於香港中文大學之外。浸會案例，反映跨商

策略之成效，仍建基於各派力量之平衡。

林子豐是潮州煤商、銀行家、工業家、虔誠基督徒。在二戰之前，他並無美國人脈。與歐偉國一樣，他在歐洲帝國網絡之中，透過跨商策略發跡。他在廣東東北成長，是家中長子，其父為汕頭牧師。他先在廈門同文書院接受教育，學習英語，然後按其父親要求，在北京協和醫學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繼續學業，這所學院由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但最後，林子豐放棄攻讀醫學，並在一九一六年移居至香港。¹¹¹他先在進口公司任職英文文員，然後創辦四維公司，從法屬印度支那（French Indochina）進口煤，並將之分發到南中國沿岸。¹¹²與劉鴻生（見第一章）一樣，煤一直為林子豐製造財富。直到一九二二年，林子豐協助創立嘉華銀行，銀行在廣州、香港、上海都有業務。

林子豐的商業成就，為他樹立了社會威望。他在同鄉與慈善組織出任不同職位，例如他成為潮州商會領袖。¹¹³作為商會主席，他與國民黨人建立關係，並為潮州利益作遊說活動。在一九三九年三月，他於海邊設晚宴，出席者非同凡響，當中包括前文提及、剛從華盛頓歸來的王正廷，前駐華盛頓大使、紅十字會新任主席、另一美國回流學生顏惠慶，前駐日大使、戰時全國賑災委員會主管許世英。¹¹⁴數月後，報導指，林子豐成功向許世英為潮州難民爭取特別援助。¹¹⁵一九三九年，林子豐當選成為香港基督教青年會主席，這個職務令他更活躍於社交場合，以及招呼到訪香港的貴賓，

例如泰國官員與菲律賓著名華商。¹¹⁶一九四一年，林子豐當選成為香港浸信會聯會主席，這個組織成立於一九三八年，在日據時期招攬難民成為會眾。¹¹⁷香港向日本投降之後，林子豐與家人退守到中立的葡屬澳門，其長子林思顯則被日人囚禁，與斯巴利及利舜英同囚於同一地方（見第一章），此前他入讀菲律賓賓大學。¹¹⁸林子豐在戰前的崛起模式，於香港脈絡之內不算特別。他是廣東人，然後透過跨商貿易網絡發跡，這個網絡橫跨歐洲的東南亞帝國版圖，其後領導基督教與傳統華人組織，並與國民政府官員建立關係。

盟軍勝利之後，林子豐開始經營美國人脈。在一九四七年一月，其長子林思顯與李清泉（Dee Ching Chuan）之女結成夫婦，李清泉是菲律賓富商，被稱為木材大王。李清泉於一九四〇年在加州去世，此前他憑著美屬菲律賓政府的特許權，經營木材生意致富。¹¹⁹林思顯結婚之後，林子豐便送他到貝勒法學院（Baylor Law School）讀書，並成立新公司，以美國為目標市場。¹²⁰他與四個同鄉成立捷和公司，將太平洋戰爭的大量廢鐵送到香港，將之融化，製造電筒、打火機、時鐘等消費品，主要出口至美國市場。¹²¹法屬印度支那的廉價煤油以及戰爭，令市場形勢有變，相較煤業，捷和更能從打撈事業取利。直到一九五四年，因為打撈事業利潤高，捷和公司與美國電筒製造商 Ray-O-Vac 結盟。¹²²在一九五〇年代末，這個聯盟擴展版圖至曼谷。¹²³與此同時，林子豐二子林思齊在一九四七年春於嶺南畢業，之後他入讀美國天普大學（Temple University），修讀工商管理碩

士課程，並在一年內完成學業，進而在紐約大學（New York University, NYU）攻讀經濟學博士。但最後，林思齊中途放棄，並選擇回港，其父因而安排他在嘉華銀行工作。¹²⁴與陳光甫（見第一章）一樣，林思齊應用美國管理與經濟學知識，以改善嘉華銀行營運。¹²⁵

美國體系擴張之時，林子豐亦更為積極投入基督教與社會活動。一九四七年，他成功當選，連任為基督教青年會主席。他隨即邀請美國代表到訪香港，並熱烈招待他們。¹²⁶更不尋常的是，在一九四八年八月，他指示基督教青年會舉辦工商業展覽，並向感到疑惑的媒體表示，從人道服務的廣義角度看，貿易展能夠展示基督教精神。¹²⁷在國內戰之時，他所展現的，其實是他的基督教信仰、反共與國際主義意識。一九四九年，美國傳教士到港，林子豐熱情款待。¹²⁸他為傳教士租屋，並於當時香港寒冬之中，為他們送煤。¹²⁹他去信美國傳教士組織，指香港需要更多傳教士。¹³⁰香港美南浸信會差會（Hong Kong-Macau Baptist Mission）成立之後，移居香港的傳教士開始安排資源到港，與林子豐之下的香港浸信會聯會合作。一九五一年，香港浸信會聯會舉辦神學研討會，培訓香港與東南亞的牧師，與此同時，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與港英政府為香港浸信會聯會提供了一百七十萬美元，以重建培正中學。¹³¹一九五三年年底，培正重開，至一九六五年，林子豐一直出任為培正校長。香港浸信會聯會也有運用資源，在全港開設宗教場所，至一九五八年，共設立了四間教會、十五間小教堂、大量徙置屋與診所。¹³²在一九三八至一九五八年間，浸信會眾人數，從

一千七百七十八人增至一萬一千三百四十八人，至一九六〇年代中，人數更增至一萬五千人。¹³³雖然會眾人數仍然不算多，但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鼓勵香港浸信會聯會設立學校與醫院。¹³⁴

一九五六年九月，香港浸信書院成立，林子豐出任為校長。這間學校之成立，主要得力於林子豐的網絡。開校初期，課堂在培正中學進行，林子豐親自在會眾間為學校聘用教師。他排拒親共者與支持武力的國民黨人。¹³⁵美國傳教士提醒，提防學生組織有其必要。¹³⁶資金主要來自美國，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每年提供二萬五千美元，以供書院之營運，至一九六五年，書院也得到總數達三十七萬五千美元，以作興建與購置器材。¹³⁷書院透過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得以接觸美國富有的浸信會人，捐贈者與書院領袖被安排到港美兩地交流。¹³⁸每年林子豐都到美國。¹³⁹一九六三年，書院在三藩市設立基金會，以方便美國支持者取得稅務優惠。¹⁴⁰在香港，書院副校長與傳教士晏務理曾說，林子豐是德高望重、精力旺盛的募款者。他在英屬香港之中，其人脈遍及官員、教會、商界等。他經常出席晚宴等社交節目，曾在一晚出席三場活動。¹⁴¹他也有利用財富，以展現基督徒的慷慨。其妻陳植亭與他在慶祝結婚五週年之時，亦舉辦感恩禮拜，為千人設宴，並為學院籌得五十五萬元。¹⁴²

學院相當依賴美國傳教士與華人浸信會人的支持。根據晏務理之說法，林子豐將日常決策交由西方夥伴決定。他不曾主持教員會議，與他們接觸也不多。這些會議以英語進行，由副校長

主持。¹⁴³除任副校長之職外，晏務理也是社會學系主任與首任院長。¹⁴⁴黃汝光是董事會主席，他從嶺南畢業，並在雷德蘭茲大學（University of Redlands）與加州理工學院（California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ltech）修讀建築系。¹⁴⁵他亦開始定期到美國，接受榮譽學位、拜訪浸信會捐贈者、在會議發表演說、出席兒子婚禮。¹⁴⁶最終他與妻子在加州定居與退休。¹⁴⁷在黃汝光的領導下，十八個董事會位置，有六個預留給美國傳教士或美國機構。而在一九六〇年代，也有兩成教員與員工是美國公民，他們或則是退休教授，或則是訪問學者。¹⁴⁸浸會比崇基更重視傳教，其學生需要修讀基督教課程，並要求他們每週都需要到教會，出席週日禮拜，以及在教堂或林子豐家中舉行的傳教活動。¹⁴⁹

浸會書院的一大目標，是引領學生進入跨太平洋網絡。林子豐一直為書院網羅各種國際交流與升學機會，但網絡招攬對象主要是美國，因為只有美國院校承認浸會文憑。至一九六〇年代中，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以書院名義，定期舉行交流計畫，連結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與奧克拉荷馬大學（Oklahoma University）的浸信會人。林子豐與美國史丹深大學（Stetson University）以及三藩市州立大學（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亦有類似協定。¹⁵⁰書院的宣傳品特別提到這些跨太平洋機會。晏務理解釋，他們利用美國浸會大學之聯繫，以招攬年青人，這些年青人或會想到美國留學。書院教職員亦需協助成績優異的畢業生到美國留學。¹⁵¹亦因此，浸會畢業生與美國關

係密切。一九六四年書院刊物指，從一九六〇年開始，共有二十七名舊生到海外留學，當中二十人到美國，另外五人到加拿大，餘下二人同時在美加學習。¹⁵²一九六九年的刊物則為十七位畢業生慶祝，他們取得數學與科學博士學位，他們當中，三位從加拿大院校畢業，一位從英國院校畢業，另外十三位從美國院校畢業。¹⁵³在林子豐的領導下，浸會已成跨商學校，學生與教員都被小心篩選，不少畢業生都到太平洋另一端，深造基督神學或與資本主義相關的科目。

林子豐從中得到不少好處。他每年到美國，令他得以進行醫療檢查、接受榮譽學位、受邀講道、在浸會機構發表演說（例如〈在美國之我見〉）。¹⁵⁴美國總統約翰遜（Lyndon Baines Johnson）曾與林子豐出席同一場合，同在貝勒大學發表畢業演說，二人合照被放在林子豐的桌上。¹⁵⁵在到訪美國的過程中，他與美南浸信會領袖見面，討論書院的發展策略，並為書院拉攏更多美國人脈。¹⁵⁶林子豐也送子女到美國留學。在一九四〇年代末，他的兩個兒子都就讀於美國院校。在一九五〇年代，其另外兩個兒子在奧克拉荷馬大學畢業。其女兒與美國華人教授結婚。一九六〇年，林子豐在威克森林大學（Wake Forest University）發表畢業演說，他的兩個兒子都在觀眾席上。¹⁵⁷其後他的三個兒子回到香港，在嘉華、捷和、浸會書院工作。林思顯積極招募美國回流行政人員與投資者到香港，並不時到美國，出席會議，與潛在客戶以及夥伴見面。¹⁵⁸在英屬香港，林子豐也有得到大英帝國勳章（Ord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OBE）之榮譽，但其家族積累財富與發展書院的主要方法，始終是

倚重美國資本。¹⁵⁹ 他的兒女最終離開香港，在美國與加拿大展開新生活。

浸會書院依賴跨商策略發展，不免亦減慢了其發展速度。在一九五八年三月，浸會書院得到土地補助，但此後直到一九七〇年，書院再也得不到其他港英政府資助。¹⁶⁰ 相較崇基，浸會書院在一九五九年申請免息貸款而被拒絕。浸會加入中大的目標亦被拒絕。林子豐曾清楚表明，書院希望在各方面合乎港英政府期望，以被納入新的中文大學。¹⁶¹ 書院亦為此刊登廣告。浸會書院的傳教意識，以及其親美的基督教學校形象，令港英政府官員忌諱——他們不希望是非基督教社會之中再有另一所基督教學校。¹⁶² 一九五九年，浸會向香港中文專上學校協會提出申請，但被拒絕，原因是浸會只成校三年，不過這個理由並不充分，因為聯合書院同樣是成校三年。¹⁶³ 在接下來二十年，浸會書院繼續被冷待，原因是書院與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不肯放棄傳教目標。¹⁶⁴ 在一九七〇年，浸會終於得到政府貸款，於一九七五年則得到另一項政府貸款，利息為百分之四。¹⁶⁵ 一九七一年，林子豐去世，於第二任校長謝志偉的領導下，書院依賴私人籌款，並急速提升學費。謝志偉是美國貝勒大學與匹茲堡大學畢業生。一九八三年，書院與政府達成協議，書院將會得到政府資助，條款與香港中文大學與香港大學相若。一九九四年，浸會連同理工以及城市大學得到大學地位。

3.4. 小結

在一九五〇年代，「難民學校」湧現，當中大部份都得到美國與國際組織的資金或支援。這些組織此前曾活躍於中國大陸。直到一九五九年，港英政府才開始以納稅人的錢資助這些院校。此前書院都需依賴美國支持。崇基、新亞、聯合、浸會都如此存活下來，其存在不但挑戰了港英政府對高等教育的期許，且也迫使港英政府官員同意第二所大學之成立。一九五九年二月，其時新任總督柏立基（Robert Black）曾寫道，指港英政府不能不認可這些書院，不然公眾會騷動。¹⁶⁶

基督信仰與冷戰議程固然是美國組織支持這些院校的誘因，但跨商策略，也是崇基與浸會得到美國支持的重要因素。歐偉國利用他的教育網絡，取得美國注意，他也從中得到個人利益。他利用英美人脈，左右港英政府與聯合董事會對崇基的態度，最終成功為崇基爭取免費校園與美國建築補助。林子豐基於商業與宗教因素，向美國靠攏，在一九五〇年代初，他重構商業網絡，固整社會活動策略，希望爭取美國市場與資源。與此同時，他與在港美國傳教士合作，以擴大香港的浸信會社群。跨商策略對浸會書院發展的影響至為明顯，其師生皆融入於跨太平洋網絡。不過，美南浸信會外方傳教會的支持，既強化了浸會書院的宗教色彩，亦因而削弱了港英政府的支持。

這些院校對英聯邦學術體系構成威脅，亦令香港學生轉而往美國留學，這都觸發了香港的非正

式解殖，港英政府亦為此做了前所未見的決定。在二戰之前，於英帝國之內，能夠提供學位課程的地方不多，這包括香港、馬耳他、耶路撒冷、錫蘭（今斯里蘭卡），和「大英帝國的明珠」——印度。¹⁶⁷這些地方的課程都僅以英語授課。南亞獨立後，高等教育機會增加，是延續英國對解殖與後殖社會影響力的重要策略。不同委員會投放資金到英帝國內的新大學，當中包括加納大學（University of Ghana, 1948）、馬來亞大學（University of Malaya, 1949）、羅得西亞和尼亞薩蘭大學學院（University College of Rhodesia and Nyasaland, 1952）。這些新大學都以英語授課，且在頒發學位時，也需倚重倫敦大學的支援。在一九六〇年代中，英屬蓋亞那（British Guiana）與肯亞等前殖民地仍在籌辦新的獨立大學。¹⁶⁸是以在一九五九年，港英政府官員決定成立第二所提供學位課程的大學，屬非比尋常之事。當時香港並無獨立之計畫，港英政府也在花費公帑修復香港大學於二戰時所受的破壞。至一九五六年，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宣佈，崇基的未來繫於其表現——這視乎崇基能否成為現行高中與大學之間的橋樑，而非另闢新徑，向畢業生頒授奇怪與不受承認的准證。¹⁶⁹三年之後，這種想法卻有變。當時香港中文大學已成英聯邦或英帝國之中第二間不以英語作為唯一授課語言的大學。另一間大學，在法屬魁北克。¹⁷⁰

香港中文大學之成立，意味港英政府著力維持英國在殖民地的影響力，確保院校以英國學術體系營運。向崇基、新亞、聯合投放資源，是為了確保這些院校能以英式發展。港督柏立基曾指，這

些院校充滿美國風格，但他仍然樂觀，認為情況仍有轉機。港英政府為此極為盡力，清楚表明，其目標是要提高院校質素，使之跟隨香港與英聯邦而非台灣與美國模式。¹⁷¹港英政府行事之用力，甚至一度令部份新亞與崇基領袖考慮退出中大。¹⁷²與此同時，柏立基亦表明立場，以回應解殖論述。他說，政府應加快步速，以杜絕院校自決之思想。¹⁷³

一九六二年八月，港英政府對香港高等教育非正式解殖浪潮之撲擊，到了新轉捩點。當時政府任命香港中文大學的首任校長。港督柏立基言明，新校長需為華人，長遠而言，更是如此。這後來卻成為港英政府期望破滅、反撲失效的原因。在整個英聯邦或英帝國之中，從未有華人學者在學府之中出任高層。港英政府官員受困於舊有的階級思維與偏見。柏立基認為，在美國之外，難以找尋合適的華人人選。不過，柏立基亦意識到這種想法的矛盾之處——港英政府認為，院校太受美國影響，但任命美國華人為校長，卻會增加美國對中文大學的影響力，使之偏離英聯邦社群，這有違英國人的期許。¹⁷⁴李卓敏將會在過程中實現其理想。

道教青松仙

【第四章】

Chapter 4

李卓敏、香港中文大學與跨商策略

大發膠皮有限公司

金寶順

榮豐金局
志興棧
裕豐號

昌興皮革

品製

金克傑

革皮興昌

料鞋革皮興聯

中汽重音響

marion

第四章 李卓敏、香港中文大學與跨商策略

「今天的香港，已取得世界無可匹敵的國際地位。」這是李卓敏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之時就職演說中的一句。他繼續說：「香港已成為海外華人家庭團聚之地、企業設置總部與存放資本之地。建於香港的中文大學（中大），在此時此刻，有其特別角色。」¹

在一九六四年，這種論調非比尋常。李卓敏似乎沒有理會香港當時所面對的限制，例如英殖管治、冷戰對壘，以及持續的移民危機。他改而聚焦於受其他人忽視之事，即香港擁有充滿朝氣的國際網絡這一點。在演說草稿之中，他甚至大膽地提出，香港是「海外華人的首都」。²他雖有克制，但他仍矢志令中大成為海外華人社群中的特別之地。李卓敏在演說之中，提到中大是公立機構，由港英政府所立，並指國際社會對中大深感興趣，對其學生與領袖更是如此。李卓敏很喜歡提及「國

際」一詞。在演說之中，他提了十四次。十四年之後，在一九七八年十月退休之時，他仍然對「國際」一詞念茲在茲。³事實上，這很大程度上是指美國，以及其與離散華人之交匯，這繼而成為「國際興趣」之根源，資本、人才、認可隨即經由華盛頓的國家—私人渠道到來香港。⁴「國際」之用詞，既減輕了倫敦的尷尬，亦避免觸怒北京。

李卓敏的理想，不止於營運大學。他既非激烈的反共份子，亦有別於第三章所提的跨商，他並沒有成為狂熱的基督徒。他是一位經濟學家與研究發展的技術官僚。對他而言，香港的國際地位狀況，只是一種經濟現象。作為專研國際貿易與貨幣政策的學者，他曾效力於國民政府與聯合國，助其制訂發展政策。一九四九年之後，他成為柏克萊加州大學商業行政教授，並入籍成為美國公民，這與他緊密配合冷戰美國議程不無關係。他的背景，令他得以掌握匯集於香港的兩大人材與資本庫——即離散華人社群，以及美國在亞洲的冷戰戰略項目。李卓敏希望利用這些結集於香港的人才與資本，建立全球華人的重要學府，以促進跨太平洋知識與社會資本之流通，進而令香港得以從第三世界發展成為第一世界。李卓敏在與港英政府官員同台之時，稱中大不只是跟隨英國模式的華人學府，而且也是具國際色彩的華人機構。⁵

李卓敏在中大出任校長十五年（1963-1978），在過程中他是決斷的跨商，他將原屬移民精英的策略普及化。在「國際」的外衣下，李卓敏主要利用美國資源，以從全球招攬華人學者，並在中



圖 4.1：李卓敏在落成的香港中文大學校園高處，一九七五，"Farewell Dr. & Mrs. Choh-Ming Li" (Hong Kong: CUHK, 1978)。圖源自香港中文大學資訊科技服務處。

大移植美國學術體系，以方便中大建立網絡。當時對華人而言，香港大學的機會有限，但對一般香港青年而言，中大所能提供的機會也不應被誇大。在李卓敏領導下，中大導引香港膨脹中的中產階級走向跨太平洋教育與專業網絡，這意味，香港正從英國霸權過渡到美國霸權之下，新的教育文化由此成形，香港進而在一九七〇年代成為美國留學生首要來源地。李卓敏利用中大，推動了香港非正式解殖。

本章第一節會回顧李卓敏的早期生活，他是跨太平洋移民的

產物，其社會資本網絡橫跨中國國民政府與美國。在一九三〇年，李卓敏成為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本科生，並在一九五一年重回美國，成為難民教授。當時他的人脈遍佈於政府、學術界、社會。這種背景，令他對戰後世界有新的看法。李卓敏曾以國際貿易專家與中國代表身份，出席一九四四年的布雷頓森林會議（Bretton Woods Conference），他理解，美國正處於中心地位，重構全球資本主義，形成新體系。與此同時，在學術研究之中，他的務實經濟哲學逐漸成形，對市場理性與企業家精神有所偏好，但同時也接受中國等窮國由國家領導的土地改革與經濟規劃之模式。李卓敏並不認同冷戰時期的簡單二分。他曾親身體會國民黨人的腐敗與用人唯親。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之時，他曾醉心研究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與此同時，他也在觀察，這所加州公立大學如何能夠催化資本主義發展。

一九六四年，李卓敏出任為中大校長，他運用其累積的經驗建設中大。對李卓敏而言，出任中大校長之職，是崇高榮譽，此前在英屬香港，從來沒有華人能任職於此。李卓敏因而多少設想自己已是管治架構非正式成員之一，將中大發展成為「跨太平洋大學」（transpacific university，作者用語）。在數年之間，中大擁有自己的美式圖書館與學術榮譽體系，乃至學位課程。與同時代人物相較，李卓敏親美，不算特別。他引人注意之處，在於他沒有利用美國援助實現政治目標，畢竟當時香港並非國族國家。⁶李卓敏的主要目標，在於經營跨太平洋網絡。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他回應團

繞人才流失之辯論，指香港畢業生到海外深造，是正面之事，這代表香港之大學的學術成就已被其姊妹大學認可。⁷有別於其他後殖學者與管治者，李卓敏對建構本土身份意識、銳意發展部份產業、培訓公務員興趣不大。他的興趣，是確保中產階級能夠融入於跨太平洋體系。畢竟，在民國時期，他與家人就是使用這個體系尋得機會。

李卓敏建立東亞乃至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是個里程碑。在本章第三節，我們會見到，李卓敏如何利用崇基早期項目，為此課程鋪路。李卓敏認為，工商管理碩士課程能令香港本土學生掌握美國企業管理、會計、金融方法，進而令香港從英國模式迎向美國模式，亦令香港高等教育更為市場導向。李卓敏利用香港高等教育推動香港經濟發展，令很多中大學者警覺，新亞新儒家學者更是如此。對海外華人身份意識與教育之理解，令他們的矛盾變得更為明顯。

李卓敏在任之時，亦積極發展中大之校園。本章最後一節會提到，李卓敏曾批准一項籌款活動，以在香港精英間建立捐款網絡。李卓敏是在美國接受教育的廣東經濟學者，他曾在天津、重慶、上海工作，能與各界別人士打交道。李卓敏成功爭取本土精英的資源，以助中大的跨太平洋發展，並從中鞏固其在中大的權力。在一九七八年移居至加州之前，李卓敏已為中大引入激進改革，書院的自主地位乃至其思想文化氛圍因而被削弱。中大管理權被集中之後，李卓敏對高等教育的新自由主義式跨商願景得以被實現，甚至變為常識。至一九七〇年代中，跨商策略的基本特徵，是到太平洋

另一端尋求高等教育，累積具實用價值的知識與網絡，然後以此牟利。

4.1. 李卓敏作為決斷的跨商

一九一二年，李卓敏在民國初期生於廣州。他是富裕工業家李鏡池的第三個兒女與第一個兒子。李鏡池是孫中山的朋友，其父母同樣極為關心教育。⁸在送兒女到美國傳教士學校培育之前，其父母聘請私人老師。與江南移民一樣（見第一章），其父母視傳教士學校為兒女接受高等教育的路腳石。他們雖然不曾接受高等教育，但也希望兒女能改變命運。結果，其十一個兒女都從大學畢業。⁹家長重視高等教育，有先見之明，且亦是中國現代化以及廣東革命熱潮的推因。在一九二七年北伐之後，李卓敏十五歲，他離開廣州，到美國傳教士營辦的南京大學。一九三〇年，他轉學至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同年七月，他從上海出發，乘船到溫哥華。¹⁰一九三二年，他完成商業本科學位課程，並在翌年與一九三六年開展碩士與經濟學博士生涯。他的博士論文研究一八八八至一九三五年間銀本位時代的國際貿易與中國。格特（Henry Grady）是其論文指導老師，他是商學院院長，後來他出任為美國關稅委員會副主席，以及美國駐印度、希臘、伊朗大使。

換言之，在李卓敏於美國加州接受高等教育之前，他曾在中國不同美國傳教士學校就讀。他對

美國的態度一直務實，他之所以回到中國，可以歸因於不同因素。第一，傳教士教育加深了他的疑慮。¹¹第二，排華限制了美國移民的發展機會，而且在孟治治下，成立於一九二六年的華美協進社的主要目標，是幫助旅美中國學生回國。¹²第三，在經濟大蕭條之後，中國經濟學家與官員更傾向支持國家規劃模式，對年輕經濟學家而言，這提供了很多發展機會。¹³二十五歲之時，李卓敏博士畢業，在一九三七年年初，他回到中國，出任為天津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教授，當時這是中國頂尖研究所。在此，他加入了由著名美國受學華人經濟學家領導的社群。這些經濟學家，包括何廉與方顯廷。何與方在跨太平洋人脈深厚，與夏威夷的太平洋關係研究所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以及洛克菲勒基金會關係密切。透過二人，李卓敏開始接觸這些網絡，二人亦提攜李卓敏，助其加入戰時不斷膨脹的民國政府。¹⁴有別於歐偉國與林子豐（見第三章），李卓敏沒有沿用傳統跨商策略，以適應後一九四五年的世界。與江南精英一樣，他之後所用的跨商策略，源自民國時期其美國高等教育背景。

李卓敏的跨太平洋網絡，也源自其家族策略。其家族保送五個兒子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李卓皓是其弟，生於一九一三年，同樣就讀於南開大學。在一九三五年，李卓皓到美國，計劃於密西根大學深造，不過在李卓敏的幫助下，他入讀密西根大學之前，便已轉讀至柏克萊加州大學。

一九三八年，李卓皓取得化學博士學位，之後他加入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成為全球首位研究腦下垂體生長激素之合成的生物化學家。¹⁵ 其他三位更年輕的李氏兄弟也移居至美國深造。李卓堯成為著名神經外科醫生，在貝塞斯達州（Bethesda）美國國家衛生院（National Institute for Health）工作。李卓顯同樣就讀於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後來成為美國霍尼韋爾國際公司（Minneapolis-Honeywell Corporation）研究主管。在一九八〇年代，他是台灣新竹科學工業園的主管，當時這是台灣高科技發展搖籃，也是跨太平洋知識生產中心。¹⁶ 最為年輕的李卓立同樣在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就讀。不過，李氏姊妹卻得不到同樣的機會。除了大姊入讀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之外，其他都在中國接受教育，並成為中國學校的校長。¹⁷ 一九四九年之外，只有一位李氏姊妹不留在中國大陸，但她們仍然相互聯絡。¹⁸ 李家案例多少反映，父權與特權如何決定家庭成員的安居之地。

一九三七年，李卓敏回到中國，這不是好時機。不過其專業令他在戰時得到不少機會。七月，日本進侵中國，南開大學成為受襲點。民國政府退守至四川，南開大學師生則到昆明，並與其他大學逃難者合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在路途中，李卓敏停留在當時仍然中立的香港，並向盧志文求婚。盧志文是美國傳教士學校真光書院畢業生與嶺南大學學生，且也是其姊妹之友。¹⁹ 盧志文的父親是孫中山第一任妻子盧慕貞的親戚。²⁰ 一九三八年，李卓敏夫婦在六國飯店成婚。（圖4-2）在昆明，李卓敏繼續研究貨幣政策與國際貿易。²¹ 於戰時，這是重點研究項目，因為民國政府的財政收入，



圖 4.2：李卓敏與盧志文結婚，一九三八年九月十七日。圖源自 Jean Li Rogers。

主要來自關稅。²² 中國因戰爭而失去沿海城市，且戰爭開支不斷上升，令民國政府財政處於崩潰邊緣。李卓敏研究中國如何嘗試革新其銀本位且權力下放的貨幣體系，他是少數能夠得益於戰爭的學者。在一九三九年，民國政府幫助南開大學在重慶重開經濟研究所，李卓敏夫婦皆移居至重慶，其妻隨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日本空襲之際誕下一子。²³ 在同年夏季，李卓敏與其論文指導老師格特重聚，他當時以美國助理國務卿（assistant U.S. Secretary of state）身份到訪重慶。²⁴

真正令李卓敏在民國地位提升的因素，是其美國人脈。陳光甫當時

是中英美平準基金委員會主席，他在重慶發現李卓敏的才能，於是招攬他加入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董事會。²⁵這段友情令江南移民與旅美回流精英開始認識李卓敏。何廉與方顯廷是戰時中國經濟的兩位重要經理，他們成為李卓敏的貴人。何廉是中央設計局主事人之一，也是蔣介石信賴的經濟顧問。方顯廷則被派駐華盛頓，代表中國，參與美國政府的經濟戰爭委員會（Board of Economic Warfare）。一九四三年四月底，李卓敏也以戰後重建代表身份參與其中。²⁶他離開家人兩年半，但在此時，他亦參與中國救國協會（Chinese National Salvation Association），並認識孟治等人（見第三章）。²⁷一九四三年年底，何廉派遣李卓敏到華盛頓，以協調中國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申請援助之事。²⁸一九四四年七月，李卓敏因而能夠以中國代表身份，參與布雷頓森林會議，當時盟國在此設計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體系。與此同時，李卓敏也協助李卓皓爭取美國永久居留權。²⁹其時李卓敏仍未完全支持美國資本主義模式，他仍然支持民國政府的國家規劃經濟模式。一九四五年二月，李卓敏於紐約發表演說，他宣稱，中國應步上美國與蘇聯經濟模式之間的發展道路。³⁰這個觀點在中國引發爭議，特別是當他也曾說，國際援助也應被派至共產陣營範圍。³¹

日本投降之後，李卓敏回到天津，協助重建南開大學。此時，他在政府的仕途煥然一新。他被委任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的副署長，位居蔣廷黼之下。蔣是哥倫比亞大學博士，曾在南開與清華大學教授歷史，此後，他成為中國駐蘇聯大使。李家移居至上海，因為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總部被

設於此地。第一與三章曾提過，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總部為中國引入大量美國與聯合國資源，亦因而成為貪腐溫床。資本家劉鴻生從中取利，李卓敏亦趕上這波淘金熱。蔣家與李家遷進上海四十房大宅，大宅原為汪精衛居住之地，汪是南京國民政府之前領袖。一九四六年十月，李卓敏的女兒出世，兩年之後的六月，其另一兒子也出生。³²期間有關貪腐的傳聞此起彼落，至一九四七年八月，李卓敏與其他十幾位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官員被正式指控貪腐。³³線報指，李與同僚將價值百萬美元之援助轉給朋友與黑市，當中包括多箱風扇、原棉與布。線報特別指，李卓敏肆意奢華，以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戶口支付大宅費用。³⁴在九月底，李在上海地區法院被傳訊，但能保釋外出，在家中被軟禁。

證明李卓敏清白的證據不足，但這可以說明，來自美國政府的社會資本有何威力。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之貪腐惡名昭著，李卓敏被指生活奢華，亦非最後一次。不過，民國政府官員經常利用法院進行政治爭鬥，其妻曾指，李卓敏支持派送物資到共產陣營地，引起高層官員不滿。³⁵香港報章則強調，洛斯將軍 (Major General Lowell Rooks) 是關鍵證人，他是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美國主管。按媒體報導，洛斯曾去信南京，為李卓敏作擔保。李妻則回憶說，洛斯到南京與蔣介石會面。³⁶不論哪個說法正確，可以肯定的是，洛斯是艾森豪威爾將軍 (General Eisenhower) 的親信，他的介入極有影響力。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行政院善後救濟總署解散，十二月，指控官說，證明李

卓敏罪成的證據不足，不過除李卓敏之外，所有其他被指控的人都被指控官送上法庭獲審。³⁷ 有兩人因在發送捐贈品時接受賄賂而需入獄。³⁸ 經此事件後，李卓敏上了一堂政治課，他明白人脈網絡之重要，對學術衝突也予以彈性處理。³⁹ 一九四八年春，李卓敏到美國講學，同時他代替蔣廷黻，成為中國駐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United Nations Economic Com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Far East, ECAFE）之代表，蔣廷黻則升任成為中國駐聯合國大使。⁴⁰

中國內戰持續進行，李卓敏已經預見結局，但他仍然留在其職位之中。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他出席在澳洲舉行的第四次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會議，會後他到香港，與家人團聚。⁴¹ 他指示妻兒留在香港，自己回到上海。其妻曾回憶說，當時謠言指，上海將會陷落，李卓敏希望她們留在香港，並說不久後他會回到香港，與她們共聚。⁴² 直到一九四九年三月，李卓敏才再途經香港，出席在曼谷舉行的第五次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會議。同年四月初，他與陳光甫回到上海。⁴³ 數週之後，中共進佔上海。李卓敏以公務為由乘機到廣州，然後到英屬香港。國民黨人在台灣為他安排了職位，但其妻說，李卓敏不予以考慮。⁴⁴ 李家在香港逗留了一年，期間李卓敏學習書法，臨摹四世紀大師王羲之的作品，猶如過退休生活。

但這種生活有違李卓敏本性。他變得不樂，於是重投工作。⁴⁵ 華人難民知識份子的機會不多，當時香港的學院正在成形，但資金不足（見第三章）。大部份學者移民海外之後，發現其待遇降

格。一九四九年，何廉加入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所，但胡適只能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尋得圖書館管理員之職。一九五一年，李卓敏運用家族與學術界人脈，重返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成為該校經濟學講師，這多少顯示了他的能力。李卓皓是該校教員，李卓敏之前的老師與同事都歡迎他回來。祈克（Clark Kerr）是其朋友之一，他畢業於柏克萊加州大學經濟系，後來成為專研工業關係的教授。一九五二年，加州大學進行架構統合，祈克成為首任校長，李卓敏在同年亦得到終身聘任（tenure track）。一九五八年，李卓敏升任成為工商管理正教授，並出任為中國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主席。他亦入籍成為美國公民。⁴⁶但在過程中，李家為此亦需付出代價。在一九五五年李卓敏成為美國永久居民之前，他不能離開美國，也不能資助家人生活，這是磨人的家庭分離。其妻回憶說，她得知生活將會如此之時，曾在美國領事館暈倒。但她明白，為了其夫與整個家庭的未來，她必需賭上運氣，與家人投向未知，隨遇而安。⁴⁷一九五五年六月，她們乘船到加州，柏克萊曾報導此一家團聚。⁴⁸

很多難民都需面對深刻的離散問題，但李卓敏對研究方向之改變，以及他建立網絡的能力，令他得到新生活。他與著名冷戰戰士同行，亦自我重新定位為美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發展的專家。一九五一年十二月，李氏家庭團聚之後數月，李卓敏出席加州里弗賽德（Riverside）的世界事務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會議。他與美國國務院官員、著名歷史學家、NBC新聞副主

席、前馬歇爾計畫主管與時任福特基金會主席荷夫曼 (Paul Hoffman) 同場發表演說。⁴⁹ 李的演說圍繞遠東農民的經濟問題。他倡議，亞洲國家應當推行土地重新分配政策，規劃發展，並指這是實現和平的唯一方法。⁵⁰ 不過他也開始隱藏其與亞洲基金會的合作，其合作項目，是影響海外華人輿論，以配合亞洲基金會的宣傳。陳世驤是其大學同事，李卓敏與陳共同負責編訂亞洲基金會的中文期刊。⁵¹ 李也務實地開始研究美國國家安全議題。李卓敏開始不再研究國際貿易，他改而審閱羅斯托 (Walt Rostow)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展的研究，自己撰寫的同類系列研究，則成為經典。⁵² 一九五九年，李卓敏首部著作《共產中國的經濟發展》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 出版。這部著作利用零碎資料，進行宏觀實證研究。⁵³ 當時有評論指，這是有關新中國經濟至為權威與透澈的研究。⁵⁴ 主流輿論開始留意這部著作，專欄作家亞索 (Joseph Alsop) 是其中一例。⁵⁵ 在反共狂熱中，李卓敏提供清醒的分析，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也得力於他的個人網絡。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操弄數據、不關心消費品、過於管制投資與大型企業加以批判。不過他強調，在蘇聯的重工業發展援助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首個五年計畫在集結資本與農業這兩個範疇內成就非凡。《共產中國的統計系統》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Communist China*) 是其第二部著作，題目聽來枯燥，但李卓敏在書中書寫了相當精彩、於薛暮橋領導之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統計部門發展史。他與薛相識，也相當欣賞這位經濟學家。⁵⁶ 在這本書與其後的著作，李卓敏也有探討具災難

性的大躍進之源起與影響。⁵⁷

4.2. 李卓敏出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李卓敏雖有出色著作，但真正助其躍升成為首任香港中文大學校長的，是其在美國華盛頓的國家—私人網絡。一九六一年六月，港英政府官員開始思考這個問題，並擔心最佳人選可能出自美國。⁵⁸至十二月，亞洲基金會祕密地向港英政府官員推薦李卓敏，亦暗裡遊說對此不感興趣的祈克，以讓他離開美國教職。⁵⁹一九六二年，英國里茲大學（University of Leeds）校長開始搜羅人才，他先聯絡美國哈佛大學校長佩斯（Nathan Pusey），佩斯也有為此事作探聽。⁶⁰佩斯得到推薦名單，名單上的學者都來自美國與台灣。不過印第安納大學（Indiana University）校長史丹爾（Elvis Stahr）則舉薦李卓敏與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的陳榮捷。⁶¹陳是前嶺南大學教務長，也是世界知名的新儒家專家。新儒家是新亞書院所專攻的研究範疇，亦因此，陳榮捷應會較易得到各書院支持，他是佩斯舉薦名單的首選，但佩斯並沒有推薦李卓敏。⁶²不過，到了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港英政府的人選名單只得二人，分別為李卓敏、馬來亞大學的物理系教授湯壽柏（Thong Saw-pak），以及香港大學數學系學者黃用識（Y.C. Wong）。⁶³時任港督柏立基剔除黃用識，原因是他

認為黃缺乏個性，他對湯壽柏是否有個性亦存疑問。從柏立基角度看，李卓敏充滿個性，此前來港之時，亦有貢獻。富爾敦爵士（Lord Fulton）卻極力反對，他認為，李卓敏「完全不適合」。⁶⁴

為何李卓敏被相中，至今並無文獻清晰作記錄。有關中大成立過程的文獻不少，這種缺遺因而令人好奇。李卓敏的優勢，在其行政經驗、相對年輕、通曉三種語言以及其研究專長。李氏夫婦指，李卓敏原先拒絕邀請，但中大所得的土地補助、柏克萊加州大學所提供的三年休假，以及在其拒絕後非華人成為首任校長之可能，是李卓敏最後應邀的三大原因。⁶⁵事實上，在一九六三年年底，李卓敏一直為其任命、待遇、福利作洽商。相較其在柏克萊加州大學的待遇，中大校長的薪金較低，所以直到亞洲基金會介入，並應允會暗中補貼李卓敏薪金，每年為其加薪七千美元之時，李卓敏才同意出任中大校長之職。⁶⁶換言之，與歐偉國一樣（見第三章），李卓敏的薪金亦來自美國政府渠道。港英政府不太同意此一安排，官員要求，這種安排需暗中進行。十月二十四日，港英政府正式發出聘書，一週之後，即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李卓敏到港。⁶⁷

4.3. 香港中文大學作為跨太平洋大學

十一月二日，港督柏立基宣佈李卓敏之任命，李隨即接受不同訪問。他指，中大會成為中西文

化有效交匯之路徑。⁶⁸這看似意義不大的陳腔濫調，但對李卓敏而言，這能有效掩藏其爭取資源、人才、認可，以導引中大親美的目標。李也有對外說美國民眾透過美國基督教世界服務委員會，向中大提供補助一百四十五萬美元，以興建學生中心。第二章已然提過，所謂「美國民眾」，意指美國國務院，這些款項其實是透過美國華盛頓的國家——私人網絡管道，通過不同項目，流通至全港。李卓敏之任命、其薪金補貼、來自美國政府的大筆款項，都意味他與華盛頓的關係值得更多的研究。數月之後，李卓敏明言，標榜「國際」，另有所圖。在對扶輪社的演說之中，他說，大家對他不斷強調中大「國際」面向之因或會感到好奇。他解釋指，原因很簡單，就是發展新大學並非易事，這需要大量人力與物力。要得到這些資源，就需令「國際」對中大感興趣。⁶⁹

李的這種說法，其實意指跨商策略。這種坦白之言，不會成為中大的官方說法。中大領袖都應和李卓敏的觀點，但其發展願景後來逐漸被邊緣化。⁷⁰

李卓敏以行動證明自己是充滿活力、具意志的中大校長，其行政管理示範了精英如何運用美國社會資本，以推動經濟發展與非正式解殖。利舜英（見第一章）與阮潤桓（見第二章）等早期跨商的活動，對政權威脅甚小。歐偉國對港英政府官員也很客氣，甚至對他們敬而遠之。相較之下，李卓敏的發言風格，是言辭直接與激烈。⁷¹因此有些同事稱他為「力量先生」（Mr. Energy）。與此同時，李卓敏亦因其鎮靜沉著個性，而被形容為「冷靜先生」（Mr. Cool）。也有人委婉地說，李

卓敏「有膽色」，作風具「壓迫感」。⁷²作為中大校長，他有司機接送，坐飛機頭等艙，每週打網球，住最好的旅館。很多港英政府官員為此感到不安。李卓敏經常在不經諮詢的情況下，宣佈新發展項目，亦經常提出官員認為笨拙的提議，甚至不理會港英政府官員的預算意見，自行募款。例如，曾有官員因預算緊張而要求減少李卓敏就職典禮的嘉賓人數，李卓敏只降低了他對出席人數的估算，受邀人數不減。有另一官員諷刺說，這是至為欠缺商業思維的行為。⁷³李卓敏當然會反對這種看法。其我行我素作風，反映他對香港本土乃至國際權力關係的看法。解殖與英國的國際收支，都在削弱倫敦之權威，李卓敏這位美國華人所做的，是在主理香港歷史之中最為昂貴與最具規模的項目。直白地說，港英政府與中大書院都需要李卓敏，而李也深明這一點。李所做的，亦反映兩大權力轉移。一方面，他在鞏固從英國霸權過渡至美國霸權之轉變，另一方面，他在預演非國家角色如何漸具力量，如何按自己的議程重塑跨太平洋之融合。

李卓敏的目標，是建立一所跨太平洋大學。他的首要工作，是擴展這所大學的網絡。李卓敏說，中大是被動地得到國際善意，但事實上，中大是在銳意孕育全球對一己之興趣。曾有官員評論李卓敏就職演說之時，指李博士相信，中大能在其他國家爭取很多潛在支持，故此廣邀嘉賓，有助經營國際社會對中大的興趣。⁷⁴李卓敏運用跨商策略，擴大自己與中大的國際網絡，其實是為方便篩選資源與認可。在擴展網絡之時，國際旅行自不可免。在扶輪社發表演說之前，李卓敏於美國逗留兩

週，以出席耶魯大學新校長保斯特（Kingman Brewster）的就職典禮。⁷⁵七月，在到馬尼拉與菲律賓各大學校長見面之前，他率領代表團到訪日本大學。⁷⁶同年十二月，他到曼谷，出席高等教育會議，同時擠出時間到訪英國。⁷⁷他的家人到美國避開香港的潮濕炎夏，李亦利用此一時間，招募中大員工，與大學領袖乃至基金會見面。⁷⁸事實上，他經常向旅美華人學者作招攬，受敬重的語言學家趙元任便是對象之一。⁷⁹李氏夫婦亦經常在港招待貴賓，他們曾在一九六五年八月款待耶魯大學校長保斯特，康乃爾大學校長布京斯（James Perkins），以及他們的妻子。其中一場款待，是在恆生銀行舉行，港督是出席嘉賓之一，嘉賓人數達二百人。⁸⁰

李卓敏持續地令中大的學術發展向美國模式靠攏。到港後不久，李卓敏便成立三個顧問委員會，以管理中大的學術發展。⁸¹每一個委員會都由美國學者主持，當中包括李卓皓與何廉，乃至諾貝爾獎得獎者李政道與楊振寧。李卓敏為此一舉措辯護，指中大需要各界專家的協助。他們是英國人、美國人或華人，都無關重要，只要他們能處理特定問題便可。⁸²但在選擇中大的校外評審人選時（這是英式體制特徵之一），李卓敏確保人選主要來自美國。一九六九年，中大校外評審共六十一人，當中二十五人來自美國院校，十六人來自台灣院校，來自英國院校的只有六位。⁸³在教員之中，美國訪問學者亦是主力。於一九六五至一九六九年間，在中大教學的教授共七十一人，當中四十六位（百分之六十五）來自美國院校，其薪金來自這些院校或美國政府。另外六位學者來自

日本院校，來自英國院校的只有四人。⁸⁴

這顯然反映結合海外華人力量與美國冷戰資源的用意。中大招攬的學者，多是來自美國的華人或歐洲人，這變相鼓勵學生到美國深造。中大大學通訊經常有學者於美港間來回的消息，或則是高級學者享用學術休假，或則是年輕學者得到美國國務院資助，到美國受訓。⁸⁵透過華盛頓的國家—私人網絡，李卓敏為年輕學者擴展了發展機會。在一九六九年之前，福特基金會為中大教員提供兩項撥款，總值四百七十萬港元，以作中大職員發展計畫之用。基金會也有為八十九位年輕學者提供三項撥款，助其到海外深造。李卓敏在背後花了頗多時間，進行磋商，以爭取這些補助。在過程中，李卓敏不斷闡述中大的未來發展大計。⁸⁶至一九六九年，共四十八位學者到美國院校，二十位到英國院校，同時到英美的共有八位。

李卓敏也確保學生能夠受惠於這種跨太平洋網絡。在就職演說中，李卓敏指，他察覺到，「國際」社會對中大學生潛在領導能力很感興趣。一九六五年春，李卓敏先與母校加州大學建立交流計畫。他邀請其老朋友祈克加入中大校董會，他們二人達成協議，任何中大師生都可到訪加州大學其中一個校園，且學費全免。⁸⁷加州大學師生亦會到中大在李卓敏指定的範疇內研究與教學。一九六八年年底，兩所大學都互派十二位師生交流。⁸⁸交流計畫開始之時，聖塔芭芭拉加州大學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校長徹度 (Vernon Cheadle) 讚許說，計畫在李卓敏充滿

想像力與力量的意志之下快速發展。⁸⁹ 徹度承認，計畫不只反映「國際」社會的善意，其來自美國政府國務院的資金也透過傅爾布萊特（Fulbright-Hayes）資助。李卓敏利用此一計畫作為範本，與英國、加拿大、美國大學洽商交流計畫。⁹⁰

這些交流計畫為中大師生帶來了各種機會。不過，或會有讀者問，計畫之推行，是否基於良好直覺之結果？李卓敏的策略，是在英聯邦學術機構之中，引入美國學術體系。中大圖書館是個有趣案例。在李卓敏履任之前，港英政府曾邀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SOAS [University of London]）圖書館館長建議中大三書院之圖書館應如何融合。一九六四年三月，李卓敏擱置這項研究計畫，並聘請加州圖書館學院（California's School of Librarianship）院長與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e）策展人，向其建議中大大學圖書館發展之策。顧問提議，中大應當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之體系，以確保中大大學圖書館能與世界各大圖書館連結，互相分享資源。李卓敏採納此一提議。亦因此，中大大學圖書館管理員都需接受美國圖書館學訓練。大學學術聘請政策，亦同樣以美國模式為藍本。裘開明是中大大學圖書館首任館長，他也是哈佛燕京學社圖書館創館人。

李卓敏甚至在此英聯邦院校引入美國學術榮譽制度。李曾私下諮詢相關委員會顧問，但他錯誤傳達了顧問的意見。一九六六年五月，李卓敏向大學校董會建議，「成績優良」與「成績優異」等

同美國學術榮譽制度的優等 (Cum Laude - 即 Distinction) 與極優等 (Magna Cum Laude - 即 High Distinction)。⁹¹富爾敦爵士曾含蓄地對此表示質疑。他說，如果在實際情況之中，這不是務實之法，這至少是不錯的替代方案。⁹²馬來亞大學教授（後來成為香港大學校長）黃麗松則較為直白地質疑決定。他的理由是，這是美國而非英聯邦慣常用語，而這些用語是被用作畢業認可，那麼中大便需用精準用語，向未來僱主交代學生水平。⁹³他特別強調，英聯邦已有先例，為何需要另立新制？李卓敏也沒有事先諮詢港英政府官員。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大校董會通過採用美國學術榮譽制度之後，他才知會港英政府官員，並要求政府在招聘與決定薪金之時，平等看待英美兩制。有官員曾寫道，指從政府角度看，中大自然理應跟隨英國而非美國學術榮譽制度。⁹⁴不過，官員也明白，他們無法強迫李卓敏改變主意。教育署最後同意，但亦抱怨，美國用語不方便，且具誤導性。⁹⁵

李卓敏在孕育香港新的教育文化。他不反對學生到英國深造，或參與其他國際交流，但他利用美國資源，推動跨太平洋網絡構建。他令美國學院與企業逐漸承認中大學位課程之水平，進而導引未來貿易與投資活動的發展方向。數週之後，他讚許新的學術榮譽制度，並指這是拉近中大與海外大學距離的一步。⁹⁶在一九六〇年代，於英屬香港，中大校長地位崇高，這等同改變香港社會上流動遊戲規則。在舊金山淘金熱後，跨太平洋的機會不曾如此清晰易見，這為中產製造了新的奮鬥目標。

4.4. 中大開設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中大之成立，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的華人身份出現巨大變化之時。從很多華人的角度看，新中國的意識形態有違中國傳統文化，自此之後，華人身份有何意涵？面對儒家思想、國族主義、共產主義，現代華人教育應以何者為根？周愛靈、王智明、黃堅立等學者都已分析指，在冷戰之中，台灣、香港、新加坡的高等教育形同戰場，主事者時刻都需思考上述問題。⁹⁷ 李卓敏自不例外，他的國際論，就是他的答案。

在一九六〇年代末，香港社會變得躁動。一九六六年，天星小輪加價暴動在九龍爆發，民眾要求改善社會服務。一九六七年，中國大陸捲起文化大革命，香港六七暴動由此而起，社會響起反帝國主義之聲，街道被投放炸彈。⁹⁸ 與此同時，香港一方面接收難民，另一方面，越戰美軍到香港「修整復原」(rest and recuperation, R&R)。⁹⁹ 從李卓敏的角度看，這意味中大需要發展更快，以提高納稅人的投資回報率。他不斷應和香港本土的一個觀點，即人文教育屬奢侈品，並認為大眾需要的，是技術教育，而非人文教育。他應諾，中大不會陷入西方的精英主義之中，會在人文教育與專業科目之間取得合適平衡。¹⁰⁰ 為此，他為中大定下兩大使命，分別為傳統教育目標，以及與眾不同的教育目標。¹⁰¹ 前者是中大的基本目標，按此目標，大部份學生都需接受職業導向教育，香港青年因而

能夠得到專業技能，進而能夠在先進社會與經濟結構之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李眼中，中大的主要功能，是為資本主義體系提供勞動力。但他亦重視保留中國傳統之價值，他視之為與眾不同的教育目標。他強調中大需有責任保存與延續中國知識與文化傳統，這項目標的重點，在於研究，而非強迫學生修習中國哲學。新亞的新儒家領袖則認為，教育的主要使命，在於道德熏陶與發展個性。李卓敏重經濟的發展議程，以及其不斷集權，令他們有所警覺。

李卓敏設立東亞乃至東南亞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令中大之內的矛盾變得更為明顯。至今天，攻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已成為身份地位的象徵，在全球行政人員、學術領袖、包括中國在內的青年眼中，這猶如社會上流成長禮的重要一環。這種觀念實際上從一九六〇年代中開始。事實上，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是美國在十九世紀末的發明。直到二戰之時，這仍是非常美國之產物。很多研究都指，最早推出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並非美國大學，而是加拿大的西安大略大學（University of Western Ontario），其推出年份是一九五〇年。在聯合國的支援下，於一九五五年，卡拉奇大學（Karachi）亦推出亞洲首個工商管理碩士課程。在一九五〇年代末，亞洲基金會開始贊助香港的管理會議與課程，不過課程仍未普及。¹⁰²英國院校一直有提供經濟與商業課程，但直到一九六五年，曼徹斯特商學院（Manchester Business School）才推出英國首個美式管理課程。一九六六年，蘇格蘭斯克萊德大學（University of Strathclyde）成為首間提供一年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的大學。對於港

英政府官員與華人學者而言，中大在同年推出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是新穎之事。

對崇基第三任校長容啟東來說，商業教育是令人感到好奇的事。一九六二年，他開始研究設立經濟學院或商學院之可取性。他向紐約嶺南信託人請求，使之委託斯基德莫爾學院 (Skidmore College) 學者 Yu-kuang Chu 研究此一課題。這位學者對容啟東的想法表示贊同，但他們二人的著眼點，是成事之後的戰略好處，而非其學術與教學之價值。學者在其報告指，容院長認為，提供商學或經濟學訓練，是值得崇基投放資源之事，因為在當時香港，醫學、工程、教師之人才培訓，多少皆由港英政府機構專營。¹⁰³此一評論，多少從側面書寫了跨商策略的著力點。港英政府殖民管治體系統領醫學、工程、教師發展，從親美角度看，這是不需再著力發展的範疇。商業範疇則不同，提供美式商業教育，容易得到香港精英舊生的捐款，亦容易培養商界與國際貿易範疇之中富裕的舊生。亦因此，容啟東與其學者顧問都利用跨太平洋網絡，以招攬資源與人才，與英殖體系保持距離，同時促進跨太平洋之融合。學者顧問建議，容啟東應當受邀到訪紐約，同時崇基亦應邀請經濟學博士到來授學。¹⁰⁴容啟東隨即向聯合董事會匯報此一建議。¹⁰⁵在某些學者眼中，崇基猶如利用邀請，構建帝國，但需要清楚的是，這非要求軍事或經濟援助的政府請求，這只是源自私人界別精英的請求，請求內容是利用美國資源，促進非正式解殖與經濟發展。¹⁰⁶

在初期規劃之中，容啟東與其顧問構思的，是經濟學院，而非工商管理學院。一九六三年春，

容啟東到訪紐約六週，與嶺南信託人與聯合董事會會面之後，他的想法有變。¹⁰⁷哈佛商學院教授霍斯 (Franklin Folts) 也有受邀列席。¹⁰⁸他是哈佛工業管理專家，且也是推動哈佛以案例研究方法授學與研究的先驅者。他在香港成長，其父是標準石油香港經理。¹⁰⁹會面的結論，是嶺南信託人與聯合董事會支持成立商學院，並會協助設立由商人組成的委員會，同時資助崇基博士生到哈佛大學留學一年，以學習工商管理教學的最新案例研究方法。¹¹⁰是以，設立經濟學院的想法，變成設立美式管理課程之規劃。中大之成立，以及當時未為人認識的中大校長，或會為規劃帶來暗湧。不過，李卓敏曾是柏克萊商學院教授，他對此一規劃感到雀躍。他就任後兩週，其辦公室便直接管理此一項目，以「方便爭取嶺南舊生以及中文大學更多的支持」。¹¹¹也就是說，李卓敏吸納此一項目，並向霍斯教授發出邀請。¹¹²

中大發展愈加快速之時，李卓敏並沒有諮詢港英政府官員，他繼續依重其跨太平洋網絡。事實上，港英政府官員會支持中大開設商科課程，但亦會反對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之設立，因為當時英國未有此一學位課程。李卓敏花了一年時間聘請教員，在一九六五年十月，他令人意外地宣佈，中大將會成立研究院與工商管理研究所。他說，這是大學發展的重要時刻，以及不可或缺的一環。¹¹³港英政府官員對此充滿疑問，其預算問題更令他們煩躁。此時李卓敏的柏克萊同事摩斯 (Maurice Moonitz) 到訪香港，作最後諮詢。一九六六年四月，李卓敏與嶺南信託人達成協議，後者會提供

所需資金——在第一年會提供六萬三千美元，在另外兩年會每年提供五萬美元。¹¹⁴ 摩斯是會計學教授，他同意出任首任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 (Lingn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LIBA) 所長，柏克萊的教授亦會輪流支援。研究所的顧問委員會共有九人，同樣親美，成員之一，是唐炳源。(見第一章) 在一九六六至一九六七年學年，研究所共招收了六名學生。¹¹⁵

我們再次見到美國社會資本如何有助李卓敏與英殖管治保持距離，導引中大學生步向以美國為中心的企業體系。一九六六年九月，在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成立典禮之中，美國嶺南託管人主席艾倫 (Yorke Allen, Jr.) 形容，研究所的功能，是幫助學生在全球資本主義競爭之中脫穎而出。他說，要贏得勝利，並不是靠長工時與勞力，而是靠市場、生產、各種商品融資之最新技術。¹¹⁶ 這等同坦白承認，資本主義重視的，是資本而非勞力，不公義的不平等由此而起。艾倫亦指，全球大部份國家如何趕上比賽中的優勝者，令他感到好奇。李卓敏顯然同意此一觀點，他將艾倫的演辭收錄於其六年報告之中。¹¹⁷ 在經濟領域迎頭趕上，是李卓敏急於設立費用高昂的學位課程的原因，當時在英屬香港，全民小學普及教育仍未被推行。課程的目標，是為培養被選拔的年青人，使之得到最新技術，以服務於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體系。其時李卓敏的大部份經濟學學者同僚，都在研究馬克思主義依賴理論 (dependency theory) 與進口替代政策 (import-substitution policies)，李卓敏則從跨國知識網絡的激進角度，理解乃至規劃經濟發展。他的方法，是訓練擁有知識與社會資本的行政人才，



圖 4.3：《工商晚報》上關於錢穆辭去新亞書院校長一職的報導，一九六四年七月一日。

使之能在跨太平洋穿梭，進而幫助香港轉型，使之從低成本、以製造業為本的「半邊陲」（semiperiphery），變成以金融業為主的「核心」。一九六八年，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只頒發四個學位課程，但到了今天，中大商學院已有三萬五千位在世的舊生。¹¹⁸

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之開展，觸發了海外華人間新一輪有關教育與身份的辯論。第三章曾提到，從一九四九年起，錢穆便是新亞書院校長。一九六四年七月，他辭任，原因是他與李卓敏爭持不下。《工商晚報》察覺到此一中大風雲，並報導指，錢穆離任，是人事問題。¹¹⁹（圖 4.3）錢穆的辭職信篇幅甚長，其不滿躍然於紙上。按其形容，李卓敏為人霸道，他的行政人員表裡不一，他們招攬教員的方法，已引起學術世界與中大校內的批評。在學術世界，性格不合固然常見，但錢穆指，他與李卓敏長時間的意見不合，遠比這常見現象嚴重。錢穆特別提到，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之成立，是他與李卓敏之間的爭論重點。他說，李卓敏剛到香港，便為此籌謀。¹²⁰錢穆同意此一計畫，但他要求，其院長之

職，應由長期效力於新亞的教授，那時他將達退休年齡。李卓敏最後委任他屬意的人，他重視的，是商界考量，而非新儒家道德精神觀。

在辭職信總結部份，錢穆談論令他們二人爭持的哲學觀點。他抱怨指，他聽說李卓敏認為錢穆應當退休而非辭職，但從錢穆角度看，他辭職，是為了表達對中大管理的不滿，這種不滿並非僅僅針對中大聘用教員的程序。錢穆甚至認為，李卓敏缺乏道德意識，他無法與這種人合作，或純然退休。他指，李卓敏從未就中大的理想與使命乃至發展策略諮詢他的意見。他解釋，他是以敢言且可信的朋友之身份，在公私場合提出這些觀點。既然他的觀點不被李卓敏接受，他就選擇和而不同，儘量避免衝突。¹²¹但似乎李卓敏無意遵從道德教誨，錢穆便自覺無需再偽裝。換言之，錢穆認為中大的日常管理已偏離儒家精神。數週後，他在台灣定居。

李卓敏與錢穆之間的矛盾，反映的是熾熱的學術觀點衝突。晚清時代，多數大學畢業生都在辯論，教育的功能是為促進社會流動，還是傳揚道德精神。李錢的矛盾，亦顯示在一九六〇年代之香港，華人教育有何潛在發展路徑。從錢穆角度看，設立新亞書院，是在文化廢土之上保存中國文化精粹，捍衛道德精神。¹²²這種觀點講求原則，對中國文化亦有特定理解。諷刺的是，從一九五四年起，雅禮協會便協助錢穆隱瞞其婚外情之事。¹²³現代新儒家主義亦選擇性地接受外學，錢穆因而同意設立商學院。¹²⁴不過，以企業思維營運大學之行事方式，則難被接受。相較錢穆，李卓敏年輕

十七歲，他是著重數據的經濟學家，且也已成爲美國人。他對何謂華人、何謂外國人、何謂現代，有較靈活的想法。在一九七一年，於演說之中，他將文化定義為「生活過程」，並強調，「我們談及中國文化之時，指的是繼往開來」。¹²⁵對李卓敏而言，香港不是文化廢土，而是全球網絡之中的一個重要樞紐。在他領導之下，中大提供的不是儒家或殖民地教育，而是資本主義教育。在此基礎上，華人身份與物質成就結合，這種物質成就衍生自由美國領導的國際秩序。港英政府官員固然抗拒李卓敏的管理模式，但他們對錢穆也不表同情。港督戴麟趾 (David Trench) 阻止官員繼續討論錢穆辭任一事，他的理由是，在某個早上的會面之中，李卓敏並無提起此事，而戴麟趾也認為，不應僅因公眾非議，便需持續討論此事。況且，從戴麟趾角度看，李卓敏應已考慮此一因素。¹²⁶事實的確如此。錢穆清楚言明二人矛盾之時，李卓敏沒有多理會。從他的角度看，香港未來的發展潛力，繫於教育。於接下來的十年，香港經歷巨大變化，引證了李卓敏的觀點，此一矛盾風波也逐漸淡出於眾人的記憶。

4.5. 跨商精英與中大發展

李卓敏督導的，不只是中大各書院的融合過程，且也包括校園發展。香港人口稠密且山多，要

建設校園並非易事。在李卓敏上任之前，港英政府決意將新亞書院遷至沙田，與崇基學院為鄰，並建議沿山擴建中大校園。崇基會處於山腳，中層為大學本部，聯合與新亞會被置於山頂位置。一九六六年，李卓敏邀請建築界新星貝聿銘（中國銀行創始人之一貝祖貽之子）就中大校園發展最終方案給予意見。工程從一九六七年開始，范克廉樓學生膳堂（Benjamin Franklin Centre Student Canteen）是最早落成的建築物，這同樣是得力於美國捐款。一九七五年，新亞遷校至中大，在當時的中大山頭，已建有六十一幢建築物。¹²⁷

港英政府以公帑資助中大興建計畫，不過在同時，李卓敏與港英政府官員都有尋求私人資金支援，以提高興建進度與減輕財務壓力。大學行政人員的主要職責固然不是籌募經費，但中大興建計畫令李卓敏認為這有其必要，亦身先事卒為此投放精力。在位時間頗長的中國研究服務中心（University Service Center for China Studies Collection）主任鐸華（John Dolfin）曾言，李卓敏擅於籌款，對他而言，最重要的事有三：一，為校籌款；二，與港英政府維持良好關係；三，與香港富人結交，以便籌款。杜芬認為，他是很好的建設者。¹²⁸在一九六四年初，李卓敏便到倫敦，從英國政府取得達二十五萬磅的經費，以興建中國研究服務中心。¹²⁹李卓敏也有利用三間書院的美國網絡，以實現其目標，同時亦善用其與福特及亞洲基金會的長期關係。¹³⁰一九六七年，負責中大工程的總工程師估計，工程成本達一點三億港幣，但按李卓敏的報告，當時中大所得的籌款額，已可達

近二千萬港幣。¹³¹

李卓敏藉為中大籌款之由，私下擴展了他在香港廣東精英圈間的網絡。當中很多人在李卓敏履職之前，已義務參與建立中大之項目，律師關祖堯、東亞銀行馮秉芬、恆生銀行創辦人之一何善衡等都是例子。他們都以其專業知識，以及金融與社會資本，推動中大之建立。在李卓敏任內，他們都得到名譽博士名銜。李卓敏甚至利用自己的學術人脈，方便他們的兒女升學。¹³²在廣東精英之中，利氏家族成員的參與特別積極。利銘澤與利榮森兄弟二人以及其親戚利國偉都是中大校董會成員。利銘澤與李卓敏相識近二十年，陳光甫同為他們二人的師父，二人亦曾在中國駐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共事。他們在工餘之外，亦會一同消遣。¹³³利榮森則協助李卓敏建立中國文化研究所。一九六七年，李卓敏利用亞洲基金會資金，建立此一研究所，並任命自己為首任所長。¹³⁴翌年，他遊說利氏家族為此研究所捐款二百萬港幣，為研究所設立永久所址。¹³⁵至今天，所內仍有寫有利榮森書法的紀念碑，以及利榮森逝世後的紀念人像。

跨商唐炳源（見第一章）是李卓敏至為得力的夥伴。南海紗廠成為全香港最大規模的紡織製造商之後，唐炳源積極出任不同社會公職。一九六四年，他成為香港立法局內首位上海人，香港蘇浙同鄉會為此特別慶祝。¹³⁶一九六九年，唐炳源加入行政局，並在一九七一與一九七二年，協助成立香港貿易發展局與理工學院。從一九二〇年代起，唐炳源便積極贊助職業訓練學校之發展，以培訓



圖 4.4：Tang Pao-Che 圖書館，香港中文大學，一九七一年。由唐家提供。

工程師與經理。他認同李卓敏的理念，認為中大理應為資本主義勞動市場提供新血。一九六三年，唐炳源加入成為中大校董會成員。按李卓敏的說法，他就中大籌款一事邀約唐炳源不久，唐便隨即應邀。唐為紀念其父，捐出三百萬港幣，以助中大興建圖書館。（圖 4.4）¹³⁷

李卓敏與唐炳源並非同鄉，他們分別是廣東人與上海人。但他們的階級、美國留學背景，乃至他們的務實政治取態，令二人成為自然盟友。在唐炳源人生最後數年，唐李二人一起共事，處理中大不同發展項目。除了成為嶺南工商管理研究所董事之外，唐炳源亦以南海紗廠之名，向研究所捐出兩筆全額獎學金。¹³⁸獎學金得主得到機會到馬尼拉

與東京進修，以獲外地的管理培訓。¹³⁹或許最重要的一點，是在一九六四年，於錢穆離去之後，唐炳源接任成為新亞書院校董會主席。繼任之後，他改變書院的哲學氣息，著力使之與中大融合，因而成為李卓敏、新亞書院教職員、雅禮協會之間的橋樑。為此，唐炳源經常以新亞代表之名，在美國與香港間往來。唐李更相互協調他們的航程，以便詳談大學發展。唐炳源甚至扮演師父角色，教導李卓敏處事方略。¹⁴⁰

唐炳源利用其江蘇工業家人脈，為新亞與中大籌謀了不少捐款。在一九七三年春，新亞書院的發展基金共得逾一百萬港幣捐款承諾，當中二十五萬來自唐家，唐炳源本人也已捐贈近五萬港幣。其他捐款主要來自工業家移民，劉漢棟、何英傑、董之英、徐季良、葉庚年等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生捐出六位數字款項便是例子。中國染廠的查濟民亦捐出一萬港幣。¹⁴¹這些工業家顯然不是新儒家主義者，他們大部份在美國留學，或保送兒女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他們都堅定支持教育，且也是唐炳源多年戰友。唐炳源最終沒有見證籌款過程之完滿，他在一九七一年六月突然過世，過世之時，他未留下遺囑。李卓敏是唐炳源葬禮八個扶靈者之一。¹⁴²在十二月，李卓敏主持大學圖書館落成典禮，唐炳源兒子唐驥干致辭與剪綵。媒體報導之時，少提唐家背景，其焦點都放在唐驥干之詞，即唐炳源的真正理想，在於與民眾同在。¹⁴³

李卓敏的籌款活動，使之容易集中中大權力。中大草創之時，以聯邦方式成立，書院擁有自主

權，大學本部只負責管理中央辦公室、大學圖書館與實驗室、先導研究計畫，以及歸大學校董會管理的項目。¹⁴⁴這種聯邦結構，旨在招攬書院加盟。李卓敏在位之時，不斷透過籌款活動、實現其屬意項目，以增加其權力。¹⁴⁵一九七一年，李卓敏辦公室已收回所有招生權，且也悄然重置大學的總部。¹⁴⁶從李的角度看，集權是為了將李卓敏所做的事制度化，以便他退休之後，中大仍能按既定方向發展。他曾戲言，少了李卓敏的中大等如零。¹⁴⁷可以預見，新亞肯定不會認同這種觀點。有書院領袖指，李卓敏的策略，是逐步間接削弱書院自主權。¹⁴⁸一九七四年八月，即連李祖法（見第三章）也反對李卓敏獨攬大權，以及其對大學聯邦結構之破壞。李卓敏回應指，集權是為了確保大學發展路線一致，以免在真正的聯邦制度之下，各書院各行其路。¹⁴⁹一九七六年三月，港英政府委員會卻指控李卓敏獨攬決定大學學術政策、發展、財政、招生、職員任命、課程、考試、學位頒發細節之權力的做法。書院領袖地位被貶，書院淪為其資產、學生福利、教育之託管人。¹⁵⁰一九七七年春，新亞大部份留下的領袖都心生去意。當時雅禮協會的蕭約去信給新亞每位領袖，希望新亞能夠保留其人文影響力，有些領袖的回覆非常尖酸。¹⁵¹一九七八年，李卓敏退休，當時的中大已完成融合過程。

在英帝國衰落、美帝國擴張、高等教育全球化、香港經濟轉型之時，李卓敏是關鍵人物。他領導中大的方式，反映世界趨勢以及其經濟體系之運作模式。他透過移民學者，以及公私渠道資金，

建立了跨太平洋大學，服務以美國為中心之體系。他以「國際」之名，成功取得華盛頓的國家——私人網絡資源，進而令中大師生能夠得到跨太平洋流動的機會，繼而方便美國逐步取代英國的全球霸權地位，香港非正式解殖亦因而開展，李卓敏本人深信出口導向經濟規劃之價值。與此同時，他亦認為，中國之現代化，只需要告別傳統，無需重新發明傳統甚至將之妖魔化，很多學者因而被邊緣化。

4.6. 小結

檢視李卓敏一九六三年前的人生，有助我們理解為何他頻繁移民、與美國建立何種關係、有何經濟哲學、如何運用其網絡。他的父母屬意美國傳教士學校與高等教育，李卓敏因而與民國時代很多精英一樣，走在待遇優厚的路上。李卓敏是美國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研究生，他相信國家經濟管理與出口導向發展之價值。他從加州回到中國，展開其事業。太平洋戰爭改變了他的命運。在戰時重慶、華盛頓、戰後上海，這位年輕專家憑藉其專業與網絡，取得政府官職。他在現場見證美國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革新，以及國民政府發展政策之失敗。中共建政之時，他利用美國社會資本，重回加州。此後，他務實地改變自己的研究興趣，以迎合美國國務需要。他參與美國冷戰計畫，引導

海外華人迎向美國國際領導地位。

作為中大校長，李卓敏以個人事業發展經驗，導引大學發展。他為中大注入美國風格，中大乃至其師生的發展，都放眼於美國，以尋求機會。在此發展方向下，李卓敏擴展其權力，令中大成為跨太平洋的一個樞紐，亦令香港在一九七〇年代成為美國留學生的最重要來源地。我們會在兩章看到，中大的跨太平洋網絡孕育了第二代跨商。在一九七〇年代，他們以美國模式革新企業，亦派遣行政人員，協助跨國企業在亞洲擴展業務。

李卓敏的教育模式不無代價。他常向傳統中國文化示好，經常引用儒家語句，亦練習書法，甚至曾著有詞典。¹⁵²但這其實既是討好國際觀眾的中國文化演示，也是避開民國時期政治紛爭之法。他從未公開議論中國內戰，民主發展與自決這類議題更自不待言。相較而言，錢穆仍然推廣中國新儒家式現代化，故此極力反對李卓敏的發展路線。不過，李卓敏佔上風。按其說法，中國智慧之傳承，必須依賴「西方實證研究方法」、「科學方法」、「雙語主義」。所以在他領導之下，中大畢業生「在兩大文明之間往來，影響彼此」。¹⁵³

對二十一世紀觀察者而言，李卓敏似乎無需進行其策略思考。中大採用何種圖書館管理制度，或其教員有何教育背景，似乎都是無關痛癢的問題。但從李卓敏與港英政府官員乃至新亞領袖的張力可見，這所英殖華人學府是否應該開設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或是否採用美國國會圖書館管理系

統，都不是不證自明的問題。這些問題的答案，反映了李卓敏的跨商策略。其他中大校長人選（例如哲學家陳榮捷）不一定會如此決策。在一九六〇年代末，世界充滿戰爭與示威，但在此時，香港步入轉捩點，這對日後的香港發展乃至中美關係都有巨大影響。在中大跨太平洋網絡的協力下，於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第二代跨商能充分對應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危機，以及中國改革之開端。

是教青松仙

【第五章】

Chapter 5

投資與解殖

親美精英之社會資本與香港產業發展



昌興皮革

有限公司

昌興皮革

聯興皮革鞋料

金寶順

傑克金屬

響音車汽

Sundrop

第五章 投資與解殖

——親美精英之社會資本與香港產業發展

「商界之中的所謂『硬資料』，多是表裡不一。」——Matthew Stewart, *The Management*

Myth: Debunking Modern Business Philosophy

一九六三年，香港迎向跨太平洋網絡的發展步入十字路口。在該年，李卓敏被任命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大）校長，美國則超越英國與日本，成為香港最大之外來投資國。第一章已指，在二戰之前，英帝國限制殖民地的外來投資，以保護帝國特惠制與英鎊匯率。戰後，經濟現實迫使香港政府放寬限制，以便取得來自中國與東南亞的資金。我在這一章會更詳細指出，英屬香港的銀行家與

工業家合作，促進這波資金流動，使之投入極需勞動力的製造業。製造業興起，為外來直接投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提供了機會，例如美國企業會採購製品，或合辦聯營企業。不過，美國貿易禁運政策，以及產地來源證明體系提高了美國與香港貿易關係的法律與物流門檻，這對香港製造業發展構成了負面影響。一九五五年，英屬香港與英屬東非的貿易額，還較香港與美國貿易額高。四年之後，來自美國的外來直接投資已成為香港主要資金來源。¹

從全球層面看，一九四五年後香港向美國靠攏，與美國建立更緊密的貿易與投資關係，並非令人意外的事。美國當時的經濟產出，已超越一九一六年整個英帝國的產出。²英國在港投資長期處於主導地位，主要得力於著名英國銀行、帝國貿易網絡，以及政府的積極干預政策。第一章曾提到，港英政府放寬規限、帝國特惠制瓦解、非殖化加速，香港因而更易融入於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體系。與此同時，美國海外投資額不斷上升，從一九四六年的七十億增至一九六〇年的三百二十億，至一九七八年，數額更增至一千六百億。³香港持續不限制外來投資，不採用進口替代政策，對外國與本土企業一視同仁，在二〇一三年前一直不推行最低工資，是以香港與美國關係愈加緊密，是自然之事。

戰後英國對香港經濟影響力非凡的神話，至今仍廣為流傳。一九八三年初，學者饒餘慶（Y.C. Yao）總結說，一般大眾認為，滙豐銀行壟斷香港銀行業務，這其實是個神話。⁴港英政府官員頗

為清醒，他們沒有受這套神話所蒙蔽，對香港經濟的真實境況有清晰理解。在同年，民政司黎敦義（Denis Campbell Bray）在美國總商會午餐會指，憲法上，香港事務歸英國所管。在經濟範疇，美國則具更大影響力。⁵ 但有關香港發展的主流論述，都會指滙豐、怡和等大型英資企業才是主宰。這種錯誤印象，某程度上與帝國主義對知識生產的影響有關——與宗主國相關的事，都被誇大。以跨商角度回望歷史，有助解構這種知識觀。我們會檢視親美華人銀行家與工業家如何建構精英網絡，這種網絡甚至能夠迫使滙豐迎向跨太平洋市場，影響英屬香港的資金流動。

這一章會探討社會資本如何促進資本之流通與積聚。在下一節，我們會見到，於一九五〇與一九六〇年代，個人關係如何形塑本土工業借貸之發展。商業歷史學家已研究香港工業振興背後的宏觀資金積聚史，但他們較少留意個人關係如何決定貸款的來源與條款。到港之時，江南紡織工業家急切需要重建與銀行的關係，以滿足營運的資金需要。第一章曾提過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花旗銀行案例，在這一章，我則會聚焦於滙豐銀行案例，並會指出，滙豐聘用其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之後，逐漸成為工業家移民的主要貸款提供者。沈熙瑞在美國接受教育，他成為滙豐銀行的重要人員，這段經歷，反映非正式解殖如何進行。作為殖民地體系的一部份，滙豐維持其聲望的方法，是逐漸下放權力給人脈甚廣的跨商，由他們決定日常事務。潘光迴（Francis Pan）是沈熙瑞的畢生摯友，他們都曾在美國、香港、中國接受教育與發展事業，他們二人的友誼，多少反映其人脈之厚

實，亦反映他作為首席銀行經紀的行事作風。

在第二節，我會檢視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間的外來直接投資如何幫助香港工業發展。移民南來擴展紡織業之時，英美先後對香港紡織業實施制裁。在這種保護主義下，香港紡織家發展新的紡織品。透過參考頗被忽略的政府研究，我會分析海外投資如何協助香港紡織家推動生產多元化。一般理論會指，香港紡織生產多元化，主要得力於日本資本。這裡所探討的政府研究卻會推翻此一理論，甚至會挑戰既有分析框架，有助我們重新審視香港在東亞的位置。工業家移民利用他們的美國人脈，取得美國資金，乃至尋得方法對應英美貿易限制。電子業案例是有趣的對照。美國企業對之投資，主要是想利用香港的低廉勞動力。

在最後一節，我會檢視一九六〇年代末個人人脈與跨商策略如何招攬兩大美國跨國投資。第一個案例，是埃索與香港中華電力合作，以增強香港的電力供應能力。第二個案例，是美孚石油重建其儲存倉庫，發展全世界最大規模的私人屋苑發展項目美孚新邨。這些項目都需要大量資本投入，亦有助香港免入發展陷阱，且也有別於埃索與美孚石油的主要業務。跨商利用其人脈與信譽，遊說跨國企業在此未知領域投資。在錯綜複雜的脈絡下，跨商善用機會形塑公共政策，增加了香港招攬外來資金的魅力。可觀利潤改變了埃索與美孚石油的全球商業策略，兩間企業因而作了重要決定，迎向後福特主義（Post-fordism）之下的全球資本主義時代。

5.1. 香港產業發展與精英社會資本

香港銀行業乃至滙豐銀行的歷史，一直是不少學者的興趣所在。⁶雖然資料不足，但學者仍然能夠梳理一九六〇年代初香港的資本積累如何有助推動香港製造業發展。這些資本以現金與器械方式從中國流出。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間，數十億港幣從中國外流到香港，另有四十至六十億來自東南亞的海外華人，他們當時面對各種不穩定。⁷不過，如果管理不善，這些龐大資金會輕易被揮霍。香港作為貿易與移民樞紐的歷史角色，意味其經驗豐富的銀行已有準備，能將龐大資金變為貸款等不同金融產品。滙豐與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是香港兩間英資龍頭銀行，東亞銀行、恆生銀行、廣東銀行、廖創興銀行、嘉華銀行（見第三章）等，則為當時的現代華人銀行代表。英資銀行主要服務怡和洋行等英資企業，現代華人銀行乃至傳統銀行的主要客戶，則為香港居民與海外華人。一九四九年之後，海外華人的匯款業務，主要由中國銀行處理。花旗等美資銀行則處理美元交易業務。換言之，香港銀行業務種類繁多，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間，銀行數字乃至其存款都急速增加。需要強調的是，當時的銀行界並沒有被嚴格規管。一九四八年至一九六五年間的銀行條例，並無要求銀行作特定儲備、預留流動資金，或預備完整財務狀況表。⁸

饒餘慶與施錫亨都曾指出，銀行業與製造業的興旺相輔相成，情況與民國時期的江南相近。當

時的香港，是世界之中兩個可以自由交易美元的英鎊地區之一，故此，香港外匯市場熾熱。⁹兩位學者強調，對英屬香港乃至工業家移民而言，香港源源不絕的美元供應，能提供極大便利。香港缺乏本土棉之供應，本地市場規模亦不大，其紡織業因而需要依賴進口棉與海外出口市場。低廉且供應穩定的美元，成為本地銀行的利潤來源，本地銀行在國際間以轉售美元取利。饒餘慶發現，滙豐銀行特別積極向倚重外匯的製造商提供低息貸款。這是雙贏交易。¹⁰因緣際會之下，資本外流、香港銀行業富有經驗、美元自由市場、資深工業家移民來港，都為香港紡織業提供極大發展空間。在此背景下，香港工業家購入大量美元，並向美國市場出口紡織品。

不過，具體而言，銀行家與工業家如何建立緊密關係，並非一目了然之事。到達香港之後，大部份移民都只有有限現金與器械，其抵押品不多。在監管寬鬆的脈絡之中，他們要取得資金，並非簡單的算術問題，他們特別需要依賴其個人網絡與社會資本以達到目的。對他們而言，英國人並不完全重要。很多工業家都與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以及花旗銀行等關係密切。饒餘慶與施錫亨指，滙豐銀行是香港本地製造商的貸款主要提供者，但他們也同時承認，能佐證這種觀點的實證並不多。他們指，雖然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五年間的數據不多，但一般觀點仍然相信，滙豐銀行所提供的貸款，佔製造商所得的總銀行貸款額逾半。¹¹這種說法其實是建基於一九六六年的紀錄。按紀錄，在一九六六年，來自滙豐銀行的貸款，佔製造業所得的總貸款額百分之四十八點三，在紡織業，比率

更佔百分之五十四。但按此假設在此前二十年情況依然，並不恰當。事實上，滙豐與恆生銀行在一九五九年才開始經營工業貸款業務，兩間銀行希望藉此與工業家維持長遠合作關係。¹²如第一章所示，工業家與銀行有如此關係，意味個人人脈是具影響力的因素。透過回顧這些人脈關係，我會指出，在一九六六年，滙豐銀行有此貸款成績，是跨商網絡與滙豐經紀沈熙瑞合作關係日益緊密的結果。

我會首先強調，大部份香港製造商都只是小型商企，對資本需求不大。在一九五五年，英屬香港共有兩千四百三十七間工廠，僱用了十一萬零五百七十四人，平均每間工廠需要四十三名工人。一九六五年，工廠與工人總數增加約三倍，但每間工廠平均人數卻降至四十人。¹³在一九七七年之前，逾九成英屬香港的製造商都聘用少於五十人。¹⁴換言之，大部份工廠都是小本經營，多依賴鄉緣人脈與本地銀行貸款。在這類工廠之中，有約十數人專責租用寫字樓，將空間改作生產膠花等消費品。曾有學者將之稱為「遊擊隊式資本主義」。¹⁵這種模式出現於台灣與香港，所謂遊擊隊式企業，其實是小企業，其焦點都在短期與小規模的生產機會，所需資金不多。這類企業經常改變生產方式，並依賴外判商網絡，以應對數量之大之訂單。擁有金屬製器的企業，或會從生產皮帶扣，改為生產汽車配件。其所需資金不多，加上種族歧視，意味能夠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取得滙豐貸款的遊擊隊式企業並不多。換言之，在一九六六年之前，若然工業貸款佔總額百分之四十八點三，

而很多企業都難以得到滙豐貸款，那麼，這些企業必定在其他途徑得到貸款。

紡織企業家移民能滿足這種貸款需求。紡織業所需資金甚多，並不符合「遊擊隊式資本主義」條件。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間，香港展現第一波製造業浪潮。數百企業在英屬香港開展紡織生意，但從事棉紡織生產的，只佔少數。¹⁶這與香港的氣候與地形乃至源於江南的競爭有關。在日本進侵之前，從上海或日本進口紗，較在潮濕山多的香港設置工場便宜。況且，如城山智子（Tomoko Shiroyama）與黃紹倫所言，棉紡織在全球需求甚殷，這為生產者提供了誘因，使之擴大生產規模。棉紡織所需的極多資金，被用於購置土地與器械，設置生產據點，乃至採購本地或國際生產的原棉。¹⁷在一九三七年之前，於江南，這種資本需求，令棉商需要以固定資產作抵押，以依賴銀行貸款從而維持營運。¹⁸這種合作關係頗為脆弱不穩。這些長期貸款，猶如棉商物業的按揭，被用於購入原棉的短期貸款，則成另一種貸款來源，日本夥伴稱之為「循環融資」（circular financing）。¹⁹這種融資模式之危險，在經濟大蕭條（Great Depression）之時變得明顯。當時，通縮與貸款緊縮令很多江南紡織商無法清還貸款，並觸發一九三四至一九三五年間的銀行危機。簡而言之，江南棉紡織生意在景氣之時利潤可以很高，但也終究是泡沫經濟。

對香港的銀行而言，上海經驗並非陌生的事。故此在滙豐銀行嚴謹貸款審查之下，移民難以取得貸款。當時這些企業家移民仍未有美元戶口，關於他們融資能力高於廣東商人之說，其實不恰

當。²⁰ 企業家移民甚至會為銀行提供貸款而感到驚奇。在一九五五年，唐驥千從紐約回港，他當時跟父親說，他為銀行願意提供貸款感到意外，原因是他們的財務狀況表並不特別亮麗，資本並不特別充裕。所得的資產，就只有不動產。²¹ 基於這些數字，他認為，滙豐銀行是在向缺失現金與業績不定的工業移民提供貸款，猶如賭博。

不久之後，唐驥千便會明白，包括他父親在內的工業家，其實是透過個人人脈取得特惠資本。拉莫羅 (Naomi Lamoreaux) 曾經分析指，在歷史之中並非不常見的現象。在十九世紀中，內線借貸 (insider lending) 是歐洲與北美常態。銀行常會向其創辦人提供貸款。²² 傳統華人銀行亦會基於個人信譽提供貸款。在一九九〇年代之前，銀行業務背後的人脈關連不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規管。唐炳源利用其人脈，從數間銀行取得無擔保貸款 (unsecured loans)，進而在一九四八年十月成立南海紡織有限公司。支持唐炳源的銀行，包括斯巴利之下的花旗銀行、滙豐銀行，以及陳光甫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如第一章所提，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預支」南海紡織有限公司三十三萬五千港幣，供其購入原棉。饒餘慶曾總結指，這類紡織家移民所得的貸款，很多時候都是無擔保貸款。²³

但是，個人聲譽與恩賜並不會永續。唐炳源利用人脈取得貸款，其實是在冒險，若非韓戰，他也許無法清還債務。戰爭誘發囤積與刺激了貿易發展，很多紡織業移民因而得救。唐炳源利用戰時

機會，快速拓展了新的生產線。²⁴其南海在韓戰之時從日本豐田購置紡織器械，這種交易需要得到美國在日政府批准，並得到美國銀行融資。在一九五三年，南海是首批能夠與美國領事館合作，為其製品取得產地來源證明書，得以清關的企業。唐炳源不斷開拓公司業務，他收購了美豐實業（Mayfair Industries），這家小企業專門生產拉鍊。一九五五年唐驥千從美國回流之後不久，其父便派他到美豐管理其業務。²⁵如前文所提，在一九五七年南海也生產禮服襯衫。唐驥千放眼於美國市場，並利用其哈佛商學院人脈，希望在美國百貨公司銷售這些製品。簡而言之，南海的生存方法是先將唐氏的精英圈人脈變為企業資本，然後利用韓戰開拓新產線乃至美國市場。當時香港對美貿易每年增長率達百分之四十，在一九六二年之時，唐炳源曾言美國市場與香港生存息息相關。²⁶

社會資本並不會立刻換來極大的商業價值，但在個人長期經營策略中，這是極為重要的一環，極具商業價值。在其中一次口述歷史訪問之中，唐驥千談到一九五〇年代。他說，對港英政府而言，工業家難民不算重要；對英漢世界而言，江南移民是有待融入於本土的新來客。在此脈絡之中，唐家的美國社會資本帶來莫大好處。唐驥千回憶說，他能建立美國與英國曼徹斯特網絡，是有幸之事。他能夠與很多人來往，這些人來自紐約與倫敦，大部份都來自美國。唐家父子積極經營其社會資本。每逢週日，他們都會廣邀朋友，遊船河或暢遊，藉此連繫人脈。唐家的國際網絡幫助他們取得貸款、延遲還款、進行銷售與外匯活動，乃至得到政府優惠。唐驥千繼續說，在香港，他認識很多官員，

以及銀行家、成功的零售商、地產商等。他說，他不想強調階級觀念，但到最後，他只能與這些精英階層同行。²⁷

很少移民的社會資本能與唐家相比。大部份只能依靠像沈熙瑞這樣的中介者。黃紹倫曾指，與陌生人打交道之時，商人慣常會尋求中介者的援助，這些中介者多與他們有某種聯繫。上海紡織家到港之時，他們也用此一方式尋請貸款。²⁸按黃紹倫的研究，英漢社會之中的歐亞裔被視為可信任的中介，他與饒餘慶乃至施錫亨都會同意，沈熙瑞亦扮演了這種角色。他在一九六四年成為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managing director）。²⁹根據饒餘慶的說法，沈熙瑞的優勢，在於他與生於上海的工業家關係密切。斯密夫（Andrew Smith）亦曾指，沈熙瑞之成就，與他曾接受美式教育，累積了一定人脈有關。³⁰透過跨商網絡分析，我們可以見到，這種網絡互為重疊，沈熙瑞進而成為滙豐銀行與親美工業家移民網絡的重心。

5.2. 案例：滙豐銀行首位華人董事總經理沈熙瑞

要理解沈熙瑞一生，我們需要認識潘光迥。在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間，他與長兄在上海出生。³¹他的長兄是民國著名人類學家與優生學家潘光旦。³²其親戚何林一在一九〇八年與一九一一

年畢業於聖約翰大學與達特茅斯學院。潘光旦則先入讀於清華大學，然後取得庚子賠款獎學金，同在達特茅斯學院就讀。³³潘光迴跟隨其兄，在一九二六年畢業於達特茅斯學院，並在塔克商學院（Tuck School of Business）升學。一九二七年年底，他在紐約大學攻讀博士，並在一九二九年，完成其博士論文，論文分析各種財政干預。沈熙瑞仿效潘光迴，先入讀達特茅斯學院，再入讀塔克商學院與達特茅斯學院。³⁴在紐約，他們住在同一宿舍，潘光迴於華美協進社工作。一九三〇年，這兩位朋友回到上海，並從事商業與教育工作。潘光迴加入著名的商務印書館，同時在上海商科學校教書。沈熙瑞則任通用電氣（General Electric）上海分支的會計師，同時在受美國傳教士贊助的上海大學與國立上海商學院（National Shanghai Business School）教書。³⁵他們也在此時期結婚。一九三〇年十一月，潘光迴與一位歐柏林音樂學院（Oberlin Conservatory of Music）及朱利亞德學院（Juilliard School）畢業生結婚，沈熙瑞則在數月後與朱懿大成婚。關於朱懿大的資料卻甚少。

沈熙瑞以自己方式步入銀行界，但潘沈二人的網絡最終交匯，他們最終合作，共同染指鐵路融資業務。一九三三年，沈熙瑞離開通用電氣，加入青島的中國銀行。一九三五年，他的事業發展突飛猛進。他成為津浦鐵路幹線的首席會計師，以及中國鐵路債償基金債券委員會秘書長。津浦鐵路幹線是頗為重要的鐵路幹線。³⁶與此同時，潘光迴離開商務印書館，並成為主管鐵路事務官員張嘉璈的首席祕書（另見第一章）。國民黨人曾迫使他離開中國銀行。³⁷作為部長的首席祕書，潘光迴

直接參與延長逾期債項時期的談判，他因而累積了銀行家與外交家人脈。³⁸簡單說，潘沈二人在中國鐵路建設過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一九三六年，潘光迥曾直白交代他們二人的合作關係。³⁹在南京，於一連串美國外交與教育活動之中，潘光迥亦參與其中。他與其妻長袖善舞。⁴⁰媒體很少提及沈熙瑞，這也說明了在二人合作關係之中，潘光迥如何活躍於社交場合。

日本進侵之後，潘沈兩對夫婦一同到重慶。從一九三八年起，重慶便成為戰時指揮中心，當地結集了國民政府官員、流離的江南資本家、美國政府代表，他們在此積極進行各類社交活動。在晚宴，他們交換內幕消息，重慶為此充斥派系與貪腐氛圍。於此地，回流美國留學生得到發揮空間。潘光迥的妻子畢業自歐柏林學院（Oberlin College），她與財政部長孔祥熙同為歐柏林學院舊生會成員。潘光迥利用此一關係，不斷得到晉升機會。一九四〇年十一月，他成為交通部處長。他亦曾代表行政院到訪美國，爭取援助。後來，他成為中國航空總公司（China National Aviation Corporation, CNAC）總監，以及中國農業機械公司（National Agricultural Engineering Corporation, NAEC）總經理。⁴¹相較而言，沈熙瑞專注於鐵路金融範疇。他先出任廣西銀行副行長之職，其職責是監管湘桂走廊事務。⁴²一九四二年，日軍佔據湘桂走廊之時，沈熙瑞成為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總監，主理海外匯款與債券銷售事務。⁴³按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美國高層李度（L.K.Little）（見第一章）所觀察，沈氏與潘氏不斷在重慶社會高升。李度亦畢業自達特茅斯學院，他認為，在美讀書所累積

的人脈，與中國之中的「關係」有相同效用。一九四三年，李度到達重慶之時，藉由相近的美國教育背景，親近潘氏夫婦。根據李度的形容，在晚宴之中，潘氏之妻至為可愛與具有魅力。⁴⁴李度亦以相同方式結交陳光甫、貝祖貽、孫科等人。一九四四年十一月，李度在另一於潘氏家中舉行的晚宴與沈熙瑞碰面。他回憶說，達特茅斯學院舊生沈熙瑞曾提到，廣西鐵路由約二萬五千工作人員自行謀劃，他們缺乏金錢與糧食，大部份人都賣了自己的兒女，有些則將之殺掉。⁴⁵對李度而言，這不是最令人享受的飯局對話，但我們可以見到，在潘氏的協助下，沈熙瑞的人脈網絡不斷擴張。⁴⁶

日本投降之後，國民政府的金融機構日益依賴美國，沈熙瑞在當中登上頂峰，這亦為他日後在香港的事業發展埋下伏線。潘光迥到上海為私人機構服務，沈熙瑞則回到南京。至一九四九年，他成為中華民國中央銀行副處長，以及中央信託局的助理總經理，後者是政府的主要採購機構。⁴⁷在這些職位之中，沈熙瑞與張嘉璈、宋子文、孔祥熙、李度等人直接共事。沈熙瑞也是外匯穩定基金（Foreign 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的副主席，在此他為陳光甫效力，力圖阻止貨幣跌勢，但不太成功。⁴⁸他亦曾一度成為美國助華委員會（Council for U.S. Aid to China）的祕書長，與美國經濟合作總署（Economic Cooperation Administration, ECA）合作，分發美國援助物資。⁴⁹後來他因貪腐案而辭職。在他離開之前，潘光迥已出任為委員會副主席。⁵⁰一九四九年四月，沈熙瑞決定與張嘉璈到香港。⁵¹潘光迥夫婦曾為此猶疑，但到了一九五〇年初，他們也移居香港。⁵²

在事業發展處於顛峰之際，沈潘二人計畫被打斷，他們移居至香港。在港之時，二人利用美國社會資本，共同以跨商策略謀生。潘氏先成立投資公司，以專營美國證券為賣點，但他向李度承認，這間公司最終蝕錢。⁵³一九五一年年底，李度協助潘氏接觸自由亞洲委員會，這個組織由美國中央情報局創建。李度建議自由亞洲委員會開辦反共刊物，由潘氏主理。自由亞洲委員會人員費來帝（Alan Valentine）與李度在午餐之時討論這個計畫，但費來帝反對由潘氏主理。費來帝同意，潘氏衣冠楚楚，且是「老朋友」，但他明確表示，潘氏想法無可救藥地糊塗，不適合處理自由亞洲委員會的工作。此前潘氏曾要求，自由亞洲委員會的政治宣傳不應視中國人民為敵人，甚至曾言，中共其實帶有善意，只是其執行方式有問題。費來帝因而認為，潘氏為人投機。⁵⁴其他自由亞洲委員會成員亦認為，潘氏希望加入組織，只為謀求個人利益。⁵⁵

這次挫敗令潘氏有所省思，他因而更進一步擁抱美國。一九五二年初，他重拾與達特茅斯學院之聯繫，並在崇基（另見第三章）教授經濟學。⁵⁶他也有發表公開演說，支持美港關係。一九五五年五月，他在聯青社（Y's Men's Club）演說，以「美國新經濟」為題。在演說中，他要求香港商界學習美國經濟之長。⁵⁷一九五七年十二月，潘氏在紐約漢諾威銀行（Hanover Bank）發表演說，他強調，香港具戰略樞紐價值，並提到香港的資本流入狀況，同時分析這對美國各大銀行而言有何潛在價值。⁵⁸一九六一年，潘氏女兒在威爾斯利學院畢業，並升學至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與此同

時，潘氏亦成為美國組織孟子基金會主席。⁵⁹第三章曾提到，孟子基金會由自由亞洲委員會成立，是美國文化外交的隱蔽戰線，其首任主席為李應林。一如歐偉國為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效力，或李卓敏為中大效力，潘氏同樣是與美國政府旗下組織協力共事。在孟子基金會任職之時，潘氏經常往返三藩市，或則參與亞洲基金會會議，或則探訪老朋友（例如沈熙瑞的前上司張嘉璈）。⁶⁰透過亞洲基金會香港分部，潘氏亦與美國中情局人員熟稔。⁶¹在一九六〇年代，潘氏與唐驥千共同領導國際獅子會，並組織達特茅斯學院舊生會。李卓敏其後任命他為中大公共關係處主管。⁶²

沈熙瑞最終亦以跨商策略謀求香港事業發展。在一九五〇年年底，沈熙瑞將妻兒帶到三藩市，並獨自回港，辭去官職。與潘氏一樣，他亦成立貿易與投資公司，不過公司最終失敗。潘氏協助沈熙瑞找尋工作，串連他與達特茅斯學院舊生的聯繫。貝爾（George Bell，見圖5.1）是其中一例，他是標準石油地區主管。一九五四年，潘氏告知達特茅斯學院，沈熙瑞正為美國家族企業 Anker Hemmingen & Co. 工作。這家企業從上海移至香港，並購置了在港可口可樂裝瓶權。⁶³李度與這個美國企業家族友好，沈熙瑞為這個家族工作，很可能與此人脈網有關。一九五八年，沈熙瑞投身於紡織業，受聘於江南企業家移民嚴欣淇，在怡生紗廠出任常務董事之職。這間廠共聘用逾千員工，他們日以繼夜工作，以滿足英美市場需要。因工作需要，沈熙瑞能夠不時到加州，在出席美國貿易展之時探訪家人，並且參觀美國院校，同時與美國大陸東北角新英格蘭（New England）紡織商與



圖 5.1：沈熙瑞和貝爾在達特茅斯學院舊生會雜誌，一九五四。"Shen, Hsi-Jui 1928," RSCLDC。由達特茅斯學院圖書館提供。



圖 5.2：沈熙瑞探訪耶魯和紐黑文紡織廠，由 *New Haven Register* 報導，一九六〇年六月十二日。"Shen, Hsi-Jui 1928," RSCLDC。由達特茅斯學院圖書館提供。

工業家建立關係。（見圖 5.2）後來李卓敏也有聘用沈熙瑞，邀請他在中大發揮所長。⁶⁴

簡單而言，要理解沈熙瑞作為英屬香港工業貸款大亨之崛起，便需要回顧他與潘光迥互相交集的人脈網，以及他們二人轉向跨商策略的經歷。沈熙瑞曾任官職，擁有深厚美國人脈，與回流美國留學生有聯繫，加上其技能，這都成為足以令他在滙豐銀行登上事業頂峰的資產。一九七〇年代末，他曾在訪問之中，如此告訴學者黃紹倫，解釋他如何能夠串連紡織業工業家與滙豐銀行：

「我到達之時，告訴紡織商有何替代方案。我私下認識他們，所以能夠代表他們，與滙豐銀行洽商。我們向滙豐銀行與港英政府官員進行遊說，說明紡織業對香港有何好處。他們的確也能夠見到紡織業的經濟利益。戰後紡織品需求甚殷，故此利潤龐大。基本上，工廠能在三年內回本。銀行只要能夠見到利潤，便會同意批出貸款。於是我充當滙豐銀行非正式顧問，每週設晚飯飯局，處理顧問工作。後來我愈加繁忙，滙豐銀行說，我們需要你。結果我在接下來三年乃至現在繼續顧問工作。這份工作甚至沒有合約。」⁶⁵

沈熙瑞的分享，包含很多重要信息。他所指的戰後，是指韓戰之後。韓戰致令貿易蓬勃發展，

沈熙瑞作為前民國政府官員與回流美國留學生，他因而能夠乘勢向英國銀行推銷紡織業的優秀表現，進而為紡織商取得貸款。換言之，他作為中介，串連銀行與工業家，從其社會資本取利。他曾創業失敗，在美國家族企業的發展亦受制，這說明他要取得此一中介地位，並非一蹴而就的易事。在一九五〇年代，他對紡織業有更深認識，與香港乃至美國的關係加深，並建議投資於紡織業。至一九六〇年代，他的成功，令滙豐銀行重視沈熙瑞。他不以合約方式為滙豐銀行效力，說明其能力與自主地位。事實上，在滙豐銀行檔案之中，關於沈熙瑞的材料甚少，只餘數幀照片。這意味，滙豐銀行與沈熙瑞都不願意記錄其行動細節。

需要強調的是，沈熙瑞的故事，並非只代表工業家眼中的滙豐銀行歷史一頁。爭取貸款只是工業家所面對的挑戰的其中一環。透過沈熙瑞與潘光迥，他們亦能接觸美國與台灣官員、英美紡織商、美國著名院校行政人員，乃至回流美國留學生，沈熙瑞亦能提供各類內幕資訊。很可能因為如此，香港棉紡織聯會推選沈熙瑞作為其代表，與華盛頓就美國棉織物關稅進行洽商。⁶⁶

在美國保護主義之下，沈熙瑞的行動能夠反映精英的社會資本如何能夠形塑本應理性的市場。沈熙瑞得到滙豐銀行委任之後，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為其設宴以慶祝。⁶⁷《華僑日報》曾刊載沈熙瑞演辭，他當時要求本地銀行家與廠商協力。⁶⁸他具體地指，香港欠缺中央銀行，是本地各銀行行為求提供高利率而不惜進行惡性競爭的原因。他讚揚本地銀行在一九四九年之後的貢獻，但也



圖 5.3：沈熙瑞（右二）與紡織工業家們（左起）Y. C. Chen、Eric Chen、S. T. King、H. C. Yung (Rong Hongqing) 與 Y. C. Wang，一九七七年三月。經滙豐控股有限公司許可轉載。

指，銀行為投機者提供高息貸款，令樓價上漲。亦因為此，相較工業製造商，發展商更能以高息取得貸款。沈熙瑞認為，工業廠商是為不斷膨脹的人口謀福祉，故此需要本著服務精神，壓制投機風氣，為生產商提供更多資本。他說，廠商面臨生存危機，這亦關乎公眾利益。⁶⁹

沈熙瑞視工業發展等同公共服務，與此同時，他與友人乃至同僚都在爭取更多經濟規劃權力，以影響本地金融市場。很多銀行參與地產泡沫投機活動，的確是事實，但沈熙瑞倡議補貼廠商，卻不一定合乎滙豐銀行金融利益。我們在此可以見到非正式解殖的反面。沈熙

瑞之任命，既反映英帝國權力在旁落至親美華人手中，但亦意味不需問責的商界精英在崛起。滙豐銀行其後主導工業貸款是否為明智決定，其實是值得思考的問題。說到底，貸款乃至經濟轉變並非純然是客觀數據問題。

5.3. 外來直接投資與香港經濟發展

一九四五年，香港仍未有紡織廠。至一九五三年，紡織廠數量增至十三間。至一九六五年，數量進一步增至四十間。⁷⁰這些紡織廠都具規模，再非以「遊擊隊」模式經營，其工人數再也不止於四十人，至一九七〇年代，人數已達平均五百人。⁷¹在一九七〇年，唐氏的南海紗廠聘用了近兩千五百人，他們以三班制二十四小時工作，廠內共有五萬七千部紡錘與九百二十五部動力織機。⁷²在沈熙瑞的影響力下，滙豐銀行取代上海商業儲蓄銀行與花旗銀行，成為這些紡織器械的主要融資者。問題是，這些紡織廠是否也有接收其他外來直接投資？廠商有否以外來資金替代銀行貸款？

港英政府對這些問題很感興趣。政府不太願意收集經濟數據，但工商業管理處（Commerc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仍有進行調查，了解外來投資狀況。在今天的政府檔案處，仍可找到這些調查結果，過去似乎並無學者引用調查結果。在一九六〇年，港英政府官員發現，只有二十六家

工廠得到外來直接投資，英國是其中一個資金來源地。這二十六家工廠共聘用一萬零二百六十四人。至一九七〇年，得到外來直接投資的工廠數目，增至一百六十二間，這些工廠共聘用五萬四千五百六十二人。⁷³在此後三年，共二百五十七間工廠得到外來資金，受聘人數達七萬一千人，佔當時製造業勞動人口百分之十二。港英政府官員注意到，美國是主要資金來源地。⁷⁴例如在一九七〇年五月，美資工業企業資金額達二點七一五億港元，佔總數百分之六十一。英國投資額排名第二，佔百分之十七點五，日本投資額緊隨其後，佔百分之十一點七。⁷⁵在聯營企業之中，日資佔百分之三十五點五，佔領先地位，英資與美資緊隨其後，佔百分之二十九點四與百分之二十五點七。⁷⁶至一九七三年三月，美國對香港本地製造業總投資額達四點六五七億港元，日本與英國投資額則達二點七九七億與一點零七七億元。⁷⁷這三個國家都投資於電子、紡織、拆船、食物加工、塑膠等行業。外國投資的工廠，都放眼於出口市場，外資電子與服飾廠主理逾九成出口品。一九七二年，外資工廠一半製品都橫跨太平洋出口至美國，至西德、英國、日本的出口品則佔百分之六點六、百分之四點九、百分之三點七。⁷⁸可以說，在一九六〇年至一九七三年間，香港工業得到了美國、日本與英國可觀的資金。這些外資主要集中於電子與服飾業，亦推動了香港往美國的出口發展。

在一九五〇年代，美國對港直接投資開始增加。當時美國企業開始入股香港製造業中小企業。例如，在一九五五年，美泰兒公司（Mattel）購入一間精密模具公司大部份股權。在一九七〇年代，

其堅尼地城工廠共聘用一百二十位塑膠倒模工人。⁷⁹一九五六年，愛夫特公司（Everyday Flashlight Co.）收購了紅磡的電筒廠，這間工廠原為上海工業家移民宋文魁所擁有。這次收購，是為拓展美國與區域市場。⁸⁰在一九六〇年代，這間愛夫特子公司成為崇佳實業（Sonca Industries）一員。⁸¹玉米產品提煉公司（Corn Products Refining Company）則在一九五七年首次投資於香港，生產果凍、玉米澱粉、含碘食鹽、雞精、葡萄糖粉。⁸²美國華人家族也有投資。一九五八年，趙氏家族在香港黃竹坑開設香港實業（造木）公司（Hong Kong Industrial [Woodwork] Company），公司聘用逾百員工。⁸³

在一九六〇年，有些紡織業工業家移民開始招攬外資，以推動生產多元化，以及應對英美保護主義。香港低廉的紡織品引發英美兩大出口市場之反彈。《蘭開夏協議》（Lancashire Pact, 1959-1965）與《棉紡織協議》（Cotton Textile Arrangement, 1962-1973）設訂限額，以控制香港紡織廠的出口量。在一九五七年，美國華盛頓亦應用類似方法，限制日本棉紡織與成衣之出口。⁸⁴香港媒體大力批評此一配額制度。⁸⁵但此制度懲罰的，是紡織業後進者，對一九六〇年前設立的紡織商反而有利。⁸⁶這些配額反而有助香港紡織大廠穩定海外市場需求，沈熙瑞曾協助議定配額量。在一九六〇年代初，香港大紡織商開始注意到，繼續在本行投資，弊大於利，故此認為，善用既有生產資源有其必要。紡織商於是開始投放資源，生產不受配額所限的合成纖維與成衣。在一九五〇年

代，香港生產大量出口紗品，於一九六九年，本土消費量已佔產量百分之九十八。⁸⁷換言之，香港本土紗品再也不是出口成品，這成為了成衣原料。紡織與成衣業是香港製造業的根基，在一九六五年，佔香港出口量百分之五十二，其聘用的工人量，佔總數百分之四十一。⁸⁸

外界總認為，上海移民極力維護其財政自主，喜歡從銀行大量貸款而非公開融資。⁸⁹一九六七年，香港只有九間工業公司上市。⁹⁰但到最後，約三分之一香港紡織業商向海外投資者售賣股份，更多企業（特別是在成衣界）選擇與海外投資者聯營。一九六九年，有調查顯示，四十一間成衣與紡織廠得到外來直接投資。當中十二間為紡織廠，另外二十九間（百分之七十一）為成衣廠。一九六五年，香港紡織廠數量處於高峰，共有四十間。按此數據，我們可以估計，約三成紡織廠擁有海外股東。在二十九間成衣廠之中，十三間為外企全資擁有，十六間為聯營公司。⁹¹一九七三年三月，申報得到外來直接投資的成衣廠增至四十三間，紡織廠數目則增至十九間。⁹²這些調查結果，建基於受訪企業的主動回應，我們因而可以推測，實際數字可能更高。換言之，香港紡織商雖然不以股票市場為融資平台，但他們仍然積極爭取美日資金。

仍然值得研究更多的問題，是誰促成這些交易？交易如何發生？家族跨商策略之應用與否，提供了線索。李震之家族與美國甚少關連。李家是江南早期紡織工業力量。在一九二〇至一九三〇年代，李家透過香港，從上海出口紡織品至東南亞。李震之曾就讀於上海一家小型大學，並因戰事而

輟學。在和平時代，他協助營運大同紗廠。⁹³一九四七年，國民黨開始更為嚴格審批入口許可，以防外匯流失，李震之因而調動機械與人員至香港。⁹⁴他先在上環設立大南紡織。在一九五〇年代，他於九龍設置另外五間紡織廠，分別為大東紡織、金星紡織、南新印染廠、亞州建業製衣廠、星洲馬來亞紡織。⁹⁵為求融資，以滿足發展需要，李震之與香港兩間英殖銀行（滙豐銀行與渣打銀行）建立關係。⁹⁶沈熙瑞很可能曾協助李震之，原因是他們曾在江蘇同鄉會共事。⁹⁷在李震之眼中，美國雖是最大市場，但他常到西歐（特別是英國與西德）外訪，出席貿易展、觀察競爭者、建立各種商務關係。⁹⁸一九六〇年，李震之被任命成為太平紳士（Justice of the Peace, JP），在同年，其長子李雍熙被送到倫敦帝國學院（Imperial College London）⁹⁹留學。

一九六二年，李震之開始從其英國資本得到回報。在該年，他得到資金，進而成立聯業製衣有限公司（TAL Group）。五月之時，怡和洋行主席巴敦（Hugh Barton）宣佈，他會與李震之合作，以聯營公司方式整合其旗下工廠，進而在國際規管日益嚴厲之時達到規模經濟效益、提高市佔率。¹⁰⁰聯業製衣在七月成立，巴敦為主席，李震之為執行董事，在當時，這是英屬香港規模最大的紡織廠。¹⁰¹翌年，聯業推出其女性服裝品牌「黛麗」。在一九六四年九月，李家仿效唐家與榮家，成為第三個將紡織公司上市的家族。¹⁰²其首次公開募股由滙豐銀行與渣打銀行負責。¹⁰³於一九六〇年代末，聯業急速發展，其每年利潤從一九六七年的六十七萬港元至一九六九年的一百五十萬。¹⁰⁴

李家專注於歐洲市場，同時在一九六六年，李震之首次到訪美國。¹⁰⁵一九六八年，聯業將其製衣器械升級，這得力於日本財團伊藤忠商事株式會社的資金。¹⁰⁶亦因此，聯業可以生產不受配額所限的製品，同時將低利潤營運外判至台灣、馬來西亞、泰國、毛里求斯（Mauritius）、尼日利亞各地。¹⁰⁷一九七三年，聯業利潤達至頂峰，在五年之內，其總資產增加百分之二百七十至四點八億港元。¹⁰⁸其時李震之已逾六十歲，他開始培養長子接班，其姪李乃熺亦在一九七三年加入公司。李乃熺畢業於倫敦帝國學院，並在美國布朗大學取得博士學位。簡單而言，李家聯業反映了香港工業企業為人熟識的營運方程式——依賴英日資本、區域生產關係、歐洲市場。

相較而言，唐家的跨商策略，則是帶領南海紗廠在英國資金之外，爭取美國資金與商業關係，同時專注於美國市場。前文曾提過，在一九五〇年代，唐炳源推動生產多元化，以迎合美國市場需要。於英美保護主義興盛之時，在一九六四年，南海紡織生意達至頂峰。唐炳源另尋出口市場，例如在一九六五年，他帶領貿易代表團，到訪新興獨立國家肯亞、坦桑尼亞、烏干達、尚比亞。¹⁰⁹同樣在一九六四年，唐炳源宣佈，南海會公開上市，英國帝國化學工業（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隨即尋求合作。此前帝國化學工業發明聚酯纖維，並計劃在香港生產。一九六三年，帝國化學工業購入南海百分之五股權，一九六四年南海上市之後，其股權增至百分之十。在此英國資金下，南海得以購置新器械、設立新廠、重新培訓員工生產新製品。¹¹⁰但與此同時，唐家亦積極尋

找美國聯營合作夥伴。一九六〇年代初，紐約服飾大入口商瑪萊工業（Marlene Industries）代表曾到港物色供應商。唐家隨即趁此機邀約，但這位代表的種族主義意識令合作無法成事。一九六四年，美國牛仔褲生產公司李維斯（Levi Strauss）主動接觸南海，提議成立聯營公司，以特定方式生產牛仔布。基於美國人對牛仔布的熱愛，以及李維斯的企業名氣，唐家接受此一合作提議。¹¹¹這次合作的利潤極大。一九六九年，李維斯上市，唐家需要出售股份，這次出售金額，足以令南海在一九六九年之後獨力開拓服飾業務。¹¹²

一九七一年，唐炳源離世，其子唐驥千仍然倚重美國網絡，以拓展公司業務。他先到台灣，與當時台灣財長李國鼎見面。李國鼎提出吸引條件，邀請唐家子公司聯亞集團（Tristate）到高雄加工出口區設立紡織廠。唐驥千同意，並且選擇與一位美國經理合作，這位經理在美國服飾業擁有良好人脈。按唐驥千的回憶，這位經理曾多年向南海購置紡織品與布料。在美國，他主管服裝廠的銷售與原料事務，李維斯的工廠亦受其管理。與這位經理合作的目的，是為促進南海服裝品在美國之銷售。對唐家而言，與美國夥伴合作是重要營商策略，但這種策略不一定時刻成功。上述美國經理曾為一位買家提供賒購寬限，但這位買家最後沒有清付款項。在美國進行三年法律訴訟之後，設於高雄的聯營公司終於錄得盈餘，成為南海旗下的核心公司。在一九七〇年代中，唐驥千亦與日本企業三井物產以及可樂麗合作，成立聯營公司，但結果未如理想。一九七〇年代末，香港製造業處於高

峰期，唐驥千開始向發展商出售南海部份旗下物業，甚至與當時崛起中的地產大亨李嘉誠合組聯營公司。地產業務所得利潤，事實上高於一九四九年後紡織業所得的總和。¹¹³

上述故事反映個人人脈網與社會資本如何影響企業長遠發展。李家選擇倚重英國社會資本，唐家則選擇投向美國，不過與此同時，在唐家的跨商策略之中，英資與日企仍有其角色，唐家甚至放眼於非洲市場。在下一章，我們會繼續比較一九七〇年代後福特主義危機之後李家與唐家的營商策略。

電子業的發展，亦有助了解社會資本對外資的影響。外資對香港電子業投放更多，由此衍生、由外資擁有的子公司亦成為全球商品鏈的一環。根據美國商會月刊，香港本土企業最先在一九五九年設立小型電子廠，利用日本零件組裝收音機。至一九六二年，英屬香港共有十四間工廠，其出口品價值達七百三十萬美元，受聘人數達八百八十一人。在一九六二年，其中一份月刊指，日本與美國企業開始意識到，香港頗具潛力，其潛力包括其社會穩定，且其稅率與人力成本低廉。美日資本因而湧進香港，其投資分佈於消費品與電子製品之生產。¹¹⁴受外資加持的電子廠，其規模遠超於「遊擊隊式工廠」之規模，但這亦令香港製造業重心移向生產鏈中的低增值項目。在一九七四年初，百分之七十八電腦組件、百分之五十五電晶體、百分之八十九合成電路都被出口至美國，供分發、組裝、轉口之用。玩具業約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六十製品亦被出口至美國。¹¹⁵

不過，外資對產業多元化的影響相當有限，香港電子業生產多元化之勢並不持久，且也沒有迎向高檔品消費市場，原因有二：第一，政府協力極為有限；第二，香港缺乏擁有深厚人脈、能夠影響大局的電子業工業家。香港電子業只在本土勞力成本低廉之時發展，工資上漲之後，便無以為繼。港英政府的「積極不干預」政策確能招攬外資，但不足以為本土企業提供誘因，使之投放資源，進行研發。¹¹⁶在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一九九〇年代，香港電子業最終北上至中國，且沒有為香港留下著名電子產品品牌，或提供就業機會，情況有別於台灣。

5.4. 案例：美國兩大企業之在港投資

在一九六〇年代初，香港經濟生氣勃勃，其一九六二年與一九六三年的年均本地生產總值達百分之十四與百分之十五。但這不代表香港經濟全無暗湧。國際競爭激烈、勞力成本上漲、物業價格高昂，都令香港製造業面對步入高增值生產的壓力。沈熙瑞曾指，香港人口急增、土地有限、規管寬鬆，令金融與地產投機變得熾熱，工業的生存空間因而受擠壓。在投機風之下，於一九六一年與一九六四年年底，廖創興銀行與恆生銀行分別發生擠提，後者因而在一九六五年被匯豐銀行收購。¹¹⁷換言之，香港勞工密集、出口導向的工業模式並不穩定。

與此同時，經濟熾熱，亦令香港社會變得躁動。在一九六六年，英屬香港房價高昂、欠缺勞工保障與社會服務，今天星小輪加價騷動爆發。在當時香港，約半人口低於二十一歲，但當中只有百分之十三年青人口就讀於中學。¹¹⁸香港青年在九龍一帶表達對政府之不滿，政府則派遣警察與「踞咯兵」(Gurkha)發放催淚彈，控制人群。在一九六七年春夏之間，香港受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影響，另一波勞資糾紛爆發，並演變成為暴動。示威者聲討英美帝國主義，並在交通工具與大廈放置真假炸彈。在一九六七年八月，香港社會主流輿論對暴動反感，麥里浩(MacLehose)改革時代(1971-1981)隨即到臨。在整個一九六〇年代，香港是不乏怨氣的血汗工廠。¹¹⁹

在這種社會與經濟危機之下，香港存有兩大計時炸彈，一為電力供應，二為房屋供應。香港製造業發展蓬勃，對電力需求甚殷，地產炒風亦推高樓價。電力與房屋供應皆需及時增加，但若缺政府干預，這難以成事。在一九六四年與一九六五年，香港迎來及時雨，這波及時雨來自全球兩大企業——埃索與美孚石油。這兩大巨企都源自洛克菲勒(John D. Rockefeller, 1839-1937)的標準石油，在一九三三年與一九六二年間，曾在亞洲合組施丹維克(Stanvac [Standard-Vacuum])，後因分歧而分拆。很值得注意的一點，是這兩間巨企在同一時間決定於英屬香港投放數以千萬美元資金，而當時的香港在中共之旁，既不易防守，亦無石油。更何況，除了建設貯存與分發能源產品的設施之外，兩間巨企都未曾曾在亞洲作如此規模的不動產投資。那為何如此？

答案在於香港商界精英的跨商策略。這些精英意識到，若然得到外國資金支持，上述兩大計時炸彈能帶來利潤可觀的機會。他們利用個人人脈與內幕消息，形塑港英政府政策，為埃索與美孚石油鋪路，引領兩大巨企爭取與利用這些機會。作為港英政府與跨國企業的中介，這些精英重塑房屋與能源政策，以滿足其利益，進而推動了非正式解殖。

招攬埃索的，是嘉道理家族 (Kadoorie family)。嘉道理家族展現的，是如何從親英轉向親美，這亦說明，跨商策略並非華人專利。嘉道理家族源於米茲拉希猶太人 (Mizrahi Jews)，他們在十八世紀從巴格達 (Baghdad) 到孟買 (Bombay)，艾利·嘉道理 (Elly Kadoorie) 與伊利士·嘉道理 (Ellis Kadoorie) 兄弟則在一八八〇年代到香港，為沙宣家族 (Sassoons) 工作。在一九一一年，艾利成為獨立貿易商，他與其妻到上海，並因馬來亞橡膠而致富。伊利士則留在香港，並購入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 (Hong Kong & Shanghai Hotel Company) 與中華電力 (China Light and Power, CLP) 大部份股權，前者擁有香港半島酒店 (Peninsula Hotel)，後者為香港的九龍與新界提供電力。伊利士能夠購入中電股權，原因是在一戰期間，英人需要資金週轉。艾利夫婦送他們的兒子到英國布里斯托 (Bristol) 克里夫頓公學 (Clifton College) 與林肯律師學院 (Lincoln's Inn) 留學。在二戰之時，艾利一家被日人囚禁，於一九四五年之後，其兩位兒子恢復家族生意。在此之前的一九四一年，英人炸毀中電的發電站，半島酒店亦被徵用為戰時指揮部。¹²⁰

在上海之時，艾利的兩位兒子認識了很多工業家，這些工業家後來成為香港移民。在一九五〇年代，他們與這些移民工業家開拓美國市場商機。在聯合國與美國實施貿易禁運政策之時，艾利兒子之一羅蘭士（Lawrence Kadoorie）發現商機，他認為，香港可以生產擁有中國結的地毯，外銷國際市場。¹²¹一九五六年，嘉道理家族成立香港地氈製造有限公司，公司成員有兩位來自榮家（見第一章）。朱孔嘉與兩位美國人拉賓（Allen Rabin）以及莊生（Linden Johnson）都是公司合伙人。朱孔嘉曾是上海商業儲蓄銀行的銀行家，在上海之時，亦曾於美國AIA出任首席會計師之職。拉賓是洛杉磯交易員，莊生則是香港工業家，他擁有Mandarin Textiles，僱用一千三百人，專門生產高級女性絲棉成衣產品，外銷至美國。¹²²這些公司創辦人，都有深厚人脈與具有經驗。香港地氈製造有限公司選擇在屯門設置廠房，以迎合美國市場需要。半島酒店亦設立展示室，陳列其「太平」品牌產品。一九五九年，小約翰·戴維森·洛克斐勒（John Davison Rockefeller, Jr.）到訪香港，當時羅蘭士曾在陳列室為其介紹地氈產品。其後洛克斐勒旗下公司與之簽約，成為地氈在美國唯一的發行者。洛克斐勒甚至利用其人脈促成訂單，例如洛杉磯的中國戲院（Grauman's Chinese Theatre）、福特汽車與大通銀行的會議室都選訂地氈。至一九六〇年，公司規模已擴展至擁有五百位員工，廠房遷至吐露港。¹²³

中華電力面臨危機之時，嘉道理亦運用跨商策略。電力需求大增，引發停電事件，電費亦上

升，公眾開始主張政府收回中電供電權。中電希望能夠擴大規模，但資金何來？羅蘭士認為，再增電費無補於事，與此同時，即使他在一九五七年加入滙豐銀行董事局，滙豐亦無法提供所需貸款。羅蘭士的兒子後來憶說，羅蘭士面對此一困境，不斷奮鬥，希望尋得銀行以外的資金，以助中電發展。¹²⁴在某個週日午餐會中，他邀請加德士（Callex）的一位美國朋友共聚。席間，這位朋友提到，只要向石油公司下長期訂單，他們或會同意投資請求。羅蘭士此前不曾想到這一點。他先接觸中電長期石油供應商蜆殼公司（Royal Dutch Shell），但其高層拒絕投資計畫，並提醒羅蘭士，指蜆殼從事的石油供應生意，不是供電生意。羅蘭士於是改而接觸美國人。他聯絡來自上海的美國老朋友。這位老朋友是貝爾，曾管理施丹維克，亦是達特茅斯學院舊生。（見圖5.1）透過貝爾，羅蘭士安排在紐約與埃索主席海達（Michael Haider）見面。一九六二年，施丹維克瓦解，令埃索失去香港據點。羅蘭士為此建議，中電與之合組聯營公司，以令埃索重新掌握香港市場。海達對此感興趣，並隨即開展秘密協議。¹²⁵

羅蘭士的優勢，在於他作為埃索與港英政府的中介，這形同歐偉國在聯合董事會與港英政府之間的角色（見第三章）。為達成協議，羅蘭士需要強調反共立場，以遊說該堅定反共的巨企願意為「紅色中國」、不易防守的英屬香港投放史無前例的資金。¹²⁶亦因為此，羅蘭士與港英政府官員合作，制訂新的能源政策。一九六四年十一月，《管制計畫協議》（Scheme of Control）面世。這份

協議基本上是由港英政府官員與中電管理層共同編訂，其目標是控制電價，同時防止政府收回供電權、容許電價與稅率有限地浮動。中電的最高利潤，被訂為其固定資產額的百分之十三點五。協議為中電與埃索的協商提供了助力，因為這容許了中電與埃索的聯營公司持續擴張，以得到更多盈利。但協議並無要求中電將盈利回贈給消費者。中電可將盈利投放於「特別發展基金」(Special Development Fund)，供未來公司擴張之用，這個基金不用納稅。¹²⁷簡單而言，羅蘭士為埃索提供的，是盈利可觀、基本上免稅、可持續發展的香港生意機會。在香港，這並非常見的公私營合作，亦象徵在非正式解殖的過程中，政府權力被下放至私營機構的管理人員。不意外的是，中電最大客戶——唐家的南海紗廠——大力支持此一協議。¹²⁸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電與埃索成立其首間聯營公司——半島電力 (the Peninsula Electric Power Company)。埃索佔有六成股權，中電則佔四成。埃索同意為香港新發電廠提供營建資金，中電則負責興建電廠與分發電力。¹²⁹嘉道理家族所運用的跨商策略頗為特別的一點，是其美國社會資本並非來自在美教育或冷戰項目。嘉道理家族透過其他途徑與洛克菲勒、貝爾、拉賓、莊生、上海移民精英 (例如唐家) 建立了關係。埃索與中電的合作，帶來了非常可觀的利潤，在一九七〇年代至一九八〇年代間，兩者共同建立了數間亞洲規模最大的發電廠。埃索為青衣發電廠投放的資金，原為七億港元資金。在二十六年間，埃索在港的資產價值增加了百分之

一千四百二十八，至一百億港元。¹³⁰

埃索與中電共同成立聯營公司，原已是特別案例。但在此後數週，美孚石油宣佈另一香港史無前例的投資計畫——重建位於荔枝角的石油貯存庫，將之建成英屬香港首個大型私人屋苑。如同埃索初涉供電生意一樣，這也是美孚石油染指地產發展的首個嘗試。這其實也是跨商策略應用的案例之一，在此案例之中，主要推手是宋啟鄺，他是美孚石油當時新任本土執行董事。

與很多跨商一樣，宋啟鄺透過傳教士學校以及戰時中美關係與美國建立了聯繫。他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生於漢口，是鐵路工程師之子，因其父工作關係，他們一家移居至北京與青島。其後在一九三六至一九三七年間，他在東京專修大學（Senshu Daigaku）修讀日文。¹³¹一九三七年四月，他回到青島，並在一所天主教學校修讀英文，其學業在七月日人進侵之時中斷。該校美國修女為其爭取以獎學金到美國聖母大學（University of Notre Dame）留學的機會，於是他與兄弟在該年夏天橫渡太平洋。一九四一年春，他在聖母大學畢業，隨後在芝加哥大學完成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他與很多中國移民一樣，無法取得美國國籍，但在一九四三年一月，在面臨被逐出境的威脅之下，他加入了美軍。¹³²其受訓地是密西西比與馬里蘭，完成訓練之後，他成功在一九四三年四月得到美國國籍，八個月之後，美國《排華法案》始被廢除。¹³³此後他被派到巴基斯坦卡拉奇（Karachi），參與空軍情報工作，隨後在阿薩姆（Assam）、昆明、重慶工作，期間他成婚。宋啟鄺成功得到

晉升，成為馬歇爾將軍 (George Marshall) 個人助理與翻譯員，並得到銅星勳章 (Bronze Star)。一九四七年，他完成美國國務委員會在上海的工作。於上海，宋啟鄭認識了不少前文曾提過的精英，例如陳光甫、沈熙瑞、李卓敏。此後他重回商界，在施丹維克出任會計師之職，並留在上海至一九五二年。一九五三年六月，宋啟鄭移居至香港。¹³⁴ 貝爾退休、施丹維克在一九六二年解散之後，於一九六三年，宋啟鄭成為美孚石油的執行董事。與此同時，其兒子宋賢慶從安多佛高中 (Andover High School) 畢業，並入讀普林斯頓大學。¹³⁵

一九六四年，美孚需要重建其貯存庫。貯存庫佔地四十五英畝，葵涌高速公路為此難以興建，港英政府需要九英畝土地，貫穿貯存庫用地，作築路之用。官員與宋啟鄭商議換地計畫，這對美孚極為有利。政府的提議有二：一，在青衣撥出九英畝土地，供貯存庫遷移之用；二，餘下三十六英畝土地，可作重新發展。¹³⁶ 這種提案並不常見。理論上，所有香港土地皆由政府批租，作為地主，港府不用提出這種提案。在一九六四年，香港地產業開始興盛，於是宋啟鄭要求紐約美孚派遣地產專家到港。發展商葛柏夫 (John W. Galbreath) 被委派到香港，他在紐約擁有與營運高樓大廈，內有美孚辦公室進駐。¹³⁷ 葛柏夫指，他建議宋啟鄭團隊將用地改作中產住宅區。¹³⁸ 宋啟鄭團隊顯然同意。他們隨即聘用紐約地產公司 Galbreath Ruffin Corporation 構思與統籌項目，同時請香港的王董集團以及紐約丹拿建築 (Turner Construction) 監督項目。一九六五年夏，美孚已極有效率地正式

呈交計畫，供香港房屋委員會審批。這個項目得到國際注意，宋啟鄭特別在《紐約時報》誇讚項目的發展速度與規模。¹³⁹

這不只是房屋發展項目。按照計畫，建立世界最大型私型屋苑是其真正目標。屋苑被命名為「美孚新邨」。(圖5.4)從一八八〇年代起，「美孚」便被定為美孚石油的中文名稱，意指「美麗」與「可信」。¹⁴⁰其煤油燈乃至品牌在中國也家傳戶曉。¹⁴¹美孚新村共有九十九幢樓高二十層的大廈，以八個階段分批完成，最後階段在一九七六年完成，屋苑共可容納八萬人，共一萬三千戶，佔當時香港人口百分之二。美孚新邨不只規模大，且也為中產居住環境定下新標準，猶如東京外的常盤平住宅區。¹⁴²屋苑內每幢大廈形同美國中產市郊住宅，樓下為停車場、店鋪、市集、銀行、學校、遊樂場、巴士總站。肯德基亦選址在此開店，規劃師亦特別在苑內設置美孚加油站。¹⁴³

但在項目進行之際，危機驟至，美孚為此需要付出額外成本。在一九六五年年中，美孚成立子公司美孚投資，以助工程進行。但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間，香港爆發銀行危機與社會暴動，地產業一度步入寒冬，以建立全球最大屋苑為目標，因而顯得有點自視過高。在此時，香港美孚請求大人物支援。一九六六年十月，美孚主席華納(Rawleigh Warner)到訪香港，宋啟鄭為其於希爾頓酒店設宴，眾星雲集。¹⁴⁴數週之後，港督戴麟趾參加奠基典禮。¹⁴⁵在興建過程之中，宋啟鄭也邀請其他親美移民精英參與其中。例如，第一期工程由江南移民葉庚年與其弟葉謀遵的建築公司負



圖 5.4：關於美孚投資美孚新邨的專題報導，香港美國商會於一九七六年報導。由香港美國商會提供。

責，他們是美國伊利諾大學（University of Illinois）與哈佛大學畢業生。¹⁴⁶在第四章，我們見到，葉氏兄弟也是新亞書院捐款者。另一例子，是美孚新邨所用窗戶，由林家的捷和實業負責。（見第三章）¹⁴⁷第一期工程從一九六八年開始，一九六九年七月，住戶開始遷入。¹⁴⁸第一期工程所用的資金額，到四億五千萬港元，工程所用工人人數達逾三千五百人。¹⁴⁹

此一巨大投資最終有可觀回報，且亦改變了美孚的全球尋租策略（global rent-seeking strategies）。美孚新邨項目新穎的管理模式與大廈設計大受歡迎。在當時的香港，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住戶居於蜂窩型、共用廁所的徙置區，美孚新

邨象徵著中產夢。亦因此，美孚與住戶得到可觀投資回報。至一九七六年，美孚新邨平均樓價上漲了百分之六百。¹⁵⁰這種爆炸性增長反映人力如何可以操控樓市，且其影響散播至全球。眼見美孚新邨的成功，在一九七〇年，美孚成立土地發展公司，於全球業務之中開源。這間公司的任務，是重新營造地產項目，三藩市南部的紅木海岸（Redwood Shores）樓盤，是其實驗作。¹⁵¹於一九六〇年代末，美孚與埃索都將業務重心移向不動產多於生產，這是後福特時代、資本主義晚期的發展轉向。這一切，都源於「第三世界」香港的跨商策略家。

5.5. 小結

這一章分析了在一九五〇年代末至一九六〇年代，精英社會資本如何影響工業與地產資金流向。本土發展與非正式解殖由此而生。一九六七年，利舜英的丈夫從花旗銀行退休，她招呼來賓人龍，從中可見移民精英如何將他們過去深厚的人脈融入於香港本土。（圖55）透過潘光迴與沈熙瑞的案例，我已指出移民精英如何憑藉跨商策略存活，成為滙豐銀行大班，促進銀行與工業家之間的合作，孕育香港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出口導向發展。一九六〇年代的英美保護主義，令一眾紡織工業家極力推動生產多元化，招攬外國直接投資，與英美日企業結伴。本章開段已指，自由市場競



圖 5.5：一九六七年，利舜英在丈夫位於香港文華東方酒店的退休晚會上接待客人。由 Victoria Sperry Merchant 提供。

爭框架並不足以解釋香港經濟發展。透過跨商，我們可以看到故事的另一端——企業發展、市場條件、腹地選擇，皆取決於教育背景、經驗、人脈網絡。沈熙瑞與他所喜好的工業家導引英屬香港金融市場服務工業利益，唐家與嘉道理等大家族則與跨國大企業廣有接觸，遊擊隊式資本家、電子業企業家的情況卻大不相同，由此可見社會資本與全球金融資本之間的關係。聯業製衣案例顯示，就算跨太平洋網絡並非機會的唯一來源，其角色亦日益重要。埃索與美孚對港投資，則反映跨太平洋網絡為香港帶來的利益不可估量，香港甚至因而帶領全球金融化與彈性生產的風潮。在下一章，我們將會見到，這種轉向為唐家帶來的利潤，遠超他們自一九四九年起的實業業績總和。

細繹梳理跨商的行動，有助我們避免以偏蓋全。需要強調的是，這些跨商都是移民，在遷居至香港之際，他們失去了不少資產。潘光迥與沈熙瑞甚至需要為重新發展個人事業而費力。韓戰的發生，也為唐家的冒險帶來更多成功的可能。他們能夠閱讀國際政治，並從其社會資本取利，故此能夠成為非一般的香港移民。但當第二、三、四章所提及的留學經驗變得普及之時，這種社會資本的身價便不再一樣。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香港是全球美國留學生最大輸出地，這是冷戰加上跨商策略的結果。在下一章，我們會見到，於一九七〇年代，香港不再依賴低廉勞力，開始邁向知識型經濟，重視服務業。在一九七〇年代初，製造業佔本地生產總值約百分之三十，此後不再增長，原

因是亞洲鄰近地區的勞力同樣低廉，全球金融市場在「尼克遜衝擊」（Nixon Shock）之下波動，

歐洲經濟共同體 (European Economic Community) 不再將香港列為發展中地區、不再給予優惠關稅。¹⁵² 不過，香港沒有墮入中等收入陷阱，因為第二代跨商能夠掌握全球資本流動，並革新其家族公司，使之成為具美國風格的香港跨國企業。

教青松仙
【第六章】

Chapter 6

跨商效應

香港教育網絡與經濟起飛



第六章 跨商效應

——香港教育網絡與經濟起飛

「歷史經驗表明，本土與國際交匯源於知識匯流。換言之，窮人只要掌各種技術與知識，得到教育，便能與富人平齊，脫離富人財產身份。」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在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經濟起飛。按世界銀行數據，一九六〇年英屬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GDP per capita）為四百二十九美元，與牙買加以及南非相約。在當時的香港，農業與漁業所僱用的人數仍達四十萬人，較製造業所聘用的二十三萬人為多。第五章曾提到，在一九六〇年代，

香港工業急速發展，至一九七〇年，工業業界所聘用的人數，已達一百五十萬人之中的六十萬。²與二戰後很多社會一樣，很多人都能感受到香港一九六〇年代經濟增長的好處，英屬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加逾兩倍至九百六十美元，較牙買加以及南非稍高。至一九八〇年，香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已增至五千七百美元。在十年內，此一數值增加約六百倍，香港成就耀眼，其表現遠超其他發展中地區，得以與以色列及愛爾蘭平齊。但這時期的增長亦不重平等。很多人為此而變得富裕，新一代全球經濟勢力應運而生，他們當中很多都是跨商。英屬香港不民主、稅率低、法規寬鬆，同時成為推崇新自由主義、著重金融發展的全球經濟中心。

一直以來，學者視此一經濟轉型為「東亞奇蹟」，並假設香港成就可與區內南韓、台灣、新加坡作比照。社會科學家與經濟歷史學家特為此提出三大框架，以解釋四小龍特別的經濟增長。第一個框架探討區內發展型國家 (developmental state) 如何穩固，以及日本乃至其資本有何影響。³認為香港欠缺發展型國家體系的論者，則會提出另一框架，指英殖時代的自由市場政策是關鍵因素，當中至為著名的代表是經濟學家佛利民。⁴第二個框架強調儒家傳統，認為其對教育、紀律、權威的尊重，發揮了巨大影響力。⁵

實際上，對於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的急速經濟增長，這三個框架的解釋力皆不高。文化理論往往會傾向加上種族化標籤，對其他不太成功的社會也似有詆毀之意。東亞之內有不同文化，不一定意

味此一區域比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亞洲其他地方更容易成功。再者，香港社會亦不只包含華人文化，英國與其他族裔對香港影響同樣深遠。香港不但缺乏發展型國家體系，且一直有別於雁行理論（*flying geese theory*）的說法，並非由日資主導。⁶如第五章所分析，至一九六〇年代初，美國已是香港最大投資與貿易夥伴。學者將香港併入「東亞奇蹟」之說，實際上是淡化了對香港至為重要的涉外關係。佛利民的經濟自由論同樣忽視了港英政府的干預行為，亦似乎美化了殖民管治。⁷總而言之，香港不單有別於其區內鄰居，甚至相較而言，有過之而無不及。在一九八〇年，香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五千七百美元，新加坡為五千零三美元，台灣為四千零五十六美元，南韓為一千七百七十八美元。

香港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成功，需要從華人力量角度來解釋。前五章已奠下分析基礎，以助我們理解在全球經濟的重要轉變之中（即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之後），香港如何應對與得到生機。歷經二十年國際收支赤字之後，英倫銀行（*Bank of England*）突然在一九六七年將英鎊貶值。此一突如其來的行動撼動了英鎊區。事前香港沒有得到預先警告，當時坐擁四億英鎊資產的香港因而蒙受損失。⁸港英政府為此震怒，進而體會到在衰落的帝國之中，香港正面對何種政治風險。一九七一年八月，美國尼克遜政府決定終止美元與金之互換，以解決國際收支問題（事件被稱為「尼克遜衝擊」）。一九七二年六月，倫敦容許英鎊匯率浮動。在此時刻，港英政府決定在經濟領域脫離英帝

國。一九七二年七月，港幣與美元掛鉤。在一九七四年至一九八三年間，港英政府容許匯率浮動，此後港幣與美元再度掛鉤。

這波經濟轉變令全球資本市場波動，成為一九七〇年代邁向後福特主義「彈性製造」模式的背景。⁹在第五章，我們見到，埃索與美孚進行前所未有的投資，正象徵這種經濟轉型。已有不少學者指出，整個東亞都受惠於「彈性製造」模式與美國市場不斷增加的訂單。¹⁰這一章指，在跨商策略與跨太平洋網絡之下，香港不成比例地受惠於「彈性製造」模式。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台灣、南韓、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的勞動成本低廉。香港優勢則不在於此。一九七三年的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美國留學生輸出地。很多本地製造商亦開始適應香港勞動成本上升的趨勢，他們與聯業製衣及南海紗廠合作，外判工序。（見第五章）不過，香港得力於跨太平洋網絡，匯聚了知識、網絡、資本，令香港更容易招攬美國資本。

下一節會審視一九六〇年代香港的教育網絡有何階級結構，如何受美國冷戰議程影響。華盛頓之國家——私人網絡選拔與贊助非精英學生，使之能夠在美國留學。與美國傳教士接觸或曾就讀於美國學校的學生特別容易受惠。¹¹事實上，相較其他地方留學生，旅美香港留學生更能自理，這多少反映他們的精英背景。我們將會看到，這種現象與香港政治不穩定互為因果，少數旅美的男性留學生回港之後，會回到香港接管家族生意，大部份人則選擇留在美國。在本章最後一節，我們則會看

到，約百分之十五留學生選擇回港，他們當中大部人利用在美國積累的社會資本重整家族企業，使之具有美國風格，故此在一九七〇年代的波動之中，這些企業能夠取得美國外流資金，並透過跨國企業方式，在亞洲之內從「彈性製造」模式得到最大好處，同時得到區內投資機會。¹²換而言之，跨商領導的企業之策略有三：第一，外判工序；第二，融合於全球資本市場；第三，涉足以知識為本的服務行業。在此策略之下，這些企業的老闆與股東都得到極為龐大的利潤。

6.1. 香港學生旅美現象

上文提到，在一九五〇年代，於跨商精英的策略與華盛頓國家——私人網絡的支持下，香港高等教育從親英逐漸走向親美。歐偉國、唐家、李卓敏等精英不斷尋求美國資源，為非精英年青人提供機會，使之能夠到美國留學。他們的實現方法，是為英屬香港的新教會、學校、學院、大學提供教員、獎學金、學術體系，令學子更容易接觸跨太平洋機會。在一九五〇至一九五一年間，紐約國際教育協會（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只得七十二位香港學生，但到了一九五九年，在美國香港留學生人數已是香港旅英留學生人數的三倍。¹³在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二年間，香港旅美留學生人數增至一千五百九十七人，至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之時，人數更增至三千人。¹⁴十年之後，在

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四年，以及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六年，香港是旅美留學生最大輸出地，輸出人數分別為一萬零七百六十四與一萬一千九百三十人。¹⁵香港作為一個細小之地，其留學生輸出人數高於人口更為稠密的加拿大、印度、台灣等地，此一現象引人注目。在整個一九七〇年代，香港旅美學生成數目，更甚至高於整個英屬香港高等教育院校學生人數。¹⁶

這種香港學生旅美留學現象，需從階級角度理解。在國際留學生之中，香港學生最具生活自理能力。按紐約國際教育協會研究數字，在這些香港留學生當中，有百分之三十七至百分之五十七學生的家人為他們繳付全年學費。換言之，他們來自富裕家庭。另外百分之四十三至百分之六十三非精英學生則靠捐助留學。這些捐助來自美國——特別是美國政府的國家—私人網絡。需要補充的一點，是華盛頓與這些美國組織的目標，並非是想令香港人才流失。其真正目的，在於反共，在於為亞洲培養擁抱美國價值與國際領導地位的未來領袖。在清末民初之時，美國亦曾做同樣的事。第二章曾提到，美國傳教士曾表明他們期望旅美留學生回到香港之時，他們會承載何種價值觀。¹⁷

大部份香港學生都有不同目標。他們希望藉此在美國得到工作機會、永久居留，並協助家人移居。單是在一九五〇年，於香港美國領事館申請公民權的人數，已高達十一萬七千人。¹⁸經過數年嚴格審查之後，大部份人的申請都不成功，在美國留學因而成為誘人選項，特別是當美國政府並無限制高等教育學府的外國學生數目。一九六五年的《移民和國籍法案》甚至為外國移民掃除種族配

額障礙。法案表明，「具經濟價值的精英」移民應被接納。¹⁹在美國院校畢業的香港留學生符合這種精英定義。法案亦容許這些移民在美國作家庭團聚，學者將這種現象稱為「連鎖移民」（chain migration）。

6.2. 案例：胡應湘從美國回港的發跡故事

香港精英階層男性留學生卻多傾向學成回港，原因是他們在港將有美好事業，大亨胡應湘是例子之一。在一九五三年年底，胡應湘十七歲，他當時取道三藩市，於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留學。其家族積極經營跨太平洋網絡，他的父親胡忠在薄扶林經營豬場，其後建立了香港戰前最大的的士公司。在日據時期，他損失了車輛，但在一九四五年後，的士生意復甦，其家族重新致富。胡應湘不少親戚在戰前移民至美國，其父親亦選用道奇汽車（Dodge）經營生意，他因而對美國有良好印象。其母著重九位子女的教育，並鼓勵他們到美國留學。²⁰胡家長子就讀於香港大學工程系，其他子女都在美國留學。一九五三年，他們大部份都已在美國定居。

受家族親美傾向影響，胡應湘逐漸得到重要知識、人脈、資格。美國商場之規模、超級市場貨物之多、公路之長、交通燈之密度，都令胡應湘印象深刻。他駛過舊金山—奧克蘭海灣大橋（Bay

Bridge) 之時，深感震撼，並決定日後要親自興建類似建築物。後來胡應湘轉校至普林斯頓大學 (Princeton University)。在那裡，他看見一個路標，標示類近小鎮霍普維爾 (Hopewell) 的名字。胡應湘認為，這是個非常悅人的名字。當時在普林斯頓，只有五位亞洲學生，胡應湘是其中之一。他的英語不佳，這令他學習不易。在工程系索羅保格教授 (Norman Sollenburger) 的導引下，他堅持下去，並在紐約建築界當實習生。一九五八年，胡應湘於工程系畢業，並與普林斯頓大學聯繫頗深。有別於一般畢業生，胡應湘選擇回到香港。完成兩輪工程學學徒訓練後，胡應湘與其父成立了實驗性公司，這間公司為家族生意，聚焦於地產投資。一九六三年，他們再成立一間建築公司，胡應湘將之命名為合和建築 (Hopewell Construction，名字取於他在普林斯頓見到、覺得悅人的鎮名)。²¹雖然香港地產市場曾引發數波金融危機，但合和建築的表現不錯。在下一節，我們會見到，胡應湘的美國常春藤聯盟 (Ivy League) 留學背景如何在一九七〇年代助其轉型——從普通投資者變成大型發展商。

胡應湘的故事，有三個要點。第一，他的父母富有，且認為其孩子接受高等教育是重要之事，同時有能力讓每一個孩子都接受高等教育，這並非平常事。第二章曾提到的移民歐偉國也屬精英階層，但在移居的過程中，他失去資產，最終生活拮据，需要依賴美國組織的接濟，並為其議程效力。第二，江南移民掀起建立跨太平洋網絡之風，胡家等廣東家族則以其方式經營這種網絡，他們

的網絡最終匯聚。第三，即連精英家族成員亦需以留學方式取得美國永久居留資格。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八九年間，得到美國永久居留權的香港人，共三十一萬人，當中包括胡應湘的兄弟姊妹。大部份人都是在一九六五年之後才得到居留權。²²來自香港的移民人數很多，較來自台灣的二十六萬八千人還多。²³事實上，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八九年間，美國是港人熱門地，其人數多於移往加拿大（十八萬八千五百四十一）、澳洲（五萬八千零八十七）、英國（五萬至六萬）的人數總和。²⁴

6.3. 非精英留學生的抉擇

非精英留學生亦會回港，但他們得到補助才會如此。聯合董事會與崇基的合作關係（見第三章），反映這種跨太平洋網絡之中的流動。聯合董事會每年資助學院年輕教員到美國深造。在一九六〇年代中，職員何素瑪（Abigail Hoffsommer）負責選拔深造人選、協助他們申請，同時在他們申請成功之後提供支援。這些人選在美國之時，需要與何素瑪保持聯絡，畢業之後需要回到崇基。在一九六三至六四年間，有八位崇基講師曾經由她指導，他們都是聯合董事會成員。²⁵物理系講師李尚平是其中一例，當時崇基視他為最有價值的科學老師之一。崇基遊說聯合董事會支持他攻讀博士。²⁶雖然李尚平不是基督徒，但他最終得到聯合董事會的資助。²⁷何素瑪指導他申

請，並查問各院校的意向，同時向李尚平建議選校策略。到了科羅拉多大學波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之後，每個學期他都需要聯絡何素瑪，匯報其成績與開支。其在校指導老師也需要寫報告。²⁸ 與此同時，何素瑪向他的指導老師施壓，指崇基校方殷切希望李尚平能早日完成學業，回到香港，恢復教職。²⁹ 李尚平最後在兩年內完成博士學位課程，隨後成為崇基學院物理系系主任。可以說，精英家族後人會以家族資源到美國留學，畢業後會回港接管家族生意，但受資助的平民學生亦未必必然留美，他們也會回港發展。

於冷戰時期，在多數國家，數學與科學是最重要的兩門學科。學生攻讀數學與科學，因而容易出人頭地。香港政府的專上獎學金（Postsecondary Scholarship）與助學金檔案能為此提供研究素材。從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初，港英政府每年為十至四十位「難民學院」（“refugee colleges”）最優秀的學生提供獎學金與助學金。³⁰ 政府的資助有其附帶條件——得主需要接受為期一年的專上學院教師培訓，並出任小學老師兩年。這些檔案顯示，不時有獎學金與助學金得主暫緩或放棄履行承諾，原因是他們成功考進美國院校。他們多修讀數學與科學。例如，在一九六二年底，崇基副院長通知港英政府官員，指其三年級化學系學生馮順創會離開崇基，到美國升學。³¹ 因為資助不足，他改而在美國加州柏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攻讀化學工程，畢業後，他於美孚石油工作，事業發展優異，二〇〇七年他曾入選成為國家工程學會成員。³² 學生深造之時，往往會選擇攻讀博士，留在美

加。³³ 在這些情況下，美國傳教士是他們的可靠盟友。他們會資助學生的旅費，或確保其英屬香港獎學金得以延續。³⁴

需要強調的是，招攬學生到美國留學，並非善舉，這經常涉及犧牲。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浸會書院學生 Nieh Chung-yit 被迫放棄其助學金，原因是他的家人成功透過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得到機會移居至美國。³⁵ 這位學生計劃在香港完成學位課程，且向美國國務院上訴，希望能被獲准留在香港，不過其要求被拒。為免家人失去移居美國的機會，他只好妥協。一週之後，他的兄弟亦放棄在崇基的學業。³⁶ 美國國務院強調，這一家人需向港英政府為兩兄弟的教育成本作補償，他們因而窮盡家財。³⁷ 這位學生逐漸清還助學金，並在南方衛理會大學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就讀，同時在萊斯大學 (Rice University) 得到博士學位。³⁸ 為招攬更多學生，於一九六七年，紐約國際教育協會在全球四大城市設置辦公室與圖書館，香港是其中之一。³⁹ 不久之後，香港成為其規模最大的國際據點。一九七二年，其辦公室到訪人次達四十二萬，這佔人口百分之一。其年報其中一篇歡迎詞，由李卓敏所寫。(另見第四章)⁴⁰

在一九七〇年代末之前，美國教育的影響力令人印象深刻。按港府的獎學金與助學金檔案，只有少數學生到加拿大或澳洲留學。重要的是，沒有學生因為到英國升學而需在港輟學。這反映在一九七〇年代之前，往英國升學的補助不多。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因為補助不少，美國教

育成功招攬了很多香港學生。留英與留加學生人數只在一九七二與一九七八年與留美學生人數平齊。在一九八〇年代，前者人數終於超越後者。⁴¹常春藤聯盟、史丹福大學等是最負盛譽的美國著名高等學府，其魅力與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平分秋色。是以回流的香港男性精英，多具美國教育背景。

6.4. 香港學生的留學取向

選擇留在美國與回到香港的學生比率數據難被斷定。畢業於美國學府的人，他們能夠跨域往來。曾有學者計算，在一九七〇年代，從加拿大回流至香港的學生比率，約為百分之六點四二。按政府估計，在一九八〇年代，從整個海外回流至香港的學生比率，則為百分之十。⁴²學者認為，台灣學生回流的情況相若，但直到一九八七年，台灣仍然戒嚴，這削弱了學生回流的動機。⁴³一九九〇年，美國駐港領事館卻指，香港人口之中的五萬五千人為美國院校畢業生，人數佔勞動人口百分之二點五。⁴⁴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八九年間，約三十一萬香港居民取得美國國籍，我們若以此數據計算，已移民或回流的人數達三十六萬五千，回流率則為百分之十五（三十六萬五千中的五萬五千）。對發展中地區而言，此一比率很高。但數據仍未完全可靠，因為這會因未知個案而被低估，

或因已移民者未曾在美留學而被高估。

在一九六〇年代中，畢業於美國院校的香港商界領袖居多，畢業於英聯邦院校的則較少。對此《香港相冊》(Hong Kong Album) 提供了頗多有用資料。其名錄收錄了英屬香港移動群的名字、照片、國籍、教育、專業。相冊編輯以何標準訂定人選，仍有待考證，不過其資料甚豐。其一九六七年版本，便已收錄一千一百七十六人的資料。⁴⁵當中四成人並無取得高等教育學位，或列出其高等教育資料，或在中國、英聯邦、美國之外留學。可以確認的一點，是美國院校畢業生人數高於英聯邦院校畢業生人數。名冊內有七百項資料為中國姓氏，在此當中，只有五十人曾在英聯邦院校留學。在美國攻讀本科與深造的則分別為五十三與八十二人。在本地接受教育的人，有七十四位於香港大學就讀，另有一百七十二位曾入讀十三間美國傳教士學校其中之一或清華。就讀於美國傳教士學校的人，通常都會到美國院校升學。有五十三人曾就讀於傳教士學校，或曾深造，當中有四十二人曾就讀於美國院校。一九六七年版本相冊內的人，主要為商界專業人士、學者、記者。

我們亦可見到，在一九六〇年代之前，紡織業外的移民工業家也都保送自己的兒女到美國留學，並視之為公司未來發展希望之所在。對這類工業家而言，選擇美國作為子女留學地，多是因為美國是家族生意的主要市場、資金來源地、生意競爭地。生產塑膠的移民工業家丁熊照是其中一例。在戰前上海，他成立滙明電筒電池廠與保久小燈泡廠，並取得龍頭地位。其所生產的電池

與電筒，能與美國與日本貨一較高下。在日本進侵之時，他將滙明遷至法國租界，並在二戰時，趁樓價下跌，搶購上海物業。在中國內戰之時的一九四七年，他於香港開設開達實業，生產塑膠。一九四九年四月，他移居至香港。一九五四年，丁熊照開設塑膠玩具生產線，並出口至美國市場。當時美國製造商邀請他與之合作，他為此感到高興。⁴⁶這次與美商合作，改變了他的世界觀。他對媒體說，開達與美國玩具大商合作，得到不少利潤，並視美國市場為香港工業未來之所在。來士馬斯公司 (Louis Marx and Company) 是開達的主要合作夥伴，且也是美國最大玩具生產商。⁴⁷一九五七年七月，馬斯親自來港，與丁熊照商議合組聯營公司，並透過丁熊照的介紹，認識其他香港工業家。⁴⁸按丁熊照的說法，跨太平洋聯營公司關係不但帶來榮耀，且也是重要資產，這既增加了銷售，亦有助解決應對大量小零售商的問題。⁴⁹至一九五九年，丁熊照謀求與日本製造商合作，是以在一九六〇年代初，他與三洋電機合組聯營企業，生產晶管體收音機。⁵⁰一九六二年，丁家環遊世界，觀覽各地的工廠，並開拓在歐洲的商業人脈。⁵¹但在一九六〇年代初，真正令開達成為全亞洲最大塑膠玩具生產商的因素，仍然是與美國商界的聯繫，以及美國市場。

與紡織商一樣，丁家同樣視美國教育為取得美國社會資本的捷徑。丁熊照認為，北京「嚴苛且專權」，香港亦難以久守，他因而覺得無家可歸，故此考慮移民至美國。一九五一年，他投資三藩市的房地產，並趁此行探訪在加州的朋友，其中之一為張嘉璈，他後來為丁熊照的回憶錄撰寫

前言。⁵²一九五九年，他送其二子丁鶴壽到美國緬因州科爾比學院（Colby College）入讀。畢業之後，丁鶴壽回港，並出任開達主管之職。⁵³一九六四年，他亦送其四子丁午壽到美國伊利諾大學厄巴納—香檳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Urbana-Champaign）入讀。⁵⁴他在一九六八年畢業，並同樣回港，在開達任職。翌年，他迎娶王雲心，她亦曾在美國留學，當時媒體形容，這是天作之合。⁵⁵一九六九年，丁家在美國環遊視察數月，開拓商機，在不同城市與很多美國商界精英與海外華人社群代表見面。丁熊照認為，美國的民主自由未能自我約束，但這仍不失為自由世界堅實的領袖國家。⁵⁶一九七〇年代，丁熊照老去，兩位兒子開始接管公司生意，並推動開達與其子公司之轉型，將之結合為市值數十億的集團，在其於一九八五年上市之後更是如此。⁵⁷丁熊照兩位兒子其後也跟從其父的做法，將他們的兒子送到美國接受教育。

可以說，丁家的跨商策略既為營商，亦為謀求離開香港的後路。丁家兩代人都在美國接受教育，開達因而能與美國最大玩具企業建立穩固關係，丁家家族企業對美國市場亦因有足夠認知。航運巨頭董浩雲也有類似計算。他來自寧波家庭，在十七歲之時，他於天津開始以學徒身份首次踏足航運業。一九三八年，他移居至上海，成立其公司，並在中共建政之時移居至台灣與香港。在一九五〇年代，他的東方海外乘香港製造業發展之勢，發展急速，運送香港製品至海外。至一九六〇年代初，董氏已擁有全球其中一支最大船隊。一九六二年，他開設香港經日本往美國東西

岸的高速航線。當時紐約市長華格納 (Robert Wagner) 為此向董氏贈送該市之匙，香港本地媒體亦因而注意董氏。⁵⁸ 董氏的國際聲譽，令香港本地媒體將他誇為「東亞船王」。⁵⁹

當時香港媒體沒有提到的一點，是董浩雲的長子董建華其時已在紐約市居住。董浩雲不曾入讀高等學府，但他對推廣教育之熱誠，眾所周知。一九七〇年，他曾購買「伊莉莎白女王號」 (RMS Queen Elizabeth)，將之改裝成「海上學府」，這令公眾印象深刻。不幸的是，在一九七二年，「海上學府」被焚毀。董浩雲亦曾參與設立東京的聯合國大學，並遊說李卓敏領導此一項目。⁶⁰ 董浩雲關心子女教育，自然不是意外事。董浩雲擔心，董建華不夠聰明，未必能夠入讀香港大學，故此在一九五〇年代初，董建華被送到英國寄宿學校就讀。董建華後來入讀利物浦大學的海洋工程系，並在一九六〇年畢業。畢業之後，其父變得親美。董建華後來解釋指，其父觀點獨特。董浩雲曾對董建華說，美國是未來之所在，他應當到那裡求學，感受未來。⁶¹ 董建華在美國逗留十年，先於波士頓為通用電氣工作，然後在東方海外的紐約與三藩市辦公室上班。旅居之時，他逐漸愛上美國體育運動，亦視美國如同香港，視之為家。一九六一年，他與趙洪娉在紐約成婚。他們的三位兒女都生於美國，並取得美國公民權。⁶² 為接掌東方海外事業，董建華花了大量時間於美國交際，積累了相當廣泛的政商人脈，在一九九七年他出任首位行政長官之時，這些人脈都大派用場，本書終章會對此詳談。⁶³ 董浩雲送所有子女到美國讀書。二子董建成先到利物浦大學就讀，然後到麻省理工學院

攻讀碩士。董浩雲的三位女兒（董小萍、董亦萍、董建平）都在美國寄宿學校與院校讀書。其中兩位定居於紐約，另外一位則回到香港。⁶⁴董浩雲的對手、另一位船王包玉剛的四位女兒同樣在當時於美國讀書。

董浩雲回憶說，兩位兒子都是在英美受訓的工程師，且二人在美國商界都有人脈，他們回港之後，曾協助他處理集箱事務。在一九六〇年代初，美國航運企業海陸聯運（Sea-Land Service）開設跨大西洋貨櫃航運服務。一九六九年七月，海陸聯運開設首條到香港的貨運航線，航線源於美國五角大樓的合約，其目的是為越戰中的美軍提供補給。⁶⁵貨運船務之效率令很多船主意識到，這是航運業的未來，與此同時，全球碼頭工人的生計會深受影響。一九六九年年底，在兩位兒子人脈網絡與知識的支援下，董浩雲反應敏捷，他效法海陸聯運，東方海外繼而成為首支提供跨太平洋貨運服務的亞洲船隊，公司更被易名為「東方海外貨櫃航運公司」。一九七〇年，港英政府開始興建葵涌貨櫃碼頭，並在一九七二年竣工。香港為此成為紐約與鹿特丹之外的全球首三大港口之一。⁶⁶

丁熊照與董浩雲的成功，並非建基於自身所得的美國教育，事實上，他們二人不曾受過高等教育。但在一九六〇年代初，他們的生意根植於美國市場、客戶，並與美國競爭者角力。二人亦因意識到，對他們的子女乃至公司未來而言，美國教育、國籍、網絡有其價值，這有助他們應對競爭激烈的全球經濟。子女到美國讀書，實際上也為家族提供逃生門。換言之，美國社會資本改變

了丁與董在一九六〇年代的世界觀，在同時代，李卓敏亦正致力將香港中文大學美國化。這正是一九六〇至一九七〇年代第二代跨商回流到香港的背景。

6.5. 香港網絡與國際技術人才分佈

香港的跨太平洋網絡，令關於冷戰時期技術人才外流的辯論變得更複雜。一般觀點，是這類技術人才從發展中地區外流至富裕經濟體（特別是指美國）。⁶⁷學者薩尼揚與徐元音都曾強調，從長時段角度看，所謂人才外流，其實是「知識勞工」（knowledge worker）交易第一階段的先兆。⁶⁸跨商研究角度則可作補足，這個角度能夠反映家族傳承對人才外流的影響，此一因素一直受忽視。大部份香港學生選擇留在美國，具精英背景的學生卻多會回到香港，而非在美國等待未知的機會。⁶⁹香港與台灣的跨太平洋流動狀況截然不同。薩尼揚特別指出，生於外地、於美國接受教育的工程師，對矽谷之成功與高科技產業之海外拓展有重要影響。薩尼揚提出「新阿爾戈英雄」（new Argonaut）之概念。依此概念，在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回流至台灣、印度、以色列乃至中國的美國留學生，他們返家之後，激活了當地的科技產業發展。⁷⁰不過，這些回流留學生鮮具精英背景，他們以企業家姿態返家創業。台灣政府也有刻意執行政策，招攬與挽留這些人才，設立科技園與孵

化器都是例子。這些新企業推動了台灣的科技轉移、創新乃至年輕專業人才的階級流動，台灣半導體業特別受惠。回流美國留學生對香港的社會與經濟影響卻大不相同。當時香港前途未卜，回流不乏風險。港英政府奉行「積極不干預政策」，為新產業提供的支援有限。對香港旅美留學生而言，在美國尋找工作，安排家人跨太平洋移民，是較安全的選項。若然可以確定回報，回港發展則不成問題。胡應湘乃至董氏兄弟便是例子。事實上，在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一九七〇年代，美國跨國企業在港投資可觀。在此脈絡下，有別台灣情況，香港跨商策略的重點，在於將香港既有家族生意融入於以美國為中心的資本主義體系以累積財富，而非發展新產業，或謀取躋身社會上流的機會。

6.6. 跨商與香港經濟轉型

在一九七〇年代，香港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逾百分之六百，這得力於香港人善用布雷頓森林體系，以及香港從福特生產模式（Fordist production）轉型至後福特生產模式（post-Fordist production）。這種經濟成績亮麗，但不意味香港社會均富。當時香港從成本低、出口導向、以美國為主要市場的製造業樞紐逐漸變成國際商品供應鏈的亞洲重要協調中心。在上一章，我們看到，聯業集團與南海紗廠都開始將生產工序外判，而非僅僅著重本土生產。與此同時，東方海外開拓貨

櫃集裝船務業務，合和則進軍地產市場。

這種轉型需要建基於專業知識與外來資金，如第五章所提，這往往源於社會資本。香港不缺銀行。在一九六五年，駐香港的外國銀行數目，已超越巴黎，居世界第三。⁷¹在一九七〇年代初，本地公司以另一種方式支持金融業——他們投入於席捲香港的股市狂熱。如前文所提，在一九七〇年前，很少工業企業上市。於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七年間，在英資主導的香港證券交易所，只有五十至七十間上市公司。但在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年間，新增上市公司達二百五十一間。⁷²此一趨勢源自美國外流至全球的資金。華人精英亦相繼開設新的股票交易所。一九六九年，李福兆便設立遠東交易所 (Far East Exchange)，他曾在賓夕凡尼亞大學華頓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⁷³很多香港居民一心求財，於是將血汗錢投放於股票交易。至一九七三年三月，在尼克遜衝擊加上石油危機之後，股市崩盤。⁷⁴不過，大部份香港企業都能渡過這場風暴，並且從家族企業營運模式轉型至集團模式。這些企業能進行轉型，原因是第二代跨商精英回流。

一九七二年，胡應湘的合和實業透過當時最大規模的首次公開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 上市，部份資金來自怡和菲林明 (Jardine Fleming) 與獲多利 (Wardley)，後者是滙豐旗下的投資銀行公司。當時合和融資額達一點二五億港元。⁷⁵一九七二年九月，另一地產商恆隆的首次公開募股金額創新高，達二點四億港元。一九七三年四月，貿易公司利豐的首次公開募股金額再創新高，達

二十三億港元。⁷⁶這三家企業上市的決定，都源自從海外回流的第二代，他們是合和的胡應湘、恆隆的陳啟宗、利豐的馮國經與馮國綸。由美國引爆的香港股災發生後，一般股民失去積蓄，上述企業亦有損失。但至一九七〇年代末，這些企業重新振作。他們利用美國資金，將業務重心轉至高增值、以知識為本的服務業。

對胡應湘而言，擁有美國社會資本，能助其將公司發展成世界級地產公司。他就讀於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的經歷，令其英語流暢，使之得到土木工程師的專業資格、美式禮儀知識、紐約建築業界知識，以及關於美國致富模式的知識，他因而願意承擔金融風險投資發展。一九六八年，合和建築擁有十二項物業，胡應湘則想建立屬於自己的物業王國。一九六九年，他利用自己的股份，創立合和實業，但他需要更多資金。他向匯豐銀行借貸一千五百萬。後來成為匯豐銀行主席的浦偉士（William Purves）批出此一「巨額」貸款，理由有二：第一，其父願意充當其擔保人。第二，胡應湘善於推銷其想法。他作為美國普林斯頓舊生，較易取信於英國銀行家，而且他也得到富商父親的支持。在接下來四年，合和實業成立十五間新的子公司，並在半山區投資地產項目。不過，合和的現金流仍然不足。一九七一年，英資投資銀行怡和菲林明聯絡胡應湘，建議他的公司上市。胡應湘並不完全理解上市的規則條款，但他認為，這是當行的事，他不需事先得到整個家族同意。與此同時，浦偉士亦表示匯豐銀行願意支持合和。結果怡和菲林明與匯豐銀行共同贊助合和一九七二年

的首次公開募股。⁷⁷此後合和大力投資於灣仔的重建項目，且回報可觀。項目之一，是在一九八〇年建成、為當時全港最高的合和中心。為此，胡應湘深明美國教育與旅美的價值。其長子胡文新的英文名字，是 Thomas Jefferson。其所有兒女都被送往美國塔夫特中學 (Taft School) 留學。胡文新步其父親後塵，同樣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修讀工程，並在史丹福大學攻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

在一九七〇年代，嘉華銀行（另見第三章）的轉型，同樣受跨太平洋網絡影響。一九二二年，林子豐成立嘉華銀行。在一九六〇年代，其兒子從海外回流到香港之後接掌銀行。此前他的兩位兒子分別在美國貝勒大學與天普大學攻讀法律與管理。他們在管理嘉華銀行之時，應用美式管理與銀行營運手法。其父在一九七一年去世，其家族亦陸續移居海外，故此於一九七四年，嘉華被轉售至新加坡投資者劉燦松，他亦是前埃索管理人員。劉燦松在東南亞的人脈網絡，加上銀行於香港與美國經營的網絡，頗具價值。雜誌《歐洲貨幣》(Euromoney) 曾指，銀行積極招攬美國回流學生，使之擔任中高層管理職務，劉燦松亦派遣逾六十名職員到芝加哥第一銀行 (First National Bank of Chicago)、花旗銀行、萬通銀行、美國銀行、蘇黎世瑞士銀行參與培訓，嘉華因而成為其中一間最為現代化的銀行。在一九七〇年代，其資產每年倍增，於一九七五至一九八三年間的淨利潤增加約百分之二千二白。其一九八〇年的首次公開募股，由美國大通曼哈頓銀行 (Chase Manhattan) 包銷，美國銀行則在一九八一年為其處理浮動利率存單 (floating rate certificate of deposit, FRCD) 之

銷售。⁷⁸

利豐集團成為龍頭供應鏈管理全球公司，則是另一案例。在一九九〇至二〇〇〇年代初，沃爾瑪（Wal-Mart）、塔吉特（Target）等大型美國零售商都依賴利豐以最低價搜羅、訂購、運送商品，這些商品包括玩具與成衣。利豐不曾擁有工廠或船隊，其服務模式是建構供應商全球網絡以供應貨品。在一九七〇年代，第二代跨商馮氏兄弟從美國回流到香港，他們革新公司，令利豐得以建立其供應商網絡。⁷⁹馮氏兄弟熱衷於記錄公司歷史，在二〇〇七年，曾邀請經濟歷史學家馮邦彥書寫利豐歷史，這為我們的研究提供了具價值的材料。

利豐發展史猶如香港經濟史的寫照。一九〇六年，商人馮柏燎與李道明在廣東創立出口公司，他們嘗試打破歐洲與美國人對中國出口貿易之壟斷。⁸⁰李道明曾經經營瓷器生意，是李卓敏的親戚。⁸¹馮柏燎則在香港中央書院（今皇仁書院）就讀，英語流利，亦令家人信奉天主教。他們以廣東為基地，並在香港處理航運事務、於南中國採購。利豐開始出口瓷器、煙花、翡翠、絲綢、藤等製品，美國被視為主要出口市場。從一九〇六年至一九八〇年代，美國的確是利豐的主要收入來源。⁸²在大蕭條之時，利豐依然表現良好，原因是中國風被奉為時尚，利豐在美國也有深厚網絡。一九一五年，袁世凱政府曾邀請馮柏燎出任中國代表團成員，出席於三藩市舉行的巴拿馬萬國博覽會（Panama-Pacific International Exposition）。在旅途中，馮柏燎結交了西斯珀（Joseph Sipser）

他工作於紐約埃士斯特公司 (Ignaz Strauss & Co.)，這是美國百貨公司等企業的主要採購商。西斯珀對具中國特色的商品很感興趣，希望能進口至美國，於是與利豐建立了長期的互惠合作關係。雖受排華政策影響，在一九二〇年代，馮柏燎仍然勇敢地每年到訪美國，與美國商人以及銀行家聯誼。⁸³他安排子女在香港熟習英語，然後引介他們認識其美國合作夥伴。

馮家以英美社會資本抵消戰爭與世代交接的衝擊。與很多江南精英一樣，他預見日本進侵的威脅，並在一九三七年吩咐其二子馮漢柱到香港，以建立利豐有限公司。此舉得到美國在港銀行的貸款支持。⁸⁴因為得到美元貸款，所以到一九四一年太平洋戰爭爆發之前，利豐仍能運作。在戰時，馮柏燎利用人脈，送子女經重慶到美國。⁸⁵一九四三年，他因中風而去世。在戰後，李道明家族將股份全售予馮家，馮漢柱與其兄弟馮幕英因而成為公司主要決策人。他們快速迎合以美國為中心的體系，首個行銷項目，是引進美國最新款原子筆，並以泛美航空專機運送。⁸⁶在美國對華禁運政策之下，利豐不再出口傳統貨品，改而出口紡織與塑膠等香港製品。

馮漢柱同樣重視維繫美國人脈。他送兩位兒子到美國留學。長子馮國經於一九六六年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此後他在同一學校修讀電子工程碩士課程，並在一九七一年於哈佛商學院取得商學博士學位。一九六九年，他與沈乃琪在波士頓結婚。⁸⁷婚後他們移居至紐約，在那裡，馮國經於花旗銀行工作，花旗銀行與利豐合作關係匪淺。一九七三年，馮國經轉到哈佛商學院出任教職。其弟馮

國綸則就讀於普林斯頓大學，在一九七〇年，他取得電子工程學士學位。此後，他亦在哈佛商學院攻讀工商管理碩士課程，並在一九七二年畢業。二〇一四年，馮氏全球論壇在巴黎舉行。馮國綸當時表示，他首次搭乘飛機，便是到普林斯頓。⁸⁸馮氏兄弟不但對美國很感興趣，他們亦積極累積精英社會資本，在大學學習知識與禮儀、取得美國名校光環、結識學者與金融業者，馮國經甚至入籍成為美國公民。⁸⁹

重要的是，他們兄弟二人回到香港發展，並以美國方式改革利豐。當時馮漢柱與馮幕英已然老去，想將公司交給下一代管理。一九七二年，馮國綸先回到香港，接管利豐。一九七四年，馮國經仍在哈佛商學院任教，他當時同時出任利豐經理之職，並在一九七六年回到香港。⁹⁰馮漢柱並不懼怕轉變，他當時告訴兒子說，他們已然在美國習得最前沿的知識，當應研究利豐有何問題，如何使之進步。馮氏兄弟於是展開哈佛商學院式案例研究，應用美國最新管理學理論，分析利豐的營運模式。他們發現，從一九〇六年起，利豐的管理結構基本上不變，他們因而重組公司，引入美國會計與員工培訓方法，要求各部門進行戰略規劃，並以得到大學教育的專業經理取代公司內的家族成員。一九七三年，利豐之內並無職員擁有大學畢業資格。至一九七八年，在一百二十個員工之中，二十人為大學畢業生。馮氏兄弟亦說服老一輩，指利豐要穩健發展，便需上市以籌集更多資金。馮邦彥指，馮氏兄弟認為，公開上市能令公司擺脫舊日管理模式，分拆公司的擁有權與管理權，使之

受專業與現代的管理。前文曾提到，在一九七三年四月，利豐的首次公開募股極為成功，其認購額超額一百一十三倍。利豐成為公開上市的公司之後，在一九七〇年代以不同方法經營美國客戶群，以渡過全球經濟風暴。馮國經每年都到訪美國數次，以建立新人脈。在其領導下，利豐不再只是普通中介，更是投資者、生產經理、諮詢顧問、零售商。一九七七年，利豐與 Leslie Fay 共同成立聯營公司，後者是美國第二或三大女裝生產集團，前者為其代理東亞與東南亞採購事務。在一九七〇年代末，利豐也與 Gap、Lewis Galoob、荷蘭連鎖公司 Peek & Cloppenburg 等企業作類似合作。⁹¹這些企業合作關係，某程度上建基於個人社會資本，利豐憑藉這些合作，革新了供應鏈管理（例如包裝與生產）。⁹²

利豐能從家族生意轉型成為市值億萬之集團，意味我們若然忽略香港，便難以理解由美國領導的資本主義全球化發展。利豐之轉型，建基於跨世代的跨商策略、美國社會資本之積累、一九七〇年代經濟風潮轉變所衍生的機會。馮氏兄弟的香港本土文化認知、美國商學院技巧、跨太平洋網絡，令利豐得以利用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所帶來的機會，並透過靈活生產推進全球化，同時在一九七一年中美貿易關係回暖後將中國融合於香港網絡之中（下兩章將會分析這一點）。至一九九七年，利豐在二十六個國家營運，利潤達三點九九億元，每年營收達一百三十三億港元（十七億美元）。⁹³

香港聯業集團（見第五章）則在一九七〇年代飽受衝擊。香港聯業集團得到怡和資金，成立於

一九六二年，並在一九六四年進行首次公開募股與上市，負責首次公開募股的銀行，是匯豐與渣打銀行。在一九六〇年代末至一九七〇年代初，聯業集團利潤可觀，其業務遍佈東南亞與非洲。但在一九七一年的尼克遜衝擊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之後，香港股市大跌，同時石油危機在一九七三年發生，聯業集團業務因而受挫。聯業集團抵禦力不足，原因是其與美國金融市場、消費趨勢、管理知識的扣連不緊密。一九七一年八月，香港傳媒注意到聯業集團業績表現不佳。一九七三年五月，《工商日報》甚至為之響起警號。⁹⁴報導指，在股票市場恐慌之中，聯業集團才開始研發合成物料，而這種物料已風行多年。事實上在一九六〇年代中，南海紗廠已然生產合成物料與牛仔布。報導亦指，聯業集團動用海外低廉勞力的分散投資政策，並非源於公司的遠見或計畫，而是只源於公司面對國際貿易損失之時減省成本的考量。聯業集團的海外合作重心，則在於日本，而非聯業集團的最市場美國。聯業集團與日本企業合組新的聯營公司，以開發新技術以及增加對日出口。⁹⁵

一九七三年，聯業集團的年度盈利增幅已降至百分之三，但集團仍然以多種貨幣借貸七千萬，推動海外業務擴張。為抵償債務，聯業再招股五百萬股，並籌集五千萬港元。不過，當時《工商日報》警告，聯業的股價已從每股三十港元降至二十四港元。聯業再發大量新股，只會令股價更低。⁹⁶聯業將賭注放在日本，是另一失誤，到了一九八〇年代，唐驥千亦犯下相同失誤。⁹⁷一九七四年九月，聯業董事局發表報告，警示集團業務危機，至一九七五年，集團創下香港上市公司

司最大虧損紀錄。⁹⁸經營聯業的李家曾嘗試變賣過度擴張之時所建立的美國資產，但最終聯業被接管。⁹⁹集團歷經兩年架構重整，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股東以每股股價十港元重購聯業股票。不過，怡和出售所有持有股份，聯業亦在股市之中被除牌。¹⁰⁰一九八三年，聯業僅餘的紡織業務被售予日本企業東麗（Toray），李震之退休。

聯業之失敗，可從跨商角度分析——李家不重視經營美國社會資本，是一大主因。美國雖然一直是聯業的主要市場，但李家成員少到美國留學或工作，因而不能準確理解美國消費者的口味。有別於南海紗廠、合和、利豐、恆隆、東方海外、嘉華等企業，聯業欠缺從美國回流的第二代跨商，李震之本人甚至未完成高等教育，他的兒子都在英國修讀化學工程。英國教育對舊日紡織生產發展確有幫助，但當時全球正歷經兩大趨勢，分別為靈活生產與金融化，在此大勢下，美國的商業教育與工作歷練變得日益重要。如果有此在美歷練，李家的商業決策或會不同。¹⁰¹

6.7. 小結

總括而言，在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經濟急速轉型，從低廉生產樞紐變成以知識與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體，多少得力於從美國回流的第二代跨商。前文提過，至一九七三年，香港超越印度、加拿大

等人口大國，是美國留學生最大輸出地。大部份學生畢業後都留在美國，但也有百分之十五回到香港發展（比率其實不低），回流者多是精英階層男性，胡應湘、董建華、馮氏兄弟等都是例子。在一九七〇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終結，跨國企業轉用靈活生產模式，股市起伏大，這些回流精英在這些趨勢之中找尋機會。他們的學歷，多集中於工程、管理、金融、法律等範疇，他們亦同時擁有專業人脈與工作經驗。亦因此，他們能夠革新家族企業，建立船務、地產、銀行、採購集團。這些經革新的企業，令香港經濟得以轉型，並成為美國消費者市場與亞洲低廉勞力的中介。

現在相關檔案仍然不足，我的研究難免會有局限，但這些檔案足以證明旅美高等教育的價值。很少第二代跨商真正是白手興家。從一九四〇年代末，唐炳源與董浩雲等香港精英已著重子女在美國教育，因為他們認定，全球新秩序由美國領導，送子女旅美留學因而上文所提的好處。

不過，也要指出，非精英家庭出身的學生，也有回流香港且事業有成的案例，鄧蓮如是其中一例。她生於香港，父母是來自廣東的難民。一九六四年，她畢業於柏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她修讀的是工商管理學系。回港之後，她在太古集團出任行政實習生。一九七〇年，在此「英殖洋行」，她成為首位最年輕的女性出口事務經理，此後她展開其政治生涯。¹⁰²李小龍是另一案例。他在一九四〇年生於三藩市，其父是廣東粵劇名伶。出生之時，李小龍已是美國公民，不過他在一九五〇年代於香港長大。他的歐亞裔身份，令他與同學產生磨擦，其家人於是在一九五九年送他

到三藩市，安排他在當地與其姊同住。他在西雅圖完成高中，並畢業於華盛頓大學。畢業之前，他邂逅其愛人蓮達。在一九六〇年代，他教授武藝，並在荷里活電視劇與電影之中出演，不過，因受種族歧視，他在一九七一年回港。一九七三年，李小龍戲劇性地去世，他去世前的電影作品非常賣座，這些電影令功夫在全球風行一時，電影亦批評日本與美國的帝國主義，同時一洗華人「東亞病夫」的負面形象。歷史學家愛斯珍 (Penny Von Eschen) 曾指出，李小龍掀起全球熱潮，並不只與其武藝、演技、樣貌有關。更重要的是，他得到家人支持，進而得到良好教育，同時能抵抗荷里活的種族歧視，利用荷里活網絡推廣香港電影，取得成就。¹⁰³換言之，美國社會資本與香港的樞紐角色，創造了李小龍的傑出故事。

跨商亦以行動說明他們如何珍視美國社會資本——他們對美國院校投放大量資金。從一九七〇年代起，第二代跨商不斷打破美國院校得到的捐款紀錄。一九六七年，唐炳源捐款資助中文大學興建大學圖書館，此後唐家向麻省理工學院、柏克萊加利福尼亞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斯基德莫爾學院、安多佛高中、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捐贈上千萬美元款項。¹⁰⁴一九八一年，胡應湘亦向普林斯頓大學捐贈一百萬美元，使之設立中國研究教授職位。一九九五年，他甚至向大學捐贈一億美元，這是大學有史以來來自「外國人」的最大捐款額。¹⁰⁵二〇一四年，恆隆的陳啟宗與陳樂宗打破胡應湘的紀錄，向美國哈佛公共衛生學院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捐贈二點五億

美元，以其父之名（陳曾熙·T.C. Chan）令學院易名為哈佛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利豐馮氏兄弟所設立的基金會，亦向哈佛大學亞洲中心、普林斯頓大學、牛津大學捐贈上千萬美元。這些捐款不只被用於建築物冠名，且也被用於設置教席與設立研究中心，推動中國研究，例如唐家在哥倫比亞大學設立唐氏早期中國研究中心，並於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設置唐驪千家族教授席（Oscar L. Tang Family Professorship）。胡應湘則在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設置胡應湘五八年中國研究講座教授（Gordon Wu '58 professor of Chinese studies）之教席（編案：史學泰斗余英時有此學術名銜）。需要知道的是，來自香港的捐款並非純然是慈善行為，當中也有私利計算。研究舊生捐款的文獻已然指出，捐款對捐贈者本人與其身邊人都有好處，例如這會方便其後代入學，增加自身在國際精英圈的名聲。¹⁰⁶人類學家王愛華（Aihwa Ong）已然指出，其他院校或慈善組織其實可以進一步受惠於這些捐款。¹⁰⁷不過，香港的捐款者似乎只心繫美國著名院校或組織，因為這樣可以推動他們的個人成就。亦因為此，源於美國冷戰議程的香港跨太平洋網絡，其衍生的不平等現象反過來影響美國，擴大了美國高校之間的不平等。¹⁰⁸可以說，香港一九七〇年代的轉型，事實上亦反映中國戰前的社會結構如何形塑資本主義全球化的進程。

【第七章】

Chapter 7

香港跨商作為中國融入世界的引路人 (1971-1982)

青松仙觀

大豐膠皮有限公司

五洲製

昌興皮革

有限公司

昌興皮革

聯興皮革鞋料

金寶順

裕豐隆

金克傑

豐昌汽車

第七章 香港跨商作為中國融入世界的引路人（1971-1982）

在一九八〇年代初，香港利豐與其最大客戶 Gap 同行到上海。¹他們希望說服 Gap，使之採購上海市紡織品進出口有限公司的製品。這家公司是中國國企，其目標是在充滿競爭的國際市場中銷售其製品。² Gap 作為美國零售商，對與中國做生意頗有保留，但利豐向其行政人員保證，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已然穩定，中國大陸的低廉生產成本亦可確保利潤。利豐與 Gap 考察後，認同上海紡織品質素不錯，但亦認為，這家國企缺乏專業技術，無法按國際標準要求生產。於是 Gap 開出條件，要求利豐為上海方增設新的織機，同時在香港進行成衣加工，最後才以「香港製造」名義出口到美國。在《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Multi-Fibre Arrangement, MFA）之下，香港擁有大

量出口配額，中國大陸配額卻幾近於無，經香港出口是必然選擇。對Gap而言，這次合作非常成功，低成本、款式轉變頻繁的時裝銷售模式因而在一九八〇年代於國際間風行一時。不久之後，Limited、Express、Lerner、Petrie等其他美國主要零售商都開始與利豐合作，從中國採購紡織品。至一九八五年，按利豐紀錄，其身在美國的員工設立採購組，為Limited處理整個中國的採購事務。³利豐利用其巨大利潤，收購玩具反斗城 (Toys "R" Us) 部份股份，在全港開設OK便利店，並染指美國創業投資 (Venture Capital) 與全球保險業務。

利豐案例簡潔地反映香港的跨太平洋網絡如何接駁中國大陸，如何在改革初期，形塑中國的對外貿易關係。如第六章所分析，在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經濟轉型。於十年間，香港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增加六百倍，這是香港從低廉勞力本製造業邁向以知識與服務為本的金融業與供應鏈管理之成果。在此期間，香港中產階級急速膨脹，香港精英亦成為具影響力的全球角色。於這一章，我們會看到，在一九七一年中美貿易關係回暖之後，香港精英與其企業將其貿易網絡延伸至中國大陸，並與中國官員以及國企打交道。一九七九年，中美關係恢復正常，香港的企業領袖預計中國大陸會推行更多改革，於是著手建立各類委員會、出版刊物、舉行研討會，以建立人脈與分享知識。至一九七八年十月，香港企業領袖已在預測各類「務實政策」，例如「工資和獎勵計畫之自由化」和「貿易和生產單位之重組」。⁴只要鄧小平能夠鞏固權力，進而批准改革，利豐等香港公司就可以

緊密參與中國改革歷程。

7.1. 香港、新自由主義興起史與中國改革

聚焦於香港，有助重寫中國改革史與新自由主義興起史。學者一般認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是重要分水嶺，此後中國放棄自力更生，開始擁抱「改革開放」。⁵ 研究全球化的學者也認為，這是新自由主義發展的「革命性時刻」。⁶ 這種觀點多少應和了一九八一年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決議認為，一九七八年十二月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原因之一，是在此之後，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被劃上句號。某程度上，這份文件是鄧小平自我神話化之作。⁷ 這種時段劃分有其誤導之處，原因是這種視角將中國精英政治與經濟活動混為一談，錯誤地將鄧小平視為「改革舵手」。⁸ 實際上，中英文學術研究指出，早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鞏固權力之前，中國經濟已然起變化。近期華文研究甚至強調，在一九六〇年中蘇分裂之時，中國已從西歐與日本引進工業技術與器械。於一九六〇年代，中國開始有限度接觸美國盟友，不過，毛澤東抗拒外債與外來直接投資，後來在文化大革命之時，這些接觸甚至完全停頓。歷史學家馬修頓（Mark Selden）曾指，市場改革始於一九七〇年代初，因為當時中國對日與對美貿易擴張。他

認為香港在一九八〇年代才發揮其影響力。¹⁰ 政治科學家楊大利 (Dali Yang) 則指，農業改革始於一九七〇年代初。當時農民飽受大躍進饑荒 (1958-1961) 重挫，故此他們重用當時未經官方准許家庭承包農作方法。¹¹ 學者們亦留意到，一九七五年一月，周恩來提出「四個現代化」，未來出任為黨總書記的趙紫陽以四川書記身份展開市場改革。¹² 學者南和志准 (Kazushi Minami) 則認為，毛澤東對國家利益的理解時有不同，有時他著重發展，有時他則聚焦於革命。¹³ 繼位之後，華國鋒的重要舉措，是透過引入外國科技，務求穩定與現代化。¹⁴ 可以說，一九七八年鄧小平的發展理論，只是承先啟後。¹⁵

這一章會修正這段經濟發展史。有關精英政治、領袖心理等課題，並非本章要旨。本章關心的，是在一九七八年之前，國際力量、非政府角色如何在中國之內與週邊（特別是珠江三角洲）影響中國之發展。在討論一九七八年之前中國的經濟自由化趨勢與外力影響之時，學者往往忽略香港。若然我們重視香港角色，並以此重構這段時期的中國經濟史，我們便會另有發現。從一九七〇年代香港跨太平洋貿易網絡活動角度看，早在鄧小平發表理論之前，很多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要人物已然放棄自力更生論。一九七一年六月，中美貿易關係回暖，香港的全球商業網絡開始滲入中國大陸，為毛澤東去世後的全面改革時代奠下基礎。雖然文革仍有殘餘影響力，對抗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的力量仍存，但管理國企的行政人員與基層官員仍然擔心中國經濟停滯不前，他們因而願意與香港角色

打交道，並透過香港方接觸美國。

在下一節，我會檢視於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八年間，香港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有何經濟活動。一九六九年，美國總統尼克遜（Richard Nixon）撤銷對華貿易禁運，並在兩年之後，重啟中美貿易。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問中國，寫下歷史一页。對華盛頓與北京而言，這些外交互動背後的目的，都在於對抗蘇聯，香港為此成為中美貿易關鍵樞紐。一九七二年，中國國企與主要港企開始協商，以期取得外匯，後者受邀到北京商議。至一九七四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希望從香港引進國際科技。一九七三年，外面獲准在寶安區進行商業活動之後，約一萬名在港美國公民開始接觸中國官員。至一九七五年年初，很多美國企業已參與中國的重要項目，逾四十間在港美企亦嘗試與中國企業合組聯營公司。¹⁶這些發生於一九七八年前的經濟活動，再次展示中國官方所宣傳的改革開放時間線如何值得商榷，香港角色如何被忽視。

第二節會分析，香港精英如何在一九七二至一九七八年間預測中國的改革開放發展，並積極為之作準備。尼克遜訪華之後，他們甚至自負地認為，改革會全面展開。他們在中國建立人脈，開拓商機，並在鄧小平發表理論之前，已預視毛澤東時代經濟發展路線會被修正。¹⁷香港美國商會悄然納入中國新會員，加上曾經旅美留學的中國領袖，美國商會漸成香港企業推動中國改革開放的重要平台。至一九七〇年代中，美國商會已能挑戰英方主導的香港總商會（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成為精英商業活動的重要場域。美國商會領袖甚至能夠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他們亦敢於在廣東貿易展覽活動中與中國官員公開對談。¹⁸換言之，在鄧小平掌握實權之前，香港資本家已具人脈與知識，知道如何在中國大陸把握商機。

在第三節，我會揭示一九七八年前的經濟活動如何形塑中國於一九七八年後與全球資本主義的互動。在一九八〇年代，中國的經濟增長，主要源於農鄉經濟去集體化以及鄉鎮企業 (Township and Village Enterprises, TVEs) 獲准發展。¹⁹鄧小平對中國經濟改革具體路線沒有完整概念，但當時中國仍然重視出口經濟，原因是這有助國家換取外匯，以免步上其他發展中國家的覆轍，受外債所累。²⁰於是，鄧小平與其盟友設立深圳經濟特區，並成立中國首間聯營公司，以擴大與美國領導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聯繫。這些新政不全然成功。在一九七〇年代，香港企業已能動用中國低廉勞動力，這些港企聚焦於補償貿易，著力避免固定投資。有別於愛國商人霍英東，大部份港企行政人員都著力與中國官員建立關係，希望能夠推動經濟特區與聯營企業之發展。當時中國放眼於「海外華人」投資者，但這裡所指的「海外華人」，並非遍佈於全球的華人，其主要意思，是指香港商界精英。他們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便扮演中介角色，至一九八〇年代，更協助制訂政策，令趙紫陽得以在一九八八年確認「沿海戰略」。²¹

7.2. 中國透過香港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路 (1971-1978)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並沒有奉行孤立主義。於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七一年間，中國與社會主義陣營的貿易關係頗為緊密，與美國盟友也存有有限度的經貿關係。加比 (Bill Kirby) 曾強調，在全球革命運動之中，中共新政權是領先角色，且也是政經聯盟，這個聯盟從柏林延展至廣東。²² 陳兼亦強調，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普世主義者 (universalist) 形象。²³ 中華人民共和國自立於全球資本主義，只是為方便國家融入於社會主義世界的經濟體系。在對外貿易部的領導之下，中華人民共和國依賴蘇聯與東歐大量物資與技術援助。在毛時代，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更被設立，逾十二家主理外貿的國企負責監管，委員會主責共產世界的貿易事務與處理「第三世界」援助。從一九五七年春開始，中國開始籌辦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 (Canton Chinese Export Commodities Fair)，交易會每兩年舉行一次。最早參與交易會的是歐洲人，在一九六〇年代初，也有很多日本人參與。²⁴ 在蘇分裂、周恩來一九六三至一九六四年無功而還的非洲外交之旅以及文化大革命之後，於一九六〇年代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得到的國際援助與國際貿易收益都大跌。²⁵ 至一九六七年底，交易會延後一個月舉行，在周恩來的介入下，交易會才順利舉行。²⁶ 換言之，當時中美直接貿易關係，受限於文革的發展。

不過，中港貿易關係卻是另一回事。從一九四九年起，中港貿易從未停止過，這也反映了香港在冷戰對壘時代的獨特中介角色。²⁷美國華盛頓嘗試利用香港實行對華禁運，香港華人仍然繼續到訪中國大陸，探訪親友，甚至工作（例如行船）。中國大陸仍為英屬香港供應食水與糧食，華人仍繼續購買中國基本消費品。中國進口貨品，佔香港總進口百分之二十，對北京而言，從中取得的外匯「不可或缺」。²⁸此外，一如香港餐廳Gingles案例所示，擁有廣東當地人脈的前美國陸軍成員，也會參與此一「竹幕」的經濟活動。²⁹

一九六九年之後，美國對華貿易制裁逐漸放寬，中國經香港對外貿易持續擴張，這為中國改革時代奠下基石。美國尼克遜政府開始容許海外美國公民購買中國製貨品，甚至容許非戰略品之貿易。³⁰於一九七一年三月至四月間，在乒乓外交之後，美國政府進一步放寬對美國人訪華與向中國匯款的規管。於六月，美國政府正式終止對華貿易禁運，並於十月容許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台灣，取得聯合國成員國資格。一九七二年二月，尼克遜訪華，令外界意外。學者仍在辯論當時尼克遜與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如何理解美國對台政策，但毫無懸念的是，美國此舉是為制衡蘇聯。³¹一九七三年，布魯斯（David Bruce）在北京開設美國聯絡辦公室（U.S. Liaison Office, USLO），其後，喬治布殊（George H. W. Bush）繼任。在一九七〇年代，理順中美關係的協商一直進行。

在此脈絡下，香港的戰略價值有增無減，但一直受忽視。中美雙邊貿易從一九七一年的五百萬

美元增至一九七四年的九點三三八億美元，美國農作物與科技以及中國煙花、絲綢、古董、茶葉是主要貿易商品。³²香港是當時中美貿易的主要協調、訂購、航運中心，港企亦因而開始改變商業策略。一九七二年，利豐開始從廣東而非澳門採購煙花，向美國銷售。³³對美國學者、文化與商務旅客而言，香港也是必經出入口。³⁴於一九七〇年代初，文革仍然高漲，但在此時，不合時宜、由廣東人主導的資本主義發展力量已然浮現。

中美貿易不但透過香港進行，英屬香港更成為中國國企購買外國科技與聯繫外國跨國企業的重要場域。北京固然會繞過香港，舉行具象徵意義的國家活動。例如在尼克遜訪華之前，中國電信與美國無線電公司（Radio Corporation of America, RCA）簽訂合同，在上海附近設立價值三百萬美元的衛星通訊設備。³⁵同年較後時間，中國急需外匯，中國石化因而需要利用特別列車，透過九廣鐵路悄然將煤油與柴油出口至香港。至一九七五年年底，此一貿易的每年收益已逾二億港元，銷量佔當時香港燃油市場近百分之十二。³⁶一九七二年四月，由宋啟鄭主理的香港美孚石油（見第五章）與香港海通船舶機械用品公司簽訂合同，每月為中國商船隊供應達三千桶潤滑劑。至一九七三年九月，雙方另訂合同，美孚化工為中國化工集團供應一萬五千噸磷酸二銨（Diammonium Phosphate）肥料。³⁷英資企業亦開始與中國國企合作。一九七一年，怡和洋行已敏捷地介入中美貿易，至一九七三年，太古集團旗下的香港飛機工程有限公司（Hong Kong Aircraft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 HAECO) 亦開始為中國國企提供引擎服務。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其行政人員受邀到北京，與中國機械進出口有限公司洽商，並簽訂中國與非共產地「首份飛機與引擎長期保養合同」。³⁸卡特彼勒 (Caterpillar) 等美國在港公司同樣得到中國國企鑽探合同，美國達拉斯的德雷瑟工業 (Dresser Industries) 因而預期南中國海鑽探業務會大增，在港開設辦公室。³⁹一九七四年，家樂氏 (Kellogg's) 與中國技術進出口總公司合作，在全中國共建八幢肥料生產廠。這個項目為期四年，在全中國不同工地，逾一百四十名美國員工參與其中。⁴⁰

中國國企透過駐香港跨國企業促成上述合作，美國對華禁運之終結，亦為港企企業家帶來新的可能——他們得到機會參與「補償貿易」。在緩和政策 (détente) 時代，補償貿易於資本主義與共產陣營間相當流行，這等同以物易物。企業家可以透過提供所需的資本、科技、器械，換取其他貨品，同時得到中國廉價勞動力，並在中國大陸設立營運據點。⁴¹副總理李嵐清留意到，此一趨勢並非自上而下推動，而是在珠江三角洲一帶由地方先行，然後得到國務院的注意，繼而成風。毗鄰香港的東莞甚至為此設立特別辦公室，積極推動補償貿易。⁴²李嵐清記錯的是，此一趨勢並非始自一九七八年。一九七三年，美國公民、長期在港的行政人員布林 (Alex Blum) 率先按補償貿易模式，在中國開展紡織業務。這位來自加州的美國人發現，中國製品質素奇差，供應問題亦嚴重，但其後他與香港同僚逐漸能夠培訓大陸工人，使之能夠按美國消費者標準，生產法蘭絨襯衫與牛仔褲。⁴³

為繞過中國與美國的規管，布林將絲綢從上海運至美國西岸長灘，然後運回香港，以免在美國清關。最後貨品以「香港製造」之名出口。⁴⁴至一九七九年，這位「絲綢之王」已在中國大陸聘用七百名員工，營運九間工廠。⁴⁵在一九七八年年底，妙麗集團的劉天亦於中國大陸按補償貿易模式設立三間工廠，生產鞋、衫、手套，聘用六百人。他宣稱，他投資三百萬，並非為了牟利，而是因為他認為，香港商人應當扮演現代工業管理技術引介者的角色。⁴⁶美國商會成員曾到寶安考察劉天在該地的工廠，當時劉天曾言，他對大陸工人曠工、官員干預感到失望，但亦強調，需要放眼未來。⁴⁷

在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舉行之時，一九七八年前積累的商貿交易與連結之發展更具戲劇性。在交易會舉行期間，資本主義與共產主義陣營的商家與代表受邀參觀乃至下訂中國製品。邀請中國以外訪客之工作，由中國商務部香港分支負責。於交易會，國際商家亦能向中國國企代表銷售其產品。⁴⁸不過，礙於文化差異，這些商貿交易並非全然順暢。美國商家對中國出口商品的質素感到失望，對中國商家不直接的協商方式亦感不滿。中國商家則認為，美國人傲慢、要求很多、口味多變，美國市場亦監管嚴密，且出口成本不菲。⁴⁹但對中國貿易而言，中國進出口商品交易會仍然意義重大，原因之一，是交易會毗鄰香港。有學者曾估計，在一九七九年之前，中國約一半國際貿易，皆始於交易會。⁵⁰

一九七二年春，在香港的美國公民與歐日同僚共同參與交易會。他們與中國官員互相測試

合作空間。在尼克遜訪華之後，美國商會設立中國商務關係委員會（China Commercial Relations Committee, CCRC），研究中國貿易商機，聯絡中國政府貿易機關，其從商會員則各自參與交易會。⁵¹對很多美國商會華人成員而言，這卻是令人擔憂的趨勢。對唐驥千而言，尼克遜訪華，是美國令人失望之舉。一九七二年年底，胡應湘首次出席廣東交易會之後，對廣州的生活質素亦感震驚。⁵²不過，這些華人通曉兩地文化，他們仍能發揮影響力。一九七二年四月，宋啟鄺帶領美孚代表團參與一九七三年年底的廣東交易會。⁵³一九七五年，在交易會中，最大代表團來自日本，其次為美國，出席的商人人數為三百五十至四百二十人。透過交易會，美國商會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中國銀行等代表見面，並強調香港可以方便中國接觸國際市場，以及為中國製品（特別是紡織品與電子製品）找尋對應關稅問題之法。⁵⁴美國商會代表說，商會是中國與香港之間、中美企業之間的橋樑。⁵⁵其後，美國商會代表在午餐會與文章中匯報交易會成果。⁵⁶一九七七年年底，美國商會的中國商務關係委員會舉行閉門午餐會，以便成員交流交易會情報。參與者都認為，中國官員比以往更熱衷於經營國際商貿關係。⁵⁷一九七八年春，很多國際訪客表示，交易會的商品質素與溝通都有明顯改善。⁵⁸

學者經常只聚焦於領袖而非地方官員的言行，但我們發現，廣東官員其實扮演重要角色。一九七四年，廣東官員邀請美國商會進行官式訪問，以便理順中美貿易關係。期間，長期在港的行

政管理人康原 (John Kann) 指出，早在一九七三年初，中國商務部已向廣東佛山給予特權，使之能夠生產出口品，同時有限度引入外資。佛山的成功，亦令其他縣級市爭取相同待遇。⁵⁹ 地方官員甚至陽奉陰違。康原在與另一位行政人員的書信指，在廣東，中央指令未被執行，地方官員與國企經理選擇性地履行職責。⁶⁰ 這反映，北京視角不足以解釋中國改革開放時代的故事。一九七八年初，地方官員甚至容許東方賓館自行透過交易會購買美國工業用殺蟲藥，以杜絕酒店內的蟑螂。⁶¹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鄧小平演說之前，很多廣東官員乃至基層員工已開始認識資本主義，不再盲目將之排拒。

需要留意的是，當引進外國科技成為中國國策之時，美國官員亦有從旁指導、鼓勵香港行政人員。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七年間，鄧小平與周恩來批准二百五十個引入外國技術的項目，這些項目總值四十億美元。⁶² 對美國華盛頓而言，這種技術轉移，有助美國佔據中國市場。一九七四年，美國聯絡辦公室的賀勞茲 (Herbert Horowitz) 要求美國商會善用中國渴求外國科技所帶來的機會。他指，這需要外國商人與中國官員建立建立聯繫與互動，同時為他們提供小冊子與文獻。⁶³ 這發生於一九七〇年代中美關係回暖之時，當時香港是中美互動的關鍵進出口。⁶⁴

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八年間，中國仍未完全融合於美國主導的資本主義體系。於此形勢下，不同中國代表、香港行政人員和企業家，乃至美國政策轉變，都促成了一系列經濟舉措。一九七六

年，中國土產畜產進出口總公司邀請康原到訪上海，出席中國羽絨服飾小交易會。⁶⁵他回憶說，在旅程中，他不時遇到態度不佳的中國官員，但他亦有獨自考察上海，與高級官員見面，並到北京出席另一小交易會，這都發生於周恩來喪禮與毛澤東過世之前。一九七五年，另一行政人員、康原友人哥曼 (Tom Gorman) 成立其面向中國的公司 CCI Asia-Pacific Ltd。這家公司的成立目的，是培養中國基層對資本主義世界資訊與科技的渴求。他免費刊行歐美工業報告，介紹歐美最新工業製品。他的策略極其成功。一九七七年，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批准哥曼訪問其讀者，以考察其興趣，這在當時是破格之舉。在一九七八年，哥曼已能在刊物之中附有反響問卷。⁶⁶至一九八〇年，美國工業報告的訂戶人數，達三萬五千人，每本刊物的傳閱人數，更達五十五人，換言之，讀者總數可達百萬人。⁶⁷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中，CCI 已刊行逾三十種工業相關刊物，這些刊物經香港傳至中國官員、工程師、商人、工業家手中。

7.3. 香港對中國改革發展之預測與美國商會本土化之源起

在一九七一至一九七八年間，香港與中國角色乘中美關係回暖之勢，嘗試不同合作方式。一九六四年，中日簽訂《中日長期綜合貿易備忘錄》，此後中日貿易關係恢復正常。但中美關係回

暖意義更重大，原因是美國為香港主要貿易夥伴，往美國領導的全球體系之門亦為此而被打開。新的國際氣候，令北京得以在一九七一年重拾聯合國席位。在一九七五至一九七八年間，鄧小平率團訪問法國與新加坡。單是在一九七八年，外訪的中國高級官員已達二十一團。北京亦非常歡迎外國領袖訪華。毛澤東曾批評南斯拉夫的鐵托（Tito）為「修正主義者」（revisionist）。但在華國鋒時代，他卻成為北京賓客。⁶⁸

這些經濟和政治信號引起了香港跨國企業群的注意，他們有意識地群策群力，迎接中國大陸的未來發展機會。這種現象的意義非凡，特別是當時美國商會等商業平台變得愈來愈本土。商會成立於一九六九年，是外國人組織，與美國領事館有聯繫。⁶⁹但從一開始，美國商會便與華人精英建立了關係，例如上述宋啟鄭是創會成員。⁷⁰從一九六九至一九七三年，美國商會會員人數從二百一十二人增至六百八十七人，馮國經與胡應湘等人也是會員。⁷¹至一九七六年年底，商會會員人數已增至一千一百人，但當中只有百分之五十五為美國公民。⁷²其餘百分之四十五成員，並沒有以歐洲為主，亦因此，商會以中英文刊行會員錄。⁷³在一九七〇年代，按商會會員名錄介紹新會員的章節，新加入成員往往是華商、製造商、銀行家、行政人員。（見圖7.1）華人甚至開始領導商會。作為宋啟鄭在美孚的門生，Helen Kar Chan 在一九七九年擔任勞資關係委員會主席，且也在一九八〇年一月成為商會首位華人女性董事會成員。⁷⁴一九七七年，鄭明訓加入商會，並在

一九八〇年當選為工商發展委員會主席，馮國經則在一九八三年加入商會董事會。⁷⁵

這種趨勢反映的，是加入美國商會，不只能提升會員的社會地位，且也可為製造商與零售商提供重要市場情報。當時香港仍將約百分之三十至四十貨品出口至美國市場，投資於香港工業的外來資金，逾半來自美國。⁷⁶故此對香港行政人員而言，美國消費者的品味、其貿易與稅收法律之細節，仍然是重要知識，聯業集團太遲理解這一點（見第六章）。在這方面，美國商會能滿足需要。

例如在一九八〇年四月，《亞洲紡織月刊》（Textile Asia）總編輯、美國商會會員宋凱沙（Kaysar Sung）為商會的紡織委員會主持研討會，詳細預測影響全球紡織業的《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未來發展。⁷⁷中小企製造商能透過這些研討會了解大勢，尋求美國領事建議，以及在美國複雜規例之中尋找機會。⁷⁸香港聯合交易所創會主席曾與美國商會合作，在荃灣興建紡織學會美國商會胡漢輝中學。⁷⁹於一九七〇年代，與香港學生入讀美國院校的原因一樣，香港行政人員亦加入美國商會，希望可以積累美國社會資本。⁸⁰一九七七年，滙豐銀行主席曾言，美國商人已與香港夥伴建立了穩固關係。⁸¹和記黃埔（Hutchison Whampoa）首席執行官被問何以積極參與美國商會事務時，他回答指，香港沒有任何一間貿易公司可以不成為美國商會成員。⁸²

美國商會本土化、華人行政人員擁抱美國商會，亦意味跨商策略在香港變得根深蒂固。例如在一九七六年，有美國行政人員於美國商會月刊指，中華人民共和國欠缺真正的貿易法律。廖瑞珠作

Meet our new members

(photographed)

1. George K. T. Ma
Plutus International Tdg. Co.
2. D. J. Savarese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mpany
3. Richard S. Zee
Collins Radio Co. (F.E.) Ltd.
4. David K. C. Ma
Int'l Assoc. of Students in
Economics & Commercial
Sciences—HK
5. Wilbur F. Hoehling
Fisher Radio
6. Simon S. M. Lai
Int'l Assoc. of Students in
Economics & Commercial
Sciences—HK
7. L.M. Angus
The National Cash Register Co.
(HK) Ltd.
8. Harry Bhalis
Nordson Pacific Inc.
9. Michael G. Hartley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10. Suzanne F. Green
Business Int'l Asia/Pacific Ltd.
11. S. F. Heffner III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12. Timothy J. Williams
Bank of America NT & SA
13. K. K. Wong
Eveready Hong Kong Co.

14. Robert Mettler
Affiliated Machinery Agencies
15. James E. Hood
Intrusion-Prepakt (P.E.) Ltd.
16. Stanley W. Hong
Jardine Matheson & Co. Ltd.
17. Michael J. Heasman
Dredge Masters International
18. Abe Chitayat
Amerex International (HK) Ltd.
19. Rainer Franz
The Chase Manhattan Bank NA
20. Raymond J. Stone
Dow Chemical Pacific Ltd.
21. Graeme C. Woodbrook
First National City Bank
22. Anthony P. Golamco
Sun Hung Kai-SGV Management
Consultants Ltd.
23. A. J. Noble
Trans World Airlines, Inc.
24. R. Diehl
Singer Sewing Machine Company
25. Theodore C. Yang
Merrill Lynch, Pierce, Fenner &
Smith Hong Kong
26. David C. L. Tsang
Hang Seng Bank Ltd.
27. Kurt R. Marschall
Goodyear International Corp.

28. Thomas M. T. Tao
Int'l Assoc. of Students in
Economics & Commercial
Sciences—HK
29. Martin H. W. Wong
Kidder, Peabody & Co. Ltd.
30. Maurice Chung
Marck Sharp & Dohme (Asia) Ltd.

(not photographed)

31. David Cohen
W. T. Grant Company
32. James K. O. Lee
Int'l Assoc. of Students in
Economics & Commercial
Sciences—HK
33. Charles K. H. Tang
Microfilms (Far East) Ltd.
34. Martin Spurrier
The HK Convention Centre Ltd.

圖 7.1：美國商會在一九七〇年代擴大會員人數，香港美國商會一九七五年報導，反映出族群多元化（性別則未必）以及美國跨國企業的影響。由香港美國商會提供。



圖 7.1 (續上圖)

為當時香港的著名事務律師，針對此點，為中國辯護。廖瑤珠畢業於香港大學、英國牛津大學、美國哈佛大學法學院。在一九八〇年代，她成為親北京政客，出任港區全國人大代表之職，並曾參與草擬《基本法》。她曾指，中華人民共和國具有合約精神，這有別於美國情況——崇尚自由貿易，但政府對外國貿易的控制微妙且複雜。不過她亦聲明，「同路人」美國商會的委員會可以討論外貿事務，且在長遠而言，能成為化解誤會之平台。⁸³曾有AIA法律顧問撰文反駁廖瑤珠觀點。⁸⁴即連廖瑤珠這種親中精英，亦不會全然視美國商會為他者，這多少反映當時的香港已遠離於英國，向美國靠攏。在中美經貿回暖之際，這種香港精英的中介角色特別重要。在下一節，我們會看到，北京曾邀請廖瑤珠草擬首份規管出口導向聯營公司的法律條文。⁸⁵

清楚可見的是，在一九七〇年代，專業知識與實戰經驗有助打破中國大陸官僚作風。一九七五年，美國商會出版頗具篇幅的指引，介紹中國的貿易發展。美國聯合碳化物（Union Carbide）行政人員高迪（John Goudey）成為首位與北京高官見面傾談生意的美國商會會員，當時毛澤東仍然在世。⁸⁶美國商會的中國商務關係委員會亦定期為會員舉行簡佈會，為貿易展參與者、記者、美國經貿官員服務。⁸⁷隨著中美兩國關係的發展，中國商務關係委員會的成員人數從一百二十人增至兩百人。委員會的工作重心，逐漸趨向建立人脈，以及促進中國地方組織的團隊精神。⁸⁸美國商會亦有刊行專題報導，介紹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經濟與司法系統，並與香港大學法律系聯合舉辦研討會，探

討中國的貿易法規、談判技巧、支付與信貸系統、紛爭處理機制。⁸⁹行政人員雖然認為，中國的貿易系統令人困惑，但他們對中國愈感信心，原因是他們的中國夥伴熱心履行合約，這與上述廖瑤珠觀點一致。⁹⁰

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之前，於美國商會內，精通中美文化的會員已與中國官員建立了關係。在中國文化之中，「關係」顯然非常重要，而在當時香港，貪污問題仍然嚴重。美國鋁業公司（Alcoa）的胡溫（Robert Woodwin）在一九七四年與中國官員會面之時，曾言中國人仍未真正理解置於香港的美國企業區域辦事處有何角色與戰略意義。美國商會的一大目標，是令中國官員明白，在港中國專家是他們應當聯繫的人。⁹¹一九七六年春，美國商會社群以「友愛、耐性、貿易」作為口號，教育中國大陸官員。⁹²他們派員出席地方悼念周恩來的場合，在此數年之前，這是令人難以想像的政治現象。⁹³曼尼（Herbert Minich）等商會會員透過香港、廣州、北京的聚會，共同建立連結中國官員的社群。⁹⁴這些聚會並非只流於空談，中國國企事實上也能從中得到助力，以克服貿易發展的種種難關。美國商會會員指導中國國企有關美國關稅的細節，亦為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舉辦研討會，介紹美國紡織品配額細節，同時提供應對美國關稅流程的免費指引。指引頗受中國紡織品進出口總公司歡迎，後者隨即增加指引索取數量。⁹⁵商會也有為中國大陸代表團籌辦考察團，以便他們觀察香港工廠營運細節。中國官員因而逐漸感受到美國商會在港角色與影響力。⁹⁶

在中美兩國於一九七九年一月恢復正常關係之前，美國商會會員已著力影響美國對華政策之制訂。於一九六〇年代末，美國政府藉由數個非政府組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接觸。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National Council for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NCUSCT）成立於一九七三年，其職責是以類官方機構身份監督中美貿易發展，這個委員會與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是合作夥伴。⁹⁷ 埃索行政人員斯露士（Mel Searls）於一九七一年首次到香港，到港之後，他立即加入美國商會，以及其中國商務關係委員會。⁹⁸ 按老布殊的回憶，在一九七四年往北京的行程中，斯露士祕密與北京高級官員見面，討論購買中國原油與為中國民航提供燃料的可能。⁹⁹ 翌年，斯露士成為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副主席，並回到美國華盛頓。他定期來往華盛頓與北京的行程不變，且常在香港停留，與美國商會的朋友見面。¹⁰⁰ 美國商會與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關係密切，斯露士甚至形容，前者是後者的訓練場。事實上，後來美國商會的執行董事繼任成為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副主席。¹⁰¹ 一九七六年，康原成為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新代表。其後，美國商會與北京新的美國大使館之間建立了旋轉門。¹⁰² 在一九七九年之後，斯露士等美國商會成員掌管北京新美國大使館的商貿事務，且美國商會亦成為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在港代表。¹⁰³ 這意味，美國商會在美國商界的定位有變。香港美國商會成立於一九六九年，成立五年後，在美國於亞洲的十八個商會中，香港美國商會已是規模最大，且也是美國商界領袖跨域旅程之中必停之站。單是在一九七六年年底與一九七八年初之間，香港美國商會

便已不少重量級座談會，講者包括道瓊斯（Dow Jones）主席、美林銀行（Merrill Lynch）首席執行官乃至美國財長。¹⁰⁴

換言之，在鄧小平鞏固權力之前，香港的跨國企業社群已預視中國改革將臨。一九七九年，這個社群所做的，是與中國官員建立人脈，向中國政府機關以普通話演說，為北京外貿機關舉行晚宴，乃至安排中國大陸官員考察團到訪香港。¹⁰⁵這種聯繫有助中國官員與香港美國商會成員建立共同目標，美國國會批准中國得到最惠國待遇，是目標之一。¹⁰⁶的確，香港精英對他們之於中美貿易的影響力滿懷自信。一九七八年七月，美國國會代表禾夫（Lester Wolf）率團訪問中國，與鄧小平見面。訪問團到香港之後，回美國之前，美國商會為訪問團舉辦了早餐會，不過美國商會成員只想討論「有關美國本土的政事」。¹⁰⁷

7.4. 香港與中國經濟實驗之試行（1979-1982）

一九七七年，除了美國商會等香港組織積極活躍之外，鄧小平與其盟友亦私下聯繫香港富豪。這些領袖希望得到的，並不僅限於這些富豪的資金，他們也希望認識這些精英的週邊人際網絡。美國歷史學家格慧士（Julian Gewirtz）認為，國際學術交流與會議固然有助中國經濟學家制訂改

革時代政策，但對於中國政府高層而言，香港精英猶如另類傳聲筒。事實上，香港精英能令中國領袖得到機會連結全球體系，若然缺乏這種助力，中國便會無法融入於這個體系。按上一章的分析，在一九七九年之前，香港跨域航運、金融、資訊網絡之廣，只有倫敦、東京、紐約能與之匹敵。一九七七年中，美國大通銀行將亞太區總部移至香港。一九七九年，中國銀行邀請大通銀行與之合作，處理匯款與銀行信用證 (letter of credit) 事務。¹⁰⁸這種合作既增加香港本土企業的流動資金，亦舒減了中國國企資金緊拙的壓力。與此同時，透過跨商，香港往美國市場的網絡變得更為深厚。一九七四年，在新的《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之下，香港紡織業得到相當多配額（下一節會更詳細分析）。一九七六年，香港貿易發展局成功爭取普及特惠稅制度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GSP) 優惠待遇。¹⁰⁹換言之，香港當時頂尖的金融能力、製造業能力、國際貿易待遇，為中國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經濟資源。

在這些經濟資源的支持下，特別經濟區之概念逐漸成形。於一九七八年四月至五月間，中國國家計畫委員會與中國對外貿易部代表歷史性地到訪香港，就寶安縣的經濟實驗與香港商界交流。¹¹⁰從一九七三年起，補償貿易便在寶安縣實行。同年五月至六月初，中國副總理谷牧到訪法國、德國、瑞士、丹麥、比利時。這是谷的首次外訪，西歐的經濟繁榮令他感到震撼。漢堡與哥本哈根等城市的出口處理區，是吸引他目光的一大創新。他回到中國之後，隨即向政治局呈交長文報告，在

一九七八年六月三十日，這份報告經多個小時的討論。谷倡議善用鄰近香港的優勢，在廣東設立類似的出口處理區，且得到其他中國領袖之和議。¹¹¹在後續討論之中，有中國領袖甚至認為，這些出口處理區應先聚焦於紡織業，以解決紡織品短缺問題、建立公眾信心、取得紡織業先進地香港與日本的資金。¹¹²

駐港北京代表也有相近看法。前情報官員袁庚在一九七八年初移居至香港，主理中國輪船招商局。此一企業歷史悠久，在中國自強運動之時成立，曾在中共建政之時分裂。¹¹³一九七八年八月，袁庚向中國交通運輸部呈交報告，提出中國輪船招商局發展藍圖，倡議利用香港航運業，令中國取利。航運業情況反映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發展差異。在香港，船隻來回時間為二點六日。而在中國港口，船隻來回時間則為七點七日。一九七九年，天津的船隻來回時間，更達十一點六日。¹¹⁴袁庚為此建議在廣東興建新港口，以便建立出口處理區。其報告被呈國務院。¹¹⁵數週之後，於國慶前夕，鄧小平與副總理李先念邀請港澳商界領袖到北京人民大會堂，當中包括胡應湘與霍英東。中國官員公開鼓勵他們研究中國國情，幫助國家渡過「新長征」，實現「四個現代化」。私下他們很有可能曾討論建立出口處理區之倡議。¹¹⁶一九七九年一月一日，中美關係正常化。兩日之後，中國輪船招商局向國務院呈交更為詳細的報告，報告倡議動用一千萬美元在蛇口（寶安旁的半島）興建港口與出口特區。¹¹⁷中國商人屆時可以在此興建與營運蛇口工業區。在一個月之內，李先念與谷牧批准建

議，並允許袁庚自行聘徵技術工人。事實上，當時廣東書記習仲勛得到中國國務院批准，招攬外資。¹¹⁸港口工程在四月開始，並在一九八一年竣工。¹¹⁹

在一九七九年四月，首四個經濟特區計畫亦得到批准開展。寶安被歸為深圳的一部份，但擁有行政自主地位。另外兩個經濟特區被設於廣東，分別為珠海與汕頭，第四個經濟特區則為福建的廈門。設立經濟特區的目的，是透過聯營公司得到外國科技與外匯。第一批聯營公司主要經營酒店，以展現「新中國」的一面。一九七九年中，霍英東被委託以補償貿易模式在廣東興建兩間酒店，也有數家中國國企與香港以及美國企業在北京聯營酒店，當中包括長城飯店、建國飯店、民族飯店，以及由貝聿銘設計的香山飯店。¹²⁰不過，這些項目亦反映了中國程序錯綜複雜以及缺乏經驗的一面。這些酒店同時也成為中國與外資聯營公司法律藍本案例，其法規在一九七九年七月一日被通過。¹²¹十月，美國商會以系列文章分析這些法規。商會歡迎這些法規，但亦認為，當中不無含糊處。¹²²在接下來二十年，美國商會繼續聚焦於法規的灰色地帶，商會的結論，是法規仍然不夠詳盡，甚至神秘。¹²³法規的一些要求，令投資者相當關注，原因是按照法規，聯營公司需以中國人為主席。有些法規內容則不夠務實，例如按其要求，每個聯營發展項目都需引入外國至為前沿的技術。¹²⁴一九七九年七月，國務院決定，在經濟特區之外的部份企業，可以保留一定比率的利潤。觀察者同樣認為，這種政策不切實際。¹²⁵

結果，願意前來合組聯營公司的外企並不多，既有的聯營企業案例，也成了警世故事。案例之一，是在一九七九年底香港企業哈柏國際 (Harpers International)、中國機械進出口 (集團) 有限公司、廣東省汽車工業貿易總公司所達成的協議。按協議，三間公司會在深圳據補償貿易模式生產旅遊巴士。哈柏國際投入一千零五十萬港元，負責器械與工程，中國國企則投入二百五十萬人民幣，負責處理廠址、地基、道路事務。一九八〇年年底，廠房啟用，但其員工被哈柏國際指「缺乏技術」。¹²⁶按照法律，員工不能被解僱，工廠只能增聘人手。工廠最終陷入營運困境，但哈柏國際仍能得到補償。¹²⁷其他早期聯營公司所以成立，其實也只是源於國家榮耀感，霍英東旗下酒店、生於美國的餐廳大亨伍沾德與其留學美國女兒伍淑清在一九八〇年四月重整中國航空服務，便是例子。¹²⁸

雖然商業交易熱潮未現，但人際網絡之發展速度確有增加。在呈交蛇口計畫之後，主理中國輪船招商局的袁庚於香港富麗華酒店 (已被拆卸) 設宴，招待四百名賓客，這些賓客包括香港社會成員，各界香港企業家，乃至香港英政府官員。¹²⁹中國輪船招商局、新華社、中國銀行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也加入了美國商會。¹³⁰一九八〇年初，廣東省領袖與中國著名經濟學家許滌新相繼來港，在美國商會發表演說，參與會議。¹³¹這些聯繫都促成了新的經濟機會，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是其中一例。¹³²一九七九年七月，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成立於北京，負責招攬外資與外國技術。

榮毅仁被選為主席，原因之一，是他擁有香港社會資本。在第一章，我們見到，於一九四九年前，榮家是江南龍頭紡織大家。榮毅仁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其家族選擇留在大陸，中華人民共和國初期亦容許其家族以國企形式繼續營運紗廠。¹³³與劉鴻生一樣，在一九五六年之後，榮家特權被奪，榮毅仁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批鬥。四人幫倒台之後，榮毅仁恢復名譽，當時香港親北京報章《大公報》與他做了詳盡的訪問，讓他為「國家資本家」發言。¹³⁴一九七九年三月，事隔三十年，他首度訪港，並接受了數個訪問，席間他表示希望能夠重新聯繫老朋友與親戚，同時亦指香港在與中國大陸經濟合作事務之中，有其特別角色。¹³⁵

榮毅仁被委以重任，經營與香港乃至美國之連結。他宣稱，在新的聯營企業法例下，港澳投資者會與國際投資者一樣，享有優待。¹³⁶八月底，他回到香港，解釋聯營企業法例細節，並且宣佈，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將會在港設立分支。¹³⁷十月五日，中信與美國電力公司伊頓（Eaton）簽約，這是中信的首份合同。按照合同，雙方以一億五千萬美元共同成立聯營公司。十月七日，榮毅仁應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之邀，到訪美國一個月。¹³⁸在這次旅程中，其目標是與眾多美國企業與官員簽約，以期促進中美貿易與投資。¹³⁹於華盛頓，榮毅仁得到百間美國企業的款待。在紐約，他出席由大使菲利（Christopher Philipps）的歡迎會，並提及外資原則。¹⁴⁰回到華盛頓之後，他與美國副總統孟岱爾（Walter Mondale）午膳，然後在晚間與美國國防部長及國務卿見面。隨後榮到芝加哥，

與第一芝加哥銀行（First Chicago Bank）簽約，合經聯營公司。¹⁴¹吳志超及後與他回到香港，在美國商會的午餐會發表演說，午餐會的嘉賓包括霍英東與美國領事等人。¹⁴²其演說主題為「外資在中國四個現代化計畫中的角色」，左中右報章皆有報導這次演說，美國商會亦有將演辭連同答問環節內刊出。¹⁴³一九八〇年五月底，榮毅仁回到紐約，他率領中華人民共和國副總理與中國銀行代表團出席大通銀行會議，會議的主題，是中國改革與中美經濟關係，舉辦者是大衛·洛克菲勒（David Rockefeller）。¹⁴⁴會議的焦點，在於中美兩國如何互利。二月一日，美國國會有條件地給予中國最惠國待遇，至四月，在蘇聯入侵阿富汗之後，美國卡達政府推出新准證「P」，容許敏感科技出口至中國。¹⁴⁵

五月，榮毅仁派遣背景相近的吳志超到香港，出任中信香港代表之職，吳志超是首任代表。¹⁴⁶作為中國「味精大王」吳蘊初之子，吳志超同樣在江南成長，是旅美回留學生。¹⁴⁷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他在香港中華總商會發表演說，談論有關聯營企業的法規。一九八〇年二月，他在美國商會演說，這次他談論的，是中美不斷增長的貿易，聽眾座無虛席。¹⁴⁸美國商會主席史屈瑟（Jim Sweitzer）介紹講者吳志超之時，提到他們都是密西根大學的舊生。中國得到美國最惠國待遇之事，受二人肯定，吳志超則分析聯營企業之發展，他亦讚頌美國商會之於中美貿易的角色。¹⁴⁹榮毅仁與吳志超同樣認為，在一九四九年前早種的美國社會資本，可被重新加以利用，中信可藉此融入於香

港的跨太平洋網絡。

這對經濟特區與聯營企業政策之發展頗具意義。在演說之中，榮與吳經常說，他們聽取香港行政人員的意見，有關聯營企業規管的反響，特別受他們重視。香港行政人員要求開除工人的權利，此一意見被納入於廣東經濟特區政策之中，一九八〇年八月，人大會議通過此一政策。不過，商界仍有怨言。例如，在經濟特區之中，企業所得稅可達百分之十五，僅低香港利得稅百分之一點五。此外，按經濟特區規例，某幾類企業可得優待，但申請程序卻未被列明。¹⁵⁰數週之後，美國商會代表聚於北京，與財政部稅務總局官員會面。這位官員「有禮地」聆聽他們對於稅務政策的訴求，且作筆記，隨後很「冷靜」地告訴他們，新法規會實現他們的訴求。同一代表團亦與中國銀行代表與副總理姚依林會面，後者生於香港，負責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金融事務。代表團就外匯安排作出投訴。¹⁵¹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即一個月之後，國務院推出外匯新政策，經濟特區可自行制定其外匯政策。¹⁵²一九八一年五月與六月，高級官員聚於北京，分析經濟特區整體表現不佳的原因，並檢視特區政策。¹⁵³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國務院接連推出十條新法規，這些新政以香港行政人員的投訴意見為骨幹，並予以特區更多特權，以進行更多實驗。¹⁵⁴至十二月，深圳推出新土地法，新法在一九八二年一月即時生效。¹⁵⁵

可以說，香港行政人員運用其中國大陸高官人脈，推動改革，影響中國大陸之政策制訂。後來

出任為中共總書記的江澤民曾指，因無先例可循，擁有愈來愈多自主權的特區官員經常無所適從，他們不時制訂不一致或自相矛盾的政策。¹⁵⁶當然，香港精英也有利用網絡，乘機貪污。羅氏美光曾在深圳之外開設外資全資擁有的工廠，但這間工廠仍能享有經濟特區優惠。¹⁵⁷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中信與芝加哥貝萃斯食品（Beatrice Foods）合組的聯營公司開設包裝廠，這間工廠理應只將成品出口，後來其製品也在國內銷售。¹⁵⁸

事實上，早期的聯營企業法規與經濟特區發展，亦反映北京的政治矛盾。農村的去集體化，令民眾收入急增，但通漲問題亦因此變得嚴重。與此同時，一九七九年，國家引入外國技術的計畫、中越戰爭之爆發，引發了中國大陸財政赤字問題。以陳雲為首的溫和保守派領袖擔心，在價格改革的情況下，經濟形勢更易失控。一九八〇年年底，北京突然減少政府支出，擱置改革，以及截停眾多外資重工業項目，以遷就輕工業之發展。諾頓（Barry Naughton）曾以「大勾銷」（great write-off）之說形容此時的中國政府政策。¹⁵⁹中國經濟發展亦因此停滯，一九八一年年底，在全中國大陸，獲批准的聯營企業少於四十家。¹⁶⁰一九八二年年底，數字回升至四十八家，當中二十二家來自香港，十一家來自美國。¹⁶¹一九八一年中，在深圳，外國投資的工業項目，達六百項，當中七成來自香港。這些項目多以補償貿易模式進行，且從一九七〇年代初開始，便已開展。¹⁶²

7.5. 小結

這一章重新檢視一九七〇年代至一九八〇年代初期間的中國改革時間線。若然聚焦於香港的經濟活動，我們會對改革時間線另有看法。從一九七一年中美恢復貿易關係開始，中國便已逐漸對外開放，鄧小平之崛起，並非中國改革故事之起點。於寶安的補償貿易，為未來深圳經濟特區之發展提供了參照。於過程之中，香港商界精英積極表達支持中國改革之想法，亦為此作準備。一九七九年一月，中美兩國關係恢復，新的機會湧現，但經濟特區之概念與聯營企業法規之內容仍然模糊，與此同時，香港企業已能動用中國大陸低廉勞力。北京縱然得到愛國商人霍英東與銀行家莊世平的支持，但莊曾對北京強調，海外華人不會純然基於愛國情懷在中國投資。以副總理李嵐清的話說，在見錢開眼的情况下，人們才會成群結隊前來。¹⁶³大部份香港商人其實都不信任中國共產黨，他們的焦點有三：第一，補償貿易；第二，與中國官員建立關係；第三，推動中國改革。

在一九八二年，要預見中國成為出口大國，或中美貿易關係蓬勃發展，並非易事。一九八二年，中美貿易額達五十三億美元，佔當時中國外貿總額百分之十二點八。中日貿易額則為八十九億美元，較前一年下跌一百零四億元。¹⁶⁴在此時，榮毅仁與吳志超利用香港的跨太平洋網絡，以發展中信，北京在香港設立企業，以得到外國（特別是美國）的資金與技術。其中一例是光大集團，北

京藉此購買外國器械與科技。其首任領袖是王光英，他是王光美（即劉少奇之妻）之弟。一九八二年，王光英移居至香港，與唐驥千同住一大廈。他同時加入美國商會與香港中華總商會。¹⁶⁵按香港中華總商會月刊的紀錄，在一九八四年四月，王光英曾在美國商會午餐會演說，這次午餐會之規模，創下美國商會之紀錄。他指，中國共有四萬家工廠，所有工廠都需技術升級。當時美國商會領袖高迪（John Goudey）回應說，中國的爆炸性增長指日可期。¹⁶⁶

一九八四年後，香港工業漸移至廣東，促成中國大陸出口導向之發展。這種發展並非無可避免。當時在廣東，大部份地方都缺電力供應或可靠交通支援，要建立港口，並不容易。對國際資本而言，若然缺乏這種基礎配套，中國勞動力低廉，也不足以成為有力誘因。再者，香港前途問題不定，亦令香港角色生變數。英國只租借香港新界九十九年，至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但當時無人知道，後事如何。在毛澤東時代，中國決心不就香港問題表態。一九七九年，鄧小平與香港總督麥里浩（MacLehose）首次討論香港問題，但並無結論。當九七問題動搖香港地產業之時，中英雙方才開始認真討論。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先提出「主權換治權」之論，希望藉此解決租約問題。一九八二年，戴卓爾夫人訪華，其聲明備受批評，故此其主張容易激起與帝國主義、中國民族主義相關的情緒，難以取得支持。¹⁶⁷

鄧小平與其盟友矢志保衛香港自主權，但大部份香港人都不信任中共官員。一九八三年，中國

北京明言，會取回香港主權與治權，香港隨即湧現恐慌，移民潮隨之而起。一九八三年年底，香港樓價急跌，股市價格蒸發了百分之三十五，港幣亦貶值，至一九八三年十月，需與美元掛鉤，聯繫匯率維持至今。數以萬計家庭移民海外，怡和洋行亦棄船。一九八四年三月，怡和宣佈，其總部會遷至百慕達（Bermuda），其股價乃至香港股市應聲下跌。¹⁶⁸這次危機危及的不只是香港，中國所有改革同樣受波及。在當時，香港是所有中國大陸經濟特區資金乃至聯營企業的最大來源地。在最後一章，我們會見到，世界格局和跨商策略如何被香港精英與北京之間的協商形塑。

道教青松仙苑

【第八章】

Chapter 8

香港跨商與全球新秩序 (1982-1992)

大興膠皮有限公司

行原

金寶順

榮豐金局
志興德
同發

昌興皮革

品製

金克傑

革皮興昌

料鞋革皮興聯

中環電車

第八章 香港跨商與全球新秩序 (1982-1992)

「在某些社群與政商機構的領導下，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不斷增長與重組。這些政商機構利用彼此決策的意外後果，從中取利。」——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一九八四年六月，唐驥千率領香港行政人員到北京，與鄧小平會面，討論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事務。¹會面的意義非凡。在此前兩年，中英談判已令香港前途成疑。英屬香港的幣值、股價、樓價全線下跌，很多人憂慮，香港大限將至。



圖 8.1：鄧小平與唐翔千、唐驥千及倪少傑在北京會面，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二日。由大公報提供。

在此時刻，唐驥千為香港商界領袖發言，這些領袖都是香港至為重要的搵客。經一百二十三年後，香港總商會（British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推選唐驥千為首任華人主席。²這令北京不得不邀請唐驥千到北京與鄧小平見面。與唐同行的，還有唐翔千（香港工業總會主席）、倪少傑（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主席）（圖 8.1）這三位資本家基本上已代表了當時整個香港的商界，但他們卻難以代表整個香港社會。一九八三年，鄧小平將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摒除在外，阻止他們參與中英談判，同時強調，北京能為港人代言。唐訪京之後，鄧小平最終在非官方場合與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見面。當時媒體認為，他冷待這些議員，猶如「公開侮

辱」。³鄧小平展現的，不但是他對英殖管治的厭惡，也包括他對香港權力架構的理解。

實際上，香港商界精英與北京之間的權力關係，並非極度不對等。在前一章，我們提到，從一九七七年起，鄧小平與其盟友已在連結香港精英，因為他們需要幫助。⁴有些精英向北京示好，包括唐驥千在內的另一些精英則有所保留，原因在於其反共意識，以及其繫於台灣的生意。但這反而令北京對後一類香港精英更感興趣。不過，唐驥千先與台灣官員商議，才接受北京邀請。顯而易見，這會觸怒北京。不過，時任香港新任新華社社長許家屯說服北京大事化小，小事化無。⁵唐驥千此時再提額外要求——他堅持其香港總商會副手（英國人）同行，這有違他所得到的指示。如此一來，唐驥千希望知道事情會如何發展。他曾言，他事實上不太看重訪京之行，甚至不太願意起行。他前行，純然出於職責，而非榮耀，故此刁難。身在北京之時，唐驥千亦沒有示好。鄧小平在會面之時點煙，且與唐驥千分享，唐驥千則點自己的雪茄，以此象徵「資本主義」。⁶唐驥千在試探鄧小平。唐暗示，香港精英群體需要得到中共明確的承諾，才會在一九九七年後留守於香港。

唐驥千以美國東北口音發言，由翻譯員翻譯。他向鄧小平強調，任何中英條約都應保存香港社會自由、獨立司法系統、獨立貨幣、國際身份、進出自由。⁷他表示，如果香港現狀不能延續，無法享有真正自主地位，像他那樣的商界領袖定會在香港回歸前離開香港，屆時香港經濟便會下沉，社會會湧現恐慌，上海精英與其子女為逃離中共而離開中國的情景會重現於香港。不過，唐驥千維

持香港現狀的立場，其實只反映其同階級逃難精英心聲。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領袖鍾士元曾問唐驥千何以只提進出自由，而沒有提到全民普選。唐驥千則反駁說，鍾士元捉錯用神。他指，若以上海諺語角度看，對在籠裡的蟹而言，第一件事是離開鐵籠，之後便能思考下一步何去何從。相較香港的老廣東人，上海難民對此感受更深。前者不曾有逃難經歷，不曾為此掙扎。本書分析至此，我們可以見到，對江南精英移民乃至跨商策略應用者而言，香港政治改革從來不是核心議題。他們務實地利用數十年時間，謀取經濟利益，推動非正式解殖，並視香港為潛在逃生之地。

事實上，唐驥千所提的意見，早已被鄧小平接納。一九八二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出首份有關香港回歸的建議書。按其建議，在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司法與資本主義體系不變，後來這被稱之為「一國兩制」，並成為中英談判的核心議題。事實上，中英談判由北京與包括唐驥千在內的香港商界領袖之間的協商主導。大部份香港人都需要相信鄧小平相當動聽的承諾——香港會繼續「馬照跑，舞照跳」。⁹但像唐驥千那樣自由自在的資本家卻希望得到中國大陸政府更具體與更詳細的承諾。在會面之中，唐驥千不斷尋求保證，鄧小平開始不耐煩，並指如果唐驥千不信任他，於事無補。他認為，他就算到廟中佛像面前許諾，唐驥千也不會信任他。¹⁰按唐驥千的說法，最終令他改變想法的，是他對鄧小平性格的評估。在北京短留兩天後，他回港。抵港後，他感到對一九九七年的憂慮似乎消散。他認為，鄧小平是有人性、有溫和一面的強勢人物。¹¹他會成為世紀之中至為偉大的

人。他宣稱，在會面之後，他決定相信鄧小平，特別是當他提到中國需要他們的協助。他甚至形容，這次會面改變了他的人生與世界觀。¹²

唐驥千與鄧小平之會面，象徵中共與香港精英階層就「一國兩制」事務之談判和協議，是中國乃至世界史中的一件大事。在一九八〇年代末和一九九〇年代初，跨商策略隨之而加速演化。學者書寫香港回歸過程之時，其分析只著眼於中國之「改革開放」，香港角色卻一直受忽略。一九八八年六月，鄧小平指，為協助實現總理趙紫陽的「沿海地區外向型發展戰略」，顧及整個中國的發展，香港的自主權地位至為重要。中國大陸不但需要說服香港人，得到其支持，甚至需要明白，香港的繁榮安定，與中國大陸發展策略環環相扣。中國當時只有一個香港，但亦計劃在內陸複製更多香港。¹³這不是虛言。一九八八年，香港是全中國最重要的境外投資者。至一九九六年，香港的投資，佔中國累計外來直接投資百分之五十九。¹⁴這些資金多被投放於出口導向產業。香港所處理的中國外貿佔比，從一九七九年的百分之四，增至一九九六年的百分之四十一點三，其七成出口都以美國為目的地。¹⁵對中國的出口導向發展乃至今天的中美貿易關係而言，中國大陸與香港商界精英的密議是其一大基石。不過，從意義上看，中國大陸與香港商界精英協力其實並非新事。這只是始自十九世紀帝國時代條約港口發展之延續。在冷戰時期，香港商界精英的協力對象，從英帝國變為美帝國。改革開放後，中國大陸成為香港商界精英新的合作夥伴。透過協議，香港商界精英願意留

守，維持社會穩定，以促進中國之發展。香港會得到的，是在一九九七年後真正的自治地位。不過，唐驥千等精英同意，關於香港民主化的問題留在日後討論。從一九八〇年代末至一九九〇年代初，跨商策略的重點，是繼續建立跨太平洋網絡，將香港重新定位為中美系統之間的樞紐。

下一節會繼續探討馮氏兄弟與胡應湘的跨商事跡。他們早在一九八〇年與一九八一年，便已著力開拓沿海發展策略之實現路徑。第七章曾提到，在最初，大部份香港投資者都對中國大陸持觀望態度，但有部份跨商察覺到中國低廉勞力加上他們的跨太平洋網絡以及彈性生產能力之潛在商機。後者缺乏的，是來自中國政府高層的助力。胡應湘連結香港、深圳、廣州、珠海、澳門的高速公路工程，能夠反映跨商策略與趙紫陽等改革者如何交匯，出口導向發展如何從中受惠。一九八七年，在趙紫陽的介入下，胡應湘的高速公路貫連珠三角，使之連結世界。

在第二節，我會剖析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中英聯合聲明》之後跨商策略之演化。至一九八四年，香港外來直接投資只有百分之八點九被投放於中國大陸。¹⁶一九八八年，按香港貿易發展局之調查，其百分之三十六會員都已在中國從事製造業與出口事業。至一九九三年，中國所得的香港外來直接投資達百分之六十一，單是在珠三角，投資額便已達二千億美元，就業機會達五百萬個。¹⁷鄧小平廣受信任，以其盟友得到更多援助，都為此形勢變化提供了助力。在一九八四至一九八九年間，楊敏德等第二代跨商開始於廣東直接投資，不再外判，但仍依賴香港的跨太平洋銷售網絡。黃

亞生等學者曾形容，中國的全球化發生於一九九〇年代，而非一九八〇年代。從香港角度看，此一轉變的動力，始於一九八四年。¹⁸

在最後一節，我會檢視一九八九年六月天安門廣場事件如何危及改革。縱然大部份跨商都對暴力與趙紫陽下台感到愕然，但他們很快便穩住了情緒。從條約港口時代開始，務實主義、流動意識、適應力便已成為跨商的內在性格，按這種性格，他們能隱藏對權力與自保的想法。香港精英真正擔心的，是來自美國的政治制裁。當時美國國會不斷辯論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香港精英則利用他們的美國社會資本重整策略，以確保香港之前途，以及中美貿易發展。

8.1. 中國改革實驗與香港

學者一直強調，中國改革之開展，是「摸著石頭過河」。一九八八年趙紫陽沿海策略之實現，是眾多事件累積之結果，當中包括：中國得以連結國際貿易系統，經濟特區得以被建立，基建得以落成，製品得以出口至世界市場。在一九八〇年代初，香港於當中都是中國所摸的石頭。

香港的優勢之一，在於其所匯聚的新知識、新技術乃至人脈。一九七七年滙豐銀行主席曾言，眾多香港企業都已採用前沿管理模式。¹⁹這其實得力於回流自美國的第二代跨商，他們引進了美國

新式商業營運模式。永安的郭志權與郭志樑、後來成為地鐵與恆生主席的錢果豐、李卓敏開設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等案例都能印證這一點。²⁰對中國而言，除了資本之外，這些應用於香港的新管理知識也是極其珍貴的資產。按唐驥千回憶，鄧小平曾對他說，錢固然重要，但其管理知識與經驗、對西方市場的理解，同樣重要。²¹

跨太平洋網絡之於中國的改革開放所以重要，是因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監管嚴密，不同國家對之連結的程度不一。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七一年間，美國對華貿易禁運，將中國摒絕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之外。中國開始重新融合於這個體系之後，也花了數十年時間，掌握各種知識與技術，香港在過程之中變得重要。例如第七章所指，在一九七九年，國務院決定經濟特區應專注於成衣業，但在全球貿易體系之中，成衣業配額規限嚴密。相較中國大陸，香港擁有更多出口配額，中國成衣因而需要先出口至香港加工，然後再出口。²²²³²⁴即使香港配額是按各製造商上一年度貿易業績分配，但需要強調的是，逾半香港配額其實集中於三十企業手中，當中包括南海、利豐等。²⁵也即是說，約十多個跨商便可決定中國成衣是否能夠取道香港出口，而且他們可以自由行事。例如在一九八〇至一九八一年間，於《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第二輪協商之際，唐驥千曾用盡其美國社會資本，款待與遊說美國紡織製造商研究所 (American Textile Manufacturers Institute) 等工業組織，以保存香港的配額。²⁶

一方面，香港紡織商與中國大陸分享國際市場的配額；另一方面，香港地產商亦提供資金與願景，以助經濟特區（特別是深圳）之發展。經濟特區早期遇到的困難，是所持外匯儲備不足，同時憂懼外債。²⁷在一九八〇年代初，第三世界的債務危機，令北京戒懼，故此增持外匯儲備成為戰略重心。²⁸於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二年間，深圳招攬了九十二億港元資金，九成資金來自香港，七成資金被用於地產發展，當中不涉外匯。²⁹

為進一步得到資金，深圳鄉區需要更為完善的基建。最後完成基建的，不是省政府、中央政府，而是深圳市長梁湘與香港地產商，兩者合作共同成事。³⁰一九八一年，香港地產商投入百萬資金，關地興建道路，鋪設電纜、水管、水渠、通信網路，梁湘提供意識形態論述支援，以成其事。³¹這個基建過程，被稱為「七通一平」，深圳城市系統因此而優於中國各地。胡應湘與其合和是當中的領軍力量。第六章曾提到，在一九七〇年代，合和轉型，故此積累了基建發展能力。合和是市值數十億美元的上市企業，且得到國際資金，因而能夠應付深圳的龐大工程。

合和投資於深圳，主因是胡應湘預見項目利潤優厚，其願景是以美式高速公路貫連珠江流域一帶。在一九七八年之前的國慶，胡應湘是其中一位與鄧小平及李先念見面的港澳商界領袖。他後來稱，這次會面，令他矢志改善中國的交通與電力系統網絡。他憶起一九五四年他對美國新澤西收費公路的印象。他其後聯絡廣東交通事務官員李牧，分享其願景。李牧不曾駕駛，或離開中國，故此

他與其同僚對胡應湘之提案抱持懷疑態度。有位官員曾質疑，一般中國民眾都難以購置自行車，為何我們需要高速公路？³²

面對這些困難，胡應湘利用深圳投資機會，實現其願景。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他簽訂合約，締結和與深圳發展公司的聯盟關係，令雙方合組聯營公司。這個新的聯營公司，會發展福田區約三十平方公里的土地。³³當中所涉的資金，達二十億港元，對當時深圳而言，這是最大投資金額。合和負責基建，其後福田成為深圳中心。胡應湘策略地在項目之中加上高速公路計畫。按計畫，福田會接連廣州—深圳高速公路，公路全長十八點一公里，另一端接駁香港邊界。簽約之後數天，於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初，胡應湘到北京，與鄧小平盟友谷牧見面，討論計畫，當時谷牧監管所有外國經濟合作項目。³⁴胡的計畫令谷牧印象深刻，他在同日下午，與趙紫陽在紫光閣見面，討論此事。趙紫陽稱讚此一計畫「有遠見」、「有膽略」，對中國改革充滿信心。³⁵他私下提醒胡應湘，此一計畫會困難重重。³⁶但得到中國領袖支持後，胡應湘決意執行計畫。他向媒體透露計畫詳情，並預計在一九八四年，高速公路會局部開放，並在十年來令投資者得到回報。³⁷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四日，合和與廣東官員簽署興建深圳至廣州合同意向書，按照條款，兩者共同營運高速公路三十年。胡應湘指，他預期正式合約會在四至五個月內簽訂。³⁸

事後證明，胡應湘的推斷相當不準確。在今天中國，基建發展速度固然是一日千里，但在當時

中國，要正式簽署高速公路合同需時三年。要在深圳外開始動工，需時六年。期間，胡曾推銷其他項目，例如在廣州興建首間五星級酒店中國大酒店。他利用這些項目，接觸官員，為高速公路項目進行遊說。例如在一九八一年三月，他曾帶領廣東與廣州首任黨書記任仲夷與梁靈光視察中國大酒店工程計畫。³⁹胡應湘也有利用國際網絡，謀求投資。一九八二年四月，大通曼哈頓的大衛·洛克菲勒曾到訪香港。胡應湘與另一地產商馮景禧與他同行到深圳。他們到蛇口遊覽，與袁庚（見第七章）以及市長梁湘見面，且巡視福田與高速公路工地。⁴⁰十日後，胡招待其日本友人，帶他們到其深圳項目工地考察，這些日本友人包括兼松株式會社主席。他們也有與廣東省省長劉田夫等人見面。⁴¹

北京政治與全球經濟環境，令高速公路項目進度停滯。前一章提過，在一九八一年，保守力量致使經濟緊縮。到了一九八三年，「清除精神污染」運動被掀起。結果至一九八二年六月，中國官員才成立委員會，研究胡應湘的計畫。⁴²八月，廣東領袖再次向胡應湘保證，他們對計畫仍感興趣。他們視中國改革與香港回歸命運相連，並強調他們對堅守香港繁榮矢志不移。⁴³當時美國亦處於經濟通縮情況，香港地產市場樓價則受中英談判影響而下滑。十一月中，在合和股東大會中，胡應湘仍指，他仍在為項目奮鬥。但兩週後，他承認項目遭逢阻滯，特別是當人民公社在分配土地，難以收地。⁴⁴

胡應湘總結經驗後，認為中層官員刻意阻撓，故此他改而著力經營中國政府最高層人脈。⁴⁵一年之後，他與趙紫陽以及谷牧首次見面。一九八二年，他與另一地產商鄭裕彤回到北京，討論經濟合作。⁴⁶討論延至晚上，他們二人在釣魚台國賓館主持晚宴，出席的嘉賓，包括谷牧、主理港澳事務的廖承志以及其他經濟事務高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毛澤東曾居於釣魚台國賓館所在地，國賓館亦是中國領袖招待外賓的地方。香港資本家能在此舉行私人宴會，頗具象徵意義。他們為「經濟合作」而舉杯，胡應湘致辭，他說，他決心克服高速公路項目的重重障礙。⁴⁷一週之後，他很快便得到一個不尋常的機會——他與趙紫陽第二次見面，討論項目所遇到的最大障礙。之後，胡向傳媒表示，按照趙紫陽說法，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資本主義體系會被保留。⁴⁸胡接著返回香港，出席合和在灣仔華潤大廈項目竣工典禮。⁴⁹

一九八三年，高速公路項目終有進展。同年，他亦開展重要的訪美之旅，以及接受邀請，加入政協。從一九四九年，政協便是一個具象徵意義的政治平台，平台匯聚商人與其他政黨成員。在一九八二年，鍾士元、安子介、簡悅強等香港從政者亦被邀請加入政協，但大部份人都拒絕邀請，原因是這涉及利益衝突。⁵⁰一九八三年三月，胡應湘出席北京會議，在那場合，鄧小平指示胡應湘推進項目進度。⁵¹同年六月，他送六位廣東官員到加州，讓他們感受美國高速公路之發展，分享他在三十年前於美國所感受的震撼。胡應湘特意買了一部車，親自駕駛，帶官員遊覽。當時廣州副市

長在車內寫日記，他說，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道路上，難有這種體驗。⁵²一九八三年六月底，胡應湘所遇到的收地、跨境程序、牌照、保險等問題都一一被解決。他相信，在一九八四年春，工程便會開展。⁵³十月，胡回到北京，向谷牧匯報進度，並帶同日本銀行家討論融資問題。⁵⁴一個月之後，胡應湘宣佈，高速公路項目初期資金問題已被解決。一九八四年十月，工程開展。⁵⁵

有關中國改革的論述，都圍繞趙紫陽言行，香港角色少被注意。⁵⁶胡應湘的案例，則顯示這種研究進路之問題。事實上，當國務院開放十四個沿海城市招攬外資之後，北京曾贊助在港舉行之會議，以宣傳這些沿海城市的經濟機會，是次會議亦成功招攬二十二億美元資金。⁵⁷五月，趙紫陽邀請胡應湘到中南海，討論高速公路項目的最新進度，並就招攬外資提出意見。這多少反映，從趙紫陽角度看，大部份資金都來自香港。⁵⁸會面之後，胡應湘與鄧小平見面。在會面之中，胡要求鄧小平直接保證，一九九七年香港現狀不變。兩週之後，唐驥千與鄧小平會面。按照胡的說法，鄧小平告訴他，如果香港商界領袖對香港回歸事宜感到不安，他們應該到北京，與中國大陸官員見面，釋除疑慮。⁵⁹鄧小平此一言論，既為增加政策透明度，且更是在指示官員儘量與英屬香港精英保持接觸，以增加互信。

一九八四年九月底，中英簽署《中英聯合聲明》。聲明保證，一九九七年後，除國防與外交事務之外，香港事務五十年不變。至此，香港作為中國最大外來投資者與貿易夥伴，與中國大陸的關

係得到明文保證。故此至十月，中國改革有兩大突破：第一，中央委員會通過首份內容全面的經濟改革綱要；第二，合和與廣東官員正式簽署高速公路項目的合同。⁶⁰為得到中國政府批准，徵用土地，合和會在首三十年興建與營運高速公路，於當中十年收取四成利潤，之後收取三成利潤。三十年之後，高速公路會被收歸國有。在此新形勢下，胡應湘隨即開展新項目。在中英雙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一週前，胡應湘宣佈將在貴林投資一億美元，興建旅遊基建。⁶¹當時的中國，仍以農村為經濟增長引擎，但在一九八四年末，中國政府官員與香港商家的合作，已為未來二十年中國融入於世界市場奠下基石。

8.2. 香港精英與中國大陸協議之履行 (1984-1989)

在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九年間，跨商策略急速發展，香港成為中美貿易發展的主要推手。這得力於三國政府。當時中美關係處於蜜月期，即使條文缺乏民主認受性，美國仍然鼓勵中英兩國訂定《聯合聲明》。⁶²美國此一舉動，乃至港元與美元掛鉤，都有助穩定香港局面，不過仍有數千人移離香港。一九八四年七月，在一九八七年「黑色星期一」之前，恆生指數增長了四倍。同年，在中國，百分之八十二外來投資都以補償貿易、聯營公司模式進行。⁶³中國百分之十一出口品都在廣東

製造。一九九四年，廣東製造的比率增至百分之四十四。⁶⁴有經濟學家曾強調，這波增長來自外來投資，但廣東製造業崛起的主因之一，離不開香港的去工業化。一九八四年初，榮氏家族在深圳開設其首家紡織廠，即連懷疑論者唐驥千也在同年六月開始表示信任鄧小平。⁶⁵

中國領袖表明，未來國家會繼續融入於世界市場。中國經濟學家、世界銀行、國際組織接觸頻繁。一九八六年四月，趙紫陽介入，委任特別委員會領導高速公路項目，以加快進度。他曾嚴厲警告省級官員，指他們如再延誤工程，將會有「嚴重後果」，新任廣東省省長葉選平會批准縣鎮政府參與工程分享項目利潤，這事實上猶如公開認可集體貪污，與一九〇〇年代津浦鐵路的情況類同。⁶⁶一九八六年六月，趙紫陽宣佈，中國會參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其實當時中國仍未合資格參與，這次宣佈，只是展現改革者的決心。⁶⁷九月，趙紫陽批准榮毅仁的請求，容許其重組中信，並擁有更多自主權。一九八七年，國務院正式批准香港中信重組，香港中信在榮毅仁的兒子榮智健之領導下，進行不少併購計畫。⁶⁸這些案例都表明了趙紫陽與其盟友改革之志。事實上，在一九八七年二月，谷牧曾與胡應湘、唐翔千、霍英東等人巡視深圳，他當時盛讚高速公路項目，並指中國與港澳之間的合作，極為重要。⁶⁹數週之後，在四月，胡應湘正式啟動高速公路項目工程。⁷⁰

與此同時，溢達集團的楊氏家族案例亦能顯示跨商策略之演化。一九七八年，楊元龍創辦此一

集團。他僱用中國大陸員工，並與美國零售商合作。其家族其實已與美國接觸多時。在一九七〇年代末，楊家四代與其妻楊蔡詠芳之家族都曾在美國留學，或親美。楊蔡詠芳的外祖父莫觴清來自無錫，後移居上海。他最後成為買辦，為美國絲綢進口商蘭樂壁洋行工作。⁷¹一九一七年，莫觴清利用一戰期間歐洲商無暇競爭的機會，在上海與商蘭樂壁洋行共同成立美亞織綢廠。一九一九年，其女兒莫懷珠與旅美回流學生蔡聲白結婚。

蔡聲白是另一著名旅美回流學生，他亦是江南紡織業的先驅（見第一章）。蔡生於書香世家，一九一一年，他入讀清華，之後得到庚子賠款獎學金，前往安多佛學校就讀。隨後他入讀理海大學（Lehigh University），修讀礦業與冶金，並在一九一九年畢業，回到中國。他聘用其女婿，使之成為美亞織綢廠經理，並從美國引進最新式的動力織布機，以及美式管理模式，以降低生產成本，與日本商競爭。他的努力為公司創造了可觀盈利。在一九二〇年代，公司的生產廠遍佈上海。不同傳記都強調，蔡善待員工，但絲綢業以工作環境惡劣見稱，工人需在滾水間工作，女性與童工易被剝削。⁷²張嘉璈是蔡之友人，透過他，美亞得到中國銀行條件優厚的貸款，甚至得到進口稅務優惠，成為保稅工廠。⁷³蔡亦有採用歐美市場推動策略，舉行時裝表演。一九二六年，美亞的製品贏得費城世界博覽會的獎項。至一九三四年，美亞成為有限公司，僱用三千名員工，動用逾二千部織布機，在曼谷與紐約皆設有辦公室。⁷⁴在日佔時期，與很多移民一樣，蔡將公司營運遷至上海的安全地區，

在中共建政之時，將美國器械遷至香港。最後他沒有堅持業務。當時機不合之時，他離開紡織業，移民至澳洲。

戰爭與革命毀滅了美亞，但蔡家依然繼續經營其跨太平洋網絡，令家族得以復興。楊蔡詠芳在美國留學，她在一九四〇年代末嫁給楊元龍。⁷⁵楊是上海聖約翰大學的畢業生，並在美國麻省羅威爾紡織學院（Lowell Textile Institute）攻讀紡織與化學工程，取得第二個碩士學位。一九五一年，這對新婚夫婦在香港與父母見面，其女楊敏德在翌年出生。其岳父處境不濟之時，楊無力建立自己的公司。憑藉自己旅美留學的履歷，以及岳父積累的社會資本，他最終成為聯業集團的經理（見第五與第六章）。今天，楊最為人印象深刻的，是他在一九八六年被指控於賽馬會「造馬」。作為聯業集團經理，楊經常亮相於媒體，以業界德高望重領袖之態示人。他為江蘇同鄉會、香港製衣廠同業公會等組織任事，與沈熙瑞等人共事。⁷⁶在一九六〇年代初，他代表香港，於歐美保護主義之下，為香港爭取利益。⁷⁷這反映在毛澤東時代，香港精英所積累的貿易知識與業界網絡。他安排楊敏德作為繼任人。一九六〇年代中，她被送到賓夕凡尼亞州的寄宿學校就讀。一九七四年，她在麻省理工學院畢業，其主修科為數學與哲學。隨後，她到哈佛商學院就讀。一九七六年，她學成畢業，然後在紐約的投資銀行工作。一九七八年，她回到香港。⁷⁸與其他跨商一樣，她不單積累了美國知識與人脈，她也很可能已取得美國公民權。

可以說，這個家族能以四代人時間，從晚清買辦演化成為親美香港資本家，其實是得力於持續不斷的跨太平洋網絡。一九七八年，聯業集團開始衰弱，中國此時機會增多，楊於是跳船。他帶走很多聯業經理乃至生意。他新創立的公司的公司聚焦於補償貿易之機會。楊敏德曾對哈佛商學院舊生會雜誌表示，在當時，成立與營運聯營公司並非容易想像之事，但透過以物易物制度，他們可以將器械送至中國其旗下工廠。作為回報，他們的成衣會被運至美國以折扣價銷售。⁷⁹其父很快便在紐約成立聯絡辦公室，與此同時，他積累中國官員人脈。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媒體報導，他與廖承志以及林修德共膳，前者後來與胡應湘在釣魚台國賓館見面，後者主管海外華人事務。⁸⁰不過，當時楊之健康不佳，並將楊敏德召回香港。縱然缺乏經驗，楊敏德幫助父親建立具效率的公司架構，使之愈趨迎合美國消費者乃至金融體系需要。

與大部份香港企業一樣，基於美國的保護主義與中國大陸的落後基建，溢達集團等待在中國投資的機會。在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二年間，中國往美國出口的紡織品不設上限。一九八三年，美國列根政府與中國北京另訂新約，在接下來四年，中國一半紡織品種類會受限制。同年十二月，中國加入《國際紡織品貿易協定》，但其效果好壞參半。美國官員此後改為百分之七十五中國紡織品類別設限。⁸¹一九八四年五月，於美國總統選舉期間，為爭取搖擺州的支持，列根總統簽署行政命令第一二四七五號，擴大美國財政部部長權力，為全球紡織品進口設置更多限制。美國財政部隨即頒

佈新令，要求貨物在最後來源地需經「重大加工」，以證明貨物為該地製品。如摩爾研究所指，這些新政令香港工廠移至中國的趨勢減慢。^{82 83}在溢達集團正式投資於中國之前，溢達集團將生產線遷至毛里求斯。

一九八六年，香港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在接下來兩年，胡應湘的高速公路項目取得突破，中國總理趙紫陽亦宣佈沿海策略。此時溢達集團決定在中國投資。溢達與地方政府合作，在佛山西邊投資過百萬，成立紡織聯營公司廣東溢達紡織有限公司。有別於一般學者的暗示，這間聯營公司並非源自「海外華人」或原鄉網絡，這其實是江南移民跨商策略產物。這種策略利用低廉中國大陸勞動力、國家補貼、新基建，盡力擴展與美國的長期營銷關係。⁸⁴新公司生產線的經理，都來自美國商學院。在一九九〇年代，楊敏德甚至定下政策，贊助公司中層管理人員修讀清華與復旦大學的工商管理碩士課程。憑有效管理與較低成本，新公司增加了溢達的盈利，溢達因而有更多資源，可按歐美品牌要求，推出更具質素的設計、包裝、營銷。在一九九〇年代中，溢達於廣東聘用逾五萬名員工，為Nike、Polo、Hugo Boss、Tommy Hilfinger等著名品牌生產逾百萬T恤。一九九八年，溢達在廣東百分之八十五的製品都出口至美國。此時楊敏德的經營重點，是留意美國消費者口味的變化，以及著重可持續生產方式（例如為生產線裝設污水處理系統）。⁸⁵她亦沿用家族的跨商策略，出任港美商務委員會（Hong Kong-United States Business Council）、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計劃於亞

洲擴張之時加入其董事局。⁸⁶

溢達與楊家案例表明，今天中美至為巨大的貿易關係，始於一九四九年前的跨太平洋網絡發展。這個網絡後來被移植至香港，由此存活，並在冷戰時期擴張。蔡聲白與美亞的經驗，能夠說明為何楊元龍與楊敏德從一九七〇年代起如此積極探索投資中國之機會。他們很快便能掌握如何透過結合中國大陸低成本勞動力與美國市場，善用機會。他們能夠如此，是因為他們傳承了二十世紀所積累的家族策略與無形資產。《中英聯合聲明》令北京與香港精英間的協議得到保證，各種監管障礙（例如香港之關稅及貿易總協定會籍事宜）逐漸消散，楊家因而在一九八〇年代末於廣東直接投資，並透過他們的跨太平洋網絡營銷製品。如上文提過，百分之八十五製品都經銷至美國。一九八八年，中美貿易額只達一百四十億美元，但楊家等跨商已利用香港，搭建跨太平洋商業網絡。⁸⁷遲至一九八八年，台灣公司才可合法地在中國投資。

但一九八四年的中國城市改革，亦令國家支出失控，造成不穩定因素。國企不斷建設新的生產線、購買器械、增加勞工報酬，中國的銀行貸款額因而增加。單是在一九八四年，工資增長百分之二十，貨幣供應增加了百分之五十，通漲率則從一九八一年的百分之二，增至一九八五年與一九八七年的百分之九與百分之二十七。這即是說，中國經濟已然過熱，這是政治敏感議題。與此同時，城市工資增長，令鄉區居民漠視戶口制度，離鄉別井，在城市找尋機會。每年，這類人人數

達八百萬。國內移民問題愈趨嚴重，因為非集體化改革無以阻擋一九八七年的農產量跌勢，國家需要重新推出配給政策。工人騷動增加、企業經理只重盈利、經濟特區貪腐問題愈趨嚴重，令國家頗感尷尬。對中國平民而言，在「新中國」之中，似乎只有精英才能享有國家發展成果。國務院內的保守勢力因而崛起，並在一九八八年開始推動經濟緊縮政策。

香港的商界領袖留意到此一趨勢，但改革衍生的經濟繁榮、香港經濟增長削弱了他們的危機意識。一九八七年年底，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中，趙紫陽被任命為中共總書記，黨內的保守力量大部份都在此時退休。對外界而言，更年輕、更重自由的新一代政治力量正在中國崛起。在一九八八年初，雖受警告，但趙紫陽仍然推出沿海發展策略。其策略的重點，是各省不需再受糧食生產自給自足政策約束，廣東等省進而可以在全球經濟體系之中扮演更重要角色。外來投資、數以百萬計湧入經濟特區的移民所帶來的勞動力，令今天中國得以成為貿易重鎮，趙紫陽的策略是要起點，香港不斷演化的跨商策略是其助燃劑。

8.3. 六四之後的跨太平洋網絡與香港

一九八九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四十週年。但這一年最後成為悲劇年而非喜慶年。無數

研究已分析天安門事件的源起與經過，我們不用再重覆其主要論述。⁸⁸較少被提到的，是這場危機如何影響香港乃至中美貿易的發展。與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一樣，香港居民在電視看到事態如何在一九八九年五月與六月升溫。事件發生前一週，全港近四分之一人口上街示威。六月三至四日的武力鎮壓，觸發了文化危機，危機至今仍未完全消散。事件發生後，百萬名港人遊行，此前從一九八四年開始出現的樂觀情緒煙消雲散。很多香港人匆忙移民，在一九九〇年，移民至加拿大的人數達四萬人。在港人憂慮下，香港後一九九七時代的憲法《基本法》被起草，末代港督彭定康（Chris Patten）加快推動民主改革，很多人視之為違反《中英聯合聲明》的表現。

天安門事件不只是一場政治危機，且也是經濟危機。中國在全球的信貸幾乎一夜消失。美國布殊政府指示世界銀行凍結七項貸款，總值七點八零一億美元。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與日本主要銀行跟隨其後。中國主要國企需要終止項目（例如融資項目）。⁸⁹北京因而需要加強始自一九八八年的經濟緊縮政策。中央政府戲劇性地收緊貸款，減少獲准向國際社會借貸的機構，其數量被降至十間。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北京亦將人民幣貶值。中國經濟增長從一九八八年的百分之十二，降至一九八九年的百分之四。⁹⁰一九八九年下半年，中國的訪客人數下跌七成至九成。⁹¹一九九二年一月，鄧小平南巡。在此之前，很多觀察者都認為，中國經濟自由化已告一段落。

對跨商而言，天安門事件危及他們在北京的人脈網絡，乃至他們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建立的跨

太平洋生態系統。在短時間內，趙紫陽、香港新華社社長許家屯、前深圳市長梁湘等盟友都相繼消失於幕前。梁曾是海南島省長，他據說因容許抗議者離開海南島而被罷黜。⁹²六月六日，在緊急會議之後，美國商會的董事會成員不尋常地刊出譴責聲明，並在其七月月刊以自由女神像為封面圖像。⁹³不過，震撼過後，對美國商會而言，經濟利益仍然誘人。同年年底，美國商會特別指出，美國銀行正在制訂「具長遠視野的策略」。⁹⁴唐驥千的態度轉變更急劇。一九八四年六月，他與鄧小平見面後，對鄧展現信任。六四事件發生後，唐驥千感到苦惱。六月七日，親北京的《大公報》引述他指，「北京局勢」會影響香港經濟。他甚至指，如果趙紫陽「能重新掌權」，對香港的影響會較少。「若軍隊繼續與人民對抗」，則會影響深遠。⁹⁵這其實是危險言論，但至六月底，唐驥千改變立場。在其子公司聯亞集團董事會會議完結後，唐驥千形容，天安門事件只是「北京事件」，他不擔心事件會否對公司乃至香港造成影響。⁹⁶一九八九年十月，聯亞集團首次在中國直接投資，於珠江流域購置工廠。在口述歷史中，唐直白地指，這次投資意義深遠。他解釋說，他相信，商界大部份人都不認為這是中國的末日。有時候，情緒可被激發，民主派舉行大型集會，情緒化的人會更具情緒。⁹⁷他指，鄧小平是「世界英雄」，鄧將中國變成「世界之中具責任感的一員」，確保中國之穩定。

從跨商角度看，唐之投機行為會變得更易被理解。前文提到，對跨商而言，民主化不在其議程

之中。第一章曾按唐驥千之回憶，回顧一九三七年唐家的決定。在日佔之時，唐的父母曾利用國難之機會發了橫財。唐驥千定然知道這個故事。在廣東，他透過投資，做了相近的事。當時在中國，國際資金蒸發，聯亞集團的投資，猶如以折扣價得到政經好處。「北京事件」令人遺憾，但對其家族而言，投資累積金融與社會資本、明哲保身才是正事。

胡應湘同樣很快便與北京和解。在六四前夕，合和股價於數週內下跌百分之二十五，他因而被迫取消市值五億美元的股份發行。他接下來到中國大陸巡視業務，錯過了自己女兒在美國康涅狄格州 (Connecticut) 的畢業典禮。回到香港之後，坦克駛進天安門的一幕，令他震撼，其妻甚至協助普林斯頓大學師生撤離到香港。國際銀行退出，令胡應湘不得不擱置高速公路項目，為時接近三年。胡應湘後來回憶說，他在美國的歲月，能夠感受到民主如何運作，他更為長子取名為「Thomas Jefferson」。但他也認為，「中國仍未合乎條件推動民主政改」。他相信，「從歷史經驗看，民主政制之發展，需要一段長時間，需要漸進」。事實上，他的跨商策略，也不著重香港或中國之民主政改。他在美國接受高等教育，看似接受自由價值，但受其事業所限，胡只利用其美國經驗融資、發展、引進技術，以得到實利。他與趙紫陽成為朋友，但在其下台之後，也很快與其接班人江澤民與李鵬建立關係。⁹⁸

一九八九年年底，香港精英更感關心的，是美國政治。白宮與國會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不一

致，但這不令人意外，因為當時兩者受不同政黨控制。美國民眾表現憤怒，但布殊政府則較為務實，與跨商近似。布殊總統嘗試控制局面，保存中美關係。與尼克遜一樣，他視中國為對抗蘇聯的夥伴。華盛頓在歷史之中也曾容忍殘暴但有價值的獨裁者。美國大使館一方面庇護參與民運的學者方勵之，另一方面布殊總統只對中國實施輕微制裁，並在日記中說，他希望能夠「平息眾怒」。⁹⁹布殊與「老朋友」鄧小平聯繫，解釋若然美國加重對華制裁，那只是民眾施壓的結果。他強調，他會致力保存中美戰略關係。七月一日，布殊政府祕密派遣國家安全顧問斯克羅夫特（Brent Scowcroft）與美國副國務卿伊格爾伯格（Lawrence Sidney Eagleburger）乘坐美國空軍飛機到北京。他們在中南海與鄧小平、李鵬等中國領袖見面。鄧小平譴責美國為危機推波助瀾，要求美國在國際事務之中尊重中國，美國兩位代表則要求中國重視國際言論。¹⁰⁰

相較之下，在國會之內，兩黨支持嚴懲中國，建議以關稅乃至修正中美關係以制裁中國。參議員赫爾姆斯（Jesse Helms）強烈要求國家不能「對另一邊的兇手」軟弱。¹⁰¹七月，國會修正同年外國援助議案 HR1487，通過「天安門制裁」（Tiananmen sanctions）。修正案制止美國對華銷售武器、終止中美軍隊高層對話、限制中美經濟合作。佩洛西（Nancy Pelosi）亦動議 HR2712 條文，延續美國境內四萬名中國學生的簽證限期，為他們提供尋求庇護的機會。總統布殊在北京反對之下，否決動議，他相信，這些學生回到中國之後，才能提高美國的國際影響力。¹⁰²很多中國學生後來因

《一九九二年中國學生保護法案》(Chinese Student Protection Act of 1992) 而得到永久居留權。對香港而言，特別重要的發展，是有關取消中國所得的美國最惠國待遇的動議最終無法通過。

對香港精英而言，如果上述動議通過，加諸於中國出口貨品的關稅會增加，中美貿易、香港經濟、跨商策略都會受到新的限制。曾有美國商會成員形容，布殊政府的制裁，猶如以手術刀放血，美國國會的制裁，則猶如用戰斧衝前斬殺。¹⁰³ 八月，美國商會舉行記者招待會，支持布殊政府「經計算的回應」。其月刊則重印美國傳統基金會演辭，演辭形容美國制裁措施「幼稚」、會助大日本商業力量。¹⁰⁴ 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的提議，其效力或有限，因為中國這種待遇每年會被更新。按一九七四年《賈克森·凡尼克修正案》，限制國民移民自由的共產國家，每年得到美國總統豁免與國會同意之後，才可延續最惠國待遇。從一九八〇年起，總統列根與布殊都曾發出豁免，並得到國會同意。天安門事件沒有動搖布殊政府的立場，但國會內很多議員卻不一樣。傳統基金會曾形容美國總統在一九九〇年仍然發出豁免的決定令人焦慮，但事實上，白宮所做的，是確保國會不會推翻總統決定。¹⁰⁵ 一九九〇年一月，布殊政府甚至撤銷部份後天安門時期制裁，時任世界銀行美國籍主席亦建議重新向中國提供貸款。美國國會則向相反方向而行。他們利用一九九〇年中國最惠國待遇之續期問題，挑戰白宮，向世界展現美國對人權之重視。

香港商界領袖發起運動，保衛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可為本書研究作結。我們看到，從一九五〇

年開始，香港實業家便已配合美國的貿易限制政策。於一九六〇年代初，他們亦開始積極迴避美國的保護主義。但這次事件所引發的反應，其本質並不相同。他們利用跨太平洋網絡，警告美國朋友、同事、本土與國際媒體、白宮、國會，一旦中國失去最惠國待遇，後果對中國與香港（後者尤其如此）都不堪設想。他們的觀點不全然建基於經濟學。部份人展開新論述，指香港能夠推動一九九七年後的中國自由化乃至民主化。一九九〇年香港美國商會主席及後來的對話基金會（The Dui Hua Foundation）主席康原、香港美國商會首位華人主席鄭明訓等人都是運動推手。康原在美國影響力較大，鄭明訓則展現了本書探討的各個課題——移民與美國利益如何在冷戰時期於英屬香港結合、跨太平洋知識與社會資本網絡如何帶來改變、香港美國商會如何融入於本土、跨商策略如何令中國重新融入於世界網絡。

鄭明訓生於一九三六年，並於一九三八年來到香港，當時他的父母為避開日本進侵而逃難。與本書第二、三、四章的分析一致的是，他同樣就讀於天主教教會學校。一九五四年，他十七歲，得到獎學金，橫渡太平洋，到美國芝加哥北部的森林湖學院（Lake Forest College）留學。他是校內唯一一位華人學生。第六章曾特別提到，當時香港青年得到各種機會，修讀數學與科學，鄭明訓修讀的則是生物學。他放棄選讀醫科，並在一九六一年於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畢業。自此之後他平步青雲。他先在紐約為國際商業機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 IBM）

工作一年，然後在 Vicks Chemical 擔任營銷工作，其後升任為新加坡、馬來西亞、曼谷的市場推廣經理。¹⁰⁶一九六五年，他入籍成為美國公民，時年二十九歲。一九六九年，他回到香港，為另一美國大藥廠 Warner-Lambert 工作。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經濟起飛，鄭執掌 Warner-Lambert 的亞洲部門。其後在一九七七年，他加入美國獵頭公司史賓沙 (Spencer Stuart)，成為其常務董事。他逐漸成為擁有不少專業人脈的中介者，並在香港市場漸以高檔消費為重心之時，為不少公司引介管理人才。¹⁰⁷按鄭之回憶，他為史賓沙工作至一九八六年，在那一年，他於倫敦一場宴會之中偶遇英之傑 (Inchcape) 主席馬加 (Charles Mackay)。這次相遇，令他得到機會加入英之傑，最後他成為英之傑太平洋地區的主席。¹⁰⁸有人則指，鄭在史賓沙工作之時，看到這個英之傑機會，並決定親自爭取。¹⁰⁹不論何種說法屬實，鄭在英之傑的晉升、英之傑這家英國老店由他領導，再次象徵英治時代的非正式解殖。

鄭加入香港美國商會，增加了他的曝光度，這為其公職生涯鋪路。一九八六年他獲選成為美國商會首位華人副主席，並於翌年成為主席。他在任之時，其工作重點都在於消滅美國保護主義，以及促進中美貿易發展。¹¹⁰他也有跟隨此前十年其前任的步履，經營中國官員人脈。許家屯與他很快便建立了合作關係，前者一直在港積極經營親中國的資本家力量。¹¹¹鄭成為香港美國商會主席之後，最先做的事情，是在一九八七年一月舉行午餐會，席間新華社與香港美國商會同意往後定期舉

行會議，許家屯與鄭明訓有為此合照，從今天角度看，這種合作關係難以想像。¹¹²同年夏天，鄭明訓與另外十六位商界領袖到訪北京，與港澳辦乃至國務院官員會面。¹¹³一九八八年，鄭明訓成為首位公開自己的美國公民身份同時獲任命的立法局議員。¹¹⁴在這些職位之中，鄭明訓能在香港、中國、美國之間遊走。他曾被問到他如何理解自己的身份，視自己為美國人還是中國人。據說，他的反應是坐在椅上往後靠，思考了一分鐘，然後莞爾一笑，說這是好問題。他認為，身份是權宜的，時機決定他的身份。¹¹⁵前往美國的中國移民世代間都在努力建立融入美國本土的形象，鄭明訓身世則不太相同。他在間隙活動，其身份意識乃至跨商策略都需按時機而變。鄭明訓不變的觀點，是他認為，香港的未來，繫於中國融入於以美國為首的經濟體系。¹¹⁶

一九八九年四月至五月，北京的示威浪潮有增無減。從鄭明訓角度看，這是政治危機，但亦帶來了經濟機會。中國大陸與香港媒體都詳細記錄了示威之過程。五月二十六日，《華僑日報》刊登了三位富商的聲明，這三位富商分別是李嘉成、鄭明訓，以及同時為立法局議員的張鑑泉。李指學生進行的是愛國運動，其投資計畫不變。張則較為謹慎，他呼籲示威者不要將運動變成盲潮。¹¹⁷鄭明訓的語調截然不同。在由亞洲協會（Asia Society）贊助的紐約早餐會中，他指，示威者或會為香港帶來潛在利益，原因是自由化或會令國際更易接觸中國。他認為，外界只從政治層面理解「一國兩制」，但卻忽略「地緣與經濟現實」。從他的角度看，香港在從幾方面領導中國巨大的經濟改革，

且在一九九七年之後，會是南中國的服務與金融中心。¹¹⁸ 他不曾預見後來出現的武力鎮壓，但他仍以跨商角度理解這場政治危機。六四之後，他轉趨低調。直到一九九〇年春，中國最惠國待遇爭議再起之時，他才再次高調。

不令人意外的是，在爭議之中，美國商會集結香港力量。其領袖去信美國國會，並與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以及亞洲協會合作。二月，美國商會主席康原直接去信美國總統布殊，其觀點後來影響一九九〇年代至二〇〇〇年代初的中美關係。他指，中美維持關係，才會改善中國的人權狀況。¹¹⁹ 鄭明訓向華人媒體提出相同觀點，認為對華貿易與投資不應被中斷，甚至應當增加。四月二十日，兩份立場對立的報章刊登鄭明訓的聲明，鄭在聲明中警告，中國對美國的三分之二出口品，都途經香港，中國一旦失去最惠國待遇，對英屬香港乃至中美貿易都將會是「嚴重打擊」。¹²⁰ 他亦宣佈，美國商會代表將會到華盛頓，為香港進行遊說。康原會帶領代表團，鄭明訓則會以前美國商會身份隨團前行。雷德 (Clark T. Randt Jr.) 是團中成員之一，他負責安排行程與會面。曾為總統布殊耶魯大學同學的雷德利用人脈，安排代表團與美國政府重要官員乃至國會成員見面。¹²¹ 雷德後來成為美國駐華大使。

一九九〇年美國商會代表團訪美行程的高潮，在於康原發表於五月十六日的演說。他向美國國會亞太事務委員會 (House Subcommittee on Asian and Pacific Affairs) 發言。席間，他代表香港政府

與英屬香港主要商業與工業組織提出異議。他應和一九六二年唐炳源對美國保護主義的批評，形容中國的最惠國待遇問題，是關乎香港生死、中國改革運動成敗之事。關心一九九七年後香港命運的人，更應重視中國最惠國待遇問題，原因是中國失去最惠國待遇之後，會對香港造成心理與經濟創傷。屆時香港社會會失去信心，中國軍隊駛入天安門所造成的創傷會變得不可挽救。他甚至形容，美國國會決議對中國施行貿易制裁，猶如大屠殺，壓迫中國會令香港局面不穩，香港或會失去數以億計的貿易，以及數以萬計的就業機會。他重申，英屬香港是美國在亞洲的重要據點。在香港，美國企業達九百間，聘用人數達二十五萬人。他強調，香港是美國服務與製品第十四大出口市場，每位香港市民每年花費逾一千元購買美國產品，消費額遠高於日本或歐洲消費者。如果國會決意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香港會被摧毀，其社會會浮現反美情緒，香港將再也不是世上至為親美之地。康原認為，香港是美國最有可能改變中國之地。若然支持中國改革者，便應當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簡而言之，延續中國最惠國待遇，好處有二：第一，能顧及香港前途；第二，能推動中國改革。¹²²其說法或有可商榷之處，但對向來矢志改變中國的美國而言，這仍是聰明的演說。康原利用人脈，務實地結合美國與香港的利益。跨商策略事實上迎合了美國日益壯大的新自由主義力量。美國商會與康原提出改善中國人權論，亦旨在謀取更大利潤。事後國會委員會主席蘇拿士（Stephen Solarz）形容，他對康原的聽證演說印象深刻。

一週之後，即一九九〇年五月二十四日，布殊政府宣佈將會延續中國最惠國地位，並指顧及香港是重要原因。康原對美國商會成員說，在整場辯論之中，無人提到香港。¹²³美國新聞祕書費茲和特 (Marlin Fitzwater) 則與康原口徑一致。按其說法，取消中國的最惠國待遇，會傷害美國利益，危及中國市場改革，數以百萬計的中國民眾將無法從中受惠，香港會受到嚴重打擊。¹²⁴總統布殊簡明地指，香港對他而言非常重要，如果中美關係惡化，香港將會是無辜受害者。¹²⁵六月二日，布殊正式向國會宣揚決定，直到年底，國會嘗試否決決定。十月，由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先通過廢除中國最惠國待遇的議案，但最終票決保留，並附帶人權條件。參議院沒有繼續議決。一九九〇年年底，香港親美商界社群認為他們成功影響美國政策制訂。他們指，美國商會在五月贏取了重大勝利。總統布殊清楚表明，香港的經濟狀況，是他在考慮中國最惠國待遇之時，至為關鍵的因素。¹²⁶美國商務部部長摩斯巴佐 (Robert Moshbacher) 亦指，香港代表團於七月美國商會午餐會的發言，影響了總統布殊的決定。¹²⁷

我們知道，早在康原的演說之前，布殊已有決定。不過，在一九九一年春，當中國最惠國待遇再成議題之時，香港美國商會的影響力，令貿易發展局與香港總商會都加入戰團。鄭明訓獲選為總商會副主席，馮國經則成為貿發局副主席。¹²⁸曾經支持胡應湘的匯豐銀行主席浦偉士則預計，中國一旦失去最惠國待遇，香港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會下跌百分之二，高達四萬五千個就業機會將會消

失。畢業於芝加哥大學的前香港中文大學經濟學者王于漸亦預計，投資資金會因而外流至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香港長期競爭力會因而受損。¹²⁹辯論升溫之時，美國商會、總商會、貿發局聯手合作，動用其美國社會資本，以保衛中國的最惠國待遇。鄭明訓告訴媒體，三個機構在華盛頓協調各種會面，避免時間相撞。¹³⁰總商會代表團的成員，都曾在美國留學，鄭明訓與畢業於哈佛大學的朱幼麟是其中兩例。五月十七日，總商會完成外訪，並重提康原一年前的警告。¹³¹鄭明訓指，會奮戰到底。¹³²

事實上，在跨商策略下，香港的經濟未來乃至其被想像的自由化潛力，逐漸取決於美國有關中國人權的辯論。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美國總統布殊再次指出，香港是中國最惠國待遇得以延續的重要原因。從華盛頓回到香港之後數天，鄭明訓表示滿意行程收穫。¹³³與此同時，他也在淡化中國最惠國待遇事態之危機。他向香港工業家表示，他們不用擔心，不用急於從中國大陸抽出資金，並降底對中國失去最惠國待遇之後香港損失之預測。¹³⁴他亦要求香港美國商會成員去信美國國會，同時宣佈，他將在華盛頓聘用遊說團隊。數週之後，鄭明訓與總商會開始每年到訪北京，鞏固與中國高官的關係，並從中進行遊說。¹³⁵七月，美國國會參議院再次揚言動議，將中國人權狀況與其最惠國待遇掛鉤，鄭明訓則指，他改為重視中國加入《關稅暨貿易總協定》之發展。¹³⁶美國國會一直每年審核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直到一九九五年，中國才永久得到最惠國待遇。每一年，香港著名人士

都代表香港組織訪美，維繫其美國社會資本。¹³⁷鄭明訓曾言，香港是中美兩大國的「誠實中介者」(honest broker)。¹³⁸事實上，香港商界領袖各有自己的盤算。

8.4. 小結

一九八四年，中國高官與香港精英達成協議。他們的協議決定了香港的未來、中國的發展，乃至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形貌。為求得到一九九七年後香港的自主權，香港精英承諾不會實現從中共建政開始撤離香港的計畫。他們會見證中國融入全球資本主義體系，這會是他們所得的回報。唐驥千、楊敏德、胡應湘、鄭明訓等人強調，這個「聯合陣線」互惠互利，投機者與愛國者都能從中國改革得益。在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與一九九〇年代初中國最惠國待遇辯論之間，英屬香港的龐大資金湧進南中國，大量出口品經香港到美國乃至世界市場，深圳與珠江三角洲因而成為製造業重鎮，為中國爭取重要的外匯、技術、知識。美國對天安門事件的反應，是自一九五〇年美國禁運以來對中、港、美三地關係發展影響至為深遠的事。香港各路親美精英利用其跨商策略與美國社會資本，令香港經濟利益成為中美關係的核心議題。香港被形容為無辜的旁觀者，以及能夠改變中國的美國最佳希望，美國布殊政府乃至國會的言辭受之而影響。美國國會最終三次拒絕為中國最惠

國待遇附加條件，或將之取消。一九九二年鄧小平南巡，中國改革之象再現，美國國會更不可能再以此作要脅。

蘇聯解體、波斯灣戰爭，象徵了美國霸權新時代之降臨。在後冷戰時期，香港精英的跨商策略決定了太平洋地區的發展方向，令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真正變得成熟。很多學者認為，二〇〇一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是中美貿易急速發展的一個里程碑，但其實這只是一個漫長過程的終點。從一九七〇年代開始，香港精英已為中國融入全球資本體系奠下基石。在一九九〇年代初，他們奮力捍衛中國的最惠國待遇，為中國融入世界掃除最後一個障礙。一九九二年，在江澤民的領導下，胡應湘的高速公路項目復工，浦東發展區在上海開幕。一九九三年三月，中國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修改國家憲法，宣稱國家將成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從意識形態角度看，這是邁向改革的大躍進。¹³⁹一九九〇年代中，據估計，管理涉及中國的供應鏈的香港企業，達五萬間。¹⁴⁰香港之存在，或中國高官之決策，並不意味這些事情會自然發生。這是香港人自己的歷史、網絡、策略使然之結果。

教青松仙

Chapter 9

結論

香港作為東方熱內亞與「漫長世紀」



第九章 結論

——香港作為東方熱內亞與「漫長世紀」

一九九七年六月三十日，全球上百萬人觀看香港主權移交電視直播，英國將其最後一個殖民地移交至中國。在雨中，香港煙花盛放，英國皇室成員與沉重的官員頌揚昔日輝煌歷史。這是英帝國的最終章，以及中國「百年恥辱」的終結。

香港回歸過程，猶如被細心安排的劇目。有關香港之協議與典禮，由北京與倫敦議定，雙方各自從中取得好處。對英國而言，香港主權移交，既能使之體面離開，亦能令公眾更加相信，英帝國為香港帶來了發展與法治，其掠奪與暴力歷史則被淡化。對中國而言，在巨大轉變中，香港主權移交象徵無價的國家團結。倒數時鐘被置於天安門、流行曲與電影湧現，反映中國對香港主權移交鋪

天蓋地的宣傳。對國際而言，香港回歸順利進行，令中國得以改善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門事件之後的形象。」

要理解港人對香港回歸的真正想法，並非易事。英殖統治並不民主，北京亦不會容許英國在港推行民主化。如果香港成為英帝國的先例，其居民可以公投決定香港前景，幾可肯定的是，英國在香港統治會被延續。²「收回香港」並非新界九十九年租約到期或中國民族主義使然之結果。即如狂熱愛國者毛澤東也不曾認為「收回香港」是第一要事，他在一九四〇年代曾言，他對香港不感興趣，中國共產黨對香港不感興趣，在他們之中，香港問題從來不是議題。³從一九四九年，卻起了兩個變化：第一，香港成為全球資本主義體系中的一個重鎮；第二，中華人民共和國推動市場改革。在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代，香港為中國發展提供無價的支援，已是不爭之事。香港是會生金蛋的鵝。

在一九九七年之前，中共明白，得到香港支援是要務，故此曾很認真連結香港的寡頭精英。於本書中，我們見到，從一九四九年，香港精英便不斷建構跨太平洋網絡，為自己謀求退路。一九八四年，唐驥千與鄧小平會面（見第八章）。這次會面的意義，在於跨太平洋網絡成為爭取九七後香港真正自主權的工具。在九七之前，數以萬計中產家庭移民至澳洲、加拿大等地，香港的商界領袖仍然歡迎香港回歸，因為他們相信，這會成為方便他們利用封閉中國大陸推動改革的珍貴

機會。新的香港特別行政區將不會設有總督一職，會改由行政長官領導，行政長官由提名委員會推選。董建華是首任行政長官，他得到任命，是合適結局。

9.1. 香港跨商策略作為新自由主義發展之推力

第六章曾提到，在一九六〇年左右，董建華之父、船王董浩雲開始親美。為此，他所定的營商策略、為兒女安排的教育發展，都以美國為中心。董之兒女都在美國畢業，東方海外亦開設跨太平洋民航航線，航線的一端以紐約為站。美國海陸聯運有限公司為香港引進貨櫃航運服務之時，他在一九六九年急召旅居美國的兒子，以迎頭趕上，與之競爭。一九八二年，董浩雲去世，董建華接班，成為公司掌舵人。一九八〇年代初，全球經濟走下坡，東方海外業務受打擊，遭遇財困。與一九七〇年代的聯業集團一樣，東方海外大量舉債，急速發展，按後來估算，其貸款款額高達二十六點八億美元。經濟衰退令東方海外融資困難。一九八三年六月，董建華警告東方海外股東，指航運業在走下坡，其後甦需時數年。⁴一九八六年，東方海外在該年的虧蝕，達逾一千萬美元。⁵同年春天的一個週六，董建華致電其鄰居與朋友唐驥千。他邀請唐驥千在晚餐後相聚。唐也是東方海外的董事之一。董建華告訴他，他將宣佈東方海外破產，並建議唐驥千為此尋找律師作準

備以自保。按唐之憶述，他回答說，從在哈佛商學院讀書時代開始，他便知道，公司破產需經何種程序，但他不需要律師，因為依照中國文化精神，他不會對朋友落井下石。⁶東方海外有可能破產的消息傳出後，董建華與逾七十間國際銀行開展複雜的洽商，以重整公司業務，為其找尋新資金。按唐的回憶，在協商過程中，東京銀行與日本興業銀行角色關鍵。這兩間銀行最初對東方海外不感興趣，甚至可以袖手旁觀，抽身離去。後者最終同意為董建華提供額外貸款，前提是東方海外需要得到北京支持。這個案例再次顯示社會資本如何影響全球資本流動。董建華隨即聯絡霍英東與許家屯。羅蘭士嘉道理（見第五章）曾利用其上海美國老朋友網絡，安排在紐約與埃索主席見面，現在董建華亦一樣，他利用親北京人脈，以便得到資金。數週後，即五月十六日，董建華與東方海外的貸款者見面，提議將公司一分为二，成立新貨櫃集團與董氏油輪及散裝貨輪集團。董氏家族基金將會持有後者以及東方海外原有股份九成，然後會在前者投資一億美元，另加霍英東一億投資。⁷在貸款者研究這個方案之時，袁庚宣佈，中國輪船招商局將會為東方海外子公司注資一點七億港元。⁸一九八六年九月，董建華與霍英東簽訂合同，達成重組方案協議，方案涉資一點二億美元。霍英東說，這是「商業行動」，旨在令東方海外重振雄風。事實上，以唐驥千的直白語言來說，霍屬「共產黨大亨」。¹⁰霍其實並無投資，他只是將中國銀行與中國輪船招商局的現金過戶給董建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資金固然無法解決東方海外的債務問題，但這已能幫助董建華重組公司、縮

減業務。¹¹北京得到的，不只是全球航運業務，且也包括董建華的忠誠。

東方海外得到拯救之事例，應和了第八章之分析。在首章，我們曾引用唐驥千的話。他說，我們或會失去錢或權力，但長遠而言，精英的社會資本更具價值。在中共建政之時，精英失去大部份物質資產，他們的生存之法，是不斷運用美國社會資本。透過跨商策略，這些精英的跨太平洋網絡為他們提供各種機會，使之能夠生存、振作、創業、為兒女教育作安排、謀求出路。唐家得到上海商業儲蓄銀行透支的支持、運用美國軍方與哈佛商學院網絡營銷，其他精英則祕密與美國政府旗下組織合作，取得美國老朋友或旅美回流學生的協助，或聘用如沈熙瑞的中介者。（見第五章）他們革新香港本土教育體制，將其跨商策略置於其中，引領香港社會進入跨太平洋網絡。

一九八六年，董建華利用其珍貴人脈，拯救東方海外，並非新事。較為特別的是資金來源。透過其國家—私人網絡，北京開始在香港確立其影響力，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美國亦曾使用同類方法，歐偉國（見第三章）、李卓敏（見第四章）等人皆為協力者。董建華不是孤身一人。一九八六年，嘉華銀行處於破產邊緣，商人劉燦松與林子豐家族（見第三與第六章）向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出售百分之七十四股權（見第七章）。¹²對於國際勢力轉移，香港精英向來敏感。他們沒有視董建華之行動為商業挫敗，他們反而務實地為董加上新的光環。一九八七年一月，葉庚年家族邀請董建華加入其新昌營造集團成為董事（見第六章）。¹³葉家的盤算，並非僅為支持董建華，

他們當時已三代在美留學，葉家希望透過支持董建華，與北京建立關係。

董建華案例無疑是極端例子，但這仍能反映在一九九七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後，跨商策略如何演進。從一九五〇年代起，反共精英建立了一套移民生存法則，後來這套法則變成了拉攏兩巨大人的向心力，這兩大巨人，一方擁有世界至為龐大的勞動力，另一方擁有世上至為龐大的消費市場。在一九七〇年代，香港精英已在試驗中國低廉勞動力的效益。他們的跨商策略隨著鄧小平的改革以及香港前途談判而演進。他們的跨太平洋生態系統，愈來愈倚重中國勞力，亦在中美之間作出新的平衡，以滿足其生產與營銷需要。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他們運用其社會資本，捍衛中國進入美國市場之權利。董建華當選成為首任香港行政長官，反映北京如何對之加賞。有足夠條件成為行政長官的，不乏人才。例如霍英東便能成為人選之一。鍾士元亦曾指，陳方安生等公務員同樣有足夠資歷領導政府。¹⁴ 董建華當選的一個重要因素，是他在香港與美國皆擁有深厚人脈。在一九九〇年代，他是彭定康政府成員之一，且亦領導港美經濟合作委員會，曾為中美貿易事務而奔走於港美之間。在這些訪美行程間，他的美國國會人脈盡顯價值，其美國國會友人之一，是戴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¹⁵ 在香港主權移交之後，董建華的首次重要外訪地，便是美國政府與國會。¹⁶

與此同時，香港精英亦加緊與北京建立政治聯繫。馮國經、楊敏德等人仿效胡應湘在一九九〇年代的做法，接受邀請，成為中國政協代表。這個身份具價值，能方便其擁有者接觸北京。透過非

正式對話、密會，這些政協代表可以與高層官員建立關係，就政策發表意見，甚至可以取得國家合約。與美國學位，乃至在冷戰時期與美國政府衛星組織的合作一樣，政協代表身份象徵新網絡之開放，香港精英可藉此自我宣傳，與新權力中心建立聯繫。鄭明訓等其他精英則加入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準備香港回歸工作。在一九九四至一九九七年間，委員會成員每月皆需到北京，與中國官員商議「重要議題」。¹⁷大部份委員會成員都成為選舉委員會成員，他們推選了董建華，使之成為香港首任行政長官。

跨商策略者與中美政治社群建立的，不只是政治或社會關係，其網絡亦得到法律認受。在一九九七年之前，北京容許香港精英擁有雙重國籍。在一九八〇年，五中全會繼一九二九年之後，通過中國的新國籍法。依照此法，父母為中國國民，或父母在中國定居者，皆可擁有中國國民身份。生於香港者亦會被視為中國國民。但此法禁制雙重國籍，違反者會失去中國國民身份。一九八一年，英國國會通過《英國國籍法》(British Nationality Act)，拒絕接受香港人擁有完全的英國國民身份，同時推出新的次等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ritish National [Overseas] passport, BNO)。當時英國國民(海外)護照擁有者不能在英國居住或工作，但在一九八五至一九九七年間，其申請人數仍達約半香港人口(即三百萬)。在北京，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拒絕承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亦不容許香港人歸化為英國人。但在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常委會重申，在外國擁有居留權的中國國民，

可以繼續持有其「旅遊證件」，不過，證件擁有者將不會得到中國國內大使館的「保護」。¹⁸北京默許雙重國籍之存在，反映香港在中國發展之角色，香港人因而得到特別待遇，香港精英亦在香港平民之上。直到最近，不少香港政府決策者仍然擁有外國國籍。

在一九九七年之前，於中美關係間，新自由主義色彩愈趨濃厚，跨商策略因而變得不明顯。在當時，持續的經濟與教育融合、精英網絡之使用，成為中美關係的重要特徵。百人會是其中一例。一九八七年，在一場晚宴中，基辛格向貝聿銘建議，美國華人精英應當成立組織，以增進跨文化關係。在天安門事件後，貝聿銘與音樂家馬友友、物理學家吳健雄、唐驥千之弟唐驊千等人創立百人會。其創立者為六四一事而感到震驚，但同時亦擔心美國的政治反應會中斷中國改革。故此，百人會自我定位為無黨派組織，其任務有二：第一，推動中美關係；第二，代表美國華人社群。但事實上，這也是精英間的社會資本交易平台。貝、馬、唐三人皆為精英移民後代，再者，要得到邀請，才能加入百人會。除了美國華人社群富裕階層之外，百人會成員還包括馮國經，乃至香港中文大學第六任校長劉遵義。¹⁹二〇〇五年，百人會在香港舉行首屆大中華地區會議，會議以連繫太平洋為主題，董建華為之獻辭。²⁰可以說，百人會的發展，亦反映中美商業與教育合作如何在後天安門時代成長。這種模式的特點，是依賴精英間相互結交連繫，同時將政治、人權、去工業化等具爭議與無助牟利的議題置於邊緣。簡而言之，若無其來有自的香港跨商策略，其後中美建交、兩國共同推

動新自由主義的歷史，也許會無從提起。

高等教育的角色同樣重要。在香港，透過教育選擇實現跨商策略，已成自然之事。香港的跨太平洋網絡亦形塑中國新的教育發展路線。後來成為中國總理的朱鎔基，曾是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創院院長。在一九八〇年代末，他便開始與美國商學院建立合作關係。一九九五年，其同事趙純均透過獎學金在麻省理工學院史隆管理學院 (Sloan School of Management) 修讀時，找到了合適的合作夥伴。在趙的鼓動之下，史隆管理學院於同年聯絡清華大學，傾談兩校之間的交換生計畫。不過，其資金安排成為耗時討論的議題。百人會領袖之一楊雪蘭 (Shirley Young) 指，政府資金會帶來限制，故此麻省理工學院改向富裕的香港舊生招手。副院長偉特 (Alan White) 與郭志權 (見第八章) 討論此事，後者邀請楊敏德參與其中。楊對此極感興趣，麻省理工學院與中國方合作的教育項目的主要資金，來自唐家、楊家、郭家、馮家等。一九九五年年底，麻省理工學院與清華大學簽署合作備忘錄，至今其合作項目仍然惠及清華、復旦、嶺南、雲南大學工商管理碩士課程畢業生。²¹ 可以說，香港融資的美式教育，在二十一世紀為中國孕育了部份未來領袖。

9.2. 香港、世界與中國

本書序言曾指，香港是唯一一個在冷戰時期不依賴石油或獨立，卻能從第三世界躍升至第一世界的社會。要理解美國領導的全球資本主義如何演化，中國如何重新融合其中，我們便需要以香港視角，理解香港的發展。我認為，在香港發展之中，「跨商」是重要角色。他們務實，其數代都在利用英帝國沒落、美帝國擴張、香港在冷戰時期的工業發展等時勢，與美國建立商業與教育關係，繼而以此為基礎，在中國建立網絡。「跨商」的足跡，反映香港發展急速但不平等的一面，其事跡源自世襲的上流地位、與帝國的戰略合作、跨太平洋教育網絡。

香港的成功，既非理所當然，亦非「奇蹟」，這與傳統的「自由放任」政策論或「亞洲四小龍」論有別。英國在港恢復殖民管治、中國爆發內戰、精英與平民移居香港、美國在西太平洋擴張繼而衍生機會等歷史意外事件，都是香港成功因素。這不但造就香港的經濟成就，且也為香港製造了非比尋常的政治與經濟空間，跨商因而能夠累積社會資本，在美國領導的太平洋間遊走，繼而與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結合，這一點過去總被忽略。他們以產地來源證明體系，與招攬美國夥伴、投資者、顧客等方法，應對美國對華禁運措施。在冷戰時期，他們為美國議程效力，建立新型學校，幫助學生乃至教員取得跨太平洋機會。他們密切留意美國消費市場動態，保送子女到美國接受高等教育，

持續改變營商模式以滿足美國新趨勢之需要。他們親美的意向，令非正式解殖悄然在英屬香港發生，新形態的社會與經濟力量因而浮現。在一九七〇年代，香港已是美國留學生的首要來源地，同時也是美國市場成衣與紡織品的最大出口地。這種巨大的跨太平洋網絡，令香港足以成為一九九七年前中國重新融入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主要中介者。

我認為，高等教育，以及隨之而來的流動性與社會資本，是推動經濟演變過程的重要因素。從這個角度看，社會日趨不平等，並非如流行說法所指，只是資本主義全球化之後的結果。分析跨商跨代足跡，會令我們明白，現在的社會不平等如何被形塑、維持、擴大。在後殖時代所謂第三世界，精英往往能從解殖與全球化過程得到巨大機會，這並不是因為他們擁有財富或政治權力，而是因為他們得到珍貴教育機會，繼而取得人脈。我所指的跨商都有這種背景。其父母都是民國時代的工業家、銀行家、商人、學者，他們都曾送子女到美國傳教士學校或美國院校讀書。其父母知道，這種美式教育，可換取「現代」知識，以及有用人脈、資歷、教養、國籍。故此對跨商而言，留學於美國，是其畢生經濟與社會策略的重要一環。

9.3. 歷史中的熱內亞與香港

在歷史中，令人意外的是，有歷史案例可與香港作比較，這可以為本書作結。在冷戰時期，香港與美國的關係，特別反映細小之地如何能從龐大帝國國家的勢力與市場取利。研究世界體系的社會學家阿銳基（Giovanni Arrighi）曾著有《漫長的二十世紀》（*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他指，今天的全球資本主義體系，演化自十四世紀末一連串事件，他稱之為「漫長世紀」（*long centuries*）。阿銳基的研究建基於熊彼德、華倫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布萊代爾（Fernand Braudel）、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觀點，他指，在每個漫長世紀，總會有一個結集資本的霸權中心——先為意大利北部城邦，然後是荷蘭、英國乃至近代的美國。每個霸權中心轉移的階段，都先有危機示警，然後再有危機終結其霸權，這通常是政治或經濟危機。

在第一個漫長世紀，佛羅倫斯與威尼斯等意大利城邦是貿易與資本中心。不過，阿銳基指，新型資本主義體系特別在熱內亞（Genoa）成形。在此一體系中，國家服務於商貿利益。這種新體系源自戰略需要，但亦衍生新的金融模式，如此金融模式為西班牙崛起提供了資金。在十四世紀末與十五世紀初，歐洲戰事頻繁，從「百年戰爭」（1337-1453）到布萊代爾所稱的「意大利百年戰爭」（1350-1453），皆是例子。在「黑死病」肆虐期間（1346-1353），歐洲王國依賴流動資金，以重

整銳減的人口、繼續戰事。這需要依靠長距離之資本流動，以及新技術之誕生。對熱內亞而言，危機特別明顯。在十四世紀，橫跨歐亞的蒙古王國與其貿易體系覆滅，威尼斯於都靈和議（Treaty of Turin）（1381）之後掌握地中海東部貿易航線。此後，熱內亞利用剩餘資本，找尋新的靠山，以及開拓前往亞洲的新航線。熱內亞商人認為，在此形勢下，他們應當投放資金、應用專業於地中海新興力量（包括阿拉貢 [Aragon] 與卡斯提亞 [Castile]），以尋求利益。熱內亞商人離散至西班牙不同城市，在伊比利亞（Iberia）建立網絡，解決了熱內亞城邦資本、資訊、技術、網絡儲備失衡問題，熱內亞繼而得到自我保護力量，在嚴峻世界之中生存。於西班牙進侵美洲之後，熱內亞運送銀到塞維亞（Seville）。熱內亞商人將西班牙軍隊所得的銀轉換成金，為西班牙軍戰事提供流動資本。熱內亞為卡斯提亞貿易所下的賭注，促成了新跨大西洋經貿發展，為十六世紀末與十七世紀初的歐洲擴張奠下基礎。²²

香港精英的跨商策略與熱內亞經驗有可比之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後，及至美國與中蘇角力之時，美國透過馬歇爾計畫（Marshall Plan）（1948-1951）、佔領日本（1949-1952）、布雷頓森林協定擴張勢力，推動全球貿易與金融發展。對香港而言，這些發展為未來增添了不穩定因素。香港當時從屬於英帝國而非華盛頓，無法自動受惠於美國援助或得到美國保護。再者，在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一年之時，美國和聯合國實施對華貿易禁運，英屬香港的傳統轉口港經濟受到影響，恰

如在十四世紀時熱內亞貿易受挫一樣。香港亦如熱內亞一般，擁有其他資產與優勢。在其傳統貿易崩潰之前，英屬香港的優勢有二：第一，精英移民的知識、資本、人際網絡；第二，數以萬計一般移民所提供的低廉勞動力。

這種優勢的結果，是香港工業急速發展，以及向美國市場靠攏。這是熱內亞投向西班牙的亞洲版本。為此，香港積累了龐大資本。在毛澤東時代，中國尚在鎖國，東南亞局勢不穩，保護主義遍佈於南韓、台灣、日本，這都阻礙地區招攬資金。與熱內亞人一樣，香港精英對建立國家或帝國不感興趣，他們反而橫渡大海，連結全球經濟體系。阿銳基曾引用布萊代爾有關熱內亞的一段文字，這同樣適用於香港案例：

「熱內亞總是依賴願意冒險、同時謹慎的人口。熱內亞不時改變生存方略，願意接受新的蛻變……這是熱內亞的命運。這種命運脆弱，同時恰如極度敏感的地震儀，世界一旦有任何恍動，便能感測。熱內亞是收集情報的巨獸，且鐵石心腸，故此不易被吞食。」²³

對香港而言，一九七九年中美建交，一九八四年中英簽訂《中英聯合聲明》，猶如西班牙將美

洲變為殖民地之時為熱內亞帶來巨大機會。馮氏兄弟與胡應湘等跨商在美國乃至中國皆有強大人脈，他們令中美貿易成形，為全球最大消費市場配對全球最大勞力供應地。冷戰之時，在數代跨商引領下，香港扮演中介角色。若然忽略跨商，我們便無法理解現今全球資本體系背後「漫長世紀」，乃至中美亦敵亦友關係之源起。

章節附註

導論

- 1 Chris Patten, *East and West* (Basingstoke, UK: Macmillan, 1998), 21.
- 2 例如，Milton Friedman, "The Real Lesson of Hong Kong," speech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May 14, 1997; Milton Friedman and Rose D. Friedman, *Free to Choose: A Personal Statement* (1979;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90), 34, 37, 39, 40–41, 50, 57, 60.
- 3 中國的統計數字參見 World Bank, "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 "China Trade Statistics: Exports, Imports, Products, Tariffs, GDP, and Related Development Indicator,"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m/CHN>, 訪問於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美國的統計數字參見 U.S. Census Bureau, "Foreign Trade: Top Trading Partners," <https://www.census.gov/foreign-trade/statistics/highlights/top/index.html#2015>, 訪問於二〇一九年九月二十日。
- 4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IIE), "Open Doors 2019: Places of Origin, <https://www.iie.org/Research-and-Insights/Open-Doors/Data/International-Students/Places-of-Origin>."
- 5 Yun-wing Sung, "The Hong Kong Economy Through the 1997 Barrier," *Asian Survey* 37, no. 9 (August 1997): 705–19.
- 6 我將共產過渡期定義為一九四六年國共內戰恢復起至一九五二年五反運動。

- 7 William C.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1990): 121-41.
- 8 關於仰光、檳城和曼谷在戰間期的比較研究，參見 Su Lin Lewis, *Cities in Motion: Urban Life and Cosmopolitanism in Southeast Asia, 1920-1940*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 9 Elizabeth Sinn,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0 Daniel Chiro and Anthony Reid, eds., *Essential Outsiders: Chinese and Jews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outheast Asia and Central Europe*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7); Philip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 11 關於二戰時期的香港，參見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3).
- 12 關於導致恢復英國統治的一系列事件，參見 Wm. Roger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no. 4 (October 1997): 1052-84.
- 13 關於圓辦，參見 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 14 關於晚清至民國時期的金融家和實業家，參見 Sherman Cochran, *Big Business in China: Sino-Foreign Rivalry in the Cigarette Industry, 1890-193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Studies in Business History, 1980);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Brett Sheehan, *Trust in Troubled Times: Money, Banks, and State-Society Relations in Republican Tianji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Tomoko Shirokuma, *China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Market, Stat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29–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008); 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Sherman Cochran, ed., *The Capitalist Dilemma in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East Asia Program, 2014); Brett Sheehan, *Industrial Eden: A Chinese Capitalist Vi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 15 著先・參照 Sara Lorenzini, *Global Development: A Cold War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Stephen Macekura, *Of Limits and Growth: The Rise of Glob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整理・參照 David C. Engerman, *The Price of Aid: The Economic Cold War in Ind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Michael E. Latham, *The Right Kind of Revolution: Modernization, Development, and US Foreign Policy from the Cold War to the Presen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1); Nils Gilman, *Mandarins of the Future: Modernization Theory in Cold War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4); Michael E. Latham, *Modernization as Ideology: American Social Science and "Nation Building" in the Kennedy Era*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3)
- 16 Wong Siu-l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2–46;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London: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Growth Economies of Asia, 2001), 75, 142.

- 17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72–73.
- 18 Vanessa Ogle, "AHR Forum: Archipelago Capitalism: Tax Havens, Offshore Money, and the State, 1950s–197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2, no. 5 (December 2017): 1433.
- 19 關於香港難民危機，參見 Laura Madokoro, *Elusive Refuge: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Cold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Madeline Y.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How the Yellow Peril Became the Model Mino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0–97; Meredith Oyen,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Lives and the Making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4–84.
- 20 參見 Nancy Bernkopf Tucker, *Uncertain Friendships: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New York: Twayne of Macmillan, 1994);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 21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eds.,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London: Routledge, 2006).
- 22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23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 24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39–40, 42–56, 64–65, 74–75.
- 25 當我思考「帝國」作為一種通過非領土和網絡形式運作的遠距離不對稱權力的分析方法時，借鑑了 Paul A. Kramer, "Power and Connection: Imperial Histor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World,"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116, no. 5 (December 2011): 1348–92.
- 26 參見 AnnaLee Saxenian,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 27 Ronald Robinson, "The Non-European Foundations of European Imperialism: Sketch for a Theory of Collaboration," in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Imperialism*, ed. Roger Owen and Robert B. Sutcliffe (London: Longman, 1972), 117–42.
- 28 Ronald Robinson, "Imperial Theory and the Question of Imperialism after Empire," in *Perspectives on Imperialism and Decolonization: Essays in Honour of A. F. Madden*, ed. R. F. Holland and G. Rizvi (London: Routledge, 1984), 45.
- 29 其它關鍵例子 - 參見 Wang Gungwu, *China and the Chinese Overseas* (Singapore: Times Academic Press, 2003); Hwei-Ying Kuo,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 (Leiden: Brill, 2014);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ist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 30 其他例子參見 Liping Bu, *Making the World Like Us: Education, Cultural Expansio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3); Andy Chih-ming Wang, *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Student 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Americ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Sarah Steinbock-Pratt, *Educating the Empire: American Teachers and Contested Colonization in the Philippin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31 舉例來說，清朝和民國的規定皆將擁有獎學金的中國學生引導至「實用」科目。參見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57–58.

- 32 針對一項在歐洲擴展美國系統的研究，參見 Victoria de Grazia, *Irresistible Empire: America's Advance Through Twentieth-Century Europe*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33 Poshek Fu, "Between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Mainland Émigrés, Marginal Culture, and Hong Kong Cinema, 1937–1941," in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ed. Poshek Fu and David Dess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9–201.
- 34 更多詳情可參見 Jenny Kwok Wah Lau, "Besides Fist and Blood: Michael Hui and Cantonese Comedy," in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ed. Poshek Fu and David Dess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159, 166.
- 35 Ackbar Abbas, *Hong Kong: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7), 6.
- 36 相關介紹參見 Ming Yu Cheng and Ron Mittelhammer, "Global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mpact of Social Capital and Institutional Building,"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67, no. 5 (November 2008): 859–88.
- 37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ment of Taste*, trans. Richard Nice (1979; London: Routledge, 1984). 他的文藝 "The Forms of Capital" (1986) 有助於理解布迪厄對文化、社會和經濟資本的區分。
- 38 參見 Pierre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in *Handbook of Theory and Research for the Sociology of Education*, ed. John G. Richardson (New York: Greenwood, 1986), 241–58.
- 39 Pierre Bourdieu, *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 trans. Laetitia C. Clough (1989; New York: Polity Press, 1996).
- 40 Bourdieu, "The Forms of Capital," 244, 248.

- 40 一般可追溯到 Theodore W. Schultz,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no. 1 (March 1961): 1-17.
- 41 首先，參見 Kenneth J. Arrow, "Higher Education as a Filter,"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 no. 3 (July 1973): 193-216; Michael Spence,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no. 3 (August 1973): 355-74; Joseph E. Stiglitz, "The Theory of 'Screening,'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 no. 3 (June 1975): 283-300.
- 42 Mark Granovetter, "Economic Ac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The Problem of Embeddednes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1, no. 3 (November 1985): 481-510; James S. Coleman, "Social Capital in the Creation of Human Capital,"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4 (1988): S95-S120.
- 43 Robert D. Putnam, *Bowling Alone: 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 American Commun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0), 20.
- 44 Fei Xiaotong, *From the Soil: The Foundations of Chinese Society*, trans. Gary G. Hamilton and Wang Zhe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 45 Bryna Goodman, "New Culture, Old Habits: Native-Place Organization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Sojourners*, 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hsin Yeh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76-107.
- 46 關於在城市與海外的原生地和方言群體關係，也可參見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 47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Kuo,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Mayfair Mei-hui Yang, *Gifts, Favors, and Banquets: The Art of Social Relationships in China*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4).
- 48 關谷 Wang Yanan - 參見 Rebecca E. Karl, *The Magic of Concepts: History and the Economic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 49 Robert L. Heilbroner, *Behind the Veil of Economics: Essays in the Worldly Philosophy* (New York: Norton, 1988).
- 50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Sucheta Mazumdar, *Sugar and Society in China: Peasants, Technology, and the World Marke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8); Li Bozhong,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Jiangnan, 1620–1850*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8); 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8);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Madeleine Zelin, *The Merchants of Zigong: Industrial Entrepreneurship in Early Modern China*, Studies of the Weatherhead East Asian Institut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5).
- 51 其他例子 - 參見 Ellen Hartigan-O'Connor, "The Personal Is Political Economy,"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6, no. 2 (Summer 2016): 335–41; Amy Dru Stanley, "Histories of Capitalism and Sex Difference," *Journal of the Early Republic* 36, no. 2 (Summer 2016): 343–50; Stephanie E. Jones-Rogers, *They Were Her Property: White Women as Slave Owners in the American South*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9).
- 52 關於鴉片與鴉片經濟的參見 - 參見 Sara Lorenzini, *Global Development: A Cold War Histor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reviewed by Julia F. Irwin, Nathan J. Citino, Nils Gilman, Stephen Macekura,

- Christy Thornton, Corinna R. Unger, and Alden Young,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21*, no. 41 (2020), <https://isforum.org/roundtables/PDF/Roundtable-XXI-41.pdf>.
 更多全球運作的例子 - 參見 Stephen Macekura and Erez Manela, eds., *The Development Century: A Global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 54 Peter E. Hamilton, "The Imperial and Transpacific Origins of Chinese Capitalism," special issue of the *Journal of Historical Sociology* 33, no. 1 (March 2020): 134–48.
- 55 說明性的例子可參見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Berlin: Walter de Gruyter, 1990).
- 56 Ezra F. Vogel,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Edwin O. Reischauer Lectur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 57 Gary G. Hamilton, ed., *Business Network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1); Danny Kin-kong Lam and Ian Lee, "Guerilla Capi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Statist Theory: Comparing the Chinese NICs," in *The Evolving Pacific Basi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nkages*, ed. Cal Clark and Steven Cha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2), 107–24.
- 58 David R. Meyer, *Hong Kong as a Global Metropo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3.
- 59 Gary G. Hamilton, "Hong Kong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Asia," in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Gary G. Hamilt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14–34; Gary G. Hamilton, *Commerce and Capital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6), 129–45.
- 8 Hamilton, *Commerce and Capitalism*, 5.

- 61 Hamilton, "Hong Kong and the Rise of Capitalism in Asia," 27; Hamilton, *Commerce and Capitalism*, 142.
- 62 Anna Lowenhaupt Tsing,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40.
- 63 Gunder Frank, *ReORIENT*.

第一章

- 1 關於民國時期中國和海外的鄉土關係，參見 Emily Honig, *Sisters and Strangers: Women in the Shanghai Cotton Mills, 1919–1949*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hsin Yeh, eds., *Shanghai Sojourners*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Bryna Goodman, *Native Place, City and Nation: Regional Networks and Identit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Madeline Y. Hsu, *Dreaming of Gold, Dreaming of Home: Transnationalism and Migra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outh China*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Hwei-Ying Kuo,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 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 (Leiden: Brill, 2014).
- 2 Philip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9), 4, 25–28.
- 3 唐炳源，又名唐星海。關於家族的遷移，參見 Jack Chi-Chien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1949–1999," 由 Carolyn Wakeman 在一九九九年進行口述歷史採集工作，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3.

- 4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5–17.
- 5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13.
- 6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3, 17. 關於類似的戰時暴利行為，參見 Brett Sheehan, *Industrial Eden: A Chinese Capitalist Vision*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95–96.
- 7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and the Japanese: Collaboration and Resistance in the Shanghai Area, 1937–45," in *Maritime Shanghai*, ed. Wen-hsin Yeh (London: Routledge, 1998), 66.
- 8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16–17, 96. 關於東北精英之間的聯合，參見 Rana Mitter, *The Manchurian Myth: Nationalism, Resistance, and Collaboration in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 9 South Sea Textile Manufacturing Company, "Number of Spindles & Automatic Looms in Operation," June 1970,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HKUSC).
- 10 相同的情況出現在一八二〇年代從馬六甲移民到新加坡的峇峇家族中，參見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101–2.
- 11 Elizabeth Sinn, *Pacific Crossing: California Gold, Chinese Migration, and the Making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 12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63–77, 13.
- 13 關於廣州（貿易）制度，參見 Paul A. Van Dyke, *The Canton Trade: Life and Enterprise on the China Coast, 1700–1845*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 14 Christopher Munn, *Anglo-China: Chinese People and British Rule in Hong Kong, 1841–188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5 Kuhn, *Chinese Among Others*, 107–14, 139.
- 16 Sinn, *Pacific Crossing*, 1–4. 關於英和斯島 - 參見 "Ellis Island: the Portal to America for 12 Million Immigrants from 1892 to 1954," <http://www.nyharborparks.org/visit/ellis.html>.
- 17 John M.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Chinese Elites and British Colonialists in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60.
- 18 Munn, *Anglo-China*, 2, 75–76;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21–36.
- 19 Elizabeth Sinn, *Power and Charity: A Chinese Merchant Elite in Colonial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89).
- 20 Angelina Y. Chin, "Colonial Charity in Hong Kong: A Case of the Po Leung Kuk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25, no. 1 (Spring 2013): 135–57.
- 21 Peter E. Hamilton, "Ho Asek"; John M. Carroll, "Wei Akwong"; and Edward J. M. Rhoads, "Wong Shing," all in *The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DHKB)*, ed. 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186, 453–55, 462–63.
- 22 John M. Carroll, "Ng Choy," in Holdsworth and Munn, eds., *DHKB*, 337–338. 關於伍在清朝終結時的角色 - 參見 Edward J. M. Rhoads, *Manchus & Han: Ethnic Relations and Political Power in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an China, 1861–1928*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2000), 210–28.
- 23 Alfred H. Y. Lin, "The Founding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British Imperial Ideals and Chinese Practical Common Sense," in *An Impossible Dream: Hong Kong University from Foundation to Reestablishment, 1910–1950*, ed. Chan Lau Kit-ching and Peter Cunich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8.
- 24 Emily Hahn, *China to Me*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Doran, 1944), 216–17.

- 25 Carroll, "Ho Kai" and "Wei Yuk," in Holdsworth and Munn, *DHKB*, 188–90 and 455–56.
- 26 Carroll, *Edge of Empires*, 63, 86–87, 126; Huei-Ying Kuo,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Chinese Busines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Hong Kong-Singapore Corridor*, 1914–1941 (Leiden: Brill, 2014), 82–129; Chan Lau Kit-ching, "Business and Radicalism: Hong Kong Chinese Merchant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Movement, 1921–1934," in *Colonial Hong Kong and Modern China*, ed. Pui-tak Lee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5), 169–83.
- 27 Philip Snow, *The Fall of Hong Kong: Britain, China, and the Japanese Occupation*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3–4.
- 28 Emma Jinhua Teng, *Eurasian: Mixed Ident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Hong Kong, 1842–194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3).
- 29 關於何東的兄弟，參見 Eric P. Ho, "Ho Fook"; May Holdsworth, "Ho Kom-tong," in *DHKB*, 187–88, 190–91.
- 30 Simm, *Pacific Crossing*, 37.
- 31 Holdsworth and Munn, *DHKB*, 71.
- 32 "American Club, Elaborate Plans for Hongkong," *China Mail (CM)*, January 10, 1925, 13.
- 33 Simm, *Pacific Crossing*, 233–64.
- 34 Woo Sing-lim (吳醒濂), *The Prominent Chinese in Hong Kong (香港華人名人史畧)* (Hong Kong: Wuzhou shuju, 1937), 38.
- 35 Holdsworth and Munn, *DHKB*, 97–98.
- 36 Frank Ching, *The Li Dynasty: Hong Kong Aristocra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20, 91, 128, 173.
- 37 Law Kar, "The American Connection in Early Hong Kong Cinema," in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ed. Poshek Fu and David Dess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44–70.

- 38 一九五八年，江蘇浙江同鄉會主席表示估計有三十五萬名上海人在香港居住。黃紹倫在他的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5–6. 廿餘年來一數字接近十萬。
- 39 其他例子參見 Kenneth Pommeranz, *The Making of a Hinterland: State, Society, and Economy in Inland North China, 1853–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40 關於杭州商人，參見 Antonia Finnane, *Speaking of Yangzhou: A Chinese City, 1550–1850*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 41 Hao Yen-p'ing, *The Comprador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Bridge Between East and Wes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這些商人有時也會被標簽為「香山人」。參見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1.
- 42 Anne Reinhardt, *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 Shipping,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 1860–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32–37, 51–62, 65–71.
- 43 Marianne Bastid, "Servitude or Liberation: The Introduction of Foreign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Systems to China from 1840 to the Present," in *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 ed. Ruth Hayhoe and Marianne Bastid (Armonk, N.Y.: M. E. Sharpe, 1987), 3–20.
- 44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1990), 12–15.
- 45 關於谷園的使命，參見 Xu Guoqi, *Chinese and Americans: A Shared Histor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76–100; Teng, *Eurasian*, 27–51; Edward J. M. Rhoads, *Stepping Forth in the World: The*

- 46 *Chinese Educational Miss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1872–81*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1).
- Y. C.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872–1949*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66), 45–49.
- 47 關於「富國強兵」，參見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18–19, 25–26. 關於以張之洞的進化作為借鏡，參見 William Ayers, *Chang Chih-tung and Educational Reform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1).
- 48 關於科舉制度的發展，參見 Benjamin A. Elman, *Civil Examinations and Meritocracy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關於人們的手忙腳亂，參見 Henrietta Harrison, *The Man Awakened from Dreams: One Man's Life in a North China Village, 1857–1942*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關於政治含義，參見 Joseph W. Escherick, *Reform and Revolution in China: The 1911 Revolution in Hunan and Hubei*, Michigan Studies o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49 李中清 (James Z. Lee), 任昀竹 (Yunzhu Ren), and 梁晨 (Chen Liang), 中國知識階層的來源與形成, 1912–1952 (Beijing: Zhongguo shehui kexue wenxian chubanshe, 2020).
- 50 包括聖約翰大學 (一八七九)、南京大學 (一八八八)、嶺南學堂 (後為嶺南大學, 一八八九)、之江大學 (一八九七)、蘇州大學 (一九〇〇)、齊魯大學 (一九〇二)、文華書院 (後為華中大學, 一九〇五)、北京協和醫學院 (一九〇六)、福建师范大学 (一九〇七)、上海浸會大學 (一九一一) (一九二九年後的上海大學)、華西協合大學 (一九一四)、金陵學院 (一九一五)、華南女子大學 (一九一七) 和燕京大學 (一九一九)。參見 Daniel H. Bays and Ellen Widmer, eds., *China's Christian Colleges: Cross-Cultural Connections, 1900–195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 51 Joel Andreas, *Rise of the Red Engineers: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ina's New Clas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20. 同時參見 "Who's Who of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 *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 (MRFE)*, August 4, 1917, 4 (published by Tsinghua).
- 52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94.
- 53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50–56.
- 54 關於一點五萬人的預測，參見 Liping Bu, *Making the World Like Us: Education, Cultural Expansion, and the American Century* (Westport, Conn.: Praeger, 2003). Y. C. Wang 在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19–20 中將總數置於稍微高一點的數字。關於畢業率，參見李中清、任韻竹與梁晨，中國知識階層的來源與形成。
- 55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82.
- 56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16–20.
- 57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156–61.
- 58 最大至最小的來源點，分別是：清華、聖約翰、華中、上海交通、燕京、嶺南、北京、上海、金陵、蘇州、浙江和中山。參見李中清、任韻竹與梁晨，中國知識階層的來源與形成。
- 59 M. T. Z. Tyau, "Chinese Returned Students: Are They Making Good?"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NCHSCG)*, April 3, 1920, 33.
- 60 相關例子，參見康愛德，"An Appeal to American Returned Students," in both *MRFE*, June 22, 1918, 131, and *Peking Leader*, June 28, 1918, 3.
- 61 關於留美學生職業的調查，參見 Tyau, "Chinese Returned Students," 33; "Those Returned Students," *MRFE*, November 13, 1920, 573.
- 62 李中清、任韻竹與梁晨，中國知識階層的來源與形成。

- 63 Madeline Y. Hsu, "Befriending the Yellow Peril," in *Trans-Pacific Interactio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1880–1950*, ed. Vanessa Künemann and Ruth May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116.
- 64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168.
- 65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2.
- 66 Marie Claire Bergère, *The Golden Age of the Chinese Bourgeoisie*, trans. Janet Lloy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 67 Tomoko Shiroyama, *China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Market, Stat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29–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008), 60–87.
- 68 Marie-Claire Bergère, "The Shanghai Bankers' Association, 1915–1927: Modern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Local Solidarities," in *Shanghai Sojourners*, 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hsin Yeh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15–34.
- 69 Brett Sheehan, "Urban Identities and Urban Networks in Cosmopolitan Cities: Banks and Bankers in Tianjin, 1900–1937," in *Remaking the Chinese City: Modern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1900–1950*, ed. Joseph W. Escherick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0), 47–64.
- 70 K. P. Chen, "Half Century Notes," January 16, 1950, 1, Kwang Pu Chen Papers, 1936–1958 (KPC), Box 9, Folder 10, Rare Book and Library Collec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RBLC).
- 71 Zhang Gongquan (張公權), 陳光甫與上海銀行, 36–37, KPC, Box 9, RBLC.
- 72 Zhang, 陳光甫與上海銀行, 38–43.
- 73 Zhaojin Ji, *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China's Finance Capitalism* (New York:

- Routledge, 2016), 118–19.
- 74 關於巴路德 - 參見 Ji, *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120. 同書參見 Chen, "Half Century Notes," 1. 同書參見 - 參見 "Who's Who in China," *MRFE*, October 4, 1919, 200; "Y. C. Tong Dies," *Weekly Review of the Far East*, November 12, 1921, 518.
- 75 "Obituary: Mr. S.C. Chu," *NCHSCG*, January 6, 1931, 15.
- 76 Ji, *A History of Modern Shanghai Banking*, 120–21. 同書參見 "Chen Kuang-fu,"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ed. Howard L. Boorma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192–96.
- 77 關於宋斐卿的學歷和有限責任公司 - 參見 Sheehan, *Industrial Eden*, 5, 17–24, 55.
- 78 B. Y. Lee, "Foreign Competition and Chinese Cotton Mills," *China Weekly Review (CWR)*, August 30, 1930, 492.
- 79 B. Y. Lee, "Cotton Manufacturing in China," *Shanghai Times*, December 15, 1919, A14. 同書參見 "Those Returned Students," *MRFE*, November 13, 1920, 573.
- 80 "Men and Events," *CWR*, May 24, 1924, 464.
- 81 Bryna Goodman, "New Culture, Old Habits: Native-Place Organization and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Shanghai Sojourners*, ed. Frederic Wakeman, Jr., and Wen-hsin Yeh (Berkeley: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2), 89–92.
- 82 Janet Y. Chen, *Guilty of Indigence: The Urban Poor in China, 1900–195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74.
- 83 Sherman Cochran, ed., *The Capitalist Dilemma in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Ithaca, N.Y.: Cornell East Asia Program, 2014).
- 84 Man Bun Kwan, "Janus-Faced Capitalism: Li Zhuchen and the Jiuda Salt Refinery, 1949–1953," in Cochran, *The*

- 85 *Capitalist Dilemma*, 89–118.
- 86 Kuo,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223.
- 87 Wa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West*, 85–87.
- 88 引述王, *Emigrant Entrepreneurs*, 16;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December 11, 1946, 8.
- 89 K. P. Chen, "Stabilization Notes," April 2, 1948, 2,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7a, RBLC.
- 90 關於無錫的發展，參見 Toby Lincoln, *Urbanizing China in War and Peace: The Case of Wuxi County*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5).
- 91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2.
- 92 Lincoln, *Urbanizing China*, 39;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2.
- 93 "Jack Tang ('Mr Textiles')," *Bulletin*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June 1984, 9, HKUSC;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2–13.
- 94 「唐炳源字星海」 in 環球中國名人傳略, ed. 李元信 (Shanghai: Huangqiu chubanshe, 1944), 189. 題頭 Modern History Databases (MHDB), Academia Sinica; P. Y. Tang, "Wusih—The Pittsburg of China," *CWR*, November 1, 1925, 35–37 節選。
- 95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2–3, 5.
- 96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140–43.
- 97 中央研究院，1935–36，「國民政府職官年表，1925–49」，第一冊 (Taipei: Zhongyanyuan jin shi suo, 1987), 424. 題頭 MHDB 訪問。
- 98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18–22, 28–31;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117–46;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114–39.

- 98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147.
- 99 Sheehan, *Industrial Eden*, 165–66, 192–93, 196–201.
- 100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8, 28, 45.
- 101 "Yeh Chu Tang Is Dead at 78; Ex-Manufacturer of Textiles,"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4, 1986.
- 102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8–23, 27–31.
- 103 "Granting of Permanent Residence to Certain Aliens," May 11, 1953, in U.S. Department of State, *United States Statutes at Large*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3), B8.
- 104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0–12.
- 105 South Sea Textile Manufacturing Company, June 1970, HKUSC; "1953,"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ulletin* 36, no. 2 (April 1960): 58.
- 106 Sherman Cochran and Andrew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93.
- 107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152.
- 108 Cochran and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14–15, 17, 69–70. 回按參見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147–51.
- 109 Cochran and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238.
- 110 Cochran and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264–66.
- 111 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在戰後的中國耗資一五點一八億美元。參見 Meredith Oyen,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Lives and the Making of U.S.-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72.

- 112 K. P. Chen, "Legislative Diary: US Aid," June 22, 1948, 2, KPC, Box 9, Folder 7b, RBLC.
- 113 Cochran and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267–71.
- 114 Cochran and Hsieh, *The Lius of Shanghai*, 281. 關於唐家，參見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21. 王世在 *Emigrant Entrepreneurs*, 19 中討論他們。
- 115 Reinhardt, *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 251.
- 116 "Quit Peiping, Consul's Advic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October 30, 1948, 1.
- 117 「天津撤退忙，北平航機已登記到明年，天津中央機關正計劃撤退，」*Wen Wei Po (WWP)*, November 8, 1948, 1. 關於民航空運公司，參見 William M. Leary, *Perilous Missions: Civil Air Transport and CIA Covert Operations in Asia*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2006), 48–49.
- 118 「北平美僑百五十人，即撤退返國，京滬美僑尚無動靜，」*WWP*, November 10, 1948, 1; 「旅滬美僑撤退，」*Kong Sheung Yat Po (KSYP)* 《工商日報》，November 21, 1948, 1.
- 119 "Evacuees Leave, Another IRO Vessel Departs From Shai," *SCMP*, January 20, 1949, 12.
- 120 「戰火迫近人心惶惶，上海居民紛紛避難，十里洋場一片混亂景色，」Sing Tao Jih Pao, April 27, 1949, in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Shai Conditions, Big Slump In Land And Luxuries," *SCMP*, November 26, 1948, 1.
- 121 Edward Szczepanik,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183. 關於猜測的一個例子，參見 "Chinese Capital, Over Sixty Billion Idle in H.K.," *SCMP*, June 26, 1948, 1.
- 122 Helen Zia, *Last Boat Out of Shanghai: The Epic Story of the Chinese Who Fled Mao's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9), 217–18, 260.
- 123 K. P. Chen, "Notes on Current Situation," January 21, 1949, 1,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 124 K. P. Chen to Lawrence Morris, Hawkins, Delafield [sic] & Wood, May 3, 1949, 1,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 125 Wm. Roger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no. 4 (October 1997): 1052–84.
- 126 "Correspondence: Some Questio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 Hongkong Telegraph* (SCMPHKT), January 30, 1946, 4.
- 127 Robert Bickers, *Britain in China: Community, Culture and Colonialism 1900–1949* (Manchester, U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9). 關於「割讓香港的背景」參見 "The Old Resident," SCMPHKT, March 9, 1946, 4; "The New Hongkong," SCMPHKT, March 18, 1946, 4; "Life on Subsidy," SCMPHKT, March 25, 1946, 4.
- 128 Zia, *Last Boat*, 170; "Glorious Fourth, American Community in Celebration," SCMPHKT, July 6, 1948, 8.
- 129 "American Shipping, President Line Plans for Pacific Service," SCMPHKT, March 27, 1946, 7.
- 130 "New HK Air Link, Pan-America Airways Service to Colony," SCMPHKT, August 3, 1946, 1.
- 131 "USA to Hongkong, Opening of Radio-Cable Service Announced," SCMP, September 7, 1947, 1; "Air Parcel Post, Gift to Governor to Mak Inauguration," SCMP, September 25, 1948, 5.
- 132 關於美國退役軍人求職・參見 SCMP's "Positions Wanted" throughout 1947. 關於法來和國泰・參見 "Air Shuttle Service, War Veterans Bringing in Supplies to Colony," SCMPHKT, June 19, 1946, 4. 回憶參見 Gavin Young, *Beyond Lion Rock: The Story of Cathay Pacific Airways* (London: Hutchinson, 1988).
- 133 K. P. Chen, "Hongkong," January 6, 1949, 2,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 134 Wallace Harper 蕭士傑, Hong Kong, July 26, 1929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Kwun Tong), *Hong Kong Record Series* (HKRS) 58-1-147.

- 135 "Foreign Firms, May Acquire Immovable Property in Colony," *SCMP*, January 13, 1949, 11.
- 136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24–25.
- 137 "Assassination of Mr. Lee Hysan," *Hong Kong Telegraph*, April 30, 1928, 1.
- 138 York Lo, "Lee Hysan; Lee, Richard Charles Ming-chak; and Lee, Harold Hsiao-wo," in Holdsworth and Munn, *DHKB*, 249–50; Ansie Lee Sperry, *Running with the Tiger: A Memoir of an Extraordinary Young Woman's Life in Hong Kong, China, the South Pacific and POW Camp* (N.p.: Sperry Family Trust: 2009), 4–6.
- 139 Hahn, *China to Me*, 216–17; Poy, Building Bridges, 16–18.
- 140 Sperry, *Running with the Tiger*, 112–15, 172–75.
- 141 Peter Starr, *Citibank: A Century in Asia* (Singapore: Editions Didier Millet, 2007), 58, 66; Sperry, *Running with the Tiger*, 117.
- 142 Sperry, *Running with the Tiger*, 219–21, 238, 244.
- 143 Peter E. Hamilton, "Pop Gingle's Cold War," in *Pacific America: Histories of Transoceanic Crossings*, ed. Lon Kurashig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7), 62–79.
- 144 Zach Fredman, "GIs and 'Jeep Girls': Sex and American Soldiers in Wartime China," *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 13, no. 1 (2019): 76–101.
- 145 Sperry, *Running with the Tiger*, 240, 244. 世界 Starr, *Citibank*, 82.
- 146 Starr, *Citibank*, 81.
- 147 Chihyun Chang, ed.,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54: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vol. 2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103.
- 148 關於美國對中國戰時新娘的審查，參見 Oyen,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 78–87.

- 149 參見 "Marriage Notices," *SCMP*, November 22, 1947, 2; "G.I. War Brides, Leave for America by Special Plane," *SCMP*, November 19, 1948, 4.
- 150 "Chinese for U.S.A.," *SCMP*, December 24, 1948, 13.
- 151 Naoko Shibusawa, *America's Geisha Ally: Reimagining the Japanese Ene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 152 Sperry, *Running with the Tiger*, 254.
- 153 Starr, *Citibank*, 82.
- 154 Rick Kroos, *Kroos Control: American Roots, Chinese Traditions* (Hong Kong: Inkstone Books, 2012), 92.
- 155 例如，榮氏家族在一九四七年向美國廠商訂購了四萬七千個紡錘。參見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132.
- 156 Starr, *Citibank*, 83.
- 157 K. P. Chen, "Equalization Diary," March 8, 1948,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7a, RBLC.
- 158 K. P. Chen, "Peace Mission to Peiping," Feb. 2, 1949, 3,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 159 K. P. Chen, "Cooperation," March 16, 1949, 1–4,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 160 K. P. Chen, 「記購證大戶」 March 23, 1949, 1,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 161 K. P. Chen, 「押放款大戶表」 March 22, 1949, 1; and 「放款透支質押品分拆表」 and 「大戶透支表」 March 23, 1949, 1, all in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 162 K. P. Chen, 「田口押匯大戶」 March 23, 1949,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Huei-ying Kuo, "Chinese Bourgeois Nationalism in Hong Kong and Singapore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36, no. 3 (2006): 396–97.
- 163 "Economic Report on Hong Kong: Prepared by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July 18, 1960, 5, HKRS 269-1-6.

- 165 164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45, 49.
- 165 164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London: Routledge, 2001), 34–43.
- 168 167 166 K. P. Chen, December 29, 1950,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10, RBLC.
- 關於企業在大蕭條中的困境，參見 Kuo, *Networks Beyond Empires*, 192–200.
- 關於與本地生產商的一次會議，參見「金山庄行華安商會，昨召集各廠商開會，應付禁運土產輸美，」*Wah Kiu Yai Po (WKYP)*, August 29, 1951, 6. 關於與美國領事館的兩次互動，參見「金山庄行函請美領事，向華府呼，籲以前定下貨品准予輸美，」*WKYP*, September 7, 1951, 6; 「港方如發給出口證明，土產可准輸美，華安商會將謁美領事條陳，」*Sing Tao Yai Po (STYP)*, June 28, 1952, 5. 關於美國財政部訪港，參見「美財部代表來港，金山庄行華安商會，提供港貨原料來源，」*STYP*, October 17, 1952, 7.
- 169 關於殘存的貿易者，參見 Tomoko Shiroyama, "The Hong Kong-South China Financial Nexus: Ma Xuchao and His Remittance Agency," in *The Capitalist Dilemma in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ed. Sherman Cochran (Ithaca, N.Y.: Cornell East Asia Program, 2014), 203–24.
- 171 170 「美嚴禁僑匯，經港轉共國，」*KSYP*, February 4, 1953, 5.
- Nancy Bernkopf Tucker, ed., *China Confidential: American Diplomats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45–1996*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1), 109–10.
- 173 172 Szczepanik, *The Economic Growth of Hong Kong*, 164.
- "Economic Report on Hong Kong: Prepared by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July 18, 1960, 5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Kwan Tong), HKRS 269-1-6.
- 174 K. P. Chen, 「記購證大戶，」 March 23, 1949, KPC Papers, Box 9, Folder 8, RBLC.

- 175 Eleanor Wong, "A History of the Wong Family Textile Business, Part Two: Life in Hong Kong," 3–4, <http://industrialhistoryhk.org/wp-content/uploads/2014/11/A-History-of-the-Wong-Family-Textile-Business-Part-Two-Life-in-Hong-Kong.pdf>.
- 176 Oyen,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 106–15; Mae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6–12.
- 177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0, 29–30.
- 178 Hui Chor Tin, "Training Programme of Apprentices at South Sea Textiles," *Hong Kong Memory*, "Post-war Industry" Collection, http://www.hkmemory.hk/collections/postwar_industry/, 訪問於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 179 "News: 1951,"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ulletin* 33, no. 3 (Autumn 1957): 56, <https://www.library.hbs.edu/Find/Collections-Archives/Special-Collections/Collections/HBS-History/School-Publications>.
- 180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206–7.
- 181 參見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第二章

- 1 Sterling H. Whiten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agoda* (N.p.: CreateSpace, 2013), 116–17.
- 2 關於戰時與戰後的留美中國學生，參見 Madeline Y.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How the Yellow Peril Became the Model Mino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04–29; Meredith Oyen, *The Diplomacy*

- 3 *of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Lives and the Making of US-China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42–68, 189–95.
- 4 Hongshan Li, *US-China Educational Exchange: State, Society, and Intercultural Relations, 1905–1950*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2007).
- 5 "Enthusiastic Advances in the Foreign Mission Enterprise," *Wachovia Moravian*, January 2, 1947, 2.
- 6 Laura Madokoro, *Evasive Refuge: Chinese Migrants in the Cold War*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 7 關於美國對中國學生返國之管制行動 - 參見 Oyen,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 189–91.
- 8 Whitener, *In the Shadow*, 124–29.
- 9 "Coming and Going: Many Missionaries Due on the Marine Lynx,"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October 6, 1946, 4. 關於貝光道牧師歸母 - 參見 Joseph Walker, ed., *Hong Kong Who's Who: An Almanac of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Histories, 1970–1973*,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HKUSC), 28–29.
- 9 關於邊境控制 - 參見 Laura Madokoro, "Borders Transformed: Sovereign Concerns, Population Movements and the Making of Territorial Frontiers in Hong Kong, 1949–1967," *Journal of Refugee Studies* 25, no. 3 (2012): 407–27.
- 10 Whitener, *In the Shadow*, 195–99.
- 11 參見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4); Lawrence D. Kessler, *The Jiangyin Mission Station: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5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Lian Xi, *The Conversion of Missionaries: Liberalism in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s in China, 1907–1932* (University Park:

- 12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eds.,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s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London: Routledge, 2006).
- 13 "Some Policies of Christian and Missionary Alliance," September 1975, Carl T. Smith Papers (CTSP), RG 12, Folder 2,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HKBUL).
- 14 Aidan Forth, *Barbed-Wire Imperialism: Britain's Empire of Camps, 1876–190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 15 Chi-kwan Mark, "The 'Problem of People': British Colonialists, Cold War Powers, and the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1949–62," *Modern Asian Studies* 41, no. 6 (November 2007): 1151–52.
- 16 關於這個轉變 - 參見 Peter E. Hamilton, "An American Family's Mission in East Asia, 1838 to 1936: A Commitment to God, Academia and Empir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49 (August 2009): 229–65.
- 17 關於夏威夷 - 參見 Jennifer Thigpen, *Island Queens and Mission Wives: How Gender and Empire Remade Hawai'i's Pacific World*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14).
- 18 Timothy S. Lee, eds., *Christianity in Kore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
- 19 Bernard Hung-kay Luk, "A Brief Outline of the History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Hong Kong," CTSP, Folder 1, "Catholic Papers, 1970–79," HKBUL.
- Cindy Yik-yi Chu, *The Maryknoll Sisters in Hong Kong, 1921–1969: In Love with the Chinese*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 20 Raymond P. Ludden 發 G. F. Tyrell, April 27, 1949, 發 G. F. Tyrell 發 R. H. Woodhead, April 29, 1949, both in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Kwun Tong, HKRS 41-1-5050.
- 21 例如 "US Missionaries, Protestants to Stay in China Despite Reds," *SCMP*, January 1, 1949, 16.
- 22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136.
- 23 Madokoro, *Elusive Refuge*, 57.
- 24 Whitenet, *In the Shadow*, 195–96, 201–3.
- 25 葛量洪致殖民地大臣、"American Aid (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January 2, 1957, 2, FO371/127303 (1957),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Kingdom, Kew (NAUK).
- 26 F. P. Jones, "Bio Sketches," Papers of Sidney R. Anderson (PSRA), Box 10, Folder 51, YUDSL.
- 27 Olive Anderson, "A Few Notes on Former Influences Affecting the Methodist Church Work in Hong Kong," PSRA, Box 10, Folder 49, YUDSL.
- 28 "Thinking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Work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Wei Li Kung Hui) in Hong Kong," 1, PSRA, Box 10, Folder 50, YUDSL.
- 29 Patsy Queen 發 發 發, Jr., March 20, 1978, PSRA, Box 9, Folder 32, YUDSL.
- 30 "Questions," PSRA, Box 2, Folder 20, YUDSL.
- 31 "Group Attending Tea at 6 Humphreys Avenue, Nov. 22, 1952," "Invitations to Tea to," and "N. Point Charter Members," in PSRA, Box 2, Folder 20, YUDSL.
- 32 "Chow, Dr. Timothy Yu Hsi," in *Hong Kong Who's Who: An Almanac of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Histories, 1970–1973*, 93, HKUSC.
- 33 Ralph A. Ward, "Another 'Upper Room' In Hongkong," *Louisiana Methodist*, July 2, 1953, 2, PSRA, Box 3, Folder

34. YUDSL.
- 34 "Questions," PSRA, Box 2, Folder 20, YUDSL.
- 35 安迪生夫婦致 Dr. Fink 以及友人，November 7, 1962, PSRA, Box 9, Folder 28, YUDSL.
- 36 "Jet Plane View of Methodist Work in Hong Kong," PSRA, Box 10, Folder 50, YUDSL; "North Point Methodist Church, Cheung Hong Street, Hong Kong," PSRA, Box 2, Folder 25, YUDSL.
- 37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北角衛理堂，金禧紀念特刊，1953–2003 (Hong Kong: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 2003), 16,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 38 Fred Richardson, *Expatriate Adventures* (N.p.: Trafford, 2012), 82–83.
- 39 "Honolulu Chinese Admitted to US Bar," *China Press*, January 9, 1934, 9; "US Court for China: Raven Law Suits Stayed,"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NCHSCCG)*, November 6, 1935, 248; "US Court for China, Reliance Motors Summoned," *NCHSCCG*, April 15, 1936, 120.
- 40 "Besant School for Girls to Open Tomorrow," *China Press*, September 9, 1925, 16.
- 41 "Many Attend Dedic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na Press*, January 24, 1937, 9; "CWC Have Party at Park Hotel," *China Press*, October 15, 1935, 4.
- 42 Richardson, *Expatriate Adventures*, 150.
- 43 Richardson, *Expatriate Adventures*, 158; "News... from Alumni Centers," *Michigan Alumnus*, September 20, 1947, 513.
- 44 安迪生夫婦致友人，September 1961, PSRA, Box 9, Folder 28, YUDSL; "New School at North Point, N.Y. Methodist Women's Funds," *SCMP*, June 18, 1959, 4.
- 45 "Allan Yuen '59," *Michigan Alumnus* 64 (1957): 94; *25 Years of Lionism in Hong Kong, 1955–1980* (October 1980),

3. 25. HKUSC: "Mr Jack Yuen New President of Y's Men's Club," *SCMP*, March 30, 1956, 5; "Mr Jack Yuen Chosen President of Lions Club," *SCMP*, May 17, 1958, 7.
- 46 Richardson, *Expatriate Adventures*, 62.
- 47 "Death of Bishop Ralph Ward," *SCMP*, December 12, 1958, 1. 關於一些讚美詩，參見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九龍安素堂，Ward Memorial Methodist Church, HKRS 306-1-134.
- 48 參見中華基督教衛理公會，衛斯理村十週年紀念特刊 (Wesley Village, Hong Kong, 1955-1965) in PSRA, Box 2. Folder 27, YUDSL; 衛理公會亞斯里村 (Asbury Methodist Village), in PSRA, Box 3, Folder 30, YUDSL.
- 49 Leo L. Hsu. "The Stewardship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in Hong Kong," M.A. thesis, 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 Southern Methodist University, 1962, PSRA, Box 3, Folder 45, YUDSL.
- 50 參見 PSRA, Box 9, Folder 28. YUDSL.
- 51 關於美國的情報行動，參見 Nancy Bernkopf Tucker, *Taiwan, Hong Kong,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45-1992: Uncertain Friendships* (New York: Wayne of Macmillan, 1994); Chi-kwan Mark, *Hong Kong and the Cold War: Anglo-American Relations, 1949-195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關於移民難民，參見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130-97*; Oyen,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 110-13, 154-84; Mae M.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6-12; Glen Peterson, "To Be or Not to Be a Refugee: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Hong Kong Refugee Crisis, 1949-55," *Journal of Imperial and Commonwealth History* 36, no. 2 (June 2008): 171-95.
- 52 簡耀洪致殖民地大臣 - "American Aid (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NAUK.
- 53 Mark,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官方也嚴厲監督校園內的政治活動，參見 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 Brill, 2011).
- 葛量洪致殖民地大臣，"American Aid (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NAUK.
- "Far East Refugee Program,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Hong Kong, FERF Funds Expended or Obligated—May 1, 1954–December 31, 1960," HKRS 890-2-18.
- "Breakdown by Agency and Type of Expense," HKRS 890-2-18.
- Madokoro. *Elusive Refuge*, 61.
- 參見惠施霖對權力下放的討論 - *In the Shadow*, 147–50.
- Whitener, *In the Shadow*, 209.
- Whitener, *In the Shadow*, 238–42.
- "Sid and Olive Anderson to Friends-Around-the-World," December 15, 1958, PSRA, Box 9, Folders 28 and 9, YUDSL.
- "Report for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Summary of Recent Developments," September 9, 1960 (8-1), 5, HKRS 890-2-18.
- J. T. Wakefield 代表輔政司致工務局局長，April 19, 1962 (13), HKRS 156-1-5473.
- 關於政府決策的爭論 - 參見 Alan Smart, *The Shek Kip Mei Myth: Squatters, Fires and Colonial Rule in Hong Kong, 1950–196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6).
- "Report for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2–3, HKRS 890-2-18.
- 聖約翰和 J. C. Phillips, Jr. 致世哲閣 "Application to Carry on Roof-top Work on a Multi-Storey Block" (1), July 5, 1956, HKRS 306-1-134.
- Mark, "The 'Problem of People,'" 1164–65.

- 68 Li Fook Kow 致 J. C. Phillips, Jr. (5), October 5, 1956, HKRS 306-1-134.
- 69 M. 117 (125). M. 126 (131), and J. C. Phillips, Jr., to Josephine Chau (3), September 6, 1956, in HKRS 306-1-134.
- 70 牧師楊震致雪晶小姐的一封信 (6), April 6, 1957; 牧師楊震致雪晶小姐的一封信 (13), August 7, 1957, HKRS 306-1-134.
- 71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Reverend Chester Yang," in Ward Memorial Methodist Church & Yang Memorial Social Service Centre (1967), PSRA, Box 2, Folder 24, YUDSL.
- 72 "Extracted from Minutes of the 4th Ex. Co. Meeting of BGCA held on 17.9.58" (18), HKRS 306-1-134.
- 73 S. E. Alleyne 致區四叔華, June 5, 1959 (30); Chu Liang-man 致區四叔華, November 7, 1962 (135); Cheng Fook-yui 致 S. Ruth Hansen (158), July 22, 1964, in HKRS 306-1-134.
- 74 區尼斯特致 H. M. A. Bristow (125), July 12, 1962, HKRS 306-1-134.
- 75 區尼斯特致 H. M. A. Bristow (130), August 29, 1962, HKRS 306-1-134.
- 76 "Rooftop Dilemma," *Hongkong Star (HKS)*, September 25, 1975; "Prove You're Non-Profit Making or Else, 160 Rooftop Schools Face Closure Threat by Govt," *HKS*, December 22, 1975; "Statement on Roof Top Schools," *HKS*, September 25, 1975, in HKRS 70-6-493.
- 77 社區總辦致區輔政司, "New Life Temple: Charities (Land Acquisition) Ordinance 1958" (15), May 2, 1960, HKRS 835-1-41.
- 78 "Development Loan Fund—Interest-Free Loans to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12), HKRS 229-1-682.
- 79 Roy Kerner 致教區總辦, Feb. 1, 1968, HKRS 156-2-2576.
- 80 教區總辦致輔政司, "Proposed Holy Cross Lutheran Primary School," March 22, 1966, HKRS229-1-675.
- 81 教區總辦致輔政司, "Application for Additional Capital Subsidy and Interest-free Loan, Proposed Holy Cross

- 82 Lutheran Primary School at T.W.T.L. 91, Tsuen Wan, New Territories," December 12, 1968, HKRS 229-1-675. 輔政司致工務局函件 - "Memorandum for Executive Council: Application from Methodist Church for Site for Church and Welfare Centre in Waterloo Road" (138-1), January 29, 1963, HKRS 306-1-134.
- 83 M.144, Rose Young, November 1963, HKRS 306-1-304.
- 84 M.147, Rose Young, November 21, 1963, HKRS 306-1-304.
- 85 社會福利署陳志華 K. Lo, "Board of Missions of the Methodist Church" (143), September 4, 1963, HKRS 306-1-134.
- 86 M.9, July 14, 1966, HKRS 156-1-6158.
- 87 F. C. Gamble 致財政司函件 - "Proposed Opening of Precious Blood Primary School, Wah Fu Estate, in Temporary Premises" (4), November 17, 1967; 民政廳函件至新界區議會秘書處, "Wah Fu Estate—Primary Schools" (4-1), October 24, 1967, in HKRS 229-1-630.
- 88 M.3, December 17, 1960; M.4, December 21, 1960; and M.5, December 22, 1960, in HKRS 337-4-862.
- 89 M.7, January 10, 1961, HKRS 337-4-862.
- 90 葛量洪致殖民地大臣 - "American Aid (Governmental and Private)," NAUK. 教育司司長致傳教士惠施霖 (2, 3), July 11, 1959, HKRS 147-7-59.
- 91 安迪生夫婦致友人 - September 1961, PSRA, Box 9, Folder 28, YUDSL.
- 92 安迪生夫婦致友人 - September 1961, PSRA, Box 9, Folder 28, YUDSL.
- 93 安迪生夫婦致友人 - September 1960, PSRA, Box 9, Folder 28, YUDSL.
- 94 安迪生夫婦致友人 - March 15, 1961, PSRA, Box 9, Folder 28, YUDSL.
- 95 Carter and Agnes Morgan, February 1961, Carter Morgan Papers (CMP), RG 6, "Correspondence, 1955-1975," HKBUL.
- 96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198-235.

- 97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Part 1,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Where They Come From," in *Open Doors* 1950–51, 15.
- 98 IIE, "Foreign Students: Home Country, Sex, Year Studies in U.S. Began, Financial Support. Academic Status," in *Open Doors*, 1961–62, 21.
- 99 George McGovern, "Report on Food for Peace Mission, February 1–March 7, 1962: Hong Kong, India, United Arab Republic, Tunisia, and Western Europe" (43-1), 6, HKRS 890-2-18.
- 100 "Vocational Training, Ward Social Center" (161), undated, HKRS 306-1-134.
- 101 M.91, August 19, 1961, HKRS 306-1-134.
- 102 M.96, November 2, 1961, HKRS 306-1-304.
- 103 Kenneth McIntosh 麥基士 Jesse Clements 陳卓賢 Chan Joy Yin, November 11, 1964; McIntosh 麥基士 S. W. Dang, November 30, 1964; McIntosh 麥基士 Chan Joy Yin, Dec. 1, 1964, in HKRS 306-1-134.
- 104 "Memorandum for Executive Council: Application from the 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for a Vocational Training Centre Site at Kwun Tong" (25-1), in HKRS 306-1-116.
- 105 "New Vocational Centre, Governor to Open It on Thursday," *SCSP-H*, May 16, 1965, in HKRS 306-1-116.
- 106 W. D. F. Williams, "Vocational Training in Hong Kong—Some General Comments," March 10, 1967, 3, HKRS 306-1-116.
- 107 美國 "Activities of Refugee Migration Unit (American Aid)," HKRS 890-2-19.
- 108 "Minutes of a Meeting Held in the Office of the Deputy Colonial Secretary at 2.15p.m. on Friday, 29th July, 1960" (2-1).
- 109 1). HKRS 890-2-18; D. W. B. Baron 羅基士 G. T. Rowe (5), September 17, 1960, HKRS 890-2-18.
- 110 "Minutes of a Meeting Held in the Office of the Deputy Colonial Secretary at 2.15p.m. on Friday, 26th August" (6-

- 1): "Contract No. S188-1a-420. Agreement Betwee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nd 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19), in HKRS 890-2-18.
- 教育司司長致輔政司 - "American Aid," January 17, 1961, in HKRS 890-2-18.
- M.1. October 5, 1961, HKRS 156-1-10405.
- M.2, October 5, 1961; M.3, October 5, 1961; M.5, October 10, 1961; and G. T. Rowe to Robert Aylward, October 19, 1961, in HKRS 156-1-10405.
- A. M. J. Wright to CS (7), October 7, 1961, HKRS 156-1-10405.
- 關於保良局 - 參見 Angelina Y. Chin, "Colonial Charity in Hong Kong: A Case of the Po Leung Kuk in the 1930s,"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25, no. 1 (Spring 2013): 135–57. 關於國民生產儲蓄委員會 - 參見 Janet Y. Chen, *Guilty of Indigence: The Urban Poor in China, 1900–1953*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86–127.
- 社會福利署 - "Note of Discussion with Mr. R. Aylward, Chief of RMU on 21st February, 1961" (20), 1–2; 民政社會福利署 - "Surplus American Foodstuffs" (51), July 30, 1962, in HKRS 890-2-18.
- "FERP Proposed Budget for 1962, Hong Kong"; "Project Summary Forms," in HKRS 890-2-18.
- "FERP Program in Hong Kong for CY 1963" (68-1); "List of CY 1964 Contracts"(80-1); "Summary of Recommended CY 1965 Budget for FERP Program in Hong Kong" (82-1), in HKRS 890-2-18.
- "H.K. Training School Graduates All Get Jobs," *SCMP*, October 31, 1964, in HKRS 306-1-116.
- S. Ruth Hansen 謝 Dorothy Lee (142), August 14, 1963, HKRS 306-1-134.
- "Restricted: Not for Publication, Wong Tai Sin Community Centre" (50-2A), 5, HKRS 156-3-28.
- "With the Compliments of the Director of Information Services: Visit of H.E. The Governor to Wong Tai Sin Community Centre," September 7, 1960, 1, HKRS 70-2-273.

- 122 "Restricted: Not for Publication, Wong Tai Sin Community Centre (50-2A)," 5, HKRS 156-3-28.
- 123 "Extract from China Mail, Wednesday, 13/7/60," in HKRS 70-2-273.
- 124 關於美國難民政策中的關懷和辭 - 參見 Sam Yong, "Compassion Gave Us a Special Superpower: Vietnamese Women Leaders, Reeducation Camps, and the Politics of Family Reunification, 1977-1991,"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30, no. 3 (Fall 2018): 107-37.
- 125 "The First Community Centre in Hong Kong: At Wong Tai Sin Resettlement Estate" (71), 2, HKRS 156-3-28.
- 126 社會福利署署長致輔政司 - "World Refugee Year Community Centre at Wong Tai Sin" (33), December 10, 1959, HKRS 156-3-28.
- 127 「介紹黃大仙社區服務中心」 and "Translation: Introducing the Wong Tai Sin Community Centre," HKRS 156-3-28; Ernie Pereira, "Community Centre Helps Refugees," *HKS*, May 20, 1962, HKRS 70-2-273.
- 128 「黃大仙社區服務中心揭幕儀式中 - 美國總領事蒞臨主持儀式」 - 12.7.60」; and "Text of Speech Delivered by The Honourable Julius C. Holmes, Consul General of the United States at the Wong Tai Sin Community Center, Kowloon," July 12, 1960, in HKRS 70-2-273.
- 129 "Vocational Training at Wong Tai Sin," *SCMP*, July 4, 1960; "Comment of the Day: Resettlement Alka Seltzer," *China Mail*, July 13, 1960, in HKRS 70-2-273.
- 130 "New Centre Will Make Self-Reliant Citizens," *SCMP*, May 4, 1960, HKRS 70-2-273.
- 131 "Community Centre at Wong Tai Sin Opened, World Refugee Year Gift from the US Government, Housewife's Welcome Speech," *SCMP*, July 13, 1960, HKRS 156-3-28.
- 132 "Text of Speech Delivered by The Honourable Julius C. Holmes," July 12, 1960, HKRS 70-2-273.
- 133 "Vocational Training for Refugees," *Sing Tao Jih Pao* 23, no. 3, HKRS 70-2-273.

- 134 "The Hon. Dhun Ruttonjee's Speech on the Occasion of the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 Stone for the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Day Centre in Kwun Tong, 10th March 1967" (123), HKRS 306-1-200.
- 135 參照 "An Institution for Spastic Children at Sandy Bay (John F. Kennedy Memorial Centre)," HKRS 156-2-2337; and "GIS Press: John F. Kennedy Centre (for Spastic Children in Sandy Bay)," HKRS 70-2-469.
- 136 勞工專員致社會福利署函 - "Proposed Day Centre for the Disabled" (42), April 23, 1966; T. Y. Tsau, "Notes for Record" (50), May 9, 1966; 勞工專員致社會福利署函 -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Day Centre for the Handicapped Tsui Ping Road, Kwun Tong" (87), October 4, 1966; in HKRS 306-1-200.
- 137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Day Centre, Open Day on Friday, 1 Sep. 1970," HKRS 70-7-400.
- 138 社會福利署致勞工專員函 -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Day Centre for the Handicapped, Tsui Ping Road, Kwun Tong" (81), August 19, 1966, 2, HKRS 306-1-200.
- 139 "Governor Opens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Day Centre, Thursday, September 5, 1968," HKRS 70-1-331.
- 140 "World Rehabilitation Fund Day Centre, Celebration to Mark Third Anniversary, 30 Aug. 1971," HKRS 70-7-400. 羅拔拔斯 - 參照 "ROSE, Halleck L.," in *Hongkong Album, Fifth Edition*, ed. P. C. Lee (Hong Kong: Sin Poh Amalgamated, 1967-1968), 277-78, HKUSC.
- 141 "Urban Council Meeting, 4 June 1963," 2; and "Rain Didn't Dampen the Spirits at the Kowloon Tsai Park Yesterday," HKS, June 10, 1967, 8, in HKRS 70-3-361.
- 142 Peter Wong 區顯揚致社會福利署函 - February 11, 1966, HKRS 147-7-59.
- 143 "Hong Kong Council—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Proposed Junior College," February 11, 1966, HKRS 147-7-59.

第三章

- 1 教育司長致輔政司 - "Confidential" (10-1), August 2, 1951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Kwun Tong], Hong Kong Record Series (HKRS) 163-1-1599.
- 2 "American Universities Club Proposed," *Hong Kong Sunday Herald*, April 23, 1950, 2; "Dr. C. T. Wang Elected President of American University Club," *China Mail*, May 18, 1950, 3.
- 3 "What Is AUC?" *AmCham* 9, no. 7 (July 1978): 77. 關於費萊蒙 - 參見 Ellen D. Wu, *The Color of Success: Asian American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odel Mino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131. 關於摩爾 - 參見 Madeline Y.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How the Yellow Peril Became the Model Mino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37-39.
- 4 關於王正廷 - 參見 Chinese Students' Christian Association in North America Archives, RG 13,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YUDSL).
- 5 「上海文匯報 - 唐瑛結婚 - 」 *Dongnan Ribao* 《東亞日報》，July 5, 1936, 6.
- 6 Anthony Sweeting, "The University by Report," in *An Impossible Dream: Hong Kong University from Foundation to Re-Establishment, 1910-1950*, ed. Chan Lau Kit-ching and Peter Cuni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0; Jun Fang, "Lai Jixi and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duc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Hong Kong Branch* 52 (2012): 267-89.
- 7 Chan Lau Kit-ching, "The Post-War Re-establishm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45-1950," in *An Impossible Dream: Hong Kong University from Foundation to Re-Establishment, 1910-1950*, ed. Chan Lau Kit-ching and Peter

- 8 *Cumich*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244, 258.
教資局局長致輔政司 - "Confidential (10-1)," August 2, 1951, HKRS 163-1-1599.
- 9 例如 - 參見 Pui Wing Fu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 Developing City: Hong Kong, 1900–1980,"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Hull, September 1988.
- 10 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不久後更名為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
- 11 Helen Laville, "The Importance of Being (In)Earnest: Voluntary Associations and the Irony of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s During the Early Cold War," in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ed.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London: Routledge, 2006), 53.
- 12 Li Choh-ming, *The First Six Years, 1963–1969*, 3, *Papers of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YCA)*, Yale University Library Manuscripts & Archives (YUIMA).
- 13 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Brill, 2011), 119–20.
- 14 John Carroll,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1967 Riots and the Strike Boycott of 1925–1926," in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ed.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75.
- 15 主教致教資局局長 (10-3A), August 14, 1951, HKRS 163-1-1599.
- 16 教資局局長致輔政司 - "Memo: Chung Chi College," May 18, 1953, 1, HKRS 163-1-1599.
- 17 Austin Coates 致教資局局長 (10), August 28, 1951, HKRS 163-1-1599.
- 18 "The Annual Report of the President of Chung Chi College, 1952–1953" (14-1D), 1–2, HKRS 163-1-1599.
- 19 David Au, "Chung Chi College," July 28, 1952,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UBCHEA).

- 20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2, YUDSL.
 "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Chung Chi College, June 27, 1958," 2, UBCHEA, RG 11A, Box 110A, Folder 1508, YUDSL.
- 21 李瑞明，南國鳳凰……中山大學嶺南（大學）學院（Hong Kong: Commercial Press, 2005），88–91, 98–103.
- 22 Thomas D. Scott to President, CFA San Francisco, September 9, 1953, Box P-55, "Hong Kong: Individuals—General (Overseas Chinese Contact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 23 費恩致黃念美 - "Memorandum: Chung Chi College in Hong Kong," November 10, 1952, Archives of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ATLU), Box 22, Folder 311, YUDSL.
- 24 "Report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ung Chi College," 17, UBCHEA, RG 11A, Box 110A, Folder 1518, YUDSL.
- 25 歐偉國致費恩 - November 16, 1954, UBCHE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26 "Government House Conference, May 16th, 1953: Chung Chi College," 2; 不及教資會會長致輔政司 - "Memo: Chung Chi College," May 18, 1953, 1, both in HKRS 163-1-1599.
- 27 李應林致黃念美 - June 8, 1953, ATLU, RG 14, Box 41, Folder 481, YUDSL.
- 28 教育司司長致輔政司 - "Memo: Chung Chi College," May 18, 1953, 1, HKRS 163-1-1599.
- 29 凱瑟克致葛量洪 (1), April 30, 1952, HKRS 41-1-7283.
- 30 副輔政司致賴廉士 (4), May 22, 1952, HKRS41-1-7283.
- 31 參見賴廉士致輔政司 (6), June 4, 1952; 賴廉士致輔政司 (9), July 22, 1952; 賴廉士致輔政司 (11), August 15, 1952; 高詩雅致輔政司 (12), October 25, 1952; all in HKRS 41-1-7283.
- 32 賴廉士致葛量洪 (14), January 19, 1953; "Memorandum on the Proposed Chinese Courses" (16), January 1953; CS,

"Note of a Meeting Held in the Colonial Secretariat at 9.45 a.m. on Wednesday, 28th Jan., 1953" (17), all in HKRS 41-1-7283.

33 教育司司長致輔政司 (23), February 11, 1953, HKRS 41-1-7283.

34 凱瑟克致輔政司 (25), February 24, 1953, HKRS 41-1-7283.

35 賴廉士致教育司司長 (3), May 5, 1953, HKRS 163-1-1599.

36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110-16.

37 Alfred Hayes 致 Wallace Donham, January 8, 1952, ATLU, RG 14, Box 12, Folder 157, YUDSL.

38 李應林致黃念美 - June 8, 1953, ATLU, RG 14, Box 41, Folder 481, YUDSL.

39 費恩致芮陶菴 - June 3, 1954, UBCHEA, RG 11A, Box 124A, Folder 1729, YUDSL.

40 "Exhibit 'A': Proposed Budget for Chung Chi College, Aug. 1, 1957 to July 31, 1958," UBCHEA, RG 11A, Box 59A, Folder 775, YUDSL; "Chung Chi College, Statement of Income & Expenditure as against the Budget, Oct. 31, 1959," UBCHEA, RG 11A, Box 110A, Folder 1513, YUDSL.

41 "Chung Chi College Building Fund, Financial Statement, as at May 31, 1959," UBCHEA, RG 11A, Box 110A, Folder 1513, YUDSL.

42 費恩致黃念美 - May 19, 1953, ATLU, RG 14, Box 22, Folder 311, YUDSL.

43 「歐偉國逝世」 Wah Kiu Yai Po 《華僑日報》 (WKYP), March 5, 1959, 4; 「歐偉國昨病逝 - 遺體今日舉殯」 Kong Sheung Yai Po 《工商日報》 (KSYP), March 5, 1959, 4.

44 「歐偉國」 吳醒濂, 香港華人名人史畧 (Hong Kong: Wuzhou Shuju, 1937), 76.

45 「宋子文：電告來港行期，廣東銀行總行行長，已內定歐偉國繼任。」 KSYP, November 16, 1936, 9; 「今晨廣東銀行復業，宋子文定今晚或明日晉省，新經理歐偉國談廣東銀行復業後方針，仍以粵人之資金發展粵人

- 商業為前提。」KSYF, November 23, 1936, 9.
- 46 K. P. Chen, "Cooperation," March 16, 1949, 2, Kwang Pu Chen Papers, 1936–1958, Group B, File 8, Rare Book and Library Collec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 47 「歐偉國逝世」, WKYP, March 5, 1959, 4.
- 48 York Lo, "Lee Hysan; Lee, Richard Charles Ming-chak; and Lee, Harold Hsiao-wo," in *Dictionary of Hong Kong Biography* (DHKB), ed. May Holdsworth and Christopher Mun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2), 250.
- 49 「聖約翰大學舊生會，新職員昨選出，歐偉國當選本屆制度。」WKYP, September 14, 1951, 6.
- 50 Mary Ferguson 致歐偉國 - April 7, 1953, 以及歐偉國 to Ferguson, April 16, 1953, both in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3, "David W. K. Au, 1953," YUDSL.
- 51 關於援助中國知識人士協會，參見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130–65; Glen Peterson, "Crisis and Opportunity: The Work of Aid Refugee Chinese Intellectuals (ARCI) in Hong Kong and Beyond,"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HKU Press, 2016), 141–59; Meredith Oyen,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Lives and the Making of US-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154–84.
- 52 歐偉國致 Ferguson, August 12, 1952, 以及 Ferguson 致歐偉國, August 13, 1952, both in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2, YUDSL.
- 53 費恩致黃金美 - May 19, 1953, ATLU, RG 14, Box 22, Folder 311, YUDSL.
- 54 歐偉國致費恩 - November 16, 1954,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55 歐偉國致費恩 - October 15, 1953,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3, YUDSL.

- 56 歐偉國致費恩 - November 2, 1953,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3, YUDSL.
- 57 歐偉國致費恩 - November 16, 1954,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58 Fern, October 16, 1952,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2, YUDSL.
- 59 歐偉國致費恩 - November 2, 1953,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3, YUDSL.
- 60 費恩致歐偉國 - December 2, 1953,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3, YUDSL.
- 61 歐偉國致費恩 - December 11, 1953,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3, YUDSL.
- 62 "Report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ung Chi College," 2, UBCHEA, RG 11A, Box 110A, Folder 1518, YUDSL.
- 63 歐偉國致教育司司長 - "Re: Site at Ma Liu Shui (New Territories) (14-1)," November 26, 1953, 3, HKRS 163-1-1599.
- 64 教育司司長致輔政司 - "Memo: Chung Chi College" (14), November 30, 1953, HKRS163-1-1599.
- 65 教育司司長致歐偉國 (11-1), June 8, 1953, HKRS 163-1-1599.
- 66 M.33, 代表教育司司長致輔政司 - March 27, 1954, HKRS 163-1-1599.
- 67 歐偉國致教育司司長 (16-1), December 16, 1953, HKRS 163-1-1599.
- 68 歐偉國致費恩 - December 17, 1953,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69 John F. Padgett and Christopher Ansell, "Robust Ac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Medici, 1400-1434,"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98, no. 6 (May 1993): 1264.
- 70 費恩致歐偉國 - December 31, 1953,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3, YUDSL.
- 71 費恩致歐偉國 - February 1, 1954,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72 "Report of the Ad Hoc Committee," 3.

- 73 Postscript. 歐偉國致費恩, August 18, 1954,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74 歐偉國致費恩, May 12, 1954,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75 費恩致歐偉國, 1-3, May 25, 1954,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76 教育司司長向輔政司匯報, "Memo: Chung Chi College—Funds from America and British Sources" (74), October 21, 1954, HKRS 163-1-1599.
- 77 關於撤回貸款申請, 參見歐偉國致輔政司, November 13, 1954. 關於被委派的董事會代表, 參見教育司司長致輔政司, "Chung Chi College" (80), December 20, 1954, both in HKRS 163-1-1599.
- 78 M.110, 副輔政司致輔政司, October 15, 1954, 50, HKRS 163-1-1599.
- 79 M.116, 副輔政司致輔政司, October 25, 1954, 53, HKRS 163-1-1599.
- 80 M.117, ACS 致葛量洪, October 26, 1954, 54, HKRS 163-1-1599.
- 81 歐偉國致費恩, August 16, 1954, 1,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82 歐偉國致費恩, November 16, 1954,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83 Sterling H. Whitener, *In the Shadow of the Pagoda* (N.p.: CreateSpace, 2013), 213-14.
- 84 歐偉國致費恩, January 26, 1955,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同書參見 Chihyun Chang, ed.,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1954: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vol. 2 (Oxford: Routledge, 2018), 34.
- 85 「歐偉國昨病逝, 遺體今日舉殯」, *KSYF*, March 5, 1959, 4; "Chung Chi College, Minutes of the College Council Meeting, March 13, 1959," UBCHEA, RG 11A, Box 110A, Folder 1513, YUDSL. 關於貸款, 參見 Henry Palmer 致歐偉國, December 19, 1955; James Cameron 致歐偉國, November 2, 1960, both in UBCHEA, RG 11A, Box 114A, Folder 1564, YUDSL.

- 86 關於凌道揚旅美和他與芮陶菴的關係，參見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Chung Chi College" 一九五六及一九六〇年間於 UBCHEA, RG 11A, Box 110A, Folder 1508, YUDSL.
- 87 「本校歷屆畢業生就分配圖 - Professional Distribution of Graduates -」 *Chung Chi College: Story in Pictures, 1951-1961*, 47, Papers of Sidney R. Anderson, Box 10, Folder 49, YUDSL.
- 88 關於主教對凌道揚的行動，參見 M.144, Sir Alexander Grantham, February 27, 1958, HKRS 163-1-1599.
- 89 "College Presidents," *University Bulletin* 1, no. 2, (July 1964): 7.
- 90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18-19, 38, 40.
- 91 C. L. Chien, "Report on New Asia College" (1), May 15, 1959, 1, HKRS 147-3-4.
- 92 B. Preston Schoyer, "A New Asian University: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Yale Alumni Magazine*, March 1966, 32.
- 93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23-24, 51.
- 94 Nancy E. Chapman with Jessica C. Plumb,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A Centennial Histo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2001), 75.
- 95 Betsy Lee (Mrs. Ming Cho Lee) 謝 Henry Baldwin, July 30, 1990, Yale College Records, Class of 1919, Box 1, Folder "Lee, Tsufa, 1987, 1990," YUMA.
- 96 Preston Schoyer, "Biographical Sketch of B. PRESTON SCHOYER (made up in 1962)," YCA, RU 233, Box 49, Folder 721, YUMA. 冏堃堃 Joseph Walker, ed., *Hong Kong Who's Who: An Almanac of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Histories, 1970-1973* (Hong Kong: N.p., 1970), 415.
- 97 Chapman,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81.
- 98 "A Note on the Chinese Post-Secondary Colleges," 2, BW90/556 (1958-1960),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nited

- Kingdom, Kew (NAUK).
- 99 "Speech of Prof. Harry Rudin at 22d Anniversary of Founders' Day, New Asia College, Kowloon, Hong Kong," September 28, 1971, 3, YCA, RG 37, Box 41, Folder 592, YUMA.
- 100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3–4.
- 101 Chapman,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83.
- 102 C. L. Chien, "Report on New Asia College" (3), April 12, 1961, 2, HKRS 147-3-4.
- 103 Yale-in-China Association, "Statement on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the Free Chinese of Hong Kong and Southeast Asia," n.d., 4–6, YCA, RU 233, Box 52, Folder 771, YUMA.
- 104 C. L. Chien, "Report on New Asia College" (1), May 15, 1959, 6, HKRS 147-3-4.
- 105 Chien, "Report on New Asia College" (1), May 15, 1959, 1.
- 106 C. L. Chien, "Note on New Asia College" (2), April 4, 1960, 2–3, HKRS 147-3-4.
- 107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138–42.
- 108 Zhang Yang, "Cultural Cold War: The American Role in Establish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UHK)," in *The Power of Culture: Encounter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ed. Priscilla Roberts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2016), 150–61.
- 109 Alice N. H. Lun Ng, "The Founding," in *The Quest for Excellence: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om 1963 to 1993*, ed. Alice N. H. Lun 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4), 15–16.
- 110 "The Vice-Chancellors' Statement on the Supplementary Budget of 1964/1965 and the Annual Budget of 1965/66," 6, HKRS 229-1-564.
- 111 "Dr. LAM Chi Fung, 1892–1971," Carter Morgan Papers (CMP), RG 6, "Correspondence 1955–75," Hong Kong

-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HKBU).
- Reginald H. Roy, *David Lam: A Biography* (Vancouver: Douglas & McIntyre, 1996), 6-9.
- 「潮州人邑商會主席，林子豐談赴省請願經過」，*KSYF*, March 11, 1938, 11.
- 「林子豐宴顏惠慶」，*KSYF*, March 2, 1939, 4.
- 「汕頭難民集中磐石，林子豐今日謁許世英請示救濟」，*KSYF*, June 27, 1939, 4; 「林子豐等，今日謁許世英」，*KSYF*, June 27, 1939, 7; 「中賑會撥款二萬，賑濟潮汕難民，林子豐昨往謁許世英，將首先購運糧食接濟」，*Ta Kung Pao* 《大公報》 (*TKP*) , June 28, 1939, 6.
- 「王泉笙，定期回菲」，*TKP*, January 20, 1940, 6; 「泰國宣傳部長，威拉斯返泰過港，林子豐等昨日設宴款待」，*TKP*, May 11, 1940, 6; 「華南婦女節制會，展覽會昨日舉行，王立明主席林子豐揭幕，出品精美遊藝極為豐富」，*TKP*, June 16, 1940, 6; 「林子豐昨晚廣播演講，青年會之歷史，公開呼籲協助籌募，今晚慶祝四十週年紀念」，*TKP*, November 20, 1941, 6.
- 「Glorious to God in the Highest: Twenty Years of History of the Hong Kong Baptist Association, "1-3, 1958, Papers of the Hong Kong-Macao Baptist Mission (HKMBM), RG 3, Folder 13, HKBU.
- Roy, David Lam, 43.
- 關於李清泉，參見 Maybelle Tan, "Dee Ching Quan," in *Southeast Asian Personalities of Chinese Descent: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ed. Leo Suryadinat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2), 229-31. 關於他的戰時活動，參見 Antonio S. Tan, "The Philippine Chinese Response to the Sino-Japanese Conflict, 1931-1941,"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2, no. 1 (March 1981): 218. 同時參見「李清泉遺產，損養難民」，*WKYP*, October 31, 1940, 2.
- "Ka Wah Bank: Standing Tall in Hong Kong," *Euromoney* (June 1984), S12.

- Roy, David Lam, 59–61. 121
- "Governor Pays Visit to Local Factories," *China Mail*, February 18, 1957, 10. 122
- Roy, David Lam, 66–67. 123
- "David See-Chai Lam," in *Online Encyclopedia of Canadian Christian Leaders*, <http://www.canadianchristianleaders.org/leader/david-see-chai-lam/>, 訪問於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四日. 124
- Roy, David Lam, 63. 125
- 「青年會新董事，林子豐等十五人當選。」 *WKYP*, December 24, 1947, 8; 「青年會昨夕歡迎，美籍幹事來華服務，林子豐致詞讚揚備至。」 *WKYP*, January 20, 1948, 6. 126
- 「不錯，青年會本身不是工商業團體，但青年會是對社會任何方面都去服務的團體，我們本會基督精神向人類服務，我們舉辦道次展覽，就是向人類服務的一種措施。」參見「會長林子豐致詞，申述舉辦展會目的。」 *KSTP*, August 16, 1948, 5. 同時參見「林子豐報告，工商展覽意義。」 *TKP*, August 16, 1948, 4; 「林子豐闡述，展覽會意義。」 *WKYP*, August 16, 1948, 4. 127
- Maurice Anderson, *The Survival Strategies of a Complex Organization* (Hong Kong: N.p., 1972), 47. 128
- Carter Morgan, "Requiem for a Refuge—169 Boundary Street, Kowloon, Hong Kong," 1–2, April–May 1996, CMP, "Articles, 1996," HKBUL. 129
- Roy, David Lam, 79. 130
- Carter Morgan, "Hong-Kong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June 1956, CMP, "Correspondence, 1955–75," HKBUL. 131
- "Glorious God in the Highest," 4, HKBUL. 132
- "Glorious God in the Highest," 1; Gertrude Tharp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M.A. thesis, Furman University, 1965, 59, HKBUL. 133

- 134 C. L. Chien, "Note on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53), 1, HKRS 147-4-8.
 135 Anderson, *Survival Strategies*, 59–60.
 136 Carter and Agnes Morgan, "Post-Script #36," November 1957, CMP, "Correspondence, 1955–75," HKBUL.
 137 Lowe, Bingham, and Matthews,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Statement of Accounts for the Year Ended July 31, 1964"; and "Hongkong Baptist College Building Fund," November 4, 1965, both in HKMBM, RG 3, Folder 54, HKBUL.
 138 Anderson, *Survival Strategies*, 70, 90, 93. "Library Gift Received," *College News*, 2–3, March 1959 (41), HKRS 147-4-8; "Board Chairman Visited Dr. David Carter," *Our College I*, no. 1 (April 1968): 14, HKBUL.
 139 Roy, *David Lam*, 103.
 140 Tharp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73–74.
 141 Anderson, *Survival Strategies*, 59–60, 64–65, 56.
 142 「林子豐博士・陳植亭女士・金婚大慶・捐獻五十五萬浸大教會・」 *KSYP*, December 31, 1970, 6.
 143 Anderson, *Survival Strategies*, 65, 73.
 144 "Newsmaker: Dr. M. J. Anderson, President of HKSS," *Our College I*, no. 1 (April 1968): 18, HKBUL.
 145 Carter Morgan, "Post Script #71, David Y. K. Wong," October 1975, CMP, "Correspondence 1955–75," HKBUL.
 146 "Board Chairman Visited Dr. David Carter," and "Visitors from Redlands U.," both in *Our College I* no. 1 (April 1968), 14, HKBUL.
 147 "Former BWA President David Wong Dies at 97," *Baptist News Global*, September 23, 2008, <http://www.abpnews.com/archives/item/3534-former-bwa-president-david-wong-dies-at-97#.UwaJoiQa44>.
 148 C. L. Chien, "Note on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53), 1–3, HKRS 147-4-8.

- 149 Chien, "Note on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5. 關於復興和歸主，參見 "Religious Emphasis Week," *College News* 2 (January 1, 1962) (115), HKRS 147-4-8. 回註參見 Anderson, *Survival Strategies*, 86.
- 150 "Staff & Grads at Stetson," *Our College* 1, no. 1 (April 1968): 16; "Faculty & Staff: Mr. Bernard Liebes," *Our College* 1, no. 2 (July 1968): 21, HKBUL.
- 151 Anderson, *Survival Strategies*, 54, 81.
- 152 "Baptist College Graduate News," *College News* (Winter 1964), 6-7, HKMBM, Folder 54, HKBUL.
- 153 "Ph.D.'s from HKBC Alumni," *Our College* 1, no. 3 (April 1969): 12, HKBUL.
- 154 Lam Chi-fung, "What I See in America: Hong Kong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Retreat," in *A Collection of Speeches and Writings of Dr. Lam Chi-Fung*, ed. Lee King Sun (Hong Kong: Hong Kong Pui Ching Middle School, 1965), 312.
- 155 Morgan, "Dr. LAM Chi Fung, 1892-1971," HKBUL.
- 156 Lam Chi Fung, "A Message to All," *Our College* 1, no. 3 (April 1969): 4; "Faculty & Staff: Dr. Lam Chi Fung," *Our College* 1, no. 3 (April 1969): 19, both in HKBUL.
- 157 Kim McGrath, "A Gift of Chinese culture," *Wake Forest News*, January 20, 2012, <http://news.wfu.edu/2012/01/20/a-gift-of-chinese-culture/>. 回註參見 "Legacy: About Tim," Timothy S. Y. Lam Foundation, <http://timothysylam.org/legacy.aspx>, 訪問於二〇一七年五月十四日。
- 158 「美電池廠經理來港視察業務。」 *WKYP*, May 21, 1953, 5; 「林思顯飛美參加業務會議。」 *WKYP*, May 24, 1957, 10; 「捷和電筒廠總經理林思顯反港。」 *WKYP*, July 27, 1957, 10.
- 159 "LAM Chi-fung, Dr., O.B.E., LL.D.," Hongkong Album, 1967-68, HKU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HKUSC).
- 160 林子豐致教育司司長 (21), March 18, 1958, HKRS 147-4-8.

- 161 林子豐致教區同區書 (52). September 25, 1959, HKRS 147-4-8.
- 162 Tharp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54, 62.
- 163 *College News*, May 15, 1962, quoted in Tharp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57.
- 164 Tharpe,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55.
- 165 "Question 9: Reply by the Honourable J. Canning, JP, to Question by the Honourable Wilfred WONG Sien-bing, OBE, JP, in Legislative Council on 31.1.73"; and "Government Loan to Baptist College," January 28, 1975, both in HKRS 70-6-479-1.
- 166 柏立基致殖民地大臣 - "Post-Secondary Colleges," February 7, 1959, BW90/556 (1958-1960), NALUK.
- 167 Ramachandra Guha, "Pluralism in the Indian University," *Economic and Political Weekly* 42, no. 7 (February 2007): 564-70; A. J. Stockwell, "The Crucible of the Malaysian Natio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Malaya, 1938-62," *Modern Asian Studies* 43, no. 5 (September 2009): 1149-87.
- 168 Gaetan F. Lungu, "Colonial Zambia: The Case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Africans from 1924 to 1964," *Journal of Negro History* 78, no. 4 (Autumn 1993): 207-32.
- 169 Far Eastern Department, Colonial Office, "Chung Chi College, Hong Kong," August 1956, 2, HKMS 158-1-11.
- 170 "Conference at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May 20, 1959, 1, UBCHEA, RG 11A, Box 110A, Folder 1513, YUDSL.
- 171 "Confidential: Chinese Post Secondary Colleges in Hong Kong," 2, 4, BW90/556 (1958-1960), NALUK.
- 172 關於崇正 - 參閱 Vermier Y. Chu 致教區同區書 - July 15, 1959, HKRS 147-3-1. 關於崇正 - 參閱 "Minutes of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Governors, Chung Chi College, July 14, 1959," 2, UBCHEA, RG 11A, Box 110A, Folder 1508, YUDSL.
- 173 崇正中學籌備處函 - February 7, 1959, HKRS 264-3-2.

174 柏立基致 W. I. J. Wallace, Colonial Office, August 25, 1962, 2, CO1030/1099 (1960–62), NAUK.

第四章

- 1 Li Choh-ming, "Inauguration Speech," September 9, 1964, 1, *Papers of the Yale-China Association (YCA)*, RU232, Box 80, "CUHK Vice-Chancellor, 1963–65," Yale University, Manuscripts and Archives (YUMA).
- 2 Li Choh-ming, "Draft (Inauguration Speech)" (21-1), September 1, 1964, 1 [Kwun Tong,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Record Series (HKRS) 146-5-30.
- 3 「李卓敏校長在就職禮表示，決心辦好中文大學，成為世界知名學府，」 *Kong Sheung Yat Po (KSYP)*, September 10, 1964, 5; "Red, Purple and Gold: Dr. Li Installed as Chinese Varsity [sic] V-C," *Hongkong Tiger Standard (HKTS)*, September 10, 1964, 2; 「決使大學成國際性，但並非要完全西化，」 *Sing Tao Yat Po (STYP)*, September 10, 1964, 20; "New University A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September 10, 1964, 6. 關於他的退休致辭，參見 "Address by Dr. Choh-Ming Li," *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 (Winter 1978), 6–7.
- 4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eds.,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s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The State-Private Network* (London: Routledge, 2006).
- 5 Li Choh-ming, "Inauguration Speech," 1.
- 6 例如，參見 Ross Barrett, "Aligning India in the Cold War Era: Indian Technological Elites, the India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at Kanpur, and Computing in Indi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echnology and Culture* 50, no. 4 (October

2009): 783–810.

- 7 Li Choh-ming, "'Cultural Desert Is Now Meaningless!'" *University Bulletin (UB)* 3, no. 9 (April 1967), 2.
- 8 "Choh-Ming Li,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Berkeley," 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n Memoriam, 1992*, ed. David Krogh, 102, <http://texts.cdlib.org/view?docId=hb7c6007sj&query=&brand=calisphere>.
- 9 "Man in the News: Hormone Synthesizer Choh Hao Li," *New York Times*, January 7, 1971, 23.
- 10 "Passengers," *China Press*, July 27, 1930, 14.
- 11 Li Choh-ming, "Addendum: A Message to the Colleges," October 28, 1977, in *A New Era Begins, 1975–1978: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8), 33, Harvard-Yenching Library.
- 12 Madeline Y.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How the Yellow Peril Became the Model Mino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71–74. 許嘉純 Chih Meng, *Chinese American Understanding: A Sixty-Year Search* [華裔美國人六十年之探索] (New York: China Institute in America, 1981).
- 13 Tomoko Shiroyama, *China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Market, Stat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29–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2009); William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in Modern China: Economic Planning on the Mainland and on Taiwan, 1943–1958,"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24 (July 1990): 125–27.
- 14 Paul B. Trescott, "H. D. Fong and the Study of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4, no. 4 (2002): 789–809. 莊希泉 Xi Zhou,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and the Nankai Institute of Economics,"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at Manoa, 1999, 62–64.
- 15 莊希泉 Choh Hao Li Papers (CHLP), UCSF Manuscript Collections MS88-9.

- 16 John F. Burns, "Taiwan Is Seeking High-Tech Growth," *New York Times*, May 12, 1986, D1. 關於新竹，參見 Annalee Saxenian,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122–96.
- 17 作者與 Jean Li Rogers 的採訪，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 18 "Choh-Ming Li," *San Francisco Chronicle*, April 23, 1991, B6; 李卓敏致家人，December 26, 1972, CHLP, UCSF, Box 6, Fold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5, 1968–72."
- 19 Sylvia Zhi-Wen Lu Li with Xin Li, Emma Yee Li, and Winston Li, "Good Fortune Indeed: My Cup Runneth Over" (1997), 74–75, <http://www.loassociates.com/FamilyTree/makeup/g3.%20CM,%20Sylvia.pdf>.
- 20 作者與 Jean Li Rogers 的採訪，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 21 李卓敏早期的作品包含 "The Effect of Depreciated Exchange Upon Merchandise Movements,"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49, no. 3 (May 1935): 495–502; "On Chinese Foreign Exchange Control," *Amerasia* (August 1939); "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Trade Under Silver Exchang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53, no. 4 (August 1939): 491–521; and "War and Trade in China," *China Forum* (December 1939).
- 22 Felix Boecking, *No Great Wall: Trade, Tariffs, and Nationalism in Republican China, 1927–1945*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7).
- 23 Sylvia Lu Li, "Good Fortune Indeed," 75–76.
- 24 Henry F. Grady with John T. McNay, *The Memoirs of Henry F. Grady* (Columbia: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2009), 63–64.
- 25 Li Choh-ming, review of *China's Postwar Markets* by Chih Tsang, *Pacific Affairs* 18, no. 4 (December 1945): 381.
- 26 "Chinese Educators to Work in U.S.," *Austin Statesman*, April 28, 1943, 5; Kirby, "Continuity and Change," 130.

- 27 "Chinese Mission Refutes Rumor of Defeat,"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June 4, 1943, 8; "Anniversary Mass Meeting Planned for Wednesday," *Washington Post*, July 2, 1943, B4; "6th Anniversary of China's Stand to Be Celebrated," *Washington Post*, July 5, 1943, 9.
- 28 Trescott, "H. D. Fong," 802-3.
- 29 李卓敏致李卓皓和 Annie Li, August 3, 1944; 以及 T. L. Tsui, 中國大使致李卓敏, Chinese Supply Commission, August 15, 1944, both in CHLP, UCSF, Box 1, Folder "Department of State, 1944."
- 30 "Economic Policy of China Revised, New Official Program for the Nation's Reconstruction Told Here by Dr. Choh-Ming Li,"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4, 1945, 19.
- 31 「李卓敏談：救濟品分配無國共之分，」 *KSYF*, July 17, 1946, 4. 同時參見李卓敏的 "Good Fortune Indeed," 79.
- 32 Li, "Good Fortune Indeed," 78; 作者與 Jean Li Rogers 的採訪，二〇一八年二月二十七日。
- 33 「李卓敏談：救濟品分配無國共之分，」 *KSYF*, July 17, 1946, 4; 「出席聯總會議，李卓敏昨過港，」 *KYSP*, July 16, 1946, 4.
- 34 「大貪污案，行總高級官員，密告檢舉，李卓敏生活窮奢極侈，寓所費用由行總付賬，」 *Wah Kiu Yai Po (WKYP)* 《華僑日報》，August 16, 1947, 1.
- 35 Li, "Good Fortune Indeed," 79. 同時參見 Rong Zongjing's use of networks to blunt government extortion in 1927: Sherman Cochran, *Encountering Chinese Networks: Western, Japanese, and Chinese Corporations in China, 1880-1937*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138-40.
- 36 「李卓敏被控案，下不起訴處分，魯克斯致函表彰工作，李現應聘赴美講學，」 *KSYF*, January 15, 1948, 2; Li, "Good Fortune Indeed," 79.
- 37 「行總李卓敏貪污案成立，」 *KSYF*, September 16, 1947, 1; 「李卓敏罪名任用私人，」 *KSYF*, September 17,

- 1947, 1: 「李卓敏貪污，受停職處分，移送監察院依法審查。」 *KSYP*, September 19, 1947, 1; 「李卓敏，先行停職，依法審查。」 *WKYP*, September 19, 1947, 1; 「李卓敏等多人被滬法院控告。」 *KSYP*, September 30, 1947, 2; "Yuan Opens Attack on Soong's Post, Thirteen CNRRA Officials Indicted," *China Mail (CM)*, September 30, 1947, 1; 「李卓敏等，交保候訊。」 *KSYP*, October 1, 1947, 1; 「行總舞弊案，李卓敏等九名，下不起訴處分。」 *WKYP*, December 20, 1947, 1.
- 38 "CNRRA Charges," *CM*, January 26, 1948, 1; "CNRRA Heads Sentenced," *CM*, April 3, 1948, 1.
- 39 作者與 Jean Li Rogers 的採訪，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 40 「李卓敏被控案，下不起訴處分，魯克斯致函表彰工作，李現應聘赴美講學。」 *KSYP*, January 15, 1948, 2.
- 41 「任何培養日戰爭經濟建議，我必堅決反對，李卓敏在遠東經委會說明立場。」 *Ta Kung Pao (TKP)*, June 6, 1948, 2; 「李卓敏周錫年，訪總督詳談，出席遠東經濟會議經過。」 *WKYP*, December 16, 1948, 7.
- 42 「李卓敏返滬。」 *WKYP*, December 24, 1948, 7; Li, "Good Fortune Indeed," 80.
- 43 「陳光甫李卓敏昨曼谷抵港。」 *TKP*, April 6, 1949, 4.
- 44 「李卓敏氏，在穗辦公。」 *KSYP*, June 6, 1949, 1; 「李卓敏在穗辦公。」 *WKYP*, June 6, 1949, 2; Li, "Good Fortune Indeed," 80.
- 45 Li, "Good Fortune Indeed," 82.
- 46 Naturalization Certificate No. 7739370, "Li, Choh-Ming," July 1, 1958, Ancestry.com.
- 47 Li, "Good Fortune Indeed," 82.
- 48 Fred Herman, "UC Man, Family Reunited After Ordeal in China," *Berkeley Daily Gazette*, July 7, 1955, 13.
- 49 "US Power Held Only Bar to War," *Los Angeles Times*, December 12, 1951, 4.
- 50 該會議的演說稿被再版成特刊。參見 Li Choh-ming, "Economic Problems of the Peasant in the Far East," *World*

- 51 *Affairs Interpreter* 22, no. 4 (Winter 1952): 431–39.
李奇敏和陳世驥致邱永城信，April 8, 1957; 收在 James L. Stewart 致 Woodbridge Bingham, April 10, 1957, both in Asia Foundation Files,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HISU).
- 52 參見 Li Choh-ming, review of *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st China* by W. W. Rostow et al.,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no. 3 (June 1955): 407–9.
- 53 Choh-Ming Li,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 An Appraisal of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Industrializ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 54 Audrey G. Donnithorne, review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ommunist China* by Choh-Ming Li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9), *Economica*, New Series, 27, no. 105 (February 1960): 95.
- 55 Alexander Eckstein, "Conditions and Prospects for Economic Growth in Communist China," *World Politics* 7, no. 1 (October 1954): 1–37; Joseph Alsop, "Mao as Stalin," *New York Herald Tribune*, November 25, 1959, 18.
- 56 參見 Carl Riskin 致羅謙。Li Choh-ming, *The Statistical System of Communis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2).
- 57 Li Choh-ming, "What Happened to the Great Leap Forward?," *Challenge* 11, no. 10 (July 1963): 4.
- 58 柏立基致 W. I. J. Wallace, August 25, 1962, 2, COI030/1099, National Archives, Kew, Surrey (NAUK).
- 59 W. Mallory-Browne 致李奇敏，December 18, 1961; Robert Blum 致李奇敏，January 30, 1962, both in Asia Foundation Files, Box P-266, "Education: School & Univ. Chinese Univ. Vice-Chancellor/Advisor on Chinese Studies," HISU.
- 60 佩斯致 Sir Charles Morris, November 13, 1962, COI030/1099, NAUK.
- 61 史丹爾致佩斯，December 7, 1962, COI030/1099, NAUK.

- 62 Untitled pages 15–18, CO1030/1099, NAUK.
- 63 W. S. Carter 致 Christopher Cox, December 7, 1962, CO1030/1099, NAUK.
- 64 Christopher Cox 致 W. S. Carter, December 10, 1962 (8), CO1030/1099, NAUK.
- 65 Li Choh-ming, "Addendum: An Interview with Dr. Choh-Ming Li," in *A New Era Begins*, 97; Li, "Good Fortune Indeed," 85.
- 66 參見 Raymond V. Johnson 與 Li Choh-ming 的電話訪談, "Li Choh-ming—Telephone Conversation with Mallory Browne," August 30, 1963, Asia Foundation Files, Box P-266, "Education: School & Univ. Chinese Univ. Vice-Chancellor/Advisor on Chinese Studies," HISU.
- 67 E. B. Teesdale 致李卓敏, October 24, 1963, HKRS 229-1-514.
- 68 "The Chronicler: November 7, 1963," *UB 1*, no. 1 (June 1964): 11.
- 69 Li Choh-ming, "Basic Ideas of a University," *UB 1*, no. 1 (June 1964): 1–2.
- 70 參見 Quo-wei Lee, "Foreword," and Sze-kwang Lao, "Chinese Studies and Cultural Integration," both in *The Quest for Excellence: 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rom 1963 to 1993*, ed. Alice N. H. Lun Ng (Hong Kong: Nam Fung, 1994), xii, 133.
- 71 "Vice-Chancellor's Reception to New Students," *UB 3*, no. 5 (December 1966), 3.
- 72 Yuet-keung Kan, "Tribute to Mr. Energy," September 29, 1978, in "Farewell, Dr. And Mrs. Choh-Ming Li," CUHK Library; Yuet-keung Kan, "Speech at the Foundation Stone Laying Ceremony for the Choh-Ming Li Building," *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 (Autumn 1978): 11. 關於「有膽色」，參見陳方正，「大刀闊斧的開創者……李卓敏校長側影」，in 李振軍，送你一座玫瑰園·香港中文大學 (Changsha: Hunan Renmin Chubanshe, 2006), 42. 關於「有膽色」，參見 Francis Hutchins 致 Bill Kitchen, January 15, 1968, YCA RU232, Box 79, "Lee, Tsufa F."

YUMA.

- 73 M.11 (13). AFSCC 致財政司副司長通過殖民地大臣首席助理， June 24, 1964, HKRS 146-5-30.
- 74 M.8. PACS 致財政司副司長， June 16, 1964, HKRS 146-5-30.
- 75 "Comings and Goings," *UB 1*, no. 1 (June 1964): 5.
- 76 "Delegation to Japan," *UB 1*, no. 2 (July 1964): 2-3; "Comings and Goings," *UB 1*, no. 2 (July 1964): 8.
- 77 "Comings and Goings," *UB 1*, no. 6 (December 1964): 5.
- 78 例如，參見 "Comings and Goings," *UB 2*, no. 12 (July 1966): 4.
- 79 參見 Yuen Ren Chao Papers, Carton 5, Folder 74,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80 "Comings and Goings," *UB 2*, no. 3 (October 1965): 7.
- 81 "The Chronicler: February 21, 1964," *UB 1*, no. 1 (June 1964): 11.
- 82 Li Choh-ming, "Advisory Bodies and Visiting Scholars," in *The First Six Years, 1963-1969*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0), 19-20, YCA RU233, Box 12, Folder 174, YUMA.
- 83 Li, *The First Six Years*, appendix 6, "External Examiners," 90-93.
- 84 Li, *The First Six Years*, appendix 4, "Visiting Scholars," 86-88.
- 85 一個很好的例子，參見 "Comings and Goings," *UB 1*, no. 4 (October 1964): 7.
- 86 "Ford Foundation Grant," *UB 3*, no. 8 (March 1967): 1.
- 87 "Exchange Programme with California," *UB 1*, no. 12 (June 1965): 1.
- 88 "Orientation Programme for Californian Students," *UB 5*, no. 1 (September 1968): 1.
- 89 "Speech by Dr. Vernon I. Cheadle, Chancellor,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Barbara," *UB 2*, no. 3 (October 1965): 2.
- 90 "Speech by Dr. Choh-Ming Li, the Vice-Chancellor," *UB 2*, no. 3 (October 1965): 5; "Leverhulme Exchange

- Programme," *UB* 3, no. 10 (May 1967): 2-3; "Exchange Programme with Indiana University," *UB* 3, no. 12 (September 1967): 4.
- 91 "The Vice-Chancellor's Memorandum on the Report of the Undergraduate Examinations Board Regarding the Award of Degrees with Marks of Distinction" (14-1), HKRS 147-3-19.
- 92 富爾敦致 Li, April 27, 1966, HKRS 147-3-19.
- 93 黃麗松致 Li, May 2, 1966, HKRS 147-3-19.
- 94 輔政司致公共服務委員會秘書, "Chinese University—Honours Degree Standards," August 6, 1966 (14-1), HKRS 147-3-19.
- 95 教育司司長致輔政司, "Chinese University—Honours Degree Standards," September 13, 1966 (15-1), HKRS 147-3-19. 同時參見 "Government Recognition of University Honours Degrees," *UB* 3, no. 3 (October 1966): 3.
- 96 Li Choh-ming, "Signs of Maturity and Development," *UB* 3, no. 3 (October 1966): 1-3.
- 97 Grace Ai-ling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Chinese Cultural Education at Hong Kong's New Asia College, 1949-63* (Leiden: Brill, 2011); Andy Chih-ming Wang, *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Student 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Americ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Huang Jianli and Hong Lysa, *The Scripting of a National History: Singapore and Its Past* (Hong Kong: HKU Press, 2008).
- 98 Gary Ka-wai Cheung,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 (Hong Kong: HKU Press, 2009).
- 99 Peter E. Hamilton, "'A Haven for Tortured Souls': Hong Kong in the Vietnam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Review* 37, no. 3 (June 2015): 565-81.
- 100 Li, *The First Six Years*, 5-6.
- 101 Li,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s Character and Its Aspirations," November 3, 1977, 2-3, YCA RU233.

Box 13, Folder 178, YUMA.

"Letters to AmCham: Business Leaders," *AmCham* 7, no. 9 (September 1976): 27–29.

Yu-kuang Chu, "Report to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on Trip to Hong Kong, July 1962," 9–10, Archives of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ATLU), Box 42, Folder 495, YUDSL.

Chu, "Report to the Trustees of Lingnan University," 9–10, 20.

查達東致文匯, "Proposed Lingnan School of Economics," November 14, 1962, 1–3,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UBCHEA), RG11A, Box 110A, Folder 1515, YUDSL.

Geir Lundestad, "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23, no. 3 (1986): 263–77.

"Minutes of the College Council, April 19, 1963," 1, UBCHEA, RG11A, Box 110A, Folder 1515, YUDSL.

文匯致查達東, April 8, 1963, UBCHEA, RG11A, Box 110A, Folder 1515, YUDSL.

Franklin Folts, *Introduction to Industrial Management*, 5th ed. (New York: McGraw-Hill, 1963); DeFold Folts,

"Placement and Rising Salary Curv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Bulletin* 39, no. 6 (November–December 1963): 11.

"Appendix A: Acting President's Report, 14 June, 1963," 1, UBCHEA, RG11A, Box 110A, Folder 1515, YUDSL.

C. T. Yung, "Presidents' Report to the Board of Governors, February 21, 1964," 1, UBCHEA, RG11A, Box 110A, Folder 1510, YUDSL.

"The Chronicler, April 1, 1964," *UB* 1, no. 1 (June 1964): 12.

參閱 "Confidential: Extract from the Vice-Chancellor's Congregation Address to Be Delivered on the 15th October,

1965" (29), 1, HKRS 229-1-492; Li Choh-ming, "The Long and Arduous Road: The Vice-Chancellor's Speech at the

Fourth Congregation," *UB* 2, no. 4 (November 1965): 2.

- 114 "Comings and Goings," *UB* 2, no. 7 (February 1966): 8; 文倫致李卓敏, "Attention of the Vice-Chancellor," April 15, 1966, 1-2, ATLU, Box 1, Folder 5, YUDSL.
- 115 "The Lingnan Institute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UB* 2, no. 10 (May 1966): 1-2.
- 116 Yorke Allen, Jr., "Speech by Mr. Yorke Allen, Jr.," *UB* 3, no. 2 (September 1966): 34.
- 117 Li, *The First Six Years*, 52.
- 118 CUHK Business School website, <https://alumni.bschoo.cuhk.edu.hk/>, 訪問於二〇一八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 119 「中文大學忽其風雲，錢穆博士提出辭職，李卓敏校長說絕不錢氏引退，」*Kong Sheung Wan Bo* 《工商晚報》，July 1, 1964, 1.
- 120 錢穆致新亞理事會，July 20, 1964, 1-5, HKRS 457-3-21.
- 121 錢穆致新亞理事會，7。
- 122 Chou, *Confucianism, Colonialism, and the Cold War*, 34, 40.
- 123 George D. Vaill, "Report of the Executive Secretary to the Special New Asia Committee," October 27, 1955, 1-2, YCA, RU233, Box 48, Folder 707, YUMA.
- 124 關於錢穆的觀點，同時參見 Rebecca Karl, *The Magic of Concepts: History and the Economic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04.
- 125 "Dr. Choh-Ming Li's Speech," *UB* 8, no. 3 (October 1971): 4; 「李卓敏校長演講詞，」中文大學校刊 8, no. 3 (October 1971): 4.
- 126 戴繼趾致輔政司，August 29, 1964 (35-1), HKRS 457-3-21.
- 127 "Chinese University Gets a New Look: Works to Finish in 1975," *Hongkong Star*, July 10, 1972, HKRS 70-3-58-2.
- 128 作者與杜芬的採訪，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二日。

- 129 "Opening of Science Extension to Chinese University," April 12, 1972, 1, HKRS 70-3-58-1.
 例如 - 參見 Mrs. E. J. Fehl 謝 K. V. Arrowsmith, March 13, 1967, 粵港匯報 M.125 and M.126, HKRS 229-1-583.
- 131 "Exhibit I: The Vice-Chancellor's Memorandum on the Basic Building Programme" (March 1966), 3-5, ATLU,
 RG14, Box 40, Folder 469, YUDSL.
- 132 李卓敏致李卓雄 - December 16, 1965, CHLP, UCSF, Box 6, Fold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5,
 1968-72."
- 133 李卓敏致李卓雄 - November 15, 1971, CHLP, UCSF, Box 6, Fold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5,
 1968-72."
- 134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Established," UB 4, no. 2 (November 1967): 3.
- 135 "Exhibition of Chinese Art at the Institute of Chinese Studies," UB 8, no. 3 (October 1971): 2-4.
- 136 "P. Y. Tang Honoured," *South China Sunday Post-Herald*, August 2, 1964, 7.
- 137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Ceremony of the Laying of the Foundation Stone of the University Library,
 Dr. Choh-Ming Li's Remarks, 28th September, 1970," 1-2, HKRS 70-3-58-1.
- 138 "Gifts to the University," UB 6, no. 1 (September 1969): 7.
- 139 "Vice-Chancellor as Director of LJBA," UB 6, no. 4 (January-February 1970): 12.
- 140 Francis Hutchins, "Confidential: Conversation with P. Y. Tang and Tsu-fa Lee, July 1st, 1968," YCA RU232, Box 79,
 Folder "Lee, Tsufa F (Chairman of Board, New Asia College, 1967-72)," YUMA.
- 141 "New Asia College Development Fund," April 19, 1973, YCA RG37, Box 41, Folder 588, YUMA.
- 142 "Service at Cathedral for P. Y. Tang," *SCMP*, June 22, 1971, 6; 「已故張氏如平耀顯，粵港匯報 粵港匯報 -」 *WKYP*,
 June 22, 1971, 12.

- 143 " 'He Practised What He Preached,' Mr. Jack C. Tang's Speech," *UB 9*, no. 4 (January 1973): 2-3; 同時參見「中大新圖書館，昨日落成啟用」，*STYP*, December 16, 1972, 20; 「中文大學圖書館紀念，故唐炳源博士」，*WKYP*, December 16, 1972, 4.3; "New Library for Students, Staff," *SCMP*, December 18, 1972, 15.
- 144 Tak Sing Cheung,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Ng, *The Quest for Excellence*, 84.
- 146 「工商管理夜校課程中大今年九月開辦，李卓敏昨接受馮景禧鄭裕彤捐款」，*TKP*, March 25, 1977, 6.
- 147 Tak, "Institutional Changes," 86.
- 148 李卓敏致李卓皓和 Annie Li, March 3, 1975, CHLP, UCSF, Box 11, Folder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73-76."
- 149 Chuck Shepard 致 Bill Kitchen 及 Ed Worthy, "Re: Conversation with Prof. Yu Ying-shih in Cambridge, 10/21/72," 1, YCA RG37, Box 41, Folder 592, YUMA.
- 150 李祖法致李卓敏 - Aug. 30, 1974, YCA RG37, Box 41, Folder 593, YUMA.
- 151 Tak, "Institutional Changes," 91-92.
- 152 蕭鈞致 T. C. Ou, Aug. 5, 1977, YCA RG37, Box 41, Folder 593, YUMA.
- 153 Li Choh-ming, *Li's Chinese Dictionary*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0).
- Wong, "Overseas Academic Links and International Exchanges," in Ng, *The Quest for Excellence*, 203. 區楚參
- 見 Li Choh-mi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Its Character and Its Aspirations," CUHK Eighteenth Congregation, November 3, 1977, 3, YCA, Box 13, Folder 178, YUMA.

第五章

- 1 "Economic Report on Hong Kong: Prepared by American Consulate General," July 18, 1960, 5 [Hong Kong Public Records Office, Kwun Tong,] Hong Kong Record Series (HKRS) 269-1-6.
- 2 Adam Tooze, *The Deluge: The Great War, America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Global Order, 1916–1931*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14).
- 3 Melville J. Ulme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and Third World Capitalism," *Journal of Economics Issues* 14, no. 2 (June 1980): 454.
- 4 Y. C. Jao, "Financing Hong Kong's Early Postwar Industrialization: The Role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in *Eastern Banking: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ed. Frank H. H. King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3), 560–62.
- 5 D. C. Bray, "America and Hong Kong," *AmCham* 15, no. 5 (May 1983): 16.
- 6 Y. C. Jao, *Banking and Currency in Hong Kong: A Study of Postwar Financial Developmen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974); King, *Eastern Banking*; Frank H. H. King and Catherine King, *The History of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vols. 1–4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8–1991).
- 7 Wong Siu-lun, *Emigrant Entrepreneurs: Shanghai Industrialists in Hong Kong*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42–46; Catherine R.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65* (London: Routledge Studies in the Growth Economies of Asia, 2001), 75, 141–42.
- 8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45, 44–71.

- 9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72–80.
- 10 Jao, "Financing," 552;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141–52.
- 11 Jao, "Financing," 566.
- 12 Jao, "Financing," 554;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147.
- 13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6.
- 14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9.
- 15 Danny Kin-kong Lam and Ian Lee, "Guerilla Capitalism and the Limits of Statist Theory: Comparing the Chinese NICs," in *The Evolving Pacific Basin in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Linkages*, ed. Cal Clark and Steven Chan (Boulder, Colo.: Lynne Rienner, 1992), 107–24.
- 16 Frank Leeming, "The Earlier Industrialization of Hong Kong," *Modern Asian Studies* 9, no. 3 (1975): 337–42.
- 17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50–53; Tomoko Shiroyama, *China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Market, State, and the World Economy, 1929–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0–87.
- 18 Jao, "Financing," 563.
- 19 Shiroyama, *China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68–76.
- 20 Judith Mary Nishida, "Japanese Influence on the Shanghainese Textile Industry and Implications of Hong Kong,"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118.
- 21 "1254 Tang, Jack Chi Chie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HKHP), 13.
- 22 Naomi R. Lamoreaux, *Insider Lending: Banks, Personal Connection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Industrial New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4–5.
- 23 Jao, *Banking and Currency in Hong Kong*, 210.

- 24 Jack C'hi-Chien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田 Carolyn Wakeman 於一九九九年進行的口述歷史 -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3, 45.
- 25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35. 區堃堃 "Number of Spindles and Automatic Looms in Operation," in *South Sea Textiles: Cotton, Polyester, Polynosic, Acrylic* (1970), HKU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HKUSC).
- 26 "Economic Report on Hong Kong," 5, HKRS 269-1-6; "Textileman's Plea: U.S. Market 'Life and Death' to H.K.,"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April 14, 1962, 6.
- 27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48.
- 28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117.
- 29 Jao, "Financing," 557;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147;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118-19.
- 30 Andrew Smith, "The Winds of Change and the End of the Compradore System in the Hong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Business History* 58, no. 2 (January 2016): 195-96.
- 31 參見 "Pan, Quentin 1924" and "Pan, Francis 1926," Alumni Files, Rauner Special Collections Library, Dartmouth College (RSCLDC).
- 32 Lynn Pan, *When True Love Came to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 區堃堃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 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240-44.
- 33 "Pan Kuang-tan," in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 vol. 3, ed. Howard L. Boorman and Joseph K. H. Chen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7), 61-62.
- 34 "Dartmouth Grants Degrees to 396," *New York Times*, June 20, 1928, 21; "Amos Tuck School Holds Graduation,"

- Daily Boston Globe*, May 14, 1929, 5.
- 35 「沈熙瑞」在上海時人誌, ed. 戚再王 (Shanghai: Zhanwang Chubanshe, 1947), 62, 訪問於 Modern History Databases (MHDB), Academia Sinica.
- 36 "H. J. Shen '28," November 1949, in "Shen, Hsi-Jui 1928," RSCLDC. 關於中國鐵路財務, 參見 Elisabeth Köll,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60, 71–77.
- 37 「鐵道部・1936–37」 in 國民政府職官年表, 1925–49, 第1冊, ed. 張朋園, 沈懷王 (Taipei: Zhongyanyuan jin shi suo, 1987), 213, 訪問於 MHDB.
- 38 "The 1926 Newsletter," March 27, 1952, 3, in "Pan, Francis 1926," RSCLDC.
- 39 "The Amos Tuck School of Administration, Dartmouth College, Report of Graduates, 1936," in "Pan, Francis K.," Tuck Alumni Records, RSCLDC.
- 40 關於與美國相關的活動, 參見 "Trade Mission Party Leaves for Tsingtao," *China Press*, May 5, 1935, 9; "Chinese-U.S. Group Scores Cable Charges," *China Press*, October 31, 1935, 12; "New York U. Club Opened at Nanking," *China Press*, August 23, 1936, 3. 外交的例子參見 Wu Ai-lien, "Chinese Social Notes," *North-China Herald and Supreme Court & Consular Gazette (NCHSCG)*, June 2, 1937, 395.
- 41 「交通部・1940–41」 in 國民政府職官年表, 204; "Foreign-Trained Men Holding China's Economic Rein," *China Critic*, May 18, 1939, 107.
- 42 「沈熙瑞」, 上海時人誌, 62. 同時參見「政令・人事・任命狀」, 廣西省政府公報, 1938, 7.
- 43 關於銀行匯款和中國戰爭, 參見 Elisabeth Köll, "Professional Managers at Political Crossroads, Hsia Pin-fang at the Bank of China in New York and London, 1939–1951," in *The Capitalist Dilemma in China's Communist Revolution*, ed. Sherman Cochran (Ithaca, N.Y.: Cornell East Asia Program, 2014), 271–97.

- 44 Chihyun Chang, ed.,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1943–54: An Eyewitness Account of War and Revolution*, vol. 1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 45 Chang,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90.
- 46 這個議題後來被戰後出版物所轉述。參見「沈熙瑞，」上海時人誌，62。
- 47 參見潘的履歷，"Francis K. Pan," 1–2, in "Pan, Francis 1926," RSCLDC. 關於沈，參見「中央銀行，1948–49，」國民政府職官年表，381。同時參見沈的履歷，"H. J. Shen '28," in "Shen, Hsi-Jui 1928," RSCLDC.
- 48 「沈熙瑞等堅決請辭，」*Wah Kiu Yat Po (WKYP)*, May 28, 1948, 1.
- 49 「美援會秘書，沈熙瑞繼任，」*Kong Sheung Yat Po (KSYP)*, June 18, 1948, 1.
- 50 「美援不來委員求去，廠家淦沈熙瑞等辭職，」*Ta Kung Pao (TKP)*, January 9, 1949, 2; 「沈熙瑞接任，中信局局長，劉攻芸任理事會主席，」*WKYP*, January 22, 1949, 2.
- 51 「利便港滬趕班客機降落，啟德機場開放夜航，自滬來港客機一日二十餘架，張嘉璈，劉攻芸，沈熙瑞均已到港，」*WKYP*, April 27, 1949, 5.
- 52 Chang, *The Chinese Journals of L. K. Little*, 2:200.
- 53 "Confidential: Graduate Survey Questionnaire, The Amos Tuck School" (1955), 1 in "Pan, Francis K.," Tuck Alumni Files, RSCLDC; Francis Pan to L. K. Little, January 17, 1952, Asia Foundation Files (AFF), Box P-55, "Hong Kong Individuals, General M-Z," Hoover Institution, Stanford University (HISU).
- 54 費來帝致 J. L. Stewart, "Proposals of Dr. Francis K. Pan in Hong Kong," January 21, 1952, 1–2, AFF, Box P-55, "Hong Kong Individuals, General M-Z," HISU.
- 55 James Ivy to Harold Noble, November 30, 1951, AFF, Box P-55, "Hong Kong Individuals, General M-Z," HISU.
- 56 Francis Pan to Holt McAloney, February 1, 1952, in "Pan, Francis 1926," RSCLDC.

- 57 「潘光迥講，美國新經濟，」 *WKYP*, May 27, 1955, 14.
- 58 潘光迥致 Karl Hill, March 31, 1958. 關於這場演說，參見 Francis K. Pan, "Whither Hongkong?" *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24, 9 (February 27, 1958). Both in "Pan, Francis K.," Tuck Alumni Files, RSCLDC.
- 59 「潘光迥正式接任，孟氏基金會主席，」 *KSYP*, April 7, 1961, 7.
- 60 L.Z. Yuan 致 Fenton Babcock, May 19, 1961, AFF, Box P-169, "Hong Kong Individuals, General M-Z," HISU.
- 61 Fenton and Evelyn Babcock, *New Lives for Old* (Pittsburgh: RoseDog Books, 2011), 120–23.
- 62 「獅子會亞洲區大會，今日揭幕，昨夕三百餘人酒會，」 *WKYP*, September 23, 1961, 7; 「獅子會友要使人與人之間，增進友善，發揮服務精神貢獻社會，國際獅子會亞洲區第四屆會議昨日在港開幕，」 *WKYP*, September 24, 1961, 5; "Dr. Francis Pan on CUP," *Chinese University Bulletin* (Summer 1977): 12.
- 63 潘光迥致 Osmun Skinner, February 8, 1954, in "Shen, Hsi-Jui 1928," RSCLDC. 關於 Henningsens，參見 Hong Kong Bottlers, Fed. Inc. USA, 1949–66. HKRS 113-2-230.
- 64 Li Choh-ming, *The First Six Years*, 1963–1969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69), appendix 6: External Examiners, 90; "Economics Research Centre," *University Bulletin* 1, no. 10 (April 1965), 2. 關於一場給學生們的演講，參見「英鎊的前途與香港，港豐銀行經理沈熙瑞講，昨在聯合書院學生會有詳盡闡釋，」 *WKYP*, April 23, 1965, 10.
- 65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118.
- 66 「香港代表團赴美，參加美國關稅委員會，有關棉織品輸入調查，」 *WKYP*, Feb. 9, 1962, 5; 「美欲加稅限制棉品輸入，港派代表赴美調查，由巴璐朱誠信沈熙瑞充任代表，」 *TKP*, Feb. 9, 1962, 4.
- 67 「廠商會定今晚宴賀，沈熙瑞任匯豐經理，」 *KSYP*, March 5, 1964, 6; 「沈熙瑞任匯豐經理，廠商會今設宴祝賀，」 *TKP*, March 5, 1964, 5; 「廠商會宴賀沈熙瑞，榮任匯豐銀行經理，」 *KSYP*, March 6, 1964, 5; 「發展

- 68 香港工業，有賴銀行合作，廠商會昨宴沈熙瑞，尹致中在席上講話。」 *TKP*, March 6, 1964, 5.
「廠商會今宴賀，沈熙瑞氏榮任，」 *WKYP*, March 5, 1964, 7; 「廠商會宴賀，沈熙瑞榮任，」 *WKYP*, March 6, 1964, 7.
- 69 同時參見「匯豐銀行經理，沈熙瑞籲請港銀行界，割愛一部份優利貨款，來支持生產事業之發展與生存，」 *WKYP*, May 21, 1964, 13.
- 70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6.
- 71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9, 65.
- 72 "Number of Spindles and Automatic Looms in Operation," in *South Sea Textiles*.
- 73 Hong Kong Commerce and Industry Department (HKCID), "Table No. 22: Growth of Employment—Pre 1960 to 31st October 1973," February 1971, HKRS 1056-1-265.
- 74 HKCID, "Foreign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by Industry," March 14, 1973, HKRS 1056-1-251.
- 75 HKCID, "Table No. 7: Investment—by Country of Origin (by Fully Foreign-Owned Companies) as at May 1970," HKRS 1056-1-265.
- 76 HKCID, "Table No. 8: Investment—by Country of Origin (Combining the Hong Kong & Foreign Interest in Joint Ventures) as at May 1970," HKRS 1056-1-265.
- 77 "Table 1: Foreign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by Country—(Position as at 14th March, 1973)" (148B), HKRS 1056-1-251.
- 78 HKCID, "Table No. 12: Export to Major Markets in 1972," HKRS 1056-1-265.
- 79 "Particulars of Factory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Precision Moulds Limited" (53), HKRS 1056-1-270.

- 80 「美商重視本港工業，斥巨資經營電筒廠，以三百餘萬元港幣承購一工廠，」*Sing Tao Wan Po*《星島晚報》，July 22, 1956. 4.
- 81 Sze-yuen Chung, *Hong Kong's Journey to Reunification: Memoirs of Sze-yuen Chu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18–20.
- 82 "Particulars of Factory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Corn Products Co. (HK), Ltd." (81), HKRS 1056-1-270.
- 83 "Particulars of Factory with Overseas Interest: Hong Kong Industrial (Woodwork) Company" (105), HKRS 1056-1-271.
- 84 H. Richard Friman, "The Eisenhower Administration and the Demise of GATT: Dancing with Pandora,"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53, no. 3 (July 1994): 257–72.
- 85 參見 AFE 收集的新聞和雜誌 - Box P-169, "Federation of Hong Kong Industries," HISU.
- 86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120.
- 87 HKCID, "Foreign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Industry," (1970), 4, HKRS 1056-1-265.
- 88 Shou-eng Koo, "The Role of Export Expansion in Hong Kong's Economic Growth," *Asian Survey* 8, no. 6 (June 1968): 510.
- 89 Wong, *Emigrant Entrepreneurs*, 56.
- 90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108–9.
- 91 HKCID, "Foreign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Industry," (1970), 2–3 and table 3, HKRS 1056-1-265.
- 92 HKCID, "Table 2: Foreign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Manufacturing Industry—by Industry," (1973) (148B-2) HKRS 1056-1-251.
- 93 「李濟之，」上海人名錄 (Shanghai, 1941), 439, 訪問於 MHDB.

- 94 Toh Han Shih, "Fate Wove the Textile Industry Into the Fabric of Hong Kong," *SCMP*, October 28, 2004.
- 95 「港九僑領名流繼承三院善業」, *WKYP*, April 5, 1957, 10.
- 96 「雞尾酒會慶祝」, *WKYP*, August 2, 1960, 7; 「吳文政李震之孫麒方，就會招待紀禮函」, *WKYP*, November 5, 1972, 8.
- 97 「蘇浙同鄉會，宴賀李震之晉紳，八五壽星林康侯善頌善禱」, *WKYP*, February 22, 1960, 9.
- 98 「大南董事長李震之飛歐」, *WKYP*, December 2, 1958, 7; 「聯業公司總經理李震之飛歐」, *TKP*, September 14, 1963, 8; 「李震之飛西德參展」, *WKYP*, Sept. 14, 1963, 12.
- 99 「任太平紳士」, *KSYP*, January 9, 1960, 5.
- 100 「怡和巴頓與李震之，商組棉紡聯營機構，雙方說願意達成協議應付局面」, *TKP*, May 11, 1962, 4; 「六大棉系工廠即將合併聯營」, *WKYP*, May 11, 1962, 5.
- 101 「怡和大南等七廠合併成功，總資本五千萬元定名為聯業紡織，此乃本港棉業合併首次在產銷盈利各方面將有良好反映」, *WKYP*, July 3, 1962, 17.
- 102 「職業紡織公司門市部，「黛麗」開始營業巴頓主持揭幕禮」, *WKYP*, June 9, 1963, 17.
- 103 「繼南海紗廠公售之後，聯業紡織股亦將上市，定九月發售一百萬股」, *WKYP*, July 15, 1964, 17; 「本港紡織漂染印花製衣整系列組合，聯業紡織公司股票，本月底公開發售」, *WKYP*, August 11, 1964, 18; 「聯業紡織股公開出售，認股申請書業已發出，該公司最近一個年度結算，純利四五六萬元」, *WKYP*, August 28, 1964, 17.
- 104 「聯業紡織派息每股七毫五仙」, June 6, 1968, 7; 「聯業紡織有限公司，推行三年發展計劃，動用資金千五百萬」, *KSYP*, July 13, 1968, 4; 「本港聯業紡織公司，在英倫展出服裝，做了千多萬生意」, *KSYP*, September 19, 1968, 5; 「聯業紡織公司宣佈盈利逾千五百萬元」, *KSYP*, July 17, 1969, 5; 「聯業紡織盈利」,

- WKYP, July 18, 1969, 11; 「聯業紡織發紅股，中期股息為六角，」 WKYP, November 27, 1969, 8.
- 「李震之飛歐美，」 WKYP, January 17, 1966, 5.
- 「聯業紡織有限公司，推行三年發展計劃，動用資金千五百萬，」 KSYP, July 13, 1968, 4.
- 「適應國際生產水準，聯業紡織精益求精，去年貿易投資金額六千萬，」 KSWP, May 28, 1973, 6. 同時參見 Shu-Ching Jean Chen, "Staying Close to Roots, Lees of Hong Kong Restored a Garment Leader," *Forbes Asia*, November 2016, <https://www.forbes.com/sites/shuchingjeanchen/2016/11/21/staying-close-to-roots-lees-of-hong-kong-restored-a-garment-leader/#7c4b21ae63e6>.
- 「紡織業面臨困境盈盈益仍增百分之三，垂直式綜合性企業聯業紡織保持平穩，」 KSWP, September 17, 1973, 6.
- "Personalities: Trade Mission Off to East Africa," *SCMP*, June 12, 1965, 7.
-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39; "1254 Tang, Jack Chi Chien," HKHP, 13.
- "1254 Tang, Jack Chi Chien," HKHP, 10, 14–15.
-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60.
-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61, 19, 61–70, 40, 106.
- 關於人力，參見 "Hong Kong's Electronic Industry—What Does the Future Hold?" *AmCham* 5, no. 11 (November 1974): 6.
- "The Hong Kong Toy Industry—Searching for a Santa Clause!" *AmCham* 5, no. 12 (December 1974): 5–9.
- Chyau Tuan and Linda F. Y. Ng, "Evolution of Hong Kong's Electronics Industry Under a Passive Industrial Policy," *Managerial and Decision Economics* 16, no. 5 (1995): 509–23; Richard Cheung Lam and Hong-Kin Kwok, "Global Supplier Without a Global Brand Name: A Case Study of Hong Kong's Electronics Industry,"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32, no. 3 (2004): 476–500.

- 117 118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58–71.
- John Carroll,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The 1967 Riots and the Strike Boycott of 1925–1926," in *May Days in Hong Kong: Riot and Emergency in 1967*, ed. Robert Bickers and Ray Yep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75.
- 119 關於這場糾紛，同時參見 Gary Ka-wai Cheung, *Hong Kong's Watershed, The 1967 Riots*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09).
- 120 關於嘉道理家族，參見 Judith Green, "Kadoorie, Sir Elly," "Kadoorie, Sir Ellis," "Kadoorie, Lawrence," and Elizabeth LaCouture, "Inventing the 'Foreignized' Chinese Carpets in Treaty-Port Tianjin. China," *Journal of Design History* 30, no. 3 (September 2017): 300–314.
- 121 關於朱孔嘉，參見「朱孔嘉」上海工商人名錄，ed. 中國徵信所 (Shanghai: Meihua Shuju 1936), 22，訪問於 MHDB. 關於莊生，參見 Gene Gleason, *Hong Kong* (New York: John Day, 1963), 140–41.
- 123 "Tai Ping Carpets—A Brief History,"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https://www.hongkongheritage.org/pages/post.aspx?post=18>，訪問於二〇一七年十一月十一日。
- 124 125 "1009 Westphal, Frederick," HKHP, 2.
- 126 127 York Lo, "Fred Westphal—the American Oil Taipan from New Orleans Who Helped to Power Hong Kong," in *The Industrial History of Hong Kong Group*, October 21, 2016, <http://industrialhistory.hk.org/fred-westphal-the-american-oil-taipan-from-new-orleans-who-helped-to-power-hong-kong/>.
- "1009 Westphal, Frederick," HKHP, 3–4.
- Changqi Wu and Leonard K. Cheng, "Hong Kong's Business Regulation in Transition," in *Deregulation and*

- Interdependenc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ed. Takatoshi Ito and Anne O. Krueg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158; Pun-Lee Lam, *The Scheme of Control on Electricity Companies*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6), 76, 84.
- "T254 Tang, Jack Chi Chien," HKHP, 12–13.
- "T009 Westphal, Frederick," HKHP, 4.
- Exxon Energy, *Exxon Energy Ltd, Hong Kong: Power Generation for Hong Kong* (Hong Kong: Exxon Energy, 1991), 5, 12, 18, HKUSC.
- "Song, John Louis," in *Hong Kong Who's Who: An Almanac of Personalities and Their Comprehensive Histories, 1970–1973*, ed. Joseph Walker (Hong Kong: N.p., 1970), 434–35; "Witness to the Making of a New China: John Soong . . . the Man in the Middle," *SCMP*, July 31, 1983, 12.
- Meredith Oyen, *The Diplomacy of Migration: Transnational Lives and the Making of US-Chinese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5), 50–60.
- "Friendly Alien on War Duty in China, Recollections—a Series by Jane Ram," *SCMP*, June 30, 1974, 24.
- "Pickering Gets Post In N.Y. Temporarily; Bardens at Shanghai," *Stanvac Meridian* 2, no. 4 (January 1951): 1, ExxonMobil Historical Collection (EMHC), Box 2.207/E172, Folder 8, 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 (BCAH),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UT Austin).
- 「米啟釐之公子米鎮釐結婚」 *WKYP*, September 3, 1963, 14; "June Wedding for Miss Mau,"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0, 1971, 78; "Married in Honolulu," *SCMP*, June 22, 1971, 5.
- Mei Foo Investments, *The Story of Mei Foo Sun Chuen* (Hong Kong: Mei Foo Investments, 1974), 2. HKRS 353.55 STO 1978.

- 137 "Mobil News Release," November 17, 1966, EMHC, Box 2.207/E173, Folder 1, BCAH, UT Austin.
- 138 "Housing Project for H.K.'s Middle Income Group," *SCMP*, September 17, 1966, in HKRS 70-3-297.
- 139 "Mobil Oil Plans Hong Kong Suites, Socony Unit to Build Middle-Income Housing," *New York Times*, July 18, 1965, R8.
- 140 *The Story of Mei Foo Sun Chuen*, 2; 「美孚新邨私人建屋計劃，世界最大，今日奠基典禮由港督主持，預計建屋萬五層容八萬人，」 *WKYP*, November 17, 1966, 7.
- 141 關於美孚煤油燈，參見 Frank Dikötter, *Things Modern: Material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 (London: Hurst, 2007), 179–80.
- 142 Norimitsu Onishi, "A Lonely Death,"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30, 2017, F1.
- 143 *The Story of Mei Foo Sun Chuen*, 5.
- 144 「無比石油總裁盛讚，美孚新邨壯觀，」 *WKYP*, October 15, 1966, 10.
- 145 Editorial: "Mobil Housing Project," *SCMP*, November 18, 1966; and "Foundation Stone of Estate Alaid, Governor Stressed Need for More Inexpensive Flats," *SCMP*, November 18 1966, both in HKRS 70-3-297.
- 146 「美孚新邨上蓋工程，由英國建築公司承建，」 *KSYF*, February 18, 1967, 10. 同誌參見 "Building Project," February 18, 1967, *Hongkong Tiger Standard*, in HKRS 70-3-297.
- 147 "Housing Project Helps Local Industries Broaden Know-How," *SCMP*, January 5, 1968, 12.
- 148 "Estate Stage 1 by July," *Hongkong Star*, May 19, 1969; "Flats for 80,000," *China Mail (CM)*, May 21, 1969, both in HKRS 70-3-297.
- 149 Ronnie Poon, "\$440m Housing Project for Kowloon," *CM*, July 13, 1966; "Multi-million \$ Housing Plan at Laichikok," *Hongkong Standard*, July 14, 1966, both in HKRS 70-3-297. 同誌參見 "Mei Foo: The \$700m Giant

- 150 Takes Shape," CM, February 25, 1974, in HKRS 70-7-36-1.
- Sherry Rosen, *Mei Foo Sun Chuen: Middle-Class Chinese Families in Transition* (Taipei: Chinese Association for Folklore, 1976), 2-4, 7, 9, 15-17.
- 151 "New Land, New Cities," *Mobile Overview 1*, no. 3 (Winter 1977-1978), in EHMCC, Box 2.207/E173, Folder 2, BCAH, UT Austin.
- 152 David R. Meyer, "Hong Kong's Enduring Global Business Relations," in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ed.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Hong Kong: HKU Press, 2016), 68. 關於種種挑戰，參見"Hong Kong's Textile Industry—When Will the Slump End?" *AmCham* 6, no. 1 (January 1975): 7-9.

第六章

- 1 *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0*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61), 42.
- 2 *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70* (Hong Kong: Hong Kong Government Press, 1971), 16.
- 3 參見Alice H. Amsden, *The Rise of the "The Rest": Challenges to the West from Late-Industrializing Economie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Meredith Woo-Cummings, ed., *The Developmental State*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 Chalmers Johnson, *MITI and the Japanese Miracle: The Growth of Industrial Policy, 1925-1975*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 4 例如，參見Milton and Rose Friedman's ten-part television series *Free to Choose* (1980). 同前參見Milton

- 5 Friedman, "The Real Lesson of Hong Kong," *National Review*, December 31, 1997.
 參見 Gary G. Hamilton, *Commerce and Capitalism in Chinese Societies* (London: Routledge, 2006); Wei-ming Tu, ed., *Confucian Traditions in East Asian Modernity: Mor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ulture in Japan and the Four Mini-Dragon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Kim Kyong-Dong, "Confucianism and Capitalism in East Asia," in *Capitalism and Development*, ed. Leslie Sklair (London: Routledge, 1994), 87–106; Gilbert Rozman, ed., *The East Asian Region: Confucian Heritage and Its Modern Adaptat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Ezra Vogel, *The Four Little Dragons: The Spread of Industrialization in East Asi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S. Gordon Redding, *The Spirit of Chinese Capitalism* (New York: de Gruyter, 1990); Tai Hung-chao, ed., *Confucian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 Oriental Alternative?* (Washington, D.C.: Washington Institute Press, 1989); Peter L. Berger and Hsin-Huang Michael Hsiao, eds., *In Search of an East Asian Development Model*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1988); Ronald Dore, *Taking Japan Seriously: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Leading Economic Issues*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6 Terutomo Ozawa, *Institutions,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in Japan—The "Flying-Geese" Paradigm of Catch-up Growth* (Northampton, Mass.: Edward Elgar, 2005); Terutomo Ozawa, *Multinationalism, Japanese Style: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Outward Dependen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藤田千雄行飛・參見 Fujio Mizuoka, "Contriving 'Laissez-Faire': Conceptualising the British colonial rule of Hong Kong," *City, Culture, and Society* 5, no. 1 (March 2014): 23–32.
- 8 Catherine R. Schenk, "The Empire Strikes Back: Hong Kong and the Decline of Sterling in the 1960s,"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57, no. 3 (2004): 570.

- 9 相關介紹請參見 David Harvey,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1990).
- 10 Robert C. Feenstra and Gary G. Hamilton, *Emergent Economies, Divergent Paths: Economic Organiza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i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 11 Helen Laville and Hugh Wilford, eds., *The US Government, Citizen Groups and the Cold War* (London: Routledge, 2006).
- 12 薩尼揚首先指出了台灣、以色列和印度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成功的教育流通。參見她的 *The New Argonauts: Regional Advantage in a Global Economy*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 13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IIE), "Part 1, Four Corners of the Earth, Where They Come From," in *Open Doors, 1950-51: Report o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al Exchange* (New York: IIE, 2005), 15. 在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學年裡，有一千零六十名學生在美國留學，七百一十一名在澳洲留學，三百二十六名在英國和愛爾蘭留學，以及一百八十名在加拿大留學。參見 *Hong Kong: Report for the Year 1960*, 113-14.
- 14 IIE, "Foreign Students: Home Country, Sex, Year Studies in U.S. Began, Financial Support. Academic Status," in *Open Doors, 1961-62*, 21; IIE, "Table I: Foreign Students: Home Country, Sex, Year Studies in U.S. Began, Financial Support, Academic Status," in *Open Doors, 1963-64*, 16-21.
- 15 參見 IIE, *Open Doors, 1973-74 and 1975-76*.
- 16 例如，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學年，香港中文大學的入學人數為二千四百三十七名，香港大學的入學人數為三千零一十二名。參見 Government Secretariat, "The Hong Kong Education System" (1981), 38, <http://www.edb.gov.hk/attachment/en/about-edb/publications-stat/major-reports/edsyse.pdf>; 香港浸會大學的入學人數為三千二百名。參見 Gordon W. Sweet, et al., *A Special Report on Hong Kong Baptist College: Prepared at the Request of*

- the Foreign Mission Board of the Southern Baptist Convention* (1975), 13, Hong Kong Baptist University Library (HKBUL).
- 17 Carter Morgan, Post Script #41, Feb. 1961, Carter Morgan Papers (CMP), RG 6, Correspondence, 1955–75, HKBUL.
- 18 Mae M.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 206.
- 19 Madeline Y.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How the Yellow Peril Became the Model Minorit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98–203.
- 20 Rosemary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Gordon Wu* (Hong Kong: Chameleon Press, 2006), 21–30.
- 21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25–26, 28, 32–33.
- 22 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二年間，大約有一萬名來自香港的合法移民。一九七〇年到一九八九年間，有二十萬九千八百一十四名移民，是總人數的三分之二。參見 Ronald Skeldon, "Emig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Pacific Affairs* 63, no. 4 (Winter 1990–91): 504.
- 23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226.
- 24 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in a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System," in *Reluctant Exiles? Migration from Hong Kong and the New Overseas Chinese*, ed. Ronald Skeldon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4), 25–26; Office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2011 Yearbook of Immigration Statistics*, "Table 2: Persons Obtaining Legal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by Region and Selected Country of Last Residence, Fiscal Years 1820 to 2011," 8, https://www.dhs.gov/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s/immigration-statistics/yearbook/2011/ois_yb_2011.pdf.
- 25 Abigail Hoffsommer, "Notes on Fellows as of April 28, 1964,"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UBCHEA), RG11A, Box 19A, Folder 240, Yale University Divinity School Library (YUDSL).

- 26 容啟東致 Abigail Hoffsommer, "U.B. Fellowship, 1963–64," January 12, 1963, UBCHEA, RG11A, Box 19A, Folder 240, YUDSL.
- 27 Abigail Hoffsommer 致容啟東, "Subject: Mr. Li Seung-ping," UBCHEA, RG11A, Box 19A, Folder 240, YUDSL.
- 28 李迥平致 Abigail Hoffsommer, January 25, 1965; Hoffsommer 致李迥平, February 1, 1965; 史丹利 C. 米勒, Jr. 致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委員會, "Report or Faculty Adviser," all in UBCHEA, RG11A, Box 19A, Folder 240, YUDSL.
- 29 Abigail Hoffsommer 致 Stanley C. Miller, Jr., January 18, 1965, UBCHEA, RG11A, Box 19A, Folder 240, YUDSL.
- 30 "Award of Government Bursaries at Chinese Post-Secondary Colleges, 1962" (43-1); and "Award of Government Scholarships at Chinese Post-Secondary Colleges, 1962," both in Hong Kong Record Series (HKRS) 147-1-14.
- 31 Leslie G. Kilborn 致教資局, November 28, 1962, HKRS 147-1-14.
- 32 馮順創致教資局, December 7, 1962, HKRS 147-1-14; 匡哲參照 News from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National Academy of Engineering Elects 64 Members and Nine Foreign Associates," February 9, 2007, <http://www.nationalacademies.org/onpinews/newsitem.aspx?RecordID=02092007>.
- 33 例如：參照 Zee Yun-Cheng 致教資局, March 17, 1964 (190); C. H. Mak 致 Zee Yun-cheng, March 24, 1964 (191); Zee Yun-Cheng 致 C. H. Mak, April 4, 1964 (202); Chan Ka-kong 致 C. H. Mak, April 14, 1964 (206); Lum Kin-kwong 致教資局, April 29, 1964 (209); Ng Yiu-qwing 致 C. H. Mak, May 19, 1964 (222), all in HKRS 147-1-17.
- 34 參照 M.17, N. C. Fong, "Mr. MEI Wai-kwok," December 2, 1963, HKRS 147-1-17.
- 35 Nieh Chung-yit 致 C. H. Mak, December 9, 1962; Nieh Chung-yit 致 C. H. Mak, December 13, 1962 (78); C. H. Mak 致高等教育學院藥學全國藥學全誌編輯會, December 28, 1962 (91), all in HKRS 147-1-14.

- 36 Nieh Tsung-kong 謝 C. H. Mak, December 27, 1962 (82), HKRS 147-1-14.
- 37 Nieh 謝 Mak, December 9, 1962, 2, HKRS 147-1-14.
- 38 Nieh Chung-yit 謝敬恆 同長, "Repayment of Bursary," (226), HKRS 147-1-14. 同誌參照 "Rice University, Fifty-ninth Commencement Exercises: Candidates for Degrees, Doctor of Philosophy," May 20, 1972, <http://scholarship.rice.edu/bitstream/handle/1911/61712/wrc01146.pdf?sequence=1>.
- 39 "Training Hong Kong's Future Leaders," *AmCham* 7, no. 7 (July 1976): 53-55.
- 40 "In Some Small Way," *AmCham* 9, no. 2 (February 1978), 27; III, *Annual Report, 1973*, 23.
- 41 一九七一年至一九八九年間，六萬五千三百四十二名香港學生在英國留學，六萬一千七百五十名在加拿大留學，以及五萬三千七百零九名在美國留學。參見 Ronald Skeldon, "Emig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Pacific Affairs* 63, no. 4 (Winter 1990-91): 511.
- 42 Eric Fong, "Return Migration from Canada to Hong Kong," *China Review* 12, no. 1 (Spring 2012): 33-35; Skeldon, "Emigration and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522.
- 43 Andy Chih-ming Wang, *Transpacific Articulations: Student Migr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Asian Americ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3), 52.
- 44 "Chamber Events: Hong Kong,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mCham* 21, no. 6 (June 1990): 83.
- 45 P. C. Lee, ed., *Hongkong Album*, 5th ed. (Hong Kong: Sin Poh Amalgamated, 1967), HKUSC.
- 46 H. C. Ting, *Truth and Facts: Recollections of a Hong Kong Industrialist* (Hong Kong: Kader Industrial, 1974), 46-66, 96.
- 47 「本港製品銷美前途樂觀，開達廠丁熊照透露玩具銷美數量猛增，且以獲得代理權為榮，」 *Wah Kiu Yai Po* (WKYP), January 25, 1956, 7.

- 48 「港美合作設廠先聲，美國玩具大王洛易馬克斯訪港，與開達實業公司洽商合作設廠。」 *WKYP*, July 15, 1957, 6.
- 49 Ting, *Truth and Facts*, 96.
- 50 「丁熊照等飛日考察。」 *WKYP*, May 16, 1959, 9.
- 51 「丁熊照伉儷環遊世界考察工業。」 *Kong Sheung Yai Po (KSYP)*, July 9, 1962, 7; 「圖：丁熊照夫婦環遊世界與公子鶴壽夫婦及康樂攝於機場。」 *WKYP*, July 9, 1962, 8; 「丁熊照返港談，歐美龐大工廠，有如一個城市。」 *Kong Sheung Wan Bo (KSWP)*, September 25, 1962, 4.
- 52 Ting, *Truth and Facts*, i-vii.
- 53 「丁熊照次公子由美學成返港，獲工商管理優異獎。」 *KSWP*, February 2, 1960, 4.
- 54 Ting, *Truth and Facts*, ix, 16-17, 22, 33-35, 84-85.
- 55 「丁午壽王雲心結婚。」 *KSYP*, May 4, 1969, 6; 「丁午壽王雲心大喜。」 *WKYP*, May 4, 1969, 7.
- 56 Ting, *Truth and Facts*, 119-20.
- 57 參見 Kader Holdings Company Limited, 「開達集團有限公司：更換主席，辭任非執行董事，更換董事總經理及委任非執行董事。」 1, http://www.kader.com/investor_relations/pdf/press_100630c.pdf, 訪問於二〇一八年六月十八日。
- 58 「如雲號抵紐約，中美人士歡迎，董浩雲獲贈紐約市金鑰。」 *WKYP*, February 24, 1962, 3.
- 59 「南來華僑印象記，董浩雲『東亞巨人』」 *WKYP*, April 27, 1962, 8.
- 60 參見 Yuen Ren Chao Papers, Carton 5, Folder 74, and Carton 8, Folder 102,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 61 Cliff Buddle, "Hong Kong's First Chief Executive Tung Chee-hwa Takes a Trip Down Memory Lane," *SCMP*

- 62 *Magazine*, July 2, 2017, <http://www.scmp.com/magazines/post-magazine/hong-reads/article/2100528/hong-kongs-first-chief-executive-tung-chee-hwa>.
- 63 "Shipping Tycoon, at Ease in U.S., to Govern Hong Kong for China,"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1996, A1; "New Hong Kong Leader Says His Kids Hold US Passports," *Chicago Tribune*, July 2, 1997, http://articles.chicagotribune.com/1997-07-02/news/9707030210_1_hong-kong-tung-passports.
- 64 Stephen Vines, "Profile: Tung Chee-hwa; China's secret weapon," *Independent*, November 24, 1996,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profile-tung-chee-hwa-chinas-secret-weapon-1354010.html>.
- 65 "3 Are Attendants of Shirley Tung at Her Marriage: Senior at NYU, Bride of John Y. K. Peng at Notre Dame Church," *New York Times*, July 19, 1964, 63; "Spring Nuptials for Miss Tung,"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8, 1970, 96; "Proud Sibling Plays to Gallery,"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December 13, 1996, 2.
- 66 William Armbruster, "Gala Marks 50th Anniversary of Containerization," *Canadian Sailings*, May 29, 2006, 7; J. R. Wachtel, "American Merchant Marine in Hong Kong," *AmCham* 8, no. 8 (August 1977): 17–18.
- 67 Howard Winn, "How Containers Made the World Smaller and Its Economy Bigger," *SCMP*, November 25, 2014, <http://www.scmp.com/business/article/1647905/how-containers-made-world-smaller-and-its-economy-bigger>.
- 68 關於該課題最早的主要研究之一，參見 Walter Adams, ed., *The Brain Drain* (New York: Macmillan, 1968).
- 69 Hsu, *The Good Immigrants*, 202.
- 70 *Open Doors*, 1958, 11. 例如，參見「美國銀行陳旭權升主任」，*WKYP*, May 5, 1971, 4.
- 71 Annalee Saxenian, *The New Argonauts: How the Regional Advantage: Culture and Competition in Silicon Valley and Route 128*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 72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125–26.

- 72 Stephen Chiu and Tai-lok Lui, *Hong Kong: Becoming a Chinese Global Ci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67–69.
- 73 Frank Ching, *The Li Dynasty: Hong Kong Aristocrats*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90–94.
- 74 Y. C. Jao,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and the Ordeal of Hong Kong* (Westport, Conn.: Greenwood, 2001), 47–48.
- 75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48–49.
- 76 「董事會主席報告」 (Chairman's Statement), in 恆隆有限公司, 一九七二—七三年年報, *Hang Lung Development Company, Limited, Annual Report 1972–73* (August 1973), 8, HKUSC; "Li & Fung Limited, Announcement," April 18, 1973, in 永豐 Li & Fung Ltd. (1974), HKUSC.
- 77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41–45, 36, 48–49. 同前參見 "Hopewell Holdings Limited, 合和實業有限公司," August 8, 1972, 6–13, https://www.hopewellholdings.com/eng/images/about_us/milestones/HHL_AU_Prospectus_1972.pdf.
- 78 "Ka Wah Bank Standing Tall in Hong Kong," *Euromoney* (June 1984): S1–S16.
- 79 關於利豐的華文歷史・參見 Robin Hutcheon (合時四), *A Burst of Crackers: The Li & Fung Story* (錦繡濠天・利豐發展的道路)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關於馮氏的商業哲學・參見 Victor Fung, William Fung, and Yoram (Jerry) Wind, *Competing in a Flat World: Building Enterprises for a Borderless World* (Upper Saddle River, N.J.: Pearson Education, 2008).
- 80 Victor K. Fung, "Forward," in Feng Bang-yan, *100 Years of Li & Fung: Rise from Family Business to Multinational* (Singapore: Thomson Learning, 2007), xiv–xvi.
- 81 參見 Victor Zheng 和黃紹倫 "Network Capital and the Li & Fung Group in Hong Kong: Four Generations of Incultation and Inheritance," in *Rethinking Social Capital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Greater China: Is Guanxi Still Important?*, ed. Jenn-Hwan Wang and Ray-May Hsung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95–126; 參見 Jean Li

- Rogers 的採訪，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 82 Feng, *100 Years of Li & Fung*, 5, 7, 8–10, 34–35. 另舉一個例子，請留意此書中「非美國」紡織集團的成立，1986: 利豐集團 (Li & Fung: Advancing with the Times for 80 Years) (1986), 12–13, HKUSC.
- 83 Feng, *100 Years of Li & Fung*, 12.
- 84 Feng, *100 Years of Li & Fung*, 22–24.
- 85 Hutcheon, *A Burst of Crackers*, 22.
- 86 Feng, *100 Years of Li & Fung*, 28–30; 利豐·一九七六年仲冬，香港 (Li & Fung Limited: For 70 Years a Part of Hong Kong's Success) (1976), 7, HKUSC.
- 87 "HK Newlyweds Back," *SCMP*, August 2, 1969, 6.
- 88 William Fung, April 9, 2014, <http://www.princeton.edu/fungforum/about/william-fung/>.
- 89 Robyn Meredith, "At the Crossroads," *Forbes* 177, no. 8 (April 17, 2006): 45–48.
- 90 Joan Magretta, "Fast, Global, and Entrepreneurial: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Hong Kong Styl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 (September–October 1998): 104.
- 91 Feng, *100 Years of Li & Fung*, 42–44, 45–48, 52, 56–58.
- 92 Magretta, "Fast, Global, and Entrepreneurial," 104–5.
- 93 Feng, *100 Years of Li & Fung*, 106, 109.
- 94 「美徵附稅英將徵稅，港紡織品勢受影響，英資聯業紡織團將派員去考察，」*Ta Kung Pao (TKP)*, September 9, 1971, 6.
- 95 「適應國際生產水準，聯業紡織精益求精，去年貿易投資金額六千萬，」*KSWP*, May 28, 1973, 6.
- 96 「紡織業面臨困境盈益仍增百分之三，垂直式綜合性企業聯業紡織保持平穩，」*KSWP*, September 17, 1973, 6.

- 97 "Chinese Press Comments," *SCMP*, June 6, 1984, 22; Bosworth Dewey, "Opening Up New Frontiers," *SCMP*, July 10, 1989, 7.
- 98 「世界貿易困難無解決良策，紡織業一年內難望好轉，聯業紡織公司董事會在報告中有此看法。」*TKP*, September 3, 1974, 4.
- 99 Shu-Ching Jean Chen, "Staying Close to Roots, Lees of Hong Kong Restored a Garment Leader," *Forbes Asia*, November 2016. <https://www.forbes.com/sites/shuchingjeanchen/2016/11/21/staying-close-to-roots-lees-of-hong-kong-restored-a-garment-leader/#64beb9e463e6>.
- 100 「聯業紡織公司協議計劃通過。」*TKP*, December 7, 1978, 10.
- 101 Milton Friedman, "A Friedman Doctrine—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f Business Is to Increase Its Profits,"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13, 1970.
- 102 "Women at Work—a Diversity of Talents," *AmCham* 8, no. 5 (May 1977): 18–19.
- 103 Penny M. Von Eschen, "Globalizing Popular Culture in the 'American Century' and Beyond," *OAH Magazine of Identity* 20, no. 4 (July 2006): 56–63.
- 104 Carla Lane, "Tang Family Gives \$4.7 Million to MIT," *MIT Tech Talk* 37, no. 20 (January 27, 1993), <http://newsoffice.mit.edu/1993/tang-0127>.
- 105 「胡應湘百萬美元，贈普林斯頓每校，資助聘請中國文化教授。」*WKYP*, October 26, 1981, 32; Karen W. Arenson, "Hong Kong Builder, Graduate of Princeton, Gives It \$100 Million,"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0, 1995, B1.
- 106 Phanindra V. Wunnava and Albert A. Okunade, "Do Business Executives Give More to Their Alma Mater? Longitudinal Evidence from a Large University,"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72, no. 3 (July

2013): 765.

107 Aihwa Ong, *Flexible Citizenship: Cultural Logics of Transnationalit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9),

107.

108 關於精英機構逐漸增加的捐款，參見 Josh Lerner, Antoinette Schoar, and Jialan Wang, "Secrets of the Academy:

The Drivers of University Endowment Succes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2, no. 3 (Summer 2008): 207–22.

第七章

1 本章大部份內容首次出現於 *Twentieth-Century China* 43, no. 1 (January 2018): 67–88. Copyright © 2018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Journal. 由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出版。

2 上海市紡織品進出口有限公司創立於一九五七年，但如今登記為東方國際集團上海市紡織品進出口有限公司。參見 China Chamber of Commerce for Import and Export of Textile and Apparel, <http://www.ccet.org.cn>.

3 Feng Bang-yan, *100 Years of Li & Fung: Rise from Family Business to Multinational* (Singapore: Thomson Learning, 2007), 59–60.

4 Tim Williams, "U.S.-China Trade," *AmCham* 9, no. 10 (October 1978): 12.

5 參見 Elizabeth Perry and Christine Wong, ed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form in Post-Mao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1985), 2; Ezra Vogel, "China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ization Model," in *Chinese Economy Policy: Economic Reform at Midstream*, ed. Bruce Reynolds (New

- York: Paragon House, 1988), 10; Stuart Schram, "China After the Thirteenth Congress," *China Quarterly* 114 (June 1988); Nyaw Mee-kau,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Trends,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Prospects," *China Review* (1993): 16.2; Yingyi Qian, "The Process of China's Market Transition, 1978–1998: The Evolutionary, Historical, an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in *China's Deep Reform. Politics in Transition*, ed. Lowell Dittmer and Guoli Liu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2006), 231; Yue-man Yeung, "China's Openness and Reform at 30: Retrospect and Prospect," *China Review* 9, no. 2 (Fall 2009): 157–67; Li Lanqing, *Breaking Through: The Birth of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trans. Ling Yuan and Zheng Siy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4.
- 6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1.
- 7 Resolution on Party History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81), 47–73. 回註參見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96–97.
- 8 總設計師或“chief designer.”在完全相反的另一端，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學家吳敬璉認為，毛澤東在一九五六一至一九五八年進行的行政權力下放應該作為中國「改革」的起點。參見 Jinglian Wu, *China's Long March Toward a Market Economy* (San Francisco: Long River Press, 2005), 9–23.
- 9 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 (Beijing: Zhongguo shidai jingji chubanshe, 2010), 470–72.
- 10 Mark Selden, "China, Japan and the Reg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East Asia, 1945–1995," in *Network Power: Japan and Asia*, ed. Peter J. Katzenstein and Takashi Shiraishi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306–40.
- 11 Dali L. Yang, *Calamity and Reform in China: State, Rural Society,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Since the Great Leap Famin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149–79.
- 12 Wu, *China's Long March*, 23–24;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40.

- 13 Kazushi Minami, "Re-examining the End of Mao's Revolution: China's Changing Statecraft an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1973–1978," *Cold War History*, September 27, 2016, <https://tandfonline.com/doi/full/10.1080/14682745.2016.1218473>.
- 14 Barry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Chinese Economic Reform, 1978–199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5), 67–74.
- 15 Ezra F. Vogel,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229.
- 16 Herbert L. Minich, "American Business in Hong Kong," *AmCham* 6, no. 2 (February 1975): 13–15.
- 17 "Transition to China's New Era," *AmCham* 8, no. 11 (November 1977): 8.18. Vogel, *Deng Xiaoping*, 221.
- 18 Vogel, *Deng Xiaoping*, 221.
- 19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0 Robert L.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3), 18.
- 21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194–95.
- 22 William C. Kirby, "China's Internationalization in the Early People's Republic: Dreams of a Socialist World Economy," *China Quarterly* 188 (December 2006): 872.
- 23 Chen Jian, *China's Road to the Korean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
- 24 John Parke Wright, "Canton and the China Trade," *AmCham* 9, no. 11 (November 1978): 21–24. John Kamm, "In Guangzhou for Good, Running an Office in Guangzhou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AmCham* 12, no. 10 (October

- 1981): 6–7.
- 25 Tareq Y. Ismael,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nd Africa,"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9, no. 4 (December 1971): 514–15, 522; Kenneth Wang, "Foreign Trade Policy and Apparatu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aw and Contemporary Problems* 38, no. 2 (Summer–Autumn 1973): 182–200.
- 26 W. K. Szeto, "Guangzhou Fair Perspective," *AmCham* 11, no. 1 (January 1980): 16.
- 27 Priscilla Roberts and John M. Carroll, eds., *Hong Kong in the Cold War* (Hong Kong: HKU Press, 2016). 參考見 "H-Diplo Roundtable Reviews" 18, no. 29 (2017) 廿九號, <https://networks.h-net.org/node/28443/discussions/183002/h-diplo-roundtable-xviii-29-hong-kong-cold-war>.
- 28 Yun-wing Sung,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China's Export Dr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5 (January 1986): 85; Catherine Schenk, *Hong Kong as an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r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1945–1965* (London: Routledge, 2002), 157.
- 29 Peter E. Hamilton, "Pop Gingle's Cold War," in *Pacific America: Histories of Transoceanic Crossings*, ed. Lon Kurashige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7).
- 30 "U.S.-China Trade in Retrospect: Amcham's Role," *AmCham* 6, no. 10 (October 1975): 23–24.
- 31 參見一號一〇一四廿九日，廿 Edwin Moise，Brian Hilton 與 Robert Jervis 之國際關係史 H-Diplo 雜誌，<https://networks.h-net.org/node/28443/discussions/40045/h-diplo-frus-review-us-department-state-foreign-relations-united>。
- 32 同前參見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77–1980*, vol. 13: China (Washington, D.C.: Bureau of Public Affairs, Office of the Historian, 2013).
- Christopher H. Phillips, "The Next Five Years in Our Trade with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mCham* 7, no. 6 (June 1976): 29.

- 33 Robin Hutcheon (魯達遜), *A Burst of Crackers: The Li & Fung Story* (張繼振天... 利豐發展的歷程)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92), 39,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y, Special Collections (HKUSC).
- 34 徐明 Kin-ming Liu, ed., *My First Trip to China: Scholars, Diplomats and Journalists Reflect on their First Encounters with China* (Hong Kong: East Slope Publishing, 2012).
- 35 Randall E. Stross, *Bulls in the China Shop: And Other Sino-American Business Encounters*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1), 27–28; Richard D. Lyons, "China Developing Satellite Link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1973, 9.
- 36 "Expanding PRC Oil Sales in Hong Kong," *AmCham* 7, no. 6 (June 1976): 5–7.
- 37 "Sales Open Bamboo Curtain," *Mobil World* (November 1973), 7, ExxonMobil Historical Collection (EMHC), Box 2.207/E172, Folder "Asia, China, News Articles," Briscoe Center for American History (BCAH), UT Austin.
- 38 John Parke Wright, "Canton and the China Trade," *AmCham* 9, no. 11 (November 1978): 24; "HAECO: Hong Kong Excels at Aviation Engineering," *AmCham* 7, no. 2 (February 1976): 10–11.
- 39 Michael Morrow, "Hong Kong Center for China Oil," *AmCham* 10, no. 10 (October 1979): 29–30.
- 40 Stross, *Bulls in the China Shop*, 28.
- 41 Jack Kaikati, "The Reincarnation of Barter Trade as a Marketing Tool," *Journal of Marketing* 40, no. 2 (April 1976): 17–24.
- 42 Li, *Breaking Through*, 221–25.
- 43 Alex A. Blum, "China's Textile Trade with America," *AmCham* 10, no. 10 (October 1979): 24.
- 44 David DeVoss, "A Modern China Trader: In the Steps of Marco Polo, Hong Kong Exporter Alex Blum Swaps California Chardonnay for Chinese Silk," *Los Angeles Times*, November 10, 1985,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85-11-10-tm-3430-story.html>.

- 45 "Alex Blum: Westerner Established Trade Links with Mainland China," *Los Angeles Times*, October 23, 1993, <https://www.latimes.com/archives/la-xpm-1993-10-23-mn-48681-story.html>.
- 46 Anita Li,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AmCham* 12, no. 10 (October 1981):21-23.
- 47 Alan Lau, "Compensation Trade Inside View," *AmCham* 11, no. 1 (January 1980):19-20.
- 48 Szeto, "Guangzhou Fair Perspective," 15-17.
- 49 Stross, *Bulls in the China Shop*, 3-22. 區世榮 Tom Gorman, "In the Shadow of the Canton Trade Fair," *AmCham* 16, no. 3 (March 1985): 63.
- 50 James A. Brunner and George M. Taoka, "Marketing and Negotiating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Perceptions of American Businessmen Who Attended the 1975 Canton Fai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8, no. 2 (Autumn-Winter 1977): 70.
- 51 Melvin Searls, "Two Way Trade," *AmCham* 9, no. 4 (April 1978): 19-21.
- 52 Jack Chi-Chien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田 Carolyn Wakeman 於一九九九年進行的口述歷史 -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3, 71, 105; Rosemary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Gordon Wu* (Hong Kong: Chameleon Press, 2006), 58-59.
- 53 "Sales Open Bamboo Curtain," *Mobil World* (November 1973): 7, EMHC, Box 2.207/E172, "Asia, China, News Articles," BCAH.
- 54 "Amcham Receives Warm Reception at Kwangchow Fair," *AmCham* 6, no. 6 (June 1975): 13-15.
- 55 "AmCham Delegation Attends Kwangchow Trade Fair: A Round-Up of China-Related Activities," *AmCham* 5, no. 11 (November 1974): 15.

- 56 "Chinese Trade and Industrialization," *AmCham* 5, no. 11 (November 1974): 18–19; "AmCham's China Seminar Highly Successful," *AmCham* 5, no. 12 (December 1974): 16–19.
- 57 "AmCham Events: Unanimous Approval," *AmCham* 8, no. 8 (August 1977): 23.
- 58 Searls, "Two Way Trade," 19.
- 59 John Kamm, "Reforming Foreign Trade," in *One Step Ahead in China: Guangdong Under Reform*, ed. Ezra Vogel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344–46.
- 60 Kamm, "In Guangzhou for Good," 9.
- 61 Thomas D. Gorman. Keynote Address, Global China Connection Conference, Princeton University, February 12, 2011.
- 62 Li, *Breaking Through*, 211.
- 63 "Doing Business with China: A View from Peking," *AmCham* 5, no. 12 (December 1974): 25.
- 64 例如，參見 "AmCham Delegation Attends Kwangchow Trade Fair," 15–17.
- 65 John Kamm, "*My First Trip to China*," Shanghaied at the Feather and Down Minifair, "*Hong Kong Economic Journal*, April 2, 2011, <http://forum.hkej.com/node/65488>.
- 66 作者與 Thomas D. Gorman 的採訪，Hong Kong, October 22, 2012.
- 67 *American Industrial Report* advertisement, *AmCham* 11, no. 4 (April 1980): 16.
- 68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28–29.
- 69 "US Chamber to Have Talks at Consulate," *SCMP*, August 28, 1970, HKRS 70-6-210-1.
- 70 John Wolf, "The First Five Years of Our Chamber," *AmCham* 5, no. 3 (March 1974): 5–6; "Appreciation Expressed to Henry M. Sperry," *American Chamber of Commerce Newsletter* 4, no. 2 (February 1973): 3, HKUSC.

- 71 "Membership Target Achieved—Congratulations!" *AmCham* 5, no. 1 (January 1974): 17; "Meet Our New Members," *AmCham* 6, no. 6 (June 1975): 29.
- 72 "Committee Corner," *AmCham* 8, no. 3 (March 1977): 27.
- 73 "Chamber Events and Pictures: New Directory," *AmCham* 7, no. 12 (December 1976): 31.
- 74 "Labor Relations," *AmCham* 11, no. 1 (January 1980): 39.
- 75 關於鄭明訓 - 參見 "Meet Our New Members," *AmCham* 8, no. 4 (April 1977): 35; James W. Sweitzer, "President's Column," *AmCham* 11, no. 2 (February 1980): 2. 關於馮國經 - 參見 "Meet 1983 Officers and Board," *AmCham* 14, no. 1 (January 1983): 11.
- 76 Michael Emmons, "Mutuality of Commercial Interest," *AmCham* 9, no. 1 (January 1978): 5.
- 77 Kayser Sung, "My Views on MFA III," *AmCham* 11, no. 6 (June 1980): 10–13.
- 78 "A Tour de Force: The Textile Committee," *AmCham* 9, no. 1 (January 1978): 13.
- 79 Alex A. Blum, "President's Column," *AmCham* 12, no. 10 (October 1981): 2; "Prevocational School Update," *AmCham* 16, no. 11 (November 1985): 11.
- 80 關於另一個例子 - 參見 Paulus W. K. Chan, "Letters to Amcham: Promoting Prosperity," *AmCham* 7, no. 12 (December 1976): 35.
- 81 "How We Help or Hurt Each Other: Taipans View the American Presence," *AmCham* 8, no. 1 (January 1977): 11–15.
- 82 W. R. A. Wyllie, "How Can a Hong Say No" *AmCham* 11, no. 7 (July 1978): 28.
- 83 Dorothy Liu Yiu-chu, "International Trade Law and the PRC," *AmCham* 7, no. 9 (September 1976): 19–23.
- 84 T. C. Chan, "Letters to Amcham: Disagreement," *AmCham* 7, no. 10 (October 1976): 35.
- 85 Li, *Breaking Through*, 258.

- Francis G. Martin, "President's Column," *AmCham* 14, no. 9 (September 1983): 9.
- Tom Gorman, "AmCham's Role in a Changing China Trade Climate," *AmCham* 11, no. 10 (October 1978): 15.
- "Transition to China's New Era," *AmCham* 8, no. 11 (November 1977): 8.
- "The Legal System in the PRC," *AmCham* 7, no. 5 (May 1976): 11–13; "Legal Seminar," *AmCham* 7, no. 5 (May 1976): 35.
- Brunner and Taoka, "Marketing and Negotiating," 72, 74.
- "AmCham's China Seminar Highly Successful," *AmCham* 5, no. 12 (December 1974): 16–17.
- "AmCham's PRC Posture—'Friendship, Patience and Trade,'" *AmCham* 7, no. 6 (June 1976): 19–21.
- "A Round-Up of Committee Activities," *AmCham* 7, no. 4 (April 1976): 36.
- "AmCham's PRC Posture," 19.
- "AmCham Events: Foreign Trade," *AmCham* 11, no. 10 (October 1978): 30.
- Michael L. Emmons, "President's Column: 1978 Fall Canton Trade Fair," *AmCham* 9, no. 10 (October 1978): 2.
- 關於中美貿易全國委員會 - 參見 Christian Talley, *Forgotten Vanguard: Informal Diplomacy and the Rise of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1972–1980* (Notre Dame, Ind.: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18).
- Melvin W. Searls, Jr., "The Outlook Is Good," *AmCham* 8, no. 2 (February 1977): 7–10.
- 美國駐北京聯絡處喬治布殊致香港總領事館 - "Exxon Negotiations with PRC," December 24, 1974, Wikileaks.
- 美國駐香港領事館致國務院 - "Reception for NCUST Vice President Searls," October 23, 1975, Wikileaks.
- "Exit and Enter: AmCham Bids Farewell to Stanley Young and Welcomes Bill Mortson," *AmCham* 8, no. 8 (August 1977): 5.
- 參見 "Executive Committee, 1991: Lyn W Edinger," *AmCham* 22, no. 2 (February 1991): 47.

- 103 James W. Sweetzer, "President's Column," *AmCham 11*, no. 5 (May 1980): 2-3; Tim Williams, "CCRC 1981," *AmCham 13*, no. 2 (February 1982): 15; "Melvin Williams Searls Jr.; Commercial Envoy, 59,"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1995.
- 104 "Coming Events," *AmCham 7*, no. 10 (October 1976): 44; "Sluggish Growth," *AmCham 8*, no. 12 (December 1977): 36; "AmCham Events: Cautious Prediction," *AmCham 9*, no. 1 (January 1978): 31.
- 105 Tom Gorman, "Seminar in Canton," *AmCham 10*, no. 10 (October 1979): 36-37; "All About Trade," *AmCham 10*, no. 10 (October 1979): 27; "Hunan Delegation," *AmCham 10*, no. 11 (November 1979): 30.
- 106 Michael L. Emmons, "President's Column: Washington Trip," *AmCham 9*, no. 6 (June 1978): 3.
- 107 "AmCham Events: VIP Breakfast," *AmCham 9*, no. 9 (September 1978): 30.
- 108 Brunner and Taoka, "Marketing and Negotiating," 75.
- 109 "A Slow Upturn in 1976," *AmCham 7*, no. 2 (February 1976): 5-8.
- 110 Vogel, *Deng Xiaoping*, 219.
- 111 Gewirtz, *Unlike Partners*, 36.
- 112 Vogel, *Deng Xiaoping*, 224.
- 113 「招商局昨舉行酒會，介紹副董事長張庚。」 *TKP*, November 2, 1978, 4. 關於招商局，參見 Anne Reinhardt, *Navigating Semi-Colonialism: Shipping, Sovereignty, and Nation-Building in China, 1860-1937*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8).
- 114 Victor F. S. Sit, "Hong Kong: The China Trade Base," *AmCham 13*, no. 9 (September 1982): 34; 區燕金 Li, *Breaking Through*, 186-92.
- 115 Min Ye, "Policy Learning or Diffusion: How China Opened to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Journal of East Asian*

- Studies* 9, no. 3 (September–December 2009): 410.
- 「鄧小平李先念副主席會見，華僑港澳同胞旅行團。」TKP, September 30, 1978, 1.
- 116 Jeffrey S. Muir, "Shenzhen: Guangdong's New Town in the Making," *AmCham* 15, no. 6 (June 1983): 39–41.
- 117 關於袁庚和蛇口，參見 Mary Ann O'Donnell, "Heroes of the Special Zone: Modeling Reform and Its Limits," in
- 118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ed. Mary Ann O'Donnell,
-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46–50.
- 119 Muir, "Shenzhen," 40.
- 120 關於羅英東，參見 Rosalie L. Tung, *US-China Trade Negotiations: Pergamon Policy Studies on Business and*
- Economics* (Amsterdam: Elsevier, 2014), 93–96. 其翌年參見 Rick Kroos, "Hotel Projects in Beijing, Opening the
- Doors of Technology to China," *AmCham* 11, no. 8 (August 1980): 35–38; "China's Second Great Wall, America's
- Role in Building It," *AmCham* 16, no. 10 (October 1985): 20–23.
- 121 Li, *Breaking Through*, 280–86.
- 122 George H. Clyde, Jr., "China'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AmCham* 10, no. 10 (October 1979): 10–17. 關於英華
- 的進一步分析，參見 L. Crawford Brickley, "Equity Joint Ven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The Promised
- Land Is Not Yet in Sight for Foreign Investors,"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0, no. 2
- (Spring 1988): 257–303.
- 123 Timothy A. Gelatt, "Gradualism in Action,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The Legal Framework," *AmCham* 12, no. 10
- (October 1981): 48; "Investment Under China's New Joint Venture Law," *AmCham* 11, no. 1 (January 1980): 21–23.
- 124 Clyde, Jr., "China's New Foreign Investment Law," 14.
- 125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52, 73.

- 127 126 Li,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23-24.
- 130 129 128 Daniel Treftak, "Investing for the Future: Current Attitudes Toward and Developments in Foreign Investment in Guangdong," *AmCham* 14, no. 6 (June 1983): 44.
- Li, *Breaking Through*, 275-78.
- 「招商局昨舉行酒會，介紹副董事長袁庚，」 *TKP*, November 2, 1978, 4.
- 「US-China Relations, an American View from Beijing,」的照片簡明扼要地證明了這一點。 *AmCham* 16, no. 4 (April 1984): 9-13.
- 131 Tom Gorman, "Chamber President Commended," *AmCham* 11, no. 4 (April 1980): 61; "AmCham-PRC Ties Strengthening," *AmCham* (April 1980): 63.
- 132 "Fall 1979 Guangzhou Trade Fair reviewed," *AmCham* 11, no. 1 (January 1980): 24.
- 133 「管理民主化經營企業化，上海申新絲紗廠，聯合組織新公司，」 *TKP*, May 15, 1950, 7.
- 134 陳穎川，「訪問榮毅仁，」 *TKP*, June 17, 1978, 2.
- 135 「前日自北京來港探親訪友，榮毅仁昨天到本報採訪，受到本報社長費彝民熱情接待，」 *TKP*, March 13, 1979, 4; 鐘明，「榮毅仁談香港與內地合作，」 *TKP*, March 16, 1979, 3; 「榮毅仁宴工商人士，」 *TKP*, March 17, 1979, 4.
- 136 「榮毅仁昨在京答覆本報詢問，合資法適用於港澳同胞投資，」 *TKP*, July 12, 1979, 1.
- 137 「榮毅仁在港闡釋中外合資問題，透露投資公司擬在港設分公司，」 *TKP*, August 31, 1979, 1; 「榮毅仁昨離港返京，」 *TKP*, September 6, 1979, 4.
- 138 「榮毅仁招待記者介紹公司業務，首宗協議昨日簽字，」 *TKP*, October 5, 1979, 1.
- 139 「應美中貿易委會等團體邀請，榮毅仁一行赴美與美國政界工商界人士接觸，謀求促進中美經濟交往加強人

- 民友好，」*TKP*, October 7, 1979, 2.
- 「一百多家美公司參加歡迎會，榮毅仁在美談吸收外資，指出我安定局面將持續，」*TKP*, October 11, 1979, 2;
- 「榮毅仁在紐約發表談話，希望發展中美經技合作，」*TKP*, October 19, 1979, 2.
- 「在華盛頓一次午餐會上，蒙代爾會見榮毅仁，指出美中友好關係應進一步發展，國防部長布朗出席宴會，萬斯當晚會見榮毅仁，」*TKP*, October 29, 1979, 1; 「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同芝加哥第一國民銀行簽合作協議，榮毅仁並回答了記者有關中外合資經營法等問題，」*TKP*, October 31, 1979, 2.
- 「榮毅仁明天抵港，九日在美總商會午餐會演講，」*TKP*, November 7, 1979, 4.
- 「美國商會午餐會榮毅仁演講，外商投資中國，利益可獲保障，中國重視法制促進互惠目的，中外聽眾深感興趣熱鬧罕見，」*WKYP*, November 10, 1979, 5; 「應邀出席美國總商會午餐會，榮毅仁經港發表演說，談外資在華投資問題，」*TKP*, November 10, 1979, 4; "Putting You in the China Trade Picture," *AmCham 11*, no. 1 (January 1980): 12-14.
- 「榮毅仁率考察團，赴美參加研討會，煤炭交通等八部門副部長隨行，」*TKP*, May 31, 1980, 2; 「應洛克菲勒等邀請考察經濟，榮毅仁率團赴美，中國銀行行長為顧問，石油煤炭等部副部長同行，隨後將率領投資公司代表團訪加拿大，」*TKP*, June 1, 1980, 1; 「榮毅仁在紐約發表演講，中美經濟交流前景廣闊，兩國都需要發展經濟，互相合作符合共同利益，中國引進外資的方針堅定不移歡迎長短期合作，」*TKP*, June 7, 1980, 2; 「中國經濟討論會昨結束，榮毅仁在美宣布，與大通銀行合作，兩月內在北京會商具體計劃與時間表，」*TKP*, June 8, 1980, 1.
- Tung, US-China Trade Negotiations*, 39-41; Stanley J. Marcuss,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relations," *AmCham 11*, no. 8 (August 1980): 51-54; Kenneth S. Chern, "Toward a Sino-American Entente?" *AmCham 11*, no. 11 (November 1980): 53-55.

- 「榮毅仁率考察團，赴美參加研討會，煤炭交通等八部門副部長隨行。」 *TKP*, May 31, 1980, 2.
- 關於吳蘊初，參見 Parks M. Coble, *Chinese Capitalists in Japan's New Order: The Occupied Lower Yangzi, 1937–1945*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3), 175–82.
- 「吳志超應邀在中總午餐會演講，中國國際投資公司，擬發債券籌措資金。」 *TKP*, December 12, 1979, 5; 「抵董兼副總經理吳志超透露，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分公司，預計五月初開始在港營業，他昨在美國商會演講，談中美貿易將迅速增長。」 *TKP*, February 29, 1980, 4.
- 148 "Outlook for Sino-US Trade," *AmCham 11*, no. 4 (April 1980): 10–12.
- 149 Li,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22–25. 關於規例，參見 WTO, "Regulations on Special Economic Zon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pproved for Implementation at the 15th Meeting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Fif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August 26, 1980)," https://www.wto.org/english/thewto_e/acc_e/chn_e/WTAC_CCHN46_LEG_8.pdf.
- 150 Tim Williams, "Tax and Banking," *AmCham 11*, no. 11 (November 1980): 6–7.
- 151 Clark T. Randt, Jr., "China's Foreign Exchange and How to Get Your Share," *AmCham 12*, no. 5 (May 1981): 12–14.
- 152 Li,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21.
- 153 Ann Fenwick, "Equity Joint Ventures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Business Lawyer 40*, no. 3 (May 1985): 839–78. 同註參見 Li, *Breaking Through*, 136–39.
- 154 Timothy A. Gelatt, "Problems and Prospects, China's Special Economic Zones: The Regulatory Framework, Problems and Prospects," *AmCham 14*, no. 6 (June 1983): 49–50.
- 155 Li, *Breaking Through*, 143.
- 156 Li,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24–25.

- 158 "Beatrice Foods Co., China Agree to Join in Food Operations," *Chicago Tribune*, November 23, 1981, D11;
 "Beatrice and China in Joint Venture,"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24, 1981, D4; Robert M. Knight, "Chinese Make
 Partial Bow to Chinese-American Food," *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 December 24, 1981, <https://www.csmonitor.com/1981/1224/122453.html>.
- 159 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85–88, 119–27; quote on 88.
- 160 Tim Williams, "Economic Readjustment," *AmCham* 12, no. 5 (May 1981): 6–7; Stross, *Bulls in the China Shop*,
 71–75; Li, *Breaking Through*, 290–93.
- 161 Li, *Breaking Through*, 309; 關於其他經濟企業・參閱 Frank Hawke,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A New Phase,"
AmCham 15, no. 6 (June 1984): 21–23; Tung, *US-China Trade Negotiations*, 93.
- 162 Li,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22–25; Ruth L. Eliel, "The Special Economic Zones," *AmCham* 13, no. 2
 (February 1982): 18–19.
- 163 Li, *Breaking Through*, 145–47, 114.
- 164 Xianquan Xu, "Sino-US Economic and Trade Relations," in *China,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lobal Economy*, ed.
 Shuxun Chen and Charles Wolf, Jr. (Santa Monica: RAND, 2001), table 11.1, "Trade Statistics for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239; Jin Huang, "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a Changing World, 1972–1992: A Chinese Perspective,"
 81–82, M.A. thesis, Simon Fraser University, 1995.
- 165 "More Information to Avert Ill-Conceived Decisions, Suggests Wang Guang-ying," *Bulletin: A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Magazine* (November 1984): 20, HKUSC; "Meet Our New Members," *AmCham* 15, no. 7 (July 1984): 81.
- 166 "American Businessmen Are Bullish About Our Future," *Bulletin* (July 1984): 11, HKUSC.

- 167 Chu, *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 Capitalists*, 59–63; 同誌參見 Chalmers Johnson, "The Mousetrapping of Hong Kong: A Game in Which Nobody Wins," *Asian Survey* 24, no. 9 (September 1984): 887–909.
- 168 "Jardine of Hong Kong Plans Shift to Bermuda," *New York Times*, March 29, 1984.

第八章

- 1 曾有代表團於一九八二年及一九八三年與其他高級領袖會面，但不是與鄧小平會面，也并非正式討論主權移交事宜。參見 Sze-yuen Chung, *Hong Kong's Journey to Reunification: Memoirs of Sze-yuen Chu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63–67.
- 2 "Jack Tang ('Mr Textiles') Chairs the Chamber," *Bulletin, A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Magazine* (June 1984), 7–9, HKUSC. 同誌參見 "Chairman's Statement/主席報告書," *Hong Kong General Chamber of Commerce Annual Report 1984/香港總商會一九八四年度年報*, 6–20, http://www.chamber.org.hk/FileUpload/201103071430269091/1984_Annual%20_Report.pdf.
- 3 "Humiliation! Deng Turns on Umelco Three,"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June 24, 1984, 1.
- 4 Cindy Yik-yi Chu, *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 Capitalists: 1937–1997*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 5 Jack Chi-Chien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1949–1999," 由 Carolyn Wakeman 於一九九九年進行的口述歷史,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3, 96–98. 許家屯也推動了香港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代表團的採訪。參見 Chung, *Hong Kong's Journey*

- to Reunification*, 95–104.
- 6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99, 100.
- 7 關於 "quiet New England accent," 參見 "Jack Tang ('Mr Textiles') Chairs the Chamber," 7. 關於唐驥千的中文參見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00. 關於新華社對這場會面的英文紀錄, 參見 "What Deng Told Industrialists, NCNA Issues Transcript," *SCMP*, June 29, 1984, 16–17.
- 8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03.
- 9 Luke S. K. Kwong, "Refurbishing Hong Kong's Image: The 1997 Saga and Chinese Nationalism Under Deng Xiaoping," *Europ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3, no. 1 (2004), 187; 同誌參見 Leo Ou-fan Lee, *City Between Worlds: My Hong Kong* (Cambridge, Mas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22.
- 10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00. 根據新華社記載, 鄧小平提及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角色。同時參見 "Deng Stresses Stability and an Orderly Takeover," *SCMP*, June 29, 1984, 17.
- 11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89, 99.
- 12 "1254 Tang, Jack Chi Chien," Hong Kong Heritage Project (HKHP), 17.
- 13 Deng Xiaoping, "We Should Draw on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June 3, 1988, 收錄於 *The Selected Works of Deng Xiaoping*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94), 261–62.
- 14 Yun-Wing Sung, "The Hong Kong Economy Through the 1997 Barrier," *Asian Survey* 37, no. 8 (August 1997): 709, 711–12.
- 15 Paul M. F. Cheng, "Don't Forget MFN," *SCMP*, March 15, 1996, 25.
- 16 Henry Wai-chung Yeung, "The Geography of Hong Kong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in the ASEAN Region,"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27, no. 4 (December 1995): 326–27.

- 17 Michael J. Enright, Edith E. Scott, and David Dodwell, *The Hong Kong Advantage*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19–20, 71–72.
- 18 Yasheng Huang, *Capit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54.
- 19 "How We Help or Hurt Each Other: Taipans View the American Presence," *AmCham* 8, no. 1 (January 1977): 15. 註參見 Raymond K. F. Ch'ien and David W. Hamstead, "Showcase for Free Trade, American Investment in Hong Kong," *AmCham* 14, no. 7 (July 1983): 10–11.
- 20 利麟 (1976),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Special Collections (HKUSC); "The Lingnan Institute: Hong Kong's New Young Managers," *AmCham* 8, no. 8 (August 1977): 27.
- 21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99.
- 22 U.S. International Trade Commission (USITC),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 1973 to 1980: Report on Investigation No. 332–108 Under Section 332 of the Tariff Act of 1930," 3, 13, <https://www.usitc.gov/publications/332/pub1131.pdf>. 編譯於 September 23, 2018. 圖文整理・參見 Stanley J. Marcuss, "United States—China Trade Relations," *AmCham* 11, no. 8 (August 1980): 51–54.
- 23 USITC,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 15, 18, 25, 35.
- 24 Irene Brambilla, Amit K. Khandelwal, and Peter K. Scott, "China's Experience Under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 (MFA) and the Agreement on Textiles and Clothing (ATC)," 參見 *China's Growing Role in World Trade*, ed. Robert C. Feenstra and Shang-Jin Wei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345–87.
- 25 David Schlesinger, "The Cost of Export Quotas in Hong Kong," *AmCham* 18, no. 11 (November 1987): 10; David Schlesinger, "Hong Kong: Knitting Up the American Rag Trade," *AmCham* 18, no. 11 (November 1987): 9–10.

- 26 關於《多纖維協議》協定，參見 Vinod K. Aggarwal, "The Unraveling of the Multi-Fiber Arrangement, 1981: An Examination of International Regime Chang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37, no. 4 (Autumn 1983): 617-45. 關於總協定的角色，參見 Carner Robinson, "ATMI Marketing Mission to Hong Kong," *AmCham* 13, no. 7 (July 1982): 26-29;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08-9; "T254 Tang, Jack Chi Chien," HKHP, 9-10.
- 27 Nyaw Mee-kau,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Trends, Performance, Policies and Prospects," *China Review* (1993), 16.19.
- 28 Ho-fung Hung, *The China Boom: Why China Will Not Rule the World*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49.
- 29 Jeffrey S. Muir, "Shenzhen: Guangdong's New Town in the Making," *AmCham* 13, no. 6 (June 1983): 40.
- 30 關於深圳，參見 Mary Ann O'Donnell, "Heroes of the Special Zone: Modeling Reform and Its Limits," 收錄於 *Learning from Shenzhen: China's Post-Mao Experiment from Special Zone to Model City*, ed. Mary Ann O'Donnell. Winnie Wong, and Jonathan Bach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39-46.
- 31 D. R. Phillips and A. G. O. Yeh, "China Experiments with Modernisation: The Shenzhen Special Economic Zone," *Geography* 68, no. 4 (October 1983): 289-300.
- 32 Rosemary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Gordon Yu* (Hong Kong: Chameleon Press, 2006), 62-63.
- 33 「深圳特區與收港商投資，發展福田成為中心市區，面積等於五個維九龍首次期投資計劃，雙方所簽合同，並和兩區分別講話。」 *Ta Kung Pao* (TKP), November 24, 1981, 4.
- 34 「在東京會議前應相同協議，胡此行討論建廣深南連公路谷牧讚揚港胞支持特區建設。」 *TKP*, December 9, 1981, 1. Shingping baron Y. K. Pao was also meeting with Deng that day: 「張小平會見巴一重。」 *TKP*, December 9, 1981, 1.

- 35 「趙紫陽會見胡應湘，對建廣深高速公路計劃表支持。」 *TKP*, December 10, 1981, 1.
- 36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62–63.
- 37 「廣深高速公路八五年底完成，胡應湘談明年開發深圳福田區新區將建現代化城市合同期限卅年。」 *TKP*, December 13, 1981, 1.
- 38 「合和投資廿四億，合約為期三十年，穗深拱240公里高速路，胡應湘謂三年可建成。」 *TKP*, December 15, 1981, 4.
- 39 「任仲夷及梁靈光會見港商胡應湘，對合建中國大酒店表示滿意。」 *TKP*, March 12, 1981, 4.
- 40 「由馮景禧及胡應湘陪同，大衛·洛克菲勒等，昨參觀蛇口深圳，受深圳市長梁湘熱情接待。」 *TKP*, April 10, 1982, 4.
- 41 「胡應湘陪日商訪深圳，乘汽車觀察廣深公路，抵穗後受到梁尚立副市長歡迎。」 *TKP*, April 22, 1982, 3; 「胡應湘陪同日財團代表，訪問深圳市抵廣州，考察興建高速公路。」 *Wah Kiu Yai Po (WKYP)*, April 22, 1982, 2.
- 42 「聯合委員會昨在穗成立，廣深珠建高速公路，正加速可行性研究，粵交通廳長李牧和胡應湘任聯合委員正副主任。」 *TKP*, June 30, 1982, 2; 「與建廣深珠高速公路，聯合委員會成立，胡應湘任副主任。」 *WKYP*, June 30, 1982, 2.
- 43 「任仲夷等晤胡應湘，說特區大原則不變，某些小調整是為更好前進不要打退堂鼓。」 *TKP*, August 19, 1982, 1.
- 44 「合和總經理胡應湘稱，深穗高速公路，面臨收地困難，福田新市計劃亦有問題待解決。」 *TKP*, November 26, 1982, 6.
- 45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61.
- 46 「趙紫陽谷牧在北京會見胡應湘鄭裕彤。」 *TKP*, December 10, 1982, 1.
- 47 「招待首都經濟人士，胡應湘昨舉行宴會，表示對合作有信心，廖承志谷牧胡子昂等出席宴會。」 *TKP*.

December 11, 1982, 2.

- 48 「胡應湘調趙紫陽表示，九七年後收回主權，港可保留現行制度。」 *Kong Sheung Yat Po (KSYP)*, December 16, 1982, 8; 「胡應湘訪中國歸來講稱，一九九七年之前，中國不會收主權。」 *Wah Kiu Yat Po (WKYP)*, December 16, 1982, 5.

49 「主樓高五十層明年五月落成，華潤新大廈昨天平頂。」 *TKP*, December 29, 1982, 4.

50 Chung, *Hong Kong's Journey to Reunification*, 39–43.

51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88.

52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64–65.

53 「參與建設的發展商胡應湘透露，港穗高速公路明春動工。」 *TKP*, June 29, 1983, 4.

54 「胡應湘與日銀行家，到北京會谷牧，談建高速公路。」 *WKYP*, October 16, 1983, 2; 「谷牧會見胡應湘。」 *TKP*, October 16, 1983, 1.

55 「胡應湘昨對記者表示，合和實業地產投資，逐漸轉移內地發展。」 *TKP*, November 12, 1983, 9.

56 例如：Naughton, *Growing Out of the Plan*, 25, 173–99; Li Lanqing, *Breaking Through: The Birth of China's Opening-Up Policy*, trans. Ling Yuan and Zheng Siying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91.

57 Min Ye, *Diaspora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and Ind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62–63.

58 「趙紫陽會見胡應湘商談引進外資問題。」 *TKP*, May 15, 1984, 1.

59 「鄧小平對胡應湘說應請港公務員訪京。」 *TKP*, June 11, 1984, 4; 「〔政協〕胡應湘在穗大談九七事，中共向公務員統戰，歡迎北上商談出路。」 *KSYP*, June 11, 1984, 1; 「胡應湘在穗表示，中共歡迎公務員，被商談出路問題。」 *Kong Sheung Wan Bo (KSWP)*, June 11, 1984, 8.

- 60 「合和在廣州週一已簽約建快速公路，」 KSWP, October 9, 1984, 7.
- 61 Luke S. K. Kwong, "Refurbishing Hong Kong's Image," 187; Jimmy McGregor, "The Chamber in Action: Sino-British Agreement on Hong Kong," *The Bulletin* (February 1985): 2, HKUSC; 「香港合和胡應湘，投資一億美元在桂林建酒店，」 *WKYP*, December 11, 1984, 2.
- 62 一九八四年六月八日，美國駐港領事館 Burton Levin 的支持聲明出現在每一份本地報章上，而國務卿則發表了他自己的聲明。參見 "Continuing Stability and Prosperity," *AmCham* 15, no. 10 (November 1984), 10.
- 63 Nyaw, "Direct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16.7.
- 64 Barry Naught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orld: Hong Kong's Economy Before and After 1997," 收錄於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Gary G. Hamilt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84.
- 65 Olivia Sin, "Textile Makers Shy Away from China Red Tape," *SCMP*, June 26, 1984.
- 66 關於趙紫陽和該高速公路，參見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88. 同時參見「旅國家派員統籌沿路縣市參建，省港澳高速公路將有突破性發展，胡應湘昨談有關情況期望年底能夠動工，」 *TKP*, April 19, 1986, 4. 關於津浦鐵路，參見 Elisabeth Köll, *Railroad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38–44.
- 67 Julian Gewirtz, *Unlikely Partners: Chinese Reformers, Western Economists, and the Making of Global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78.
- 68 Yongjin Zhang, *China's Emerging Global Businesses: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igations*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39–41.
- 69 「要為外商投資創造更好小氣候，谷牧在深圳晤港商界，談共同開拓國際市場，」 *TKP*, February 10, 1987, 2.

- 70 「省港合作投資八十億港元，廣深珠高速公路，昨簽約後天動工。」 *TKP*, April 21, 1987, 1.
- 71 飛翔編輯部，女性主宰的世界：最有權力的中國女人 (Beijing: Feixiang shidai wenhua chuanmei youxian gongsi, 2009), 224. 同時參見「莫觴清，Moh Song Ching」上海總商會同人錄 (Shanghai: Shanghai zong shanghai, 1918), 42. 訪問於 Modern History Databases (MHDB).
- 72 「蔡聲白先生」現代實業家 (Shanghai: Shanghai shang baoshe, 1935), 33–34. 訪問於 MHDB.
- 73 女性主宰的世界，225.
- 74 Antonia Finnane, *Changing Clothes in China: Fashion, History, Na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8–9; 「蔡聲白」現代實業家，34.
- 75 Peter Quay Yang, *Recollections at Random* (Hong Kong: Signal Printing, 2013), 59.
- 76 「鉞後正一抵港，希望促進港口貿易」 *WKYP*, May 31, 1956, 5; 「蘇浙同鄉會同人，宴賀三位鄉彥晉紳，邱德根楊元龍朱成信」 *WKYP*, January 20, 1965, 12; 「廠商會新首長選出，莊重文任會長，副會長胡文瀚楊元龍洪祥佩」 *KSYP*, August 21, 1968, 4; 「楊元龍甘銘任，貿易發展委員」 *WKYP*, October 12, 1968, 4.
- 77 「出席國際棉紡業會議，港代表團昨飛日內瓦」 *WKYP*, January 28, 1962, 8; 賀梅山，「日內瓦棉紡織品會議現狀」 *TKP*, February 1, 1962, 2; 「楊元龍安子介由歐飛返港」 *WKYP*, February 18, 1962, 7; 「楊元龍飛歐美，任港代表顧問」 *WKYP*, May 5, 1963, 7; 「港府任免令」 *WKYP*, July 27, 1963, 12; 「談判棉品輸英分類問題，港棉業團飛英」 *TKP*, November 12, 1963, 4; 「棉業代表團飛倫敦談判，研究分類配額問題」 *WKYP*, November 12, 1963, 5; 「港英棉業談判結果，港英今日發表」 *WKYP*, November 23, 1963, 5.
- 78 Peter Dunn, "Marjorie Yang '74, Extending a Textile Tradition," *MIT News Magazine*, June 17, 2014,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article/528021/marjorie-yang-74/>; "Marjorie Yang: Biography," <http://www.principalvoices.com/voices/marjorie-yang-bio.html>; Carla Rapoport, "Stitched for Big Time on the Mainland," *SCMP*, September 22,

- 1997, 14.
- 79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Alumni Stories, "Marjorie M. T. Yang (MBA '76)," January 1, 2002, <https://www.alumni.hbs.edu/stories/Pages/story-bulletin.aspx?num=2023>.
- 80 「廖承志副委員長設宴招待・香港企業家楊元龍車家驊・」TKP, November 12, 1978, 1.
- 81 Thomas G. Moore,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Chinese Industry and International Sources of Reform in the Post-Mao Er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65–66.
- 82 Yun-wing Sung, "The Role of Hong Kong in China's Export Drive," *Australian Journal of Chinese Affairs* 15 (January 1986): 83–101. 匡世參照 "Textile Exports Threat," *AmCham* 15, no. 9 (September 1984), 9–11; Stanley J. Marcuss and Philip D. Fletcher, "Country of Origin," *AmCham* 15, no. 10 (October 1984): 27–29.
- 83 Moore, *China in the World Market*, 71–72, 85.
- 84 關於基礎設施對滙達集團投資的影響・參見 Tyler Marshall, "Modern Facilities Give China's Competitiveness a New Edge," *Los Angeles Times*, January 16, 2005,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05/jan/16/business/ft-quotaside16>.
- 85 Mark L. Clifford, *The Greening of Asia: The Business for Solving Asia's Environmental Emergenc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1–62.
- 86 "Hong Kong's Marjorie Yang," *Businessweek* June 28, 199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1998-06-28/hong-kongs-marjorie-yang-intl-edition>.
- 87 Fred S. Armentrout, "Squaring Tiananmen: Blood and Sanctions in the PRC," *AmCham* 20, no. 10 (October 1989): 29.
- 88 首先・參見 Louisa Lim, *People's Republic of Amnesia: Tiananmen Revisite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關於天安門事件起源和遺留問題的文化分析・參見 Wang Hui, Theodore Hutters, and Rebecca Karl, eds.

- 89 Susan Hill, "American Banks in China: World Sanctions Squeeze PRC Credit," *AmCham* 20, no. 10 (October 1989): 10–12.
- 90 "The Chinese Economy in 1989 and 1990: Trying to Revive Growth While Maintaining Social Stability," *AmCham* 22, no. 10 (October 1990): 36–43.
- 91 "Massive Drop in China Visitors," *AmCham* 20, no. 10 (October 1989): 40.
- 92 關於許家屯，參見許家屯，許家屯香港回憶錄（上）（Hong Kong: Lianjing chuban gongsi, 1993）。關於張湘，參見 Mary Ann O'Donnell, "Heroes of the Special Zone," 收錄於 O'Donnell, Wong, and Bach, *Learning from Shenzhen*, 58.
- 93 "4 June 1989: AmCham Takes a Position. Hong Kong Takes to the Streets," *AmCham* 20, no. 7 (July 1989): 10–11.
- 94 Hill, "American Banks in China," 12.
- 95 「港口經合委會唐驥千表示，日對港投資穩定增長，北京局勢對港經濟構成一定影響。」 *TKP*, June 7, 1989, 24.
- 96 「港對美紡品依賴減少，唐驥千稱北京事件對聯亞無影響。」 *TKP*, June 30, 1989, 20.
- 97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13, 110.
- 98 Sayer, *The Man Who Turned the Lights On*, 92–94, 96–107.
- 99 Jeffrey A. Engel, *The China Diary of George H. W. Bush: The Making of a Global President*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461.
- 100 Robert L. Suetlinger, *Beyond Tiananmen: The Politics of US-China Relations, 1989–2000* (Washington, D.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2003), 79–93.
- 101 Fred S. Armentrout, "Squaring Tiananmen: Blood and Sanctions in the PRC," *AmCham 20*, no. 10 (October 1989), 24.
- 102 Suettinger, *Beyond Tiananmen*, 95.
- 103 Armentrout, "Squaring Tiananmen," 25.
- 104 "AmCham's Position on the Escalation of China Sanctions," *AmCham 20*, no. 10 (October 1989), 27; M. C. Jaspersen, "Jensen International Warns Against Further US Trade Sanctions on China," *AmCham 20*, no. 10 (October 1989): 30.
- 105 Andrew B. Brick, Bryan T. Johnson, and Thomas J. Timmons, "Report: Washington's Agonizing Decision, to Extend or Revoke China's Most-Favored-Nation Trade Status," Heritage Foundation Asian Studies Center, *Background*, no. 104 (May 8, 1990): 1–12,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1990/05/washingtons-agonizing-decision-to-extend-or-revoke-chinas-most-favored-nation-trade-status>.
- 106 Peter Robinson, "Stormy Year Ahead for New Amcham Boss," *SCMP*, January 1, 1987, 3.
- 107 Robbie Shell, "Alive and Well and Working in . . . Hong Kong," *Wharton Alumni Magazine* (Spring 1997), 15–16, <http://whartonmagazine.com/wp-content/uploads/1997/04/am97spr.pdf>, October 4, 2018.
- 108 Michael Marray, "US Business Build-Up Gathers Pace," *SCMP*, July 13, 1987.
- 109 Stephanie Jones, *The Headhunting Business* (London: Springer, 1989), 87; Evelyn Cromer, *The Son from the West* (Leicester: Troubador, 2007), 317.
- 110 「美國商會總裁鄭明訓表示，美保護主義仍受制衡，港貨輸美可望再增長。」*TKP*, January 3, 1987, 10; 「連任美國商會會長鄭明訓指出，美國保護主義，仍威脅港出口。」*WKYP*, January 7, 1987, 5.
- 111 Chu, *Chinese Communists and Hong Kong Capitalists*, 69–70.

- 112 Paul M. F. Cheng, "Presidential Memo," *AmCham* 18, no. 2 (February 1987): 5.
- 113 「貿易諮詢委會非官委員，十二人獲延期一年，美國商會總裁鄭明訓新加入，」 *WKYP*, June 27, 1987, 5;
- 114 "Briefs: AmCham President on TAB," *SCMP*, June 27, 1987; Cheng, "Presidential Memo," 5-6.
- 115 "US Citizen Takes Up His Place in History," *SCMP*, October 12, 1988, 7.
- 116 Mandie Appleyard, "Sunday Portrait: A Moderate Who Won't Sit on the Fence," *SCMP*, January 15, 1989, 10.
- 117 同時參見「辯論施政報告，關注人才外流，議員力主治本，培訓接班人才，」 *WKYP*, November 11, 1988, 3; 「容許外國律師執業增海外投資者信心，鄭明訓認為對本港前途有好處，」 *WKYP*, March 22, 1989, 10.
- 118 「李嘉誠說學生只是愛國行動，學運不會帶來危機，不會改變投資計劃，對港影響屬暫時性無意拋售屬下股票，張鑑泉呼籲勿使遊行變盲潮，」 *WKYP*, May 26, 1989, 3.
- 119 「中國學運長遠來看，鄭明訓說對港有利，可望促使中國市場更加開放，」 *WKYP*, May 26, 1989, 3.
- 120 John Kamm, "Presidential Memo: Sanctions Against China" and letter to President George H. W. Bush, February 5, 1990, *AmCham* 22, no. 3 (March 1990): 56-57.
- 121 「立法局議員，前美國商會會長，鄭明訓盼美顧各方利益勿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中美貿易關係若倒退香港難免受沉重打擊，」 *TKP*, April 20, 1990, 7; 「前美國商會主席鄭明訓警告，若取消中國最惠國待遇，港美貿易必受損害，」 *WKYP*, April 20, 1990, 10.
- 122 John Kamm, "Presidential Memo: On to Washington!" *AmCham* 22, no. 5 (May 1990): 81.
- 123 C-SPAN, "China's Most Favored Nation Status, Part 2," May 16, 1990, <http://www.c-span.org/video/?14300-1/chinas-favored-nation-status-part-2> (16:00-37:00).
- 124 Kamm, "Presidential Memo," 81.
- "Statement by Press Secretary Fitzwater on the Renewal of Most-Favored-Nation Trade Status for China," May 24,

- 1990, 收錄於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Bush, 1990, Book I—January 1 to June 30, 1989*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91), 715–16.
- 125 "Bush Says China MFN 'Not A Special Favor,'" *AmCham* 22, no. 8 (August 1990): 40.
- 126 "AmCham's MFN Maydays in Washington," *AmCham* 22, no. 8 (August 1990): 39.
- 127 Robert A. Mosbacher, "Hong Kong: America's Business Partner in Asia," *AmCham* 22, no. 9 (September 1990): 93.
- 128 「羅康瑞當選總商會主席，龐約翰鄭明訓分任副職，麥理覺與羅康瑞就中國問題意見分歧，宣佈不再角逐立局可能由鄭明訓補替，」 *WKYP*, April 30, 1991, 1.
- 129 「美中之間最優惠國待遇，浦偉士稱對港經濟重要，王于漸指出若終斷最惠待遇對港打擊大，」 *TKP*, May 4, 1991, 8.
- 130 「向華府國會議員遊說，總商會廿日派團赴美，促延續對華最惠待遇。鄭明訓強調美若一意孤行亞洲嚴重受害，」 *TKP*, May 11, 1991, 8; Sondra WuDunn, "Chamber Takes Smart Tack on MFN Mission," *SCMP Business Post*, May 10, 1991, 12.
- 131 「鄭明訓率團赴美國，遊說予華最惠待遇，」 *WKYP*, May 18, 1991, 12; 「鄭明訓昨率團赴美，促延對華貿易優惠，盼美勿在此問題上附加條件，」 *TKP*, May 18, 1991, 10.
- 132 Michael Chugani, "Trade Status a Struggle to the End, Warns Cheng," *SCMP*, May 25, 1991.
- 133 「鄭明訓強調赴美遊說收穫滿意，美續予華最惠國樂觀，港商勿急於撤走資金，」 *WKYP*, June 7, 1991, 12.
- 134 「鄭明訓談最惠國地位，稱港商無需過份反應，呼籲去信美國國會進行遊說，」 *TKP*, June 7, 1991, 11.
- 135 「鄭明訓擬組商界遊說團，分訪北京及華盛頓，期望中美談判減少打擊本港，」 *WKYP*, November 30, 1991, 3.
- 136 「鄭明訓談最惠國問題，稱港人仍需繼續遊說，如中國能加入關貿問題可解決，」 *TKP*, July 26, 1991, 22.
- 137 Michael Chugani, "Fung Finds Assurance in Washington," *SCMP*, January 31, 1992.

- 140 139 138
 Kevin Murphy, "Lobbyists Seek Key Sino-US Talks Role," SCMP, April 30, 1992.
 Gevirtz, *Unlikely Partners*, 245–54.
 Enright, Scott, and Doddwell, *The Hong Kong Advantage*, 14.

第九章

- 1 Sheldon H. Lu, "Filming Diaspora and Identity: Hong Kong and 1997," in *The Cinema of Hong Kong: History, Arts, Identity*, ed. Poshet Fu and David Dess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273–76.
- 2 鍾士元參考一九八二年進行的三次調查，其顯示贊成維持現狀的比例為百分之八十五至九十三。參見 Sze-yuen Chung, *Hong Kong's Journey to Reunification: Memoirs of Sze-yuen Chung*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0–51. 其他的意見調查及向外移民的情況都已歸入這一結論。參見 Wong Siu-lun, "Deciding to Stay, Deciding to Move, Deciding Note to Decide," in *Cosmopolitan Capitalists: Hong Kong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ed. Gary G. Hamilton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9), 135–36.
- 3 Wm. Roger Louis, "Hong Kong: The Critical Phase, 1945–194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2, no. 4 (October 1997): 1055.
- 4 「東方海外主席蕭建雄認為，航運業今年難好轉。」 *Kong Sheung Wan Bo*, June 21, 1983, 5.
- 5 「東方海外主席蕭建雄表示，市場對集團重組後貨櫃運輸服務頗復信心。」 *Wah Kiu Yai Po (WKP)*, July 14, 1987, 18.

- 6 Jack Chi-Chien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Hong Kong," 由 Carolyn Wakeman 於一九九九年進行的口述歷史, Regional Oral History Offic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2003, 141.
- 7 「董建華航運集團重組, 債權人控制主要股權, 董建華放棄經濟權益成受薪首席行政員, 債權人初步反應良好預料七月底可實施,」 *Ta Kung Pao (TKP)*, May 17, 1986, 9.
- 8 「袁庚董建華昨簽署協議, 招商局購入歐亞企業, 共斥資一億七千萬美元, 將把歐亞青衣深水岸線建成多用途碼頭,」 *TKP*, June 14, 1986, 13.
- 9 「董氏集團重整重要里程碑, 霍英東與董建華簽約, 注資一億二千萬美元, 霍英東稱注資可加強董氏重整資金實力,」 *TKP*, September 3, 1986, 9.
- 10 Tang, "The Textile Industry," 142.
- 11 Stephen Vines, "Profile: Tung Chee-hwa, China's Secret Weapon," *Independent*, November 24, 1996, <https://www.independent.co.uk/voices/profile-tung-chee-hwa-chinas-secret-weapon-1354010.html>.
- 12 Yongjin Zhang, *China's Emerging Global Businesses: Political Economy and Institutional Investigations*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138.
- 13 「利漢釗丁午壽董建華, 加入新昌集團董事會,」 *WKYP*, January 5, 1987, 14.
- 14 Chung, *Hong Kong's Journey to Reunification*, 235–36.
- 15 Andy Ho, "Spotlight on Tung,"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SCMP)*, February 6, 1996, 17.
- 16 Simon Beck, "Time to Prove His Mettle," *SCMP*, September 7, 1997, 13.
- 17 Robbie Shell, "Alive and Well and Working in . . . Hong Kong," *Wharton Magazine* (Spring 1997), <http://whartonmagazine.com/issues/spring-1997/alive-and-well-and-working-in-hong-kong/#sthash.ilqeNCzm.dpbs>.
- 18 Hong Kong Government, "Explanations of Some Questions by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 Congress Conc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ity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Adopted at the 19th Session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8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n May 15, 1996), " <http://www.gov.hk/en/residents/immigration/chinese/law.htm#nat>.
- Most recently, 參政「百人會中國年會 / C100 China Conference 2018, 1101 年十二月一日・中國・北京」6-7.
- "The Committee of 100, First Greater China Conference: Bridging the Pacific, January 12-14, 2005, Grand Hyatt Hotel,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Special Collections.
- Kathleen and Robert Thurston-Lighty, *The Stars Aligned: Celebrating the 20-Year Anniversary of the MIT-China Management Education Project* (水到渠成...慶祝麻省理工學院 [MIT] 中國管理教育項目二十周年紀念)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16), 35, 49, 55, 62.
-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Money, Power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s* (London: Verso, 1994), 118-20.
- Arrighi, *The Long Twentieth Century*, 152.